

平定縣裡不平定： 山西省平定縣文革史(下)

No Peace in a County Named “Pea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Pingding, Shanxi

郝志東、黎明 / 著





No Peace in a
County Named
“Peace” :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Pingding, Shanxi

當代中國研究（二）09

平定縣裡不平定： 山西省平定縣文革史 (下)

郝志東、黎明 ——著

目錄

• 上冊 •

前 言 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及其對今人的啟發兼介紹本書各章	9
第一章 走過幾千年：平定簡史	59
第二章 文革的思想動員：學毛選、批「黑幫」	83
第三章 文革的組織動員：平定有了紅衛兵	119
第四章 練「兵」：破四舊、立四新、鬥牛鬼蛇神	147
第五章 「長征」：為紅衛兵充電	187
第六章 鬥「走資派」：文革掀高潮	211
第七章 「奪權」：文革高潮與平定第一次奪權	235
第八章 再「奪權」：文革高潮與平定第二次奪權	261
第九章 奪權之後：總站和兵團正式分派以及陳永貴和解放軍的作用 ..	285

• 下冊 •

第十章 武鬥初起：總站得勢、兵團敗走東鄉.....	337
第十一章 武鬥升級：兵團得勢、總站撤退昔陽.....	387
第十二章 武鬥的後果：多人重傷、三人致死.....	427
第十三章 貌合神離的拉郎配：大聯合與平定縣革委會的成立.....	445
第十四章 肇固革命成果：清隊、一打三反、清理三種人.....	489
第十五章 學大寨運動：一首唱走調的歌.....	549
第十六章 餘音嫋嫋：階級鬥爭的邏輯還未拋棄.....	597
結語 文革反思的困難與必要性	625
附錄 人物小傳.....	641

武鬥初起：總站得勢、兵團敗走東鄉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¹

為什麼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

——毛澤東與周恩來、王力、謝富治、陳再道、鍾漢華等人的談話²

我們不能太天真爛漫。當挑起武鬥的一小撮人，他們拿起武器打你們的時候，革命群眾可以拿起武器自衛。在雙方達成停止武鬥的協定以後，他們仍然不把武器收起來的話，你們自衛的武器不能放下！（鼓掌，並高呼：毛主席萬歲！）我記得好像就是河南一個革命組織提出這樣的口號，

1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見於建燦（主編）《中國農民問題研究資料彙編（第一卷）》，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7年版，第321頁。

2 前引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第576頁。

叫做「文攻武衛」。這個口號是對的！（熱烈鼓掌。）……放下武器，這是不對的，你們要吃虧的，革命小將你們要吃虧的。

——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在接見河南
「二七公社」的代表時的講話，1967年7月21日³

平定的武鬥，一開始是拳打腳踢，後來是石頭磚瓦，再後來，真槍實彈。之所以敢這樣搞，是因為無法律約束，有理論指導、有榜樣。這個理論指導，就是毛澤東和江青的上述語錄。當時的榜樣是河南的「二七公社」和上海的「一月風暴」。在平定，武鬥初起並逐步升級的過程，也是紅總站力圖鞏固自己在中共平定縣核心小組的優勢，並以此鞏固政權的過程，也是失勢的兵團在政權問題上與總站抗爭的過程。本章將敘述武鬥和爭奪政權這兩條相互纏繞在一起的線索。這些武鬥興起勃發的背景，是身為「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的毛澤東夫人江青，在接見河南「二七公社」代表團時提出的「文攻武衛」。

「文功武衛」，顧名思義，就是兩派之間，攻擊手段要「文」，而守衛方式則「武」。這是個邏輯十分混亂的提法：前提「文攻」，應當導致的結果是「文衛」，這合乎「君子動口不動手」的古訓，也合乎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的初衷和警告。但若一方動武，無論是「攻」是「衛」，必然導致雙方大打出手，這也合乎人性中「以牙還牙」的特點。作為中央一級的領導人說話，影響之大，可謂一言九鼎。其後果可想而知。「文革」初始，儘管毛澤東主持制定的「十六條」和其他文件中已經一再告誡「要用文鬥，不用武鬥」，但是在事實上中央並沒有採取有力措

³ 康生、江青、陳伯達，「中央首長第七次接見河南赴京代表團紀要」，1967年7月21日。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施去制止武鬥。正如我們在前言中所指出的，中央領導包括毛澤東對暴力是默許的。這個「文攻武衛」口號的提出，無論是時間上還是火候上，恰恰成了全國上下全面動武的理論根據。江青提出的「文功武衛」的口號，雖說邏輯上有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味道，但是十分適用。而且和毛澤東宣導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暴動」的教導也基本吻合。在全國各地的兩派已經鬧到箭在弦上引而不發躍如也的地步的時候，她的指示，無疑是讓把這弦上的箭放出去，是在旺火上澆了股油。繃得太久的弓弦，在「紅都女皇」（一個外國女人給她寫的傳記的書名）的一聲號令之下，便矢飛如雨了。

山西的武鬥

這時候的山西，已經不再是「山雨欲來風滿樓」，而是「風雨如磐暗故園」了。翻開浩浩的長卷本《山西通志》，我們就能看到「文革」進入「萬馬戰猶酣」時期的 1967 年到 1969 年的血腥畫面：

1967 年

2 月 4 日，晉東南武鬥事件不斷發生，造成嚴重傷亡和財產損失。

3 月 7 日，離石中陽兩縣「造反派」包圍臨縣城，搶走縣武裝部大批武器。

4 月 14 日，太原各「造反派」組織相互爭鬥，公開分裂，武鬥相繼發生。

8 月 7 日—9 日，平遙兩派「造反派」組織之間矛盾激化，發生了大規模武鬥事件。參加武鬥的有從太原去的「造反派」頭頭楊成效等和平遙附近各縣的「造反派」組織近萬人，造成嚴重後果。

9 月 5 日，兩派群眾組織在太原十中發生大規模武鬥事件，造成重大

傷亡，公共財產破壞損失嚴重。武鬥持續兩天。這就是當時聞名三晉的「九·五事件」。

本月，陽泉、晉南發生武鬥事件。

12月1日，西山礦務局武器庫本月1日、5日、10日3次被搶。

12月3日，太原並州飯店發生大規模武鬥，持續兩天，造成傷亡和經濟損失。

上月19日，省城一些「造反派」組織搶劫太原市武器庫，搶去部分槍支彈藥。

12月21日，陽泉又發生大規模武鬥，造成嚴重傷亡。

1968年

1月7日，晉東南發生武鬥，一派「造反」組織向長治市內打炮，造成傷亡。

本月，晉中一派「造反」組織組織八縣聯防軍（後又擴展到十三縣），與另一派爭鬥，造成嚴重後果。

1月28日，太原一些造反派衝入省軍區機關，造成「一·二八事件」。

4月10日，晉中「八縣聯防軍」衝擊離石縣監獄，搶去武器，放出犯人，打死打傷軍民數人。

4月24日，交城縣「造反派」組織搶奪駐交解放軍武器，衝擊監獄。27日，縣武裝部受到衝擊，被搶走一批武器。

5月8日，太原鋼鐵公司兩派「造反派」組織發生武鬥，一派組織所住的太鋼職工學校大樓被炸裂，樓梯被炸塌，武鬥雙方死亡6人，經濟損失達19萬多元。

5月9日，「晉中十三縣聯防軍」與陝西「造反派」組織「紅工機」3000餘人。聯合攻打中陽縣城，把該縣一派「造反派」組織趕出縣境，

造成嚴重傷亡，並抓捕數百人。

15日，太原、晉中、陽泉、晉南、晉東南等地武鬥不斷發生。據晉南22縣6個月的統計，在武鬥中共有31萬多人受害。有的被監禁勞改，有的被揪鬥抄家，有的被打傷打殘，有的被逼死或外逃，造成嚴重後果和損失。在此前後，文水開柵、離石大武鎮、汾離公路、大軍公路連續發生大規模武鬥，並伏擊汽車，造成重大傷亡及嚴重經濟損失。

6月19日，「晉中十三縣防聯軍」與太原、晉東南、陽泉以及陝西的一些「造反派」組織，聯合武裝包圍晉中的另一派「造反派」組織駐地，造成大規模武鬥事件。

1969年

1月19日，建工部第八工程局第二安裝公司辦公大樓被「造反派」圍攻，造成嚴重傷亡，4名解放軍戰士也遭毒打。

24日，臨汾地區發生「一·二四」武鬥事件。

2月2日，省城軍區在五一廣場舉行迎芒果大會，由於兩派衝突，許多群眾和解放軍戰士被打傷。

3月9日，平汾公路交通要道汾河鐵橋被「造反派」放火焚燒。

3月，太原市區銀行、郵局、工廠等不少單位繼續發生武鬥，打傷群眾多人。

5月28日，臨汾地區一些「造反派」組織武裝衝進晉南軍分區軍械庫，搶走部分槍支彈藥。

這是《山西通史》之《大事記》卷從1967年武鬥開始到1969年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後的武鬥記載實錄。另據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68〕37號文件披露：

中陽縣400餘人武裝搶劫該縣金庫和八個營業所，共搶現金136萬

元、黃金 650 克、雜銀 818 斤、銀元 5699 個、兌金牌 15 件、兌銀牌 37 件，搶劫糧食 14 萬斤、糧票 86,000 斤、料票 288,000 斤，兌流布證 9,000 餘尺，把 2,197,000 多斤糧食下放給「紅司」觀點群眾，搶劫百貨公司庫房，搶走棉大衣、工作服、膠鞋等共值 2,980 元。⁴

這些文章很簡要，記載也不盡完備。我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抄錄下所有的正史記載，是因為這些記錄可謂「字字血，聲聲淚」（當時流行的「樣板戲」語）。集中地閱讀這些記載，當時山西武鬥的概況，便可窺一斑而知全豹。作為山西東大門的平定，作為兩大派犬牙交錯爭鬥交鋒地的平定，作為事事不落於全省之後的平定，在武鬥上當然也不甘於當尾巴，儘管其實和上述武鬥事件相比，平定可能還是小巫見大巫。不過芒果事件、油畫事件、張莊事件……日積月累，聚沙成塔，細端末節，終釀成大禍。一次偶然發生的事件，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波及全城的大武鬥，給 1969 年的新年獻上了一份充滿火藥氣息的「厚禮」。

平定武鬥的開始：「元四」、「七三」小試拳腳與和平「迎芒果」

關於武鬥的發端，潘佩經的回憶是：

兩派形成後武鬥就逐漸開始了。1968 年元月四日事件是最早的武鬥。這天下午兵團打來電話，說今天晚上紅總站可能有活動，讓吃過晚飯到人委大院集中。當時我留在學校，把我們的人派了去。武鬥結束後，他們回來對我說，兵團的人守的是人委那座二層樓，紅總站進攻。雙方都是扔磚頭。我們把花園牆上的磚拆下來往外扔，他們就不敢進來了。紅總站攻了幾次，都沒有成功，後來撤走了，雙方都沒有人受傷。武鬥的導火線是封

4 見平定縣檔案館存檔第 663 卷。

了核心小組，紅總站就開始在縣委集中。通過這次武鬥，我才聽說馬車社的河神爺、藍狗貨（這是他們的外號）、賈文彩、潘振華四個人在當晚出力很大，沒有他們紅總站很可能會衝進來。

查封核心小組，是兵團派認為新改組的核心小組和自己的觀點不一致而採取的行動，他們認為是黨的領導權應該在誰手裡的問題。平定馬車社的社址在原東關街裡，現東關村委會附近，與原平定中學（現陽泉礦務局職業二校）相距很近。蘭狗貨姓蘭名苟和、河神爺姓名不祥。馬車社工人因力大且獨自趕車，慄悍出名。

其實在 1967 年 7 月 3 日，平定就曾經爆發過一場小型武鬥。這就是平定「文革」史上比較有名的「七三事件」。關於這場武鬥的全過程，郝忠德的回憶比較細緻和全面，描述了紅總站一派的動向：

1967 年 7 月 3 日，在平定東關職工俱樂部召開「紅總站」成立誓師大會。大會原準備在上午 9 點開始，但人群不斷地進入會場，怕發生意外，就推遲了開會時間，還抽調工業系統 200 人和「紅戰團」150 人維持秩序。這時人還是太多，董鋼就叫紅戰團再抽調 150 至 200 人加強維護。主席臺上來了不少前來祝賀的代表，其中陽泉來了不少。10 點多大會才開始。首先由副總指揮郝守映宣讀成立宣言，後由紅總站總指揮董鋼作題為「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聯合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的講話。

這時候，陳永貴進入會場〔另有人說陽泉的梁寶貴也擔著盒子槍上了臺〕。頓時口號震天。董鋼請陳永貴講話，陳講了文化革命的大好形勢。講完後，陳說要去北京，就離去了。

大會一直開到 12 點多才結束。由於太晚了，便決定遊行推遲到下午進行。下午，我們在職工俱樂部集結。這時，忽然來了一些人堵住了大

門。陽泉前來參加遊行的汽車，被「紅指」的學生手圍阻。遊行隊伍排成隊衝出去上了大街。

文革發展到這時，兩派就已經要勢不兩立了。郝忠德接著講：

遊行結束後，有部分遊行隊伍向政府大院（即「籌委會」駐地）進發，籌委會就調人保衛。政府大院裡擁擠不堪，雙方展開辯論，辯論發展成指責和謾罵，還有人互相推搡。陽泉為支持紅總站又開了 50 多輛汽車，有陽鋼鋼鐵兵團，有化工廠、化工局、煤炭系統等單位的造反派。傍晚，保衛籌委會的人都去食堂吃晚飯，紅總站的人也退下來。

這時有人喊「哎喲！石頭，有人扔石頭！」紅總站的人一片混亂，都奪路去躲石頭。這時發現有軍人換便裝混入人群，陽泉的人就抓了一個人，就是軍訓的周排長。人們一直鬧到深夜。這的確可以稱得上是平定文革的兩件大事。一是紅總站的成立，二是「籌委會」的解體。

紅總站成立後第一件事情就是衝擊「籌委會」，這和 1968 年兵團衝擊核心小組一樣，也是政權之爭。時任「紅戰團」作戰部長的翟全臣回憶了武鬥的起因和過程：

「七三事件」是 1967 年的事。七三事件的核心是砸籌委會的牌子和搶籌委會的章。我記得那會兒平定家〔地方話，即平定人，指「紅總站」〕從陽泉調來了不少人，領頭的是陽鋼兵團的李勇健，來了十多汽車⁵人。紅指的人知道了就馬上行動，由解放軍帶著紅指的人去保衛籌委會。陽泉來的人是在紅總站進職工俱樂部的時候到的，兩派都來了人，這兩派人就鬥

5 書裡提到的載人的汽車，通常是指可以載幾十個人的敞篷的解放牌大卡車或嘎斯車。

上了。當時有個解放軍的排長叫周廣財，是穿便衣去的。可能是有人和陽泉紅總站的人說這人是個頭，晚上趁亂陽泉紅總站就把周排長弄走了。打鬥完以後回來清點，部隊上少了個人，這才由解放軍向陽泉軍管會反映要人，第三天周排長才從陽泉被放回來。

這便是平定「文革」史上的「七三事件」。周廣財是平定中學軍訓排高三班（即高三排）的排長。「七三事件」過後，周廣財返回平定中學時，「紅指」的學生在校內夾道歡迎，給周排長披紅戴花。這次武鬥事件，雙方大打出手，但沒有造成人員傷亡。這是兩派圍繞權力而爭鬥的又一個大的交鋒。七三事件的整個過程，是從東關職工俱樂部到原縣人委大院，雙方相互產生身體接觸，相互推搡。「保」和「砸」都是在爭奪平定縣縣一級的領導權。這也是平定「文革」開始後一次規模較大的社會化的行動。兩派的人都跳出原來的行業範疇，以觀點不同而分派行動，甚至各自從外地增調援手。

作為一名普通學生，當時的高四班學生李金田參與了「七三事件」的全過程。他是走讀生。由於學校無課可上，他去學校只是例行公事地逛一趟。他是「紅指」裡最普通的學生，加入「紅指」，也是隨大流跟風而入，並沒有自己的觀點。他在《「文革」的回憶》中講述了他親歷「七三事件」的過程。他的記敘可能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事情的面貌：

「七三事件」發生時間在 7 月 3 日下午。那一天，我到校後，見「紅指」組織人到東關奶奶廟集合，似乎是紀念和慶祝什麼事情，但具體的卻忘了。有同學叫我去參加活動。我平時游離於運動之外，見人家看得起我，就高興地隨大流去了。到了那裡，人很多，很亂。這時有人喊「紅戰團要衝大門」，於是便蜂湧去守職工俱樂部的正門。到正門後，見有人往

裡衝，有人往外堵，兩股人流湧來湧去，卻並沒有動老拳。

後來，又有人喊說紅戰團要衝會場側門，我便跟隨人流來到南門。南門是一個鐵柵欄門，已被打開，雙方擠作一團。「紅指」這一邊，以女生居多，「紅戰團」男生多，而且還從陽泉叫來一批人。這些人坐在敞篷「嘎斯」車上，汽車正要朝會場裡開。

「紅指」有人號召手挽手阻止汽車。我這時已被湧到隊伍前邊，便與一排同學手挽手阻擋汽車。後面的同學擠在我們身後，使勁前壓，我的腿被擠壓在汽車的保險杠上，擠得生疼，但我們齊聲唱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毛主席語錄歌」，沒有後退。汽車使勁地轟著馬達，但也沒硬往前闖。雙方相持不下，鬧騰到黃昏。我跟著人流跑來跑去，卻一直也沒弄清這是誰家開會、開什麼會。

後來，忽有人喊去縣人委院裡。我便跟隨人流，一齊衝進縣人委大院。這時，天已近傍晚，院裡的人群湧來湧去，但我卻不知道為的什麼，只是跟著亂跑。九點多鐘時，天全黑下來了，院裡的人又饑又累，喊聲漸漸小了。有人說食堂正在分發乾糧。我便跟隨幾個同學來到食堂，見有人抬來一個柳條筐籃，裡邊盛著玉米麵窩頭。餓極了的我伸手抓了兩個，啃了起來。正啃著，外面又一陣紛亂。我們跑出去，忽見圍牆下的人流忽地退了回來，有人驚呼「扔石頭了，小心！」黑暗中，看不清石頭，但能聽到石頭砸地「撲通」的響聲。石頭是從牆外扔進來的。混亂中，人流忽東忽西地湧動著，一直鬧騰到天色微明，我才與同學相跟著散去，返回家中。

郝忠德的回憶，李金田的親歷，已經概略地勾畫出這個事件的輪廓。這個事件整個過程中，雙方折騰的挺凶，卻並沒傷人。這個事件中，在平定中學擔任軍訓的解放軍高三班（排）周廣才排長被綁架，使「紅指」的

學生更加同仇敵愾，卻也增添了一些慌亂。

「七三事件」之後，兩派為了爭奪權力而進行武鬥已成定局。接踵而來的元四事件、迎芒果事件，就是在繼續爭奪權力、爭奪自己組織的合法性。但是迎芒果事件並沒有導致武鬥，而是和平進行，和平結束。也可以說是在面臨即將升級的武鬥時，兩派之間短暫的和平。

芒果，一種熱帶水果。這會到街上水果攤那裡，掏錢就能買到。可是在「文革」時期，對於中國北方人來說，那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稀罕玩藝兒。當年，中國和柬埔寨兩國關係密切，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因國內局勢不穩，長年住在北京。一次回國返京時，給毛澤東主席帶來幾簍芒果，請主席吃個稀罕。主席念及全國各地造反派對「文化大革命」的貢獻，分出一些要給大家嘗嘗。山西省的造反派是幹得最出色的團體之一，分得一枚。嘗是不夠的，即使分到細胞一級，也不夠嘗。而且，誰也不敢嘗，因為這是對偉大領袖的褻瀆。但是，這種精神的鼓勵，無異於放了一顆「精神原子弹」（當時流行語）。

這枚珍貴的芒果要從北京運到山西，在鐵路線山西省的入境口娘子關站要舉行迎芒果儀式，如同現時迎奧運會的火炬傳遞接力一樣。平定的兩個陣營的造反派對於享受這樣的殊榮，以增加自己組織的合法性，享受一種來自毛主席的關懷或說加持，當然都異常重視。於是，各自組織了強大的陣容，從縣城趕往八十里外的娘子關，迎接「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的珍貴饋贈。作為親自去東站迎接的「紅指」首領，劉振傑親歷了這次活動：

芒果是毛主席給的，是從河北省石家莊送過來的。因為送芒果來是半夜，所以兩派都連夜去取。誰去的早，占了車站，誰就接住了。所以兵團

就早早去了，先迎接住了。接回來，第二天下午搞的慶祝遊行，兵團組織的。

劉振傑所述說的事實，時間是 1968 年盛夏。那時候，兩派對立已經形成，誰先接了毛主席送給的芒果，似乎暗示著誰就受到偉大領袖「最大的關懷、最大的支持」，當然也就有隆重慶祝的理由。當時李金田被派去刷寫大字標語。他站在原東門裡「玻璃社」（做玻璃加工業的手工業生產社）的房頂上，邊在糊好的整張大紙上用排刷寫字，邊近距離目睹了那枚珍貴異常的芒果和後邊浩浩蕩蕩激情充沛的遊行隊伍：

那枚芒果裝在一個大玻璃罩子裡邊，放在一輛大卡車的駕駛樓頂上，兩邊站著兩個解放軍，挎著槍守衛著。前頭是鼓樂隊，後頭是舉著語錄本喊口號的人們。隊伍很長，窄狹的街上人擠得滿滿的。那芒果不大，長圓形的，下邊墊著紅絨布，拿紅綢繫著。後來，有人告訴我，那是假的，拿木頭做的，塗了顏色，看上去和真的一樣。真芒果不耐放，天一熱，不兩天就爛了，吃不住這麼搗騰。因為我站在房沿上，離汽車頂很近，所以下邊的人看得清楚。

「迎芒果」這件事，紅總站方面是如何應對的呢？郝忠德說：

迎接芒果，紅總站二十多輛汽車前往娘子關，到車站後還沒多少人。我們幾個到住戶找水喝，趕緊返回車站，接受芒果的娘子關駐軍列隊迎候，陸續到達的平定各界、各個組織、各個戰鬥隊自覺整隊等候。那天在車站看不出對立、派性、觀點不同，臉部表情高度一致——虔誠、莊重。這才使我真正體會到，文革有那麼多人參與，甚至生死不顧，就是因為毛

主席領導中國人民所經歷的事業前古未有、可歌可泣、崇高偉大，激勵著中國人又一次投入由他發動的文化革命運動之中，這就是大多數人的動機。

郝忠德並沒有講兵團首先接到芒果的事實，但是至少沒有發生爭鬥、沒有動武，確實難能可貴。至於和誰拿到芒果是否就更有合法性這個問題，則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心理作用而已。

總之，這時候，觀點不同的兩派算是各自有了權力機構的支持：「紅總站」有剛剛由上邊委任建立的「核心小組」，「兵團」有以前合法成立的「籌委會」。這兩個組織，分別代表黨、政權力機構，卻偏偏「觀點」大相逕庭，坐不到一盤炕上。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歷史上，黨政不和可能也會時有發生，但是各自都有群眾組織公開支持、相互叫板，則是只有文革中才會有的現象。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中央政策的問題之外，就是來自上邊——省、地權力機構的分歧。權力伴隨著利益。正在為權力爭得不可開交的人們，誰也不服誰，沒有一個權威，也沒有公平的遊戲規則能使權力取得平衡，使雙方心服口服。在這種狀態下，雙方註定要用更加激烈的手段，來爭奪和保護自己一方的權益。爭鬥方式的升級已經不可避免。

政權分歧和搶槍事件

要想打鬥得更狠，一個辦法是要有槍，熱兵器。兵團方面覺得有解放軍和民兵的支持，搞到槍很容易。總站方面覺得自己沒有其他辦法，就只能搶了。所以有了「搶槍」事件。當時大的背景，還是兩派的分裂，尤其是權力機構的分裂：黨的核心小組的主要負責人和總站是一派，而政府（籌委會）的主要負責人和兵團是一派。兩家在觀念上無法達成共識。

按照常規，當時的核心小組是黨的機構，相當於「文革」前的黨委會。這在全國都是一致的。平定的「籌委會」，當時經過奪權，行使著政府的權力，相當於以前的「人委會」，或者現時的縣政府。按照慣例，黨委領導政府，但不管具體的行政事務。雖說不管，但花個錢的事，黨委點了頭，行政不會磕絆。可「文革」一起，這些規矩在平定都亂了套：黨的機構是一派的，行政機構是另一派的，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有點像美國政府有時候的情況：政府由一黨掌握，議會由另外一個黨掌握。）黨管不了政，所以花錢就受制。受了制，就向自己一派的人訴述委屈。這一派的造反派，就要為自己的權力機構爭奪權力。黨委或者政府都不能領導全部群眾，他們反而需要自己一派的群眾為他們撐腰做主。這在民主社會是正常的，但是，在集權國家，是無法想像的。難道是為民主在練兵嗎？或許從毛澤東的角度看，是在練兵，讓他們在自己百年之後資本主義復辟的時候，能夠再掀文革運動，推翻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是這個可能現在看來基本沒有。如果這個練兵還有什麼正面的功能，則是向人們證明，黨和政府需要人民的支持，否則便沒有權威。或許在為未來的民主練兵。至少是在思想上練兵。

在兩派分歧嚴重而又互不相讓的情況下，維護「核心小組」，就得摧垮「籌委會」；保衛「籌委會」，就得推倒「核心小組」。在說理不成時，「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就顯示出其正確性。

這年 5 至 6 月，「紅總站」一派以參觀大寨的名義，在昔陽與平定連續舉辦了四期「站隊學習班」，縣、社、隊幹部共約 4000 餘人參加。學習班以「檢查、揭發、表態、站隊」的方式，學習晉中核心小組代組長任井夫、晉中核心小組副組長宋志民、晉中核心小組成員趙滿倉、平定核心小組組長閻扣成的講話。在此期間，「兵團」一派造反派成員董銀民（郵電局職工）、王學良（平中教師）、潘佩經（平中學生）等被毆打，原籌委會

班子成員張瑾瑤被圍攻揪鬥。當然，「兵團」也不是省油的燈，到了這份上，服軟裝熊，絕不是造反派的脾氣。

為了更好地鬥爭，1968 年的 5 月份，「紅總站」的總指揮們做出了一個決定：搞武器。「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就這樣被「活學活用」了。《中國共產黨平定縣歷史紀事》記載道：

1968 年 5 月，「紅總站」總指揮部常委在戲院開會，研究部署了搶武器計畫。五、六月間，「紅總站」下屬組織先後 8 次出動到 11 個村、1 個工廠，共搶到重機槍 2 挺、輕機槍 3 挺、步槍 45 支、土槍 1 支。

武器分散在農村的民兵組織裡，大部分是與日本軍隊作戰時繳獲的武器：三八大蓋、拐把子輕機槍，也有與國民黨軍隊作戰時繳獲的武器，比如衝鋒槍。民兵的裝備，並不是當時部隊裝備的好武器。這些武器，平時由生產大隊集中保管，有些村居住分散，也有小隊甚至私人保存的。當然，這些武器大都是有槍無彈的。「紅總站」是一個大組織，下屬的小戰鬥隊接到總部命令便開始搜羅槍支。紅總站的武器是怎麼來的呢？戎崇璽說：

我們自己開始建立武裝，第一回是去搶牛王廟溝的槍，把民兵連長綁架了，讓他領著人去民兵家裡拿槍。我們搶的槍包括歪把機槍、重機槍、卡賓槍、手槍、小鋼炮。

郝忠德說：

搶槍的事我知道。你們兵團家有部隊支持、有農民支持，武器來源沒

問題。我們也得找武器呀，就把學校的小口徑步槍拿了。解放軍收繳武器後，調動農民在平中開會，平定形勢變得十分緊張。南關大隊紅總站派的張茂生被打成重傷，印刷廠紅總站負責人郝和生被暴打，左腿成粉碎性骨折。開會的農民貼大字報向紅總站施壓。

顯然，他們感到需要用槍來保護自己。《楊志忠遺存傳單材料》裡，有幾份當時關於紅總站搶槍的「證明材料」。現抄錄一部分如下，讀者可以大概瞭解一下當時搶槍的過程。這是石門口公社南上莊大隊民兵營長王文科所描述的經過：

（1968）五月十五日深夜三點多，從南坪大隊方向開向我大隊一輛汽車（係木頭柵□，往常跑柏井客車之樣），坐二十餘人，身帶槍支武器。一進村，就越牆跳進大隊辦公室，用槍威逼看門的老貧農劉滿：「你們的營長住在哪裡？」劉滿被迫指示了我的住處方向，臨走時這些匪徒砸開大隊鎖子，搶走紙煙六盒。到了我家，包圍了院，設立了崗，十五、六人砸開大門，又層層包圍我住的家，有六七個人進到屋裡，三支電筒照著，兩支長槍、兩支短槍指著我，說：「不准點燈！不准喊叫！趕快起！有事要說！」當下我□不清怎麼回事，心裡很害怕，行動慢了些，這夥匪徒用大槍就打，起來後，把我押到外邊，用槍逼著我，「你們村有多少支槍？放在哪裡？如不老實交代，結果了你！」連打帶罵，押著我。在此威逼下，我只好告給他們槍支和保存人員，到各戶拿槍。每到一戶都是有人看押，立在門口，不准說話，不准入院，這夥匪徒越牆而入，進行搶竊。一共搶了八支步槍。最後到大街，一個匪徒惡狠狠地說：「沒你的事了！回去吧！」我問他們是哪個組織的？一個匪徒回答，不用你問！這是上級指示，把你們的槍收了。從進村到出村約四十分鐘左右，最後在老園（地名）停車，鳴槍一聲，車向西郊方向開走。

下面是在紅衛大隊搶槍的描述：

夜，靜靜的，經過一天辛勤勞動的紅衛大隊社員，正在甜睡之中，突然村東軍烈屬周×同志家響起了激烈的敲門聲，接著便有人喊：「開門！開門！！」周的母親在睡夢中被驚醒，急忙起來去開門，門一開，一群黑影就闖進了家逼著周母要槍，在百般無奈下周母只好把兒子的槍拿出來，這些傢伙拿走槍，緊接著又追問：「有子彈嗎？」周母答：「沒有。」他們凶聲凶氣地威脅：「胡說！不交出來槍斃了你！」周母答：「沒有就是沒有，如果不信你們可以搜，搜出來我負責。」他們看到實在沒有，便一揮手全部退了出去。周母緊張害怕的心還沒有放下，忽然幾個人又返回來了，大聲威脅說：「今晚的事不許你告訴其他人，如果告訴別人，我們明天還要來，知道後，非把你拉出去槍斃了不可！」

退出周家，又來到民兵連長趙××的家門，看到街門關著，幾個人便越牆而入。包圍了趙家住所，一邊用槍砸著家門，一邊狂叫：「開門！快開門！武裝部來收槍了！」趙覺得不對頭，便說：「把武裝部收槍的證明從門縫裡傳進來我看。」暴徒們急了瘋狂地喊：「別囉嗦，再不開我們就要砸碎玻璃，砸破門進去！」說話間門已快被砸開，趙心中一動，看看炕上還睡著三個孩子（一個六歲，一個三歲，一個剛滿八個月），如果把門砸碎，把玻璃也砸破，磕著孩子或嚇著孩子那就不好了，於是便把門打開，門剛一開，六個暴徒就闖了進來，一個提著手槍，三個端著長槍，一個拿著手榴彈，一個持著刺刀。端槍的□□〔此處詞語有辱人格，故刪去——轉抄者〕急狠狠地說：「把你的槍交出來！」「我的槍已經交給武裝部了。」「胡說！」一夥暴徒七手八足翻騰起來，結果沒有搜出，□□〔同前〕用槍使勁朝趙的前心窩狠狠地一捅，趙痛得後退幾步（到現在傷還在），並逼著：「把你的子彈全部拿出來！」趙答：「沒有。」這些傢伙

更加惱羞成怒地把趙綁了起來，一頓毒打。打完，又把趙拉到村邊的河溝裡，又是一頓毒打。毒打後逼著趙給他們帶路，「今晚拿不出槍來要了你的腦袋！」那個□□還說：「我讓你說什麼，你就說什麼，不然非把你幹掉！！」在這種情況下，趙只好給他們帶路到有槍的人家去。一路上，他們問趙這家是什麼觀點，那家是那一派的，並無恥地欺騙說：「咱們都是兵團，是一個觀點，是支持張日清的。」還說什麼：「張日清我們堅決支持，劉格平有問題，我們堅決打倒。我們是太原『紅聯站』的，搶槍的事你不要告人！我們明天還要來！……你小心點！……。」

另外幾篇證詞也都類似。裡面都有不少藝術描寫，有誇張的成分，但是基本事實應該沒有多大出入。不過，這些武器雖然到手，但沒有子彈的步槍，還不如一根棍子使著得勁。況且，兩派爭鬥雖說翻了臉，但還沒人敢開槍殺人。所以，「紅總站」到手的武器，也就是起了點炫耀的作用，讓喜歡新鮮玩意兒的年輕人背著威風了威風。7月3日，部隊來人收繳武器，「紅總站」還沒捂熱乎的傢伙兒被盡數收繳。不過，這件事是一個危險信號，它顯示著兩派爭鬥要升級，要玩真的了。

紅總站支持的核心小組在全縣建立和鞏固政權

按照當時的理論與慣例，所有的基層權力都掌握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裡，所以就要奪權。奪了權誰來掌管？就得成立一個機構。大的單位，叫革命委員會；小的單位，就叫革命領導小組。成立權力機構也有講究：這就是毛澤東「最新最高指示」所說的：「革命委員會的基本經驗有三條，一條是有革命幹部的代表，一條是有軍隊的代表，一條是有革命群眾的代表，實現了革命的三結合。」⁶

6 毛澤東，「關於革命委員會的基本經驗」，1968年3月。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

紅總站一派占了上風，縣一級的革命委員會卻無法建立。因為上述的三條，兩派都有自己的人選，捏合不到一塊。尤其是「軍隊的代表」這一條，更是紅總站的一塊短板。

那就先在基層單位搞起權力機構吧。在紅總站支持的核心小組的領導下，基層政權的建立工作開始了。1968年4月28日，公安局、檢察院、法院三家合一的「無產階級專政委員會」被核心小組宣布撤銷，「平定縣公檢法臨時領導組」成立，王金章和劉志義擔任了小組領導。這是政法機關在「文革」動盪二年後的又一次推倒重來，儘管這種恢復程度有限，儘管這個小組還不可避免地帶有派性的色彩。為此，新的核心小組專門下發了〔68〕004號文件。文中說：「我縣在聯合籌委會的密謀策劃下，於67年3月25日非法撤銷了公安、檢察、法院三機關，成立了所謂『三位一體』的『無產階級專政委員會』。現在『建立『平定縣公檢法臨時領導組』，恢復公、檢、法，並於4月30日開始辦公』。《中國共產黨平定縣歷史紀事》記述了這段歷史：

1967年12月13日，中共平定縣核心小組改組，組長閻扣成，成員有閻扣成、楊忠志、錢志超、尹廷魁、劉志義、梁子銘，上屬中共晉中核心小組。〔作者注：這個排名有誤。12月小組原排名是：閻、錢、尹、梁、劉、楊，原文件尚存。楊是兵團派。〕

1968年4月28日，中共平定縣核心小組撤銷「無產階級專政委員會」，成立「平定縣公檢法臨時領導組」，由王金章、劉志義領導，30日正式辦公。

1968年4月20日，新的中共平定縣核心小組連續發文，先後再次任

命了各公社、各系統、各單位核心小組或革委會負責人及班子成員：維社公社核心小組組長兼革委會主任宋仁，工業交通革命委員會主任吳雲載，城關公社革委會主任王懷英，南坳紙廠革委會主任李興業，塑膠廠革委會主任李巨才，化肥廠革委會主任岳星書，印刷廠革委會主任賈丕山，龍莊石廠革委會主任賈漢文，平定劇團革委會主任趙興福，中心醫院革委會主任王全生，張莊聯校革委會主任張豐功，文教衛生臨時領導組康同柱、李守珍，連方，鎖簧公社革委會主任趙俊；古貝公社革委會主任王光璧，岩會公社革委會主任王英劍，巨城公社革委會主任馬自有等。在兩派摩擦不斷矛盾激化的情況下，在基層建立權力機構，穩定底層，是這再次任命基層領導班子的目的——儘管這次建立班子的努力作用有限。

主要原因是兵團派對此不予承認。我們搜集到一些由兵團一派整理的、由當時籌委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楊志忠保存的材料，主要是兵團一派有系統地揭發和批判紅總站一派單方建立政權機構的內容。這些傳單由兵團一派所整理和撰寫，其中不乏攻訐以致詈罵。但是我們在下面的敘述中，只選錄其所述的看起來是事實的部分。透過這些，我們基本可以判斷，當時，在紅總站一派占上風時期，其主要工作就是建立自己一派占上風的基層組織的權力機構。我們從中還可以看出在權力機構建立過程中的一些細節情況，例如組成人員、建立步驟等。當然，自然流露的兵團一派對這一行動的態度，更顯而易見。這也是此後雙方爭鬥的一個因素。

以下內容，集入一冊，名為《梁子銘破壞革命大聯合和三結合實行資產階級一派掌權的罪行》（資料 2），編輯者為平定總團資料組。時間為六八年九月一日。我們這裡只做一些摘錄，以瞭解紅總站所支持的核心小組如何建立政權，而兵團一方又是以什麼理由不支持，不承認這些基層權力機構的。因為是兵團觀點，正確與否，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實，讀者也需要自己判斷。



圖 10-1 兵團揭發總站支持的核心小組成立自己的革委會的材料

資料來源：作者自拍。

《楊志忠遺存傳單材料》所存材料之一、由署名為「平定總團資料組」於 1968 年 9 月 1 日所編寫的『多中心論』，堅決砸爛閻梁『獨立王國』一文，指控梁子銘給各單位紅總站負責人安排部署說：「踢開他們兵團咱們成立，成立起來就是勝利，反正只能補臺，不能拆臺。」他們「對基層的革命領導幹部，站到『我』這一邊的就聯合，不站到我這一邊的就採取威脅、利誘、封官許願、圍攻毆打等手段，軟硬兼施、強行結合；再不行，就乾脆踢開，由閻梁三人核心小組直接往下派人。總之，不管聯合不聯合，不管人員多不多，不管幹部有沒有，不管

□□純不純，反正我們一派就是要成立派委會，就是要一派掌權」。

該傳單認為「平定縣運輸公司全公司共 42 人，其中紅總站僅僅有 11 人。就此梁子銘也要插手，甩開占四分之三的大多數職工，打跑該單位的兵團負責人，不搞大聯合，更不搞三結合，操縱站在他一邊的少部分人（紅總站）成立派委會」。當時兵團派稱核心小組成立的革命委員會為「派委會」。傳單說「派委會領導班（子）7 個成員，全部是梁子銘觀點的。平定水泥廠站在梁子銘〔一邊的〕僅占全廠職工的四分之一，而且大部分都是合同工，梁子銘指使他們接管了水泥廠，成立了『接管小組』。這個小組由 5 人組成，其中 4 個人是合同工，而且奪占人事大權的也是合同工……」。其實將合同工包括在革委會裡面，是一種進步，當然派性的問題另說。

傳單接著說，「平定中學派委會就是在把 600 多名紅指小將趕出學校之後單方面成立的。在平定銀行，梁子銘為了獨攬財政全面大權，把由解放軍親自幫助建立起來的『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垮，把革命領導幹部趕跑，破壞了革命大聯合和革命三結合，踢開不同觀點的另一革命□□組織，又由一派成立了一個革命委員會……」。「平定郵電局、南坳紙廠、鎮簧公社、張莊公社等，不結合原有的革命領導幹部，而是另派自己親信去建立派委會和派性領導機構。古貝公社派委會的 10 個人，全是紅總站的觀點，是兵團觀點的全部排除，就是公社武裝部長、貧□主任也一樣靠邊站。全社 11 個大隊的貧下中農提出反抗，竟遭政治迫害，剝奪了政治權利」。

與此同時，傳單指責梁子銘在各個單位成立「派委會」時，「組織、指揮所有紅總站統統都去遊行、慶祝」，還從陽泉調撥大批人馬，架有機槍，挎著步槍前來助威。「調撥大批勞力、車輛，大放鞭炮、禮炮，大印

派性傳單，大貼派性標語，慷國家之慨，樹個人之威」。但是話說回來，至少他們是認真地在建立政權。

據該傳單的不完全統計，由核心小組主導成立的革命委員會有 51 個，包括工交郵電系統 10 個：工交局、運輸公司、化肥廠、印刷廠、平車社、郵電局、水泥廠、白羊墅煤炭經理部〔原文缺二個單位名稱——轉抄者注〕；手管局系統 7 個：汽修廠、工程隊、鎖簧農機廠、南坳紙廠、龍莊石場、穀頭礦廠、塑膠廠；文教衛生系統 12 個：新華書店、平定中學、衛生局、電影管理站、平定師範、張莊聯校、鎖簧聯校、南陽勝聯校、移穰中學、耕讀中學、人民醫院、平定劇團；財貿系統 3 個：糧食局、百貨商店、平定人民銀行；城關鎮 4 個：城關鎮、城關鎮醫院、城管棉織廠、城關鎮供銷社；農村人民公社 14 個：古貝公社、鎖簧公社、張莊公社、維社公社、石門口公社、南關大隊、王家莊大隊、後溝大隊、河頭大隊、舊街公社（被摧毀）、裡社大隊、西關大隊、大峪大隊、城關公社水電安裝隊。

傳單說，6 月 18 日，梁子銘在職工俱樂部「站隊學習班」大會上說：「平定形勢大好，各基層、各系統、各廠礦、各公社以及全縣各生產大隊的革命委員會已經和正在建立起來，並發揮出強大的生命力。」

在全縣建立基層政權的同時，傳單指責紅總站「大搞人人站隊檢查過關，個個站隊。紅司 110 多個小將檢查 300 人次之多，幾乎全部被迫退出紅司組織。（工交派委會成立後，副主任侯××本身又是梁子銘文攻武衛專業隊隊長。）僅席慶同志就檢查 30 多次。在檢查時一邊放著刑具，檢查不好，就是一頓毒打，名為『學習班』，實質是私設公堂。站隊期間，行刑逼供，毆打抄家，不計其數。最嚴重的是紅總站□委竟然有權決定扣發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的工資，僅原縣委、縣人委機關就扣了○○〔原

文空白——轉抄者注】人的工資，有的高達一年之久，至今不給（見附件）。而且梁氏小組斷然批准，遵照執行。還有核心小組開上介紹信到娘子關銀行抓人搶錢」。

傳單引述毛主席語錄，「對於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傳單質疑「核心小組究（竟）站在什麼立場，在為誰家服務」。

傳單又引述 1967 年《紅旗》第 3 期社論：「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在掌權的時候，總是利用他們的權力來對抗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鎮壓革命群眾。在他們權力被革命群眾奪掉的時候，他們還是千方百計地進行反奪權，妄圖反攻倒算，把他們失去的權力再奪回去。有的地方這些反動傢伙，正在重新組織他們的反動隊伍，聚集地富反壞右分子，搜羅社會渣滓，向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奪權。」

儘管核心小組在基層成立政權之舉其實可以看作是在奪權之後的順理成章之事，但是兵團則認為是派性權力組織之舉，是走資派在復辟，而且有毛主席語錄和《紅旗》雜誌社論的理論支撐。在既沒有上級黨組織權威性的「紅頭文件」委任，又兩派誰也不服誰的情況下，這個基層權力組織的命運，在它剛剛出生的時刻就已經註定短命了。

《楊志忠遺存傳單材料》所存材料之二、由「汽修虎頭山」署名的、寫於 1968 年 8 月 14 日的文章詳細敘述了平定縣汽修廠建立革委會的經過，並指控核心小組在該革委會「成立時沒有通過全廠廣大革命群眾同意，更沒有和另一派革命組織商量，而是成立後的第二天，他們才說：『革委會』成立了，還給你們留下四個席位，看你們誰去」。

傳單指控革委會打擊、迫害、排斥、驅趕不同觀點的革命群眾、撤換

不同觀點的財會工作人員、逼迫革命職工、財務會計董貴堂交出財務公章、大量私造武器、修理廠變成了「兵工廠」、破壞「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等。

《楊志忠遺存傳單材料》所存材料之三，有平運造反隊撰寫於 1968 年 8 月 16 日，敘述了平定縣運輸公司革委會的成立經過，認為「平定運輸公司共有職工 42 人，其中『紅總站』的『飛馳縱隊』有 11 人，『兵總團』的『造反隊』有 31 人」。傳單質疑這個由少數組成的革委會的合法性，認為該革委會「破壞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偉大方針」、出動車輛幫助紅總站到農村抓人、搶槍等。傳單還指控該革委會「打擊革命幹部，瓦解群眾組織」。

《楊志忠遺存傳單材料》所存材料之四，由平定銀行「八一」聯合戰團於 1968 年 8 月 9 日撰寫，批判平定銀行非法建立「派委會」鎮壓群眾的「罪行」。傳單指出：「平定銀行在農村有派出機構 11 個，全行共 86 名職工，在支行的職工有 50 名，基層職工 36 名，而在支行的 50 名職工在大聯合被摧垮後，又分成了兩派」。傳單認為在革命委員會建立之前，兩派就根本沒有聯合，談不上和基層的聯合了。「僅僅是一派的兩個革命群眾組織的聯合，人數只占 30%，這樣就能算大聯合嗎？」「對此，我們堅決不予承認，並給予堅決抵制」。傳單指控該革委會「濫發通告，恐嚇群眾」、搞打砸搶抄、強迫站隊等。

《楊志忠遺存傳單材料》所存材料之五，由衛東一中紅衛兵指揮部所撰寫、名為「梁子銘一小撮在平定中學非法建立所謂『校革委』鎮壓群眾的罪行」的傳單，指控梁子銘等策劃一派掌權，將紅指的同學毒打並趕出學校；指控紅戰團於 4 月 20 日、21 日「將在校的四名紅指同學趕出了學校，其中尚素雲（女）和呂毓林同學被拉到後操場進行了慘無人道的毒

打，為其一派成立『校革委』掃清了障礙」。由於該革委會沒有合法性，得不到上面承認，於是不得不和紅指再談判。紅教聯和紅戰團「裝出一副高姿態要和紅指和職工聯隊實行大聯合」。在結合幹部問題上，兩家也無法達成共識。紅指「認為一派成立革命委員會是根本違背毛主席關於『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的教導的，是不符合毛主席關於團結大多數人一道幹革命的偉大教導的，是和毛主席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背道而馳的，是不符合黨中央和中央文革一系列關於建立『三結合』權力機構的明文規定的，是不符合省革委指示的」。堅決不予承認。紅指認為以紅戰團為首的革委會「殘酷鎮壓」革命群眾，指控他們在 4 月 30 日成立革委會，第二天就「乘三個大卡車到石門口、立壁等地抓人，甚至把一般工作人員也抓來平定毒打」；「尤其殘忍的是在五月二十八日傍晚，竟把紅指負責人潘佩金同學捆綁到後操場用銅鞭、木棒等兇器將潘佩金打昏過去，潑上冷水，潘佩金同學半個月不能下床走路」。

《楊志忠遺存傳單材料》所存材料之六指控平定師範的革委會，說他們是梁子銘部署，由一派非法成立的「派委會」成立之後便迫害革命的領導幹部、迫害廣大革命師生、陷害革命群眾、私藏武器，拒不上交等等。

農村也是如此。《楊志忠遺存傳單材料》所存材料之八指控梁子銘在裡社大隊「非法成立派委會破壞農村革命生產」。革委會成立後則鎮壓貧下中農、「把不同觀點的貧下中農四人送到紅衛大隊私設公堂進行了審訊」、組織人員私造了手槍、地雷、手榴彈等武器、不顧黨的政策，大搞投機倒把、重用壞人、破壞抓革命、促生產方針。

而「紅總站」方面則大力維護「核心小組」、革委會的權力。比如關於財政局的權力爭奪問題，總站認為是兵團的人不服從核心小組的領導，

集體出走，所以要建立新的業務班子。《楊志忠遺存「文革」傳單材料》裡，保存著一份「紅總站」派於 1968 年 4 月 2 日的「聲明」，因為不太長，故全文抄錄於下：

最高指示

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關於財政管理問題的聲明

原人委財政局的個別領導和個別人員，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頑固的（地）抵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組織上抵制中共平定核心小組的領導，拒撥印刷中共中央文件的經費，封鎖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聲音，拒付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的經費，破壞抓革命促生產。因此我們於 1968 年 3 月 30 日造了他們的反，使他們改正錯誤，通過調整個別人，在中共平定核心小組的領導下，為平定的文化大革命和生產服務。但是這個革命行動遭到了賈洪舉（原稅務局代局長）杜逢魁（原財政局副局長）的破壞，杜逢魁代（帶）領他的全班人員於三月卅一日出走，至今下落不明，賈洪舉也召開會議策劃更大陰謀。為此發表如下造反聲明：

一、三·三〇造反是革命的行動，目的是要財政局的領導人和個別人員改正錯誤，在中共平定核心小組的領導下，為平定的文化大革命和生產服務。但是這個革命行動遭到了賈洪舉、杜逢魁之流的破壞，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由賈杜等人承擔。

二、杜逢魁及財政局全體人員出走之後，我們本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派出大批人員四處尋找他們，至今找不到他們的下落。為了不影響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通過各方面協商，組織了一個臨時的業務班子，於一九六八年四月二日重新立帳，正式辦公。原財政局的一切財產和財務帳目，我們不動用，他們的安全我們從即日起也不再負責。一切損失和後果，由賈杜、等人負責。

對於財政局的大多數同志，我們相信他們是革命的和要革命的，對於他們我們將採取耐心等待積極熱情的（地）歡迎他們回來工作。

三、新的業務班子，要在中共平定核心小組的領導下，堅持原則，按政策辦事，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誓作他們的後盾，如果有人敢於搗亂破壞，我們將給予毀滅性打擊，特此聲明。

紅總站 工總司 第一軍

第二軍

決死縱隊

紅色財貿大軍

1968年4月2日

上面所說的三·三〇事件，實際是兩派爭奪權力的鬥爭。兵團在同年的7月30日也有一個聲明，解釋兩派鬥爭的情況以及他們為什麼要出走的原因。因為聲明較長，我們節選了一些重要部分，來瞭解事件的梗概。

最高指示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

要節約鬧革命。

平定縣財稅系統大聯合兵團

關於財政局受到干擾和衝擊事件的報告

平定縣財政局、稅務局在去年三月二十八日以革命的三結合全面奪權以後，合併為財稅組（三·二八以前為合署辦公），共有財稅幹部 44 人，為了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堅決響應關於按照系統，按著（照）行業，按著（照）班級實行革命大聯合的最新最高指示，通過充分協商於去年九月下旬成立了財稅大聯合兵團，有 40 人參加，基本上實現了財稅系統的革命大聯合。根據中央文件要求，這個群眾組織沒有參加社會上的兩大派群眾聯合組織。此後，大聯合的同志們堅守工作崗位，抓革命，促生產，堅決按政策和制度辦事。並和浪費國家資財、違犯財政紀律的行為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從而保證了財稅工作的正常進行，取得了顯著成績。

.....

〔但是〕三月三十日上午，趙生玉（原稅務局副局長）、王德青（原縣委會的幹部、紅總站常委）等人，以研究開支為名叫走現財政局負責

人、站出來的革命領導幹部杜豐愧〔上文為杜逢魁〕同志，到紅總站下屬組織決死縱隊的住所進行了審問。隨後，紅總站數人擁（湧）進財政局，監視財政局人員的行動，並提出質問圍攻財政局一般幹部。緊接著由紅總站常委郝守映等人帶領約 200 多人，停留在財政局門口。郝守映當眾宣布：「財政局不聽平定核心小組的話，一些革命組織研究要接管財政局……」並宣讀了早已寫好的所謂「關於財政管理問題的通告」（詳見附件一），張貼在財政局門口。當眾，勒令杜豐愧交接財政手續。在這種強迫、威脅之下，杜豐愧同志表示「可以交接」。直至在遊行隊伍中派出代表數人，再次湧進財政局後，其他受蒙蔽參加遊行的群眾才整隊走開。

這時候趙生玉、董華榮（銀行幹部）等人，又將杜豐愧叫到財政（局）裡屋，又一次進行威逼。趙生玉問杜豐愧：「你看財政局留誰在好？」杜豐愧表示，這話我不能說。趙生玉等人說：「我們研究是讓焦玉琪、楊文洪立即交清財政業務手續，離開原業務崗位，就這（麼）辦吧。」然後，把人集合在一起，趙生玉主持，銀行幹部董華榮宣布「焦玉琪（預算會計）楊文洪（企業財務）立即交清財政業務手續，離開原工作崗位，工作由核心小組另行安排。」被無故解除的同志當場提出種種質問，據理抗議：「為什麼要交代？」得到的回答是：「不要講大道理，必須立即交代。」在這種嚴重威脅、甚至無理訓斥的壓力下，被解除同志仍然堅持原則進行鬥爭。焦玉琪同志提出「即使是交也必須是原財政局幹部來接，否則不交。」趙、董表示，交給財政局幹部由張世春（原財政局長）接。儘管被解除的同志提出種種要求，都被無理拒絕。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才將有關當年資料整理立單，加封存櫃。最後還留下數人繼續看守。當晚就有紅總站下屬組織的群眾，五個人手持長矛進駐財政局。就是在這天晚上，稅務局被砸，打破玻璃數塊，損壞電話機一個。從此財稅局白日有暗哨監視，夜間有身帶武器的人巡視，時而進駐財稅辦公室，時而布防於室外。直至四月

二日，外單位人員進駐財政辦公室才撤離。在交談過程中，趙生玉等人多次揚言：「只管財政，不管稅務。」但實際上趙生玉把稅務大權也獨攬了。可是另一方面又企圖把已經實現大聯合的財稅幹部 40 人分裂開來。這種兩面三刀破壞大聯合的陰謀我們早已識破，並予回擊，他們的陰謀當然不能得逞！

.....

我們把事情發生的真實情況向上級反映後，都得到有關單位的聲援。特別是省革委、省支左委員會更是支持我們的！省革委給晉中革委會下達了「派專人調查處理，並將結果報省備案」的便函。根據省革委指示精神，我們返回晉中，晉中革委會才表示不日派人前往解決。四月十六日晉中工作組一行四人來到平定，十八日和我們有關人員進行了詳談，平定核心小組也派人參加。晉中工作組來平親臨解決財政問題，我們大聯合的同志無不歡欣鼓舞，認為這是正確執行省革委指示，落實問題的先驅。於是我們懷著激動的心情，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抱著很大的希望，向來人彙報了事件發生的由來、真相和我們的態度。並要求按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黨中央對財稅工作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妥善解決。

但是，遺憾的是，來人的態度很不尋常，對於我們的反映情況，根本不和有關中央文件財政政策相聯繫，而是抽象地讓我們表示對核心小組的態度。在□□身上採取用了一種高壓手法，片面地站在肇事者一方，帶著非無產階級的派性觀點去認識問題，妄圖把我們壓倒了事。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大聯合的所有同志據理力爭。如在四月二十二日，晉中工作組提出：各派代表問題的願望出發，三人前去交談。我們本著解人，室內外都有。在所謂交談中，對「要杜絕愧全面交出財權！」就是這樣以勢壓人！

在這種情況下，我大聯合撤出代表，不參加這個所謂的座談會。不日晉中工作組卻返回晉中，說什麼：他們的意見留給當地核心小組（什麼意見？我們不知道！），財政問題由當地核心小組解決。這樣就算解決了問題了嗎？我們肯定地回答：否！

.....

平定財稅大聯合兵團
於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日

聲明說他們曾和平定縣核心小組「閻扣成同志」彙報過情況，但是問題並沒有解決。顯然，對兩派的鬥爭，省革委和支左小組責成晉中地區處理，但是晉中革委會卻是支持平定核心小組的。於是兵團派顯然採取了不合作態度，全班人馬集體出走。這也是我們在下面一部分要敘述的兵團敗走東鄉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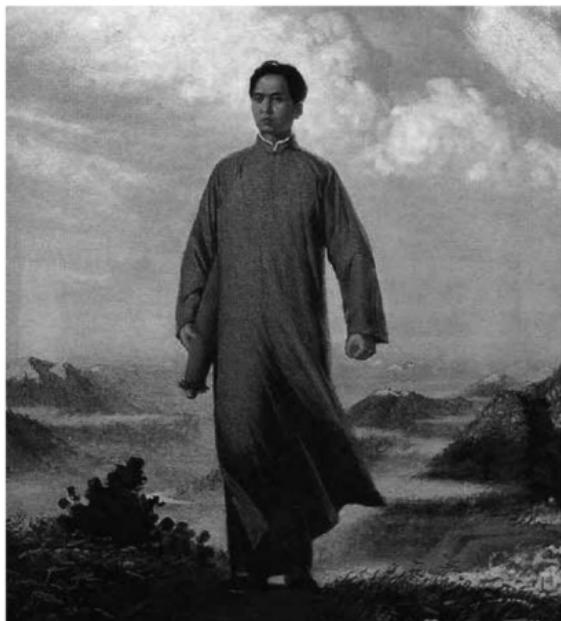
顯然，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學校還是工廠，兩派顯然沒有聯合起來，誰也不買誰的帳。紅總站一派將這個失敗歸咎於軍隊的不支持。無論如何，問題還是沒有解決，政權還是穩定不下來。儘管上面的描述都是一派的觀點，但是剔除那些派性的成分，我們可以看到大概發生了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搶油畫」事件和張莊事件

兩派的僵持到 1968 年 8 月時，雙方爆發了一次大的激烈衝突，這就是「搶油畫」事件。這也是兩派爭取各自的合法性的一個手段。《中國共產黨平定縣歷史紀事》的說法是：8 月，「紅總站」和「兵團」兩大「造反派」組織因贈送《毛主席去安源》油畫，在縣城馬車社引起爭鬥。

被搶的油畫是《毛主席去安源》。這幅油畫是由中央美術學院的劉春華等創作的。畫面上的青年時代毛澤東身穿藍布長衫，手夾雨傘，意氣風發地行走在一個高地上，背後雨過驟晴，霞光四射。這幅畫，是為當時的政治形勢而作。在中國共產黨的工人運動史上，李立三、劉少奇等一直搞工人運動，安源煤礦工人的革命運動，也主要是由他們發動與領導的。「文革」以前，有一部電影《燎原》，反映的就是這一段歷史。毛澤東去安源煤礦，主要是進行調查。但是，「文革」的主要目標是劉少奇。當他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並遭受人身攻擊以至被殘害後，對他的革命史，就作了歪曲和編造。尤其是劉少奇在安源領導礦工運動的歷史，在「文革」前被收入小學語文教材，已成盡人皆知的史實。所以，在「藝術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號召下，應時之作與跟風之作層出不窮。這幅油畫的創作成功，起到了宣揚毛澤東而貶斥劉少奇的作用，是迎合了當時政治形勢的時興之作。1995年10月7日，此畫的原稿以550萬元的天價被一富人購買收藏，還引發過一場版權之爭，這是後話。

當時油畫出版發行後，以4開版大批印刷，分發各地，各大報刊也競相推薦宣傳，一時成為潮流。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曾下發文件，向煤礦職工、復殘軍人、軍烈屬、貧下中農免費贈送。各地都搞起「迎寶像」等儀式，與上一年的「迎芒果」相媲美。當油畫送至平定新華書店時，新華書店便遵照持「兵團」觀點的平定縣貧下中農協會的指示，讓「紅指」負責，把這批畫送到東鄉，再發到各村各戶。雖是發放一張畫，但顯示的是縣一級領導機構的權威性。由縣的貧協會下令，在當時爭奪縣領導權的情況下，便包含這個機構的威望問題，發畫也就並不僅僅是發畫了。這才引起一場爭奪和衝突。於是紅指的人便把油畫拿回學校，準備發放。兩派為顯示「忠於毛主席、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爭相搶奪，演出了一場全武行。參與此事的平定中學學生郝忠德說：

圖 10-2 毛主席去安源⁷

那天我看見潘佩經和高二頭扛個麻袋從校門進來，不知道裡面是什麼，估計肯定有用，我就叫我們的人想截住看一下，他們轉身就跑，我們就追，他們一急就進了馬車社了。我眼尖，看見麻袋裡花花綠綠的，知道肯定是新下來的宣傳品，後來才知道是《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畫。當時我就找人通知紅總站趕快來人去搶。這會潘佩經和高二頭已經躲到馬車社裡了，後來知道他們把油畫藏在馬車社廚房的甕裡了。

7 見黃式國、黃愛國，「《毛主席去安源》的幕後風波與歷史真實」，載於共識網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td/lstd/article_2013121196865.html，上網日期 2015 年 10 月 18 日。

最先衝進馬車社的是我們紅戰團的二十多個人，緊接的紅總站又來了人幫忙找。平定馬車社也從河下〔村名〕馬車社調了一汽車人拿著鐵鍬過來。我們想往出退，趙岐山就進去和他們交涉，他們就把人給扣住了。這一下就把矛盾激化了，紅總站就又調人衝進去想搶人。竇憲進去，結果讓人家用鐵鍬給拍出來了，血當時就流出來了。這就對峙上了。從下午一直到晚上。後來他們把趙岐山放出來，這事也就完了。

油畫我們也搶著一點，都給了核心小組。我們為什麼去搶油畫呢？這是中央統一發下來的油畫，這是有政治意義的，但是新華書店把它們都給了紅指。

為搶油畫而流血，一方面顯示了雙方造反派們對毛澤東的忠誠，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少年氣盛、互不相讓的意氣。他們也在爭奪權威。潘佩經對搶油畫事件的回憶是這樣的：

平定新華書店接到了上級分配給平定縣貧下中農《毛主席去安源》油畫，書店李崇喜向縣貧協會請示，貧協會讓直接將油畫送到石門口公社，通過貧協會往下發。紅指的學生負責押車保護。從石門口回來，帶回來發給城關公社的油畫，放在西邊的老師宿舍，準備第二天由東關貧協的農民來拿。黑夜我不放心，派馮延文和高二頭看護，走到門房被郝忠德發現了，〔搶走了一點〕。

這一點和郝忠德的敘述有些出入，不過雙方都承認的事實是總站發現兵團擁有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畫而不服氣，覺得這顯示了核心小組的無力，自己發放油畫權力的喪失，所以至少要搶一些回來。潘佩經接著說：

馮回來報信，我帶上人就往外跑，郝一看我們追來了，就往汽修廠跑。一拐彎，我就搶過來油畫，跑到馬車社把畫藏在馬車社的米麵庫，一出門郝守映、李守珍帶著人就衝過來了。他們往裡進，我們擋著。紅總站就調決死縱隊的竇憲、竇盛往進衝，兵團的人知道了，就從河下用車調人過來。

李守珍一看人來的多了，就撤了。我們弄住了竇憲、趙岐山和張小牛，竇盛來救人也被抓住了。「文革」期間竇憲打人最凶，我們最恨他。我們把竇憲打了一頓就扔出去了。其餘紅總站的人就放跑了。到了晚上，李守珍、郝守映帶領紅總站的排著隊、喊著口號，沿馬車社外面進行了幾次示威，雙方沒有發生衝突。由於一天一夜沒有吃飯睡覺，又餓又累，我們就回到了學校。

後來，在縣裡一個退休幹部組織的協會從事清潔和服務工作的中年婦女回憶說：「打竇憲那一回我見過，俺家就在馬車社對面。那一天一看打起來了，俺媽嚇得就趕緊關上大門，我們姊妹們有點好奇，就趴在院牆上偷看。我見竇憲衝進去，一下又跑出來了，一頭一臉的血，可嚇人了。俺媽罵俺們，不讓看」。

油畫事件爆發前後，雙方激烈的情緒已經到了非尋找一個發洩口不可的地步。搶油畫就是一個發洩口。

這期間發生了另一件衝突事件，即「張莊事件」，是另外一個發洩口。張莊，平定最南面、與昔陽交界的一個大村，座落在舊平遼公路（現國道 207 線）邊上。我們在第六章曾經介紹了張莊鬥走資派的情況。張莊地處陽勝河沖積小平原上，在山高石多的太行山上，是屈指可數的比較肥美的產糧區。這裡的農民也以農耕為重，曾出過勞動模範趙綱。在「文革」期間，農村的兩派觀點在多數地區並不顯著。農民們忙於生計，也不

願在衣食尚且不足的境況下再過動盪生活，因此「文革」的衝擊波在農村的多數地區相對比城裡要小得多。

但由於「籌委會」幹部有很多是從農村基層一步一步上去的，與農村現任基層黨支部和生產大隊幹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農村的基層領導要說有觀點，也是傾向於「兵團」。還有一層原因：「籌委會」既是大張旗鼓成立的一個政權組織，就代表著一種傾向穩定的力量，與農民的看「正統」和求穩定思想傾向相吻合。在「文革」中，平定農村絕大部分是「兵團」觀點，原因即在於此。

前面說過，昔陽在陳永貴造反奪權之後，基本沒有了大的兩派，全縣上下一統支持陳永貴，支持「十月事件」的受害幹部任井夫、王振國、張懷英等。在這期間，陽泉市區由一名幹部安克和一名造反派頭領梁寶貴為首，由陽泉鋼鐵公司的鋼鐵工人組織起了「鋼鐵兵團」，他們的派別觀點是支持陳永貴，也就是山西全省的「紅總站」觀點。

「鋼鐵兵團」是一個特別能打鬥的組織，他們頭戴柳條帽，統一的工作服，脖子圍白毛巾，手執由鋼管斜削一頭成為鋼筆尖式矛頭的長矛，還有土制的用鋼管黃泥封入炸藥製成的手榴彈。由於相距僅數里的礦區煤礦工人觀點和他們不同，「鋼鐵兵團」曾與礦工發生大規模武鬥。現在，他們為了讓自己派別的觀點統一周邊，便以「解放者」的姿態，南出平定，與從昔陽來的造反隊兩相夾擊，去張莊「統一觀點」。

這個衝突事件的發生，與陳永貴的亂表態、亂講話也不無關係。陳永貴在統一昔陽全境觀點後，客觀上使昔陽的局勢相對平穩下來。但是，他急於要利用自己在「文革」期間所享受到的特殊待遇和所形成的特殊威望統一他能影響到的一切地區，而不顧當地的實際情況，反而使許多地區武鬥激烈化。在太原，他在「五一廣場」的群眾集會上當場表態使兩派群眾

幾乎釀下慘劇。在平遙，他在受委託處理兩派武鬥時急於表態釀成大矛盾，結果由解放軍武裝保護，以軍裝偽裝才得以脫身。在平定，他分別兩次在縣城「人民劇院」和工會露天舞臺的「紅總站」群眾集會上大作報告，給一些群眾組織題寫袖標。這些言行，都在助長著兩派的對立。當時曾參加過張莊武鬥的城裡大隊社員孫樹仁說：

我參加過張莊武鬥。那是因為張莊是兵團的頑固堡壘，陽泉的「鋼鐵兵團」和昔陽下來的人都去了張莊，和張莊家打起來了，趙岐山和郝守映下令調人過去，我們「永貴好兵團」也去了幾個人。

陽泉與昔陽的「紅總站」派別到張莊，無論從行政隸屬關係或者地緣關係上看，都是一種對當地生活的破壞與騷擾，激起當地居民的憤怒和反抗，也在情理之中。而平定「紅總站」的首領派人參與其中，顯然是派性已經大於鄉情。撇開張莊村的派性因素，衝突也會是必然的。

郝忠德回憶說：

那次我也坐汽車去了張莊。在「文革」中，張莊一帶沒有分成明顯的兩派，但臨近平定的陽泉市發生了武鬥，被打散的「兵團」派在張莊聚集活動。因此，陽泉市紅總站組織了一次示威，其中有陽泉鋼鐵兵團。平定紅總站也去不少人，坐著汽車以助聲勢，一共去了六七十輛汽車，但昔陽沒人參加。陽泉去的大部分是工人，頭戴柳條帽，脖繫白毛巾，手持鋼管矛，高呼口號，聲勢很大。沒有發生武鬥。但是每經過一個村莊就喊口號，聲勢很大，影響頗廣，引起震動。

到底有沒有發生武鬥，程度如何，至今仍各執一詞，尚沒有有效的證

據和證詞，但是武力的宣示卻是毫無疑問的。

兵團敗走東鄉

在武鬥和政權建設中，「紅總站」一方暫時占了上風，「兵團」一派由於力所不逮，被迫撤退。他們之所以採取這樣一個「戰略撤退」的步驟。可能是學習「毛選」受到了啟發，要採取「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撤退的目的地，選擇了石門口等平定東鄉一帶。那裡是本縣傳統的老革命根據地，縣裡的許多老幹部，就來自那一地區。在提拔幹部問題上，老幹部當然要選拔自己熟悉的、知根知底的年輕人，所以，現在在任的不少幹部，也就來自那一地區，包括造反以後站出來的籌委會裡的「革命幹部」。現在，撤退到老根據地，當然如魚得水。「兵團」一派撤退的東鄉，仍然保持著「籌委會」這個權力機構的名號。這樣，平定縣便有了兩個政權機構：縣城裡有核心小組，東鄉有籌委會。一家一把號，各吹各的調。縣城的機構管不了鄉下，鄉下的機構管不了縣城。當時所稱的「東鄉政府」，就是這樣來的。

潘佩經描述了他們撤退時的情況以及他中途回城被打的情況。他說：

兩派形成後，就出現了武鬥，並逐步升級。紅戰團與紅總站的其他組織聯合，來掃蕩平定中學。當時紅指女生較多，寡不敵眾，就跑散了。紅戰團的翟全臣他們抓了劉振傑，打了一頓，紅戰團的劉凱庭給劉振傑求情，於是就把劉振傑放了。

那時武鬥剛剛開始，就是推推打打。過了一段時間，我們轉移到了石門口待了一個月左右。我回學校看情況，大搖大擺地進了學校，在食堂小灶上吃了一碗抿圪斗〔平定的一種麵食〕。吃完往下走，紅戰團一群人衝過來把我抓住，把我捆起來綁在一個教室的床腿上。——那時學校停課，

教室擺著床，接待參觀大寨的人。我想在床腿上磨斷繩子，可是不行。我聽見任壯志來救我，悄悄地喊「潘佩經在哪裡？」我讓人堵著嘴了，嗯嗯的喊了半天他也沒聽見。

黑夜他們把我拉出來，弄到西邊頭一排的一個宿舍拷打我，一棍子打在腦袋上，我就暈了，用涼水潑醒後，他們問我「子彈放誰那兒了？」我知道我們學校的小口徑步槍子彈是女生藏了，但是不能說。就胡說了一個很遠的地方，估計他們也不會去找。

第二天，董鋼來了，讓我勸紅指的人歸校，並讓我放棄觀點。後來李玉福也進來了，看看把我打得不行了，就說先走吧。把我哥哥叫過來把我弄出去。我哥哥和他們是一派。

關於潘佩經被打，高四班女學生閻秀雲說：

我們住在後邊女生宿舍。本來那地方就野，還鬧過狼。因為鬧兩派，好多女同學回了家，一到夜裡就更害怕。我們宿舍後邊是體育教研組，也就是「紅戰團」的團部。一天夜裡，聽見外邊打得有人唧唧哇哇的叫喚，早晨起來一打聽，說是「紅戰團」打潘佩經呢。我們更害怕了，也就回了家。

潘佩經接著說：

回家養了幾天傷就好了。傷好了以後我要繼續革命，就去了東鄉，東鄉農民是我們的後盾。

不久之後，我們就開始往城裡轉移。城裡住的先回，兩三次以後就全部回去了。回來以後我們和社會上聯繫起來，我們的力量就不單薄了。這樣兩家力量就相當了，兩派就不敢輕易發動武鬥了。

當時兵團的勢力包括農村貧協會、平中、郵電局、糧食局和馬車社。返校後，同社會正式聯絡起來，組織就健全了。總指揮是李田柱，政委是董福昌，副政委是劉懷祿，副總指揮是我。

這是潘佩經「轉移到石門口」的故事。由於縣領導層是「紅總站」派掌權，社會上的各種戰鬥隊也就「紅總站」得勢。「衛東一中」的「紅戰團」男學生多而「紅指」女學生多，於是，「紅指」被「紅戰團」打走，下了東鄉。1968年9月11日，晉中地區核心小組和革委會籌委會通知：平定縣「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籌委會」是錯誤的，不予承認。在兩派爭鬥愈演愈烈的情況下，這樣的表態，明顯地在給兩派分裂助力。



圖 10-3 「紅指」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第二排左三為葛秉臣，右三潘佩經，右一李文元，第三排右一為體育教師張天福，右三為教導處老師王道江）

資料來源：葛秉臣、李文元提供。

當然他們在鄉下也沒有閒著。葛秉臣回憶了他在下鄉期間帶領宣傳隊到各地表演節目的情況。他說：

1968 年我領著紅指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下鄉，當時我主要負責的是宣傳隊的工作。我記得當時走過的地方主要有岔口、東回、馬山等幾個村子。宣傳隊有 12 個人〔總數似應為 20 多人，見圖 10-3〕，走到哪吃到哪，宣傳到哪，中間回家住了幾天就又去了，中間就是漏了個南面的鄉村沒有去。當時我們的節目有「忠於毛主席」、「北京的金山上」、「殺、殺、殺」等等。我們在外面轉了好幾個月。那時平中已經沒人了。



圖 10-2 紅指宣傳隊的刻印材料，封面上的江青是革命文藝的旗手

資料來源：作者自拍。

下鄉的「紅指」把電影上學的地下工作辦法用上，還在城裡搞起了地下宣傳。李金田在《「文革」的回憶》中記述了這樣一件事：

那時我已經完全脫離了「革命」，當了「逍遙派」，回家上地去了。有一天，高三班的李景生找我，要我給「紅指」刻傳單〔作者注：以前的傳單都是先將蠟紙放在鋼板上，再用鐵筆刻出字來，然後再油印出若干份來散發或者張貼〕。我很高興我這個「白專典型」還能讓人看得起，並且在「促生產」中還不誤「抓革命」，萬一哪天「革命成功」了，咱也是有功之臣，也能分享一下革命果實，便答應了。

那時「紅指」一派大約進入了低潮，開始了「地下工作」，所以我刻傳單的內容都由他提供，刻好後交到十字街他家。他不知搗鼓到哪裡，就印了出來。我白天上地，晚上便在燈下刻鋼板。有幾次，在縣城東門的城門洞裡，我見到我刻印的傳單，有文、有畫，還講究排版，蠻像那麼回事，心裡還在神秘感中有幾分得意。

不料有一天，在劇院對門的郵電局門口，遇到高三班「紅戰團」的一位同學。他見我站在那兒，就揮拳打來。我那時打架是十足的「大吃包」，避之不及，跌倒在那個報欄下面。

他邊打邊踢，還罵道：「看那傳單就像你個操你媽的寫的，你還反了你了！」我爬起身來，抱頭鼠竄。挨了一頓打，我才知道像我這號人，是如同魯迅筆下的阿 Q 一樣，有癩病在頭上，是誰也能揪你的小辮子，而且是不准革命的。我的心立刻又「拔涼拔涼的」，死心塌地去「促生產」，把「抓革命」的大任交給同學了。

顯然，「兵團」下了鄉，卻並沒有在鄉下休息。《楊志忠遺存傳單材料》裡，有一份「平定總團」所寫的「平定問題的鬥爭實質」，就是寫於

這個時期。雖然這份夾敘夾議的文字有些地方甚至語句都欠推敲以至文理欠通，但它比較系統地表達了「兵團」一派的觀點，內中也透露出一些當時的現實資訊。而且，該文是用稿紙一字一格地複寫的，這在當時十分罕見，可以推斷其不是一般的大字報稿，而是一份比較重要的表態性的文章。

該文章重申「三·二八」奪權是正確的，並列舉革命的三結合等四條理由。但是他們承認由於缺乏經驗、水準不高，對部分群眾組織聯合的不好，對個別組織有排擠；對中層幹部及時結合不夠；專政委員會在四月份拘留了革命群眾三人，也是很錯誤的；1967年五月份，部分革命群眾炮轟「晉中十月事件受害者任、張」，他們也未作更多的工作勸阻、制止，犯了錯誤。

不過該文稿緊接著就批判紅總站。文稿認為：

（平定紅總站）大寫特寫、大喊特喊「砸爛平定『臭盃壞』」、「堅決不承認平定核心小組」、「打倒李六孩」（籌委會主任、核心小組成員）、「任芝靠邊站」（核心小組成員）、「張光輝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楊志忠必須觸及靈魂檢查」（原核心小組組長），隨之這些領導人、革命組織負責人有的被綁架，有的被毒打，有的被扣押。就這樣，到八月廿九日平定新生紅色政權——「聯合籌委會」處於無法工作的狀況。

與此同時，他們又明目張膽地向中國人民解放軍施加壓力，惡意攻擊，掀起了反軍「黑風」，大造反軍輿論說：「解放軍的支左大方向全然錯了」、「把帶槍的劉鄧揪出示眾」、「打倒張日清，解放山西省」、「打倒狗崔冰，解放晉中」（晉中軍分區政委）、「打倒李金印（平定人武部政委），解放平定」如此等等。大街小巷大標語，籠罩全城。緊接著就是衝擊武裝部，同樣守敵（原文如此——轉抄者注）圍攻、綁架、審訊解放軍。

八月三日將武裝部長張光輝從榆次會議上揪回平定扣押在平中紅戰團和八一火海樓上毒打並令其發表聲明，表態支持紅總站，又把平定駐軍首長搞去施加壓力。可見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

正在這個時候，晉中派來閻扣成，支援紅總站一派，開始了工作，八月廿九日採取了高壓手段，接管了第一線生產指揮部，並將按單位聯合起來的財稅局也接管了。從此，紅總站一派正式行使辦公，但由於廣大群眾對這樣違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不法行為不滿，當時他們也就會處於孤立狀況，直至去年十二月份也未有一個正式領導機構，更談不到一點工作，就連一次「抓革命、促生產」的會議也沒有開達。這也就是他們說的平定籌委會癱瘓了。

於是，該文件總結說，平定總團、紅總站分為兩大派，「由於對三·二八奪權紅不紅、對不對，平定籌委會是無產階級司令部還是資產階級司令部，解放軍支左大方向正確與否等三個問題鬥爭不休，取不得一致」。「在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對現在的核心小組持有兩種根本對立觀點的鬥爭，紅總站一派認為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堅決支持，總團認為是派性的產物堅決不支持」。

該文件指控紅總站：

將人武部李金印政委，揪在紅總站第一軍部扣押，捏造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說什麼「李金印從歷史上看，他是資產階級在軍內的代理人」「在文化革命運動中是殘酷鎮壓革命群眾的總後臺」「郭存華的黑二線人物」「地地道道的軍內走資派、三反分子」，並且將該同志帽徽領章撕掉，用各種刑俱（具）（狼牙棒，即木棒上帶釘子、站板凳、罰跪等刑罰）進行審訊考（拷）打，致使該同志遍體臨〔鱗〕傷，血跡斑斑。不僅如此，對該

同志又揪鬥「遊街示眾」、「坐噴氣式飛機」、「照狗像」、「舉手投降」等血腥鎮壓和百般侮辱。又在批鬥會上把該同志和晉中走資派王繡錦強迫站一起進行鬥爭。

閻梁之流對革命群眾組織進行殘酷鎮壓，徹底摧垮，其手段是：抓頭頭、打骨幹，名曰：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實際專搞站隊扭觀點。原東方紅等戰鬥隊，他們認為是籌委會的骨幹戰鬥隊，要搞垮籌委會，必須砸爛這個骨幹隊。七月卅一日到八月二日有計劃地、大規模搞了三天打、砸、搶、抄、抓。東方紅所住之家所有窗上玻璃全碎，箱、櫃銷子扭光，所有財物搶光，人身沒有保障。

八月十一日他唆使一夥暴徒將東方紅戰鬥隊長程銀科、魏德卿扭綁到藥林寺，逼供、審訊八天，企圖破壞該組織致於癱瘓。釋放後，籌委會作戰組負責人翟國昌，他們到處抓捕，使其在外到處流浪。不幸於九月二日早晨在昔陽被抓，沿途在汽車上除揪頭髮、毆打外，坐「噴氣式飛機」三十華里，返回平定立即掛牌遊街二十華里。並照「狗像」。後被壓（押）到紅總站第一軍部半日〔月？〕之久，逼供信、惡打，將胳膊、眼睛打傷，使其至今不愈。革命領導幹部、原核心小組長楊志忠同志於八月廿六日從太原開會返回來，他們不讓貫徹會議精神，唆使紅總站下屬組織「八一火海」將其扣押並私設公堂審訊，強迫改變觀點，但是由於楊志忠立場堅定、堅持真理，遭到毒打，致其牙被打掉。

五月一下午兩點，他們乘坐四輛汽車，荷槍實彈，將總團常委石棟章、總團戰士史章所抓回平定，進行了嚴刑考。特別是（拷）打，特別是史章所，撥（剝）掉全身衣服（只留條補褲），用木棒、鋼鞭、皮帶，惡打四小時之久，打死用涼水噴活，再打。死去三次，渾身鮮血淋淋，再也不省人事，方才甘休。

五月三日，他們唆使一夥暴徒創（閨）入郵電局，我總團總指揮董銀

民正在工作，不防之機（際）（正在修理電話）當頭一棒，將其打暈在地，一夥暴徒一湧而上，將其抬拉到核心小組會議室，用皮鞭、木棒進行毒打勒令其立即退出總團，反戈一擊。

五月廿五日深夜十一點四十分鐘，他們唆使廿餘名暴徒，闖入馮存貴家中，將其綁架於鎖芳（簧）中學，後又拉到山頭上，威脅其反戈一擊，陰謀未成，又將其關壓（押）在黑房裡不讓吃飯，直到第二天上午十一點又用麻繩捆綁，塞進車裡，拳打腳踢拉回平定紅總站決死縱隊辦公室，用直徑三寸粗的木棒毒打，並將木棒打斷還不甘休，又用手榴彈打馮的膝蓋和頭部，致使馮遍體鱗傷，面部青腫，頭部鮮血直流，至今未愈，並使馮母精神失常，身患瘋症。馮被捕之夜，該母從鎖芳（簧）□平定往返兩次（六十餘里），無人照迎（應）。閻梁之流就是這樣迫害革命幹部、群眾，摧殘革命組織，是可忍孰不可忍！！

上述描述仍然有派性的成分。讀者需要剔除那些誇張、謾罵的詞句，來看可能發生了什麼。其中兵團的人被總站的人打，似乎也是後來武鬥激化的誘因之一。

李金田在《「文革」的回憶》中記述了他親歷的一次同學間的打鬥：

那時，我已經放棄「抓革命」，回家「促生產」了。一天，我和幾個青年人去冠莊拉煤。回來走到東南營彰化坡一帶，見同校的「紅指」一群女生在潘佩經帶領下，從彰化坡慌亂地跑上來。一見我，潘佩經喊著我的名字說：「紅戰團追來打我們了，你快掩護我們一下！」我看了一下，這裡左邊是一片地，地墳有四尺多高，上邊叉滿圪針，右邊是房子的背牆，中間道路剛能過一輛小平車。我喊住夥伴，說明意思，一位姓孫的夥伴說了聲「好辦」，便叫我們幾輛裝滿煤炭的小平車歪歪扭扭停下來，把驢兒

返回來拴在車把上，說了聲「走」，便帶我們去一個熟人家休息去了。我不放心，隔著街門縫往外瞧，見紅戰團一群同學在董銅帶領下，手提木棍氣喘吁吁追了過來。見有車擋了路，喊了幾聲無人應答，便拿木棍去捅那驢。甩尾一輛車正是我的，那頭小黑驢是頭強驢，被捅疼了，它飛起後蹄，狂踢亂蹶。紅戰團同學雖然強悍，但在侍弄牲口上不如我這個「白專典型」，讓這頭小驢三蹶兩踢，嚇得接連後退。我隔著門縫偷著樂。到了天寧寺雙塔跟前，潘佩經和十幾個女生站在那裡。他告訴我，他們搞「飛行集會」，被紅戰團發現了。我在「文革」以來，頭一回這麼讓人看得起，頓生英雄救美的得意。不過，也就僅此一次而已。

兵團敗走東鄉後，聯合支持他們的縣級領導楊志忠、李六孩，在東鄉召開了高家掌會議，討論當前的形式以及自己的任務。此舉被紅總站認為是搞右傾翻案，所以要「堅決摧垮楊、李東鄉政府」、「徹底粉碎楊李在平定右傾翻案的妖風」。

高家掌會議於 1968 年 4 月 22 日到 29 日召開，有二十餘人參加。會議再次肯定了三·二八奪權的正當性；肯定「平定籌委會和前核心小組在掌權中成績是顯著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平定人武部、駐軍的支左工作成績顯著，大方向始終正確，任何抓住解放軍在『三支』『兩軍』工作中缺點而惡毒攻擊解放軍的行為是反毛澤東思想的」；「任何支一派、壓一派的做法……是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是國民黨反動派對待革命人民的態度，革命人民必須對之堅決鬥爭，不能讓其陰謀手段繼續得逞」！

會議決議堅持「三·二八」觀點，「實現平定縣兩大派的革命大聯合。否則，繼續堅持鬥爭」；「反對一派成立『派委會』」；「總團組織些戰鬥隊（有人叫小分隊）回城貼大字報，抓些打人兇手和操縱鎮壓群眾的壞頭頭」；「以公社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抓革命，促生產，同時組織群眾做好

武裝自衛工作，有來犯者，必殲之」；「在平定未建立革命委員會之前，讓籌委會恢復工作，促進全縣革命、生產」。

從兵團的這篇很長的表態性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紅總站派為了保衛「核心小組」重新任命的、觀點是自己一派的本縣「頭把手」，確實使用了一些拿不上桌面的辦法，而兵團方面則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其次，雙方都以「主義」和「思想」作為標準，動輒以此為尺度衡量對方。但是，這個「主義」和「思想」，並沒有一個可操作性的標準，甚至沒有一個準確的概念。雙方的群眾，爭的是「理」。但是在一個「不講理」的社會爭「理」是緣木求魚。雙方的領導幹部，在爭「理」的同時，還在爭著「利」。如此分析，平定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冠冕堂皇的大旗下，就是一場「爭權」繼而「奪利」但在多數情況下卻又是無厘頭的鬥爭，或者說爭鬥，是鬧劇、荒唐劇，也是悲劇。

武鬥升級：兵團得勢、總站撤退昔陽

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

——毛主席最新指示，1967年9月17日¹

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也沒有想過。等到事情出來以後，就看出了現象。用熱兵器搞武鬥是從6月開始的。這絕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銳的階級鬥爭。解放後包下來的國民黨、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國民黨特務、反革命——這些就是他們武鬥的幕後指揮。

——毛澤東接見了以謝·佩奇為首的阿中友好協會代表團時的講話，1967年12月18日。²

1 原載《紅旗》雜誌編輯部社論，「在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實現革命的大聯合」，1967年9月17日，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 東方直心，《毛澤東大傳》第340章。2010年出版。載於和平社區網，<http://www.hyhp.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733&page=61>，上網日期2015年10月3日。

上一章所描述的武鬥初起與兵團和總站的權力鬥爭，和山西省的總體情況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本章首先記述山西的武鬥和中央幾次關於山西問題會議的指示，然後描述兵團和總站矛盾的進一步深化以及貧下中農代表會的介入。我們最後看到的是平定兩派鬥爭的相持不下，導致武鬥升級，總站被兵團打敗到鄰縣昔陽逃難。這還真有點「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味道。之前是總站將兵團趕到東鄉，現在是兵團將總站趕到昔陽（和「夕陽」同音。）為什麼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厲害衝突的情況下，會有毛澤東所講的勢不兩立的情況，甚至還會發生我們在下一章所描述的打死人的現象，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深思。這些武鬥現象和毛澤東所講的「國民黨、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國民黨特務、反革命」有任何關係嗎？至少在這前後關於平定武鬥共三章中、從當事人關於武鬥的回憶中，我們看不出來。毛澤東階級鬥爭思維方式被證明達到了偏執狂的程度。武鬥雙方，打人的和被打的人，都是工人階級、革命幹部、紅衛兵小將，看不到任何「國民黨、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國民黨特務、反革命」的影子。

山西武鬥、中央的角色

在山西兩派矛盾形成和膨脹的過程中，來自高層即中央的插手，是矛盾激化的推手。1967年4月，鑑於山西兩派武鬥開始激烈化，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組在北京召開山西核心小組會議，要求制止武鬥，扭轉混亂局面。由於山西主要負責人劉格平、張日清各支一派各壓一派，這種局面未能控制。

1967年7月4日至8月2日，中央連續召開會議，專門解決山西武鬥問題。關於《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的擴大會議紀要》，毛澤東親批「照辦」，中共中央也作出批示。但是，這個紀要採取了支一派壓一派的辦法，把其中一派逼到了顏面盡失沒有迴旋餘地的地步，結果激起了更大反

彈，山西武鬥遂不可收拾。這個《紀要》說：³

劉格平、袁振、曹中南、陳永貴、徐志遠等同志執行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支持革命小將和廣大革命造反派炮轟劉貫一、陳守中、劉志蘭，大方向是正確的。會議也肯定了張日清同志參加奪權，站出來支持左，做出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後來，張日清同志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特別是四·一四以來，他沒有把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反對挖衛恒、王謙、王大任的二三線，錯誤地支持劉貫一、陳守中、劉志蘭，壓制革命群眾運動，甚至在軍隊內進行反對劉格平同志。在晉中問題上，他不支持陳永貴同志，不支持王振國、任井夫、張懷英等同志，反而支持軍分區少數執行錯誤路線的負責人。

會議認為，在晉中問題上，必須堅決支持陳永貴同志，堅決支持王振國、任井夫、張懷英等通知，堅決支持給「十月事件」受害者平反，堅決支持「晉中總站」等左派群眾組織。

會議認為省核心小組和革命委員會內兩條路線鬥爭的蓋子已經揭開。

軍區和某些軍分區、武裝部的少數負責人，犯了一些錯誤，有的犯了嚴重錯誤。例如，支持了一些保守派，打擊了革命派。

會議認為必須支持站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的劉格平同志，擁護以劉格平同志為首的核心小組和革命委員會的正確領導。……逐步召開和成立以左派為核心的工作會、農代會、紅代會。

³ 見《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擴大會議紀要》，1967年8月6日，以及中共中央批轉《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擴大會議紀要》，以及毛主席批示「照辦」，1967年8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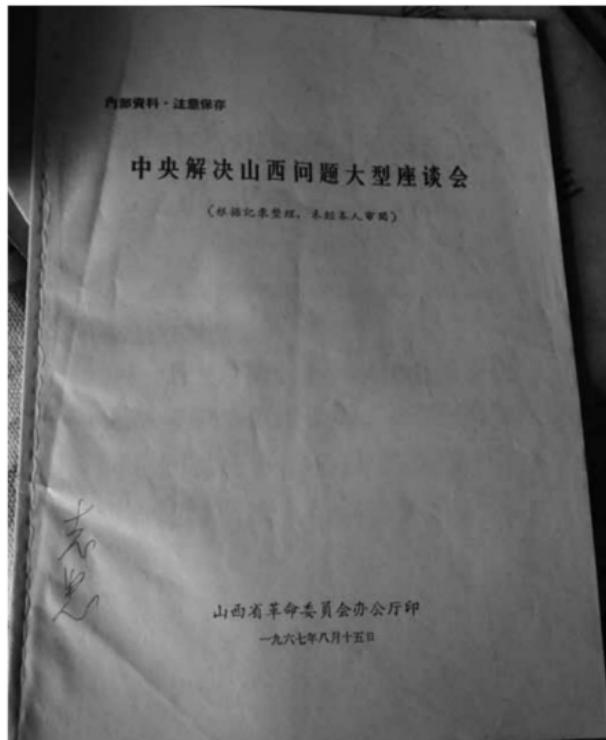


圖 11-1 中央解決山西問題會議紀要之一，1967 年 8 月 15 日

資料來源：楊志忠保留文件，作者自拍。

這樣的決定，對於山西誰也不服誰的兩派來說，只能起到火上澆油的作用。儘管《紀要》說兵團、總站、太司等都是革命左派組織，但是基本態度卻是支一派壓一派，結果激發了被壓一派強烈的反彈，從而爆發了全省範圍內更加激烈的兩派衝突，中央於當年 12 月再次召集會議解決山西問題。這次會議力圖糾正七月會議的偏頗，指出：

對七月會議紀要的貫徹也「不夠全面」、「領導上也有派性，因而加深了革命組織間的對立，影響了革命的大聯合。以致使武鬥上升，生產下降，秋（指秋糧徵購）緩慢。對張日清同志的錯誤，到處肅清流毒，擴大了批判面，致使軍區、軍分區、人武部受到衝擊」。⁴

在指出這些偏差之同時，這次會議對軍隊「三支兩軍」問題也重新定下基調。原來在山西群眾中流傳的「六十九軍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跟六十九軍的同志說一下，要站在劉格平同志一邊，堅決支持劉格平同志」的指示，⁵現在變為「今後『三支』『兩軍』工作，以六十九軍為主，統一領導」。這次會議精神，實際上是對以劉格平、陳永貴為首的「紅總站」一派的委婉批評和對軍隊參加山西「文革」的重新定調。有了這個定調，「十二月會議」後，軍隊便再次介入了山西的地方「文革」運動。「十二月會議」確定由 69 軍統一領導山西「支左」工作，支左委員會由 69 軍軍長謝振華任主任，政委曹中南任第一副主任，山西省軍區第二政委張日清任第二副主任，同時增補謝振華為省核心小組第一副組長。

但是武鬥還是沒有制止。這是因為「摠下葫蘆瓢起來」，扶了軍隊一把，又把正在興旺一時的劉格平、陳永貴一派得罪了。在誰也難以服誰的時候，說是道非，只能平添亂象。山西武鬥也就應了一句俗話「山西的拉麵——沒頭」。1968 年 5 月，中共中央第四次召開解決山西問題的會議，制止山西武鬥。6 月 29 日，山西省革委會、69 軍、省軍區發出通知，撤銷各級支左委員會，成立支左領導小組。

此時，山西武鬥愈演愈烈，已到不可遏止之地步。6 月 3 日，毛澤東

4 見平定縣檔案館存中國山西省核心小組文件〔68〕4 號，卷 679。

5 同上。這段流傳中的講話應出自康生，見「康生傳達關於山西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傳達時間鋒在場），1967 年 7 月 28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接見山西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和部隊代表指示「山西省要既擁軍又擁政，一定要處理好地方與軍隊的關係」。這是一個中央態度又一次向軍隊傾斜的表態。據《中國共產黨山西歷史》記載：

1969年2月間，周恩來和「中央文革」碰頭會部分成員在接見參加全國冶金工業抓革命、促生產會議和「八·一五」會議的山西代表時，要求山西搞歸口大聯合；陳永貴、曹中南先後講話，做了自我批評。周恩來指出，陳永貴陷入派性，被一派利用，親一派，疏一派。同時指出部隊在一些問題上沒有把一碗水端平，沒有按照毛主席指示辦事，由此加深了兩派的對立。

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山西的劉格平、陳永貴、李順達當選為中央委員，張日清和大同礦務局韓英、陽泉礦務局王體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又一次批評山西的主要負責人，指出：「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麼爭吵幹什麼？」「地方的問題在軍隊，軍隊的問題在工作。」「我看是前世無冤，今世無仇，碰在一塊，有些意見不對頭，人家或者是搞什麼批評了自己，反對了自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結果就發生矛盾了。反對自己的人不一定就是壞人。」⁶

在一言九鼎的中央前邊的指示和後邊的說法相互矛盾一再「翻烙餅」的情況下，無所適從的山西兩派，各用各的理論和靠山為依託，對中央指示各取所需，各說各有理。上層領導們各抱心思，針尖對麥芒，誰也不服誰。於是，武鬥的組織花樣越來越多，武器越來越精良。當然，人員傷亡

6 見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編）《中國共產黨山西歷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477頁。

也就越來越多。與平定近在咫尺的陽泉市，武鬥早已進入「萬馬戰猶酣」的境地。《中國共產黨陽泉市城區歷史》這樣記述：⁷

隨著「文化大革命」形勢的發展，陽泉礦務局從 1967 年 1 月實行軍管後，兩派出現了短暫的聯合，組成了礦區「大聯合」組織。但在 6 月 28 日，與「大聯合」相對立的另一個群眾組織從中分裂出來，組成「六二八風暴」（簡稱「六二八」）。7 月下旬，「六二八」和「陽泉市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分化出來的一派群眾組織，共同組成了陽泉市紅色造反聯絡總站（簡稱「紅總站」）。

……（1967 年）8 月 8 日，市「紅總站」所屬群眾組織在市體育場召開大會後，進行遊行。遊行隊伍行至北大街洪城河時，受到礦區「大聯合」組織的上萬名群眾的「靜坐」阻攔，雙方從上午一直對峙到晚上，最終發生了大規模的武鬥。……這次武鬥兩派組織共 1.2 萬餘人參與，造成 3 人死亡、200 餘人受傷的惡果。

……9 月 12 日，礦區「六二八」組織聯合「紅總站」組織，在四礦口大橋與礦區「大聯合」再次發生武鬥，雙方參戰人員共 6000 餘人，造成 1 人死亡、30 餘人傷殘的嚴重後果。「九·一二」武鬥後，市內一些群眾組織和礦區「大聯合」積極尋求外界支援，又與省城「山西革命造反兵團」掛鉤成立了「山西革命造反兵團陽泉分團」（簡稱「兵總團」）。

同年 12 月 21 日晚至次日凌晨，「紅總站」與「兵總團」兩派群眾共 1 萬餘人，在南大街、晉東化工廠、桃河大橋等處，爆發了大規模武鬥，雙方除動用了一般的鋼管、鋼筋外，還動用了步槍、手雷、四〇火箭筒等武器，造成 22 人死亡、220 餘人傷殘和部分建築設施被毀的重大惡果。大

⁷ 中共陽泉市城區委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陽泉市城區歷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第 167 頁。也見陳霑、孟宏儒（主編）《陽泉市志》（上下卷）中的相關資料，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 年。

批幹部、職工、群眾紛紛逃往外地。

平定也不能脫俗。

兵團返城與貧代會的介入

1968年9月2日，「籌委會」在東鄉宣布恢復辦公。這個時候，正是山西兩派針鋒相對，69軍介入山西「文革」的時間。

9月11日，晉中核心小組、晉中革委會籌委會通知：平定縣「無產階級革命聯合籌委會」是錯誤的，上級不予承認。⁸同一級黨的組織——晉中核心小組，時隔不過一年多，自己下達的指令——承認「籌委會」，卻又出爾反爾。這種極不嚴肅的行為背後，是置局勢穩定於不顧的派別爭鬥。因為，此時的晉中核心小組與平定核心小組，已非原來的那個核心小組。毛澤東曾說過「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這又一次應驗。

兵團一派的星星之火，終於燎原，農村包圍城市，由理論成為了現實。走時行色匆匆，返回來卻今非昔比。「兵團」一派鄉下返回城裡，帶回了大批的農民。這一年末，平定縣「貧代會」進駐縣直機關和郵電局等要害單位。平定的農村，其「觀點」傾向於「兵團」派別。「貧代會」由農村貧下中農代表組成。他們入駐縣城並行施權力是誰的決定，至今不得而知。這年冬天，按照歷年的慣例，要召開全縣三級幹部會議。由於「籌委會」被兩派你撕我扯，推倒了又扶起來，已經沒有了權力機構的權威和召喚力，所以，這一年的全縣三級幹部會議（縣、公社、大隊）是由縣貧下中農協會組織召開的。這次三幹會，明顯帶有和新的核心小組叫板的意思。

⁸ 平定縣黨史（縣誌）辦公室編著並出版，《中國共產黨平定縣歷史紀實》，第208頁。

當然，如果沒有軍方的支持，「貧代會」也沒有這麼大的底氣去組織全縣數千人的大型會議。沒有一些有經驗幹部的支持，「貧代會」也沒有經驗和能力去召開一個目的是安排全縣工作的會議。而且，「貧代會」的一些表態，雖然套著當時形勢的框框，比如反擊「二月逆流」，但醉翁之意不在酒，骨子裡是針對當地另一派的。

「籌委會恢復後」發布文件《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紅總站」一派於次日派人毆打了「兵團」一派數名成員。9月30日，原籌委會建立的「貧代會」在東回村開會，作出「解決平定問題的決議」，並給全縣貧下中農贈送《毛主席去安源》油畫5000張。10月1日，在東回的「兵團」派與「貧代會」代表乘車由東回赴平定遊行，並且在縣城給「貧代會」掛牌。

與此同時，貧代會於1968年12月16日散發了自己關於平定問題的意見的文章，想以此影響平定的發展。⁹該文說「參加學習班的一千六百名貧下中農代表，經過充分的醞釀討論，對解決平定問題提出如下意見」。第一，必須「把反軍、鎮壓群眾的黑指揮揪出來，為解決平定問題，掃清政治上、思想上的障礙」。第二，「三·二八奪權，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向走資派的奪權，是在人民解放軍支持下三結合的奪權，是經過晉中核心小組批准的奪權，完全符合毛主席指示，是正確的，必須維護這個革命的成果」。「平定籌委會在奪權後是『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儘管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還是做出來很多成績。貧下中農完全贊成。」現在的三人核心小組存在是不合法的，所以「解決平定問題，必須在支左領導小組的領導下進行。平定總團、總站都應在支左領導小組領導下，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這樣，同貧下中農一道都為儘快建立

⁹ 見《楊志忠遺留「文革」傳單》中一份題名為「平定縣貧代學習班全體貧下中農代表對解決平定問題的意見」（1968年12月16日）的文件。

平定縣革命委員會作出新的貢獻」。第三，關於解決平定問題的途徑和方法問題，該文章要求「走突出政治的道路，儘快實現按系統、按行業、按班級的大聯合。建立各級革命委員會，是貫徹毛主席指示、貫徹省、晉中革委會有關指示，從根本上解決平定問題的途徑，請全縣革命群眾和人民解放軍考慮」。文章要求平定縣革命委員會在建立時，必須有一定數量的貧下中農參加，解決平定問題也要有貧下中農以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方式參加。之前在「少數公社、大隊和一些廠礦、企事業單位成立的四十多個『派委會』必須解散。」

農民對縣裡的事情有這麼大發言權，似乎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看來「貧代會」要名正言順地在縣城出頭露面並且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了。當然，他們背後的力量肯定不可小覷。總站的人對這話語背後的含意也心知肚明，對這個「貧代會」也不會掉以輕心。所以，在貧代會的吃飯問題上就先開始了一番較量。

開會，而且是幾千人的大會，吃飯是頭等大事。兩派在這個當務之急的問題上針尖對麥芒，叫上了板。王增榮《糧食工作回顧》記載這一問題上雙方互不相讓的情景：

1968年12月下旬，縣人武部和支左領導小組召開貧下中農代表會，造表批供糧食。糧食局的承辦人員霍有章說：「縣核心小組通知，沒有核心小組的批准，任何人不准動用一粒糧食。」並說，「只有黨指揮槍，哪有槍指揮黨。解放軍只有支左的權，沒有執政的權。」

但是在混亂的年代，不是「有槍便是草頭王」嗎？況且解放軍在地方上擔任了行政職務。王增榮接著講：

1968年12月24日，城關糧站保管負責人高松年不經開票收款，沒有銷售票，付給承辦貧下中農代表會管伙食的人白麵、小米幾千斤。保管員蔡祿發現後，躺在汽車下不准拉走。取糧人員把蔡祿拖在一旁，強行開車拉走糧食。

1969年1月20日，貧下中農揪鬥了霍有章，理由是：霍不供貧下中農代表會議糧食，還給各站下通知，不准兌給參加貧下中農代表會議代表的糧票。

說到底還是兩派之爭。這時候，一批在當時比較有名的幹部，也站出來表態，發表聲明，亮出自己對解決平定問題的觀點：堅決維護「三·二八」奪權的成果；支援平定籌委會；「堅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軍，學習人民解放軍，做好擁軍愛民工作」；他們援引毛主席的教導：「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只要兩派都是革命的群眾組織，就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他們認為「平定總站、總團都是革命群眾組織，應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要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儘快聯合起來，共同對敵，穩、準、狠地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

署名者有：

張守禮、王效祥、王岫亭、郭世榮、李開成、杜逢魁、賈洪舉、
陳寶鎖、孟辛田、梁實存、翟久盛、張良保、董惠青、張文鎖、
張玉蘭、董福昌、張維智、連方、梁福壽、王醒書、張振國、
郭子榮、戴光榮、李芝英、曲瑞生、劉喜慶、周喜庭、趙秀成、
趙俊、李順來、劉懷祿、任玉山、高連冬、李文科、李開太、

張喜興、王 淵、張錦雲、張潤田、張文壽、王富昌、郭慶雲、翟雙成、周蘭生、齊 富、李桃生、劉大醜、石寶山、郝思忠、郝恩和、王建平、範海昌、王巨錄、馮 沅、李俊牛、穆文山、張兆儉、蘆玉祥、鄭富和、葛如琪。

上面文字為刻鋼板油印。在另一份鉛字印刷的同名傳單中，以上 60 名幹部後面，又增加了這些名字：

張鐵鎖、任 福、李生田、王吉祥、劉培珍、王雨田、王□□、
張世錄、劉芝榮、趙憲武、趙 啟、王滿貴、趙士本、王瑞深、
周國義、朱□富、□文科、趙晉華、李 馥、石繼忠、王貴先、
劉寶貴、沙萬江、□秀文、白貴玉、潘□珍、蘇子成、王 □、
趙來扣、李士本、馬振家、徐全秀、時□全、嶽長孩、呂□書、
張瑛祥、段□□、王□□、王忠義、高鴻林、李□□、張榮富、
□□平、趙□華。¹⁰

他們顯然都是話裡有話，有所傾向。他們在「學大寨」還是「學習人民解放軍」之間有了一個選擇。平定縣這個應運而生的「貧代會」對輿論工作的作用相當重視，也駕輕就熟。在這些幹部們站出來表態的同時，一個為造輿論而開的「座談會」召開了，即平定縣貧代會常委會聘請縣社兩級革命幹部座談會，並發表了「對解決平定問題的意見」（1968 年 10 月 22 日，文後並附有參加會議的來自全縣各地的革命幹部和貧下中農代表的名單）。意見說：

¹⁰ 有□者因原文字係油印，膠版搓皺，文字不清。

會議中，我們認真學習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最高指示和最近發表的紅旗四期社論，按照明察秋毫的毛澤東思想，用一件件活生生的事實，一樁樁血淋淋的罪證，徹底揭露、批判了一小撮階級敵人對全縣 26 萬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深刻認識了平定階級鬥爭的實質。進一步擦亮了眼睛，明確了方向，挺起了腰杆，堅定了信心。……

平定兩年來政權問題上鬥爭的革命原則，集中表現在對待奪權問題、對待權力機構問題、對待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態度問題，對待廣大革命群眾問題等方面上，對待革命的原則，我們必須弄的它一清二楚，明明白白。

會議重申了上面「革命幹部」的聲明中表明的觀點。他們還說：

把平定一派革命群眾說成是「國民黨」、「西安政府」、「敵占區」，把兩派的對立說成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鬥爭」、「只有站隊的資格，沒有聯合的餘地」的反動作法，以反革命謠言傳單為依據，強迫幹部群眾「站隊」、「檢查」、「投降」的惡毒手段，以及從反革命的「多中心論」出發，占山為王，以敵為友，一手組織專業武鬥隊，武裝搶劫民兵武器，非法私自製造槍支彈藥，血腥鎮壓革命群眾，一手大搞「以我為核心」的一派掌權，建立自己的所謂「革委會」。觀點相同的，即使是壞人，也親如手腳，上派下調，予以翻案，委以重任。觀點不同的，即使是貧下中農，也要政治迫害，經濟扣發，組織開除，抄家搶竊，嚴刑拷打等等罪惡，真乃血淋淋、淚汪汪，說不完，訴不盡。在那陰雲迷霧的白色恐怖中，我們日日夜夜多麼想念親人毛主席啊！因此，對於那些反對路線、特別是反動的多中心論，我們必須徹底揭發、深刻批判，誓死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有意思的是，他們在批判對方將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人說成是「國民

黨」、「西安政府」、「敵占區」的同時，也說對方這些做法是「反動做法」。顯然，相互都視對方為敵人，沒有調和的餘地，儘管口頭上說要實現革命大聯合。另外，該座談會的聲明也強調了讓貧下中農參與平定問題解決的合法性。聲明說：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根據黨中央的方針政策，結合我縣「以農為主」，26 萬人有 25 萬農民的農業縣的實際情況，平定縣的政權必須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必須有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參加。在一個農業縣，沒有這支最廣泛的群眾基礎——貧下中農參政，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強大威力的堅實的群眾基礎，政權就反映不了全縣革命人民的利益，政權就體現不了毛澤東思想，政權就抵抗不住修正主義的襲擊，政權就不會鞏固。這是依靠誰的路線問題。否則離開堅強的產業工人，離開廣大的貧下中農，能行嗎？不行！根本不行。

因此，這次解決平定政權問題，則（即）建立平定縣革命委員會問題，必須讓貧下中農參加，必須依靠貧下中農，必須讓貧下中農參加政權建設！一切否定、打擊貧下中農的荒謬絕論，統統不符合毛澤東思想。

讓農民代表參與縣政權的建設，似乎是土改以來再一次對農民的重視。但是這種對農民的重視，並沒有制度上的保障。在多少年中農民在全國人大的代表比例遠遠低於市民代表就是一個實例。另外貧代會並不是真正的農民或者貧下中農的代表，而是代表了當時農村中權力派別或少數既得利益階層。而且貧代會是兵團派的一個變異，其作為完全是兵團派的。所以談不上重視，是不得已而用之。貧代會進了城，看上去是貧下中農以穩定局勢的架勢「拉架」來了，實際上，是「兵團」一派「扶諸侯以令天子」。這個「諸侯」就是貧代會。雖說他們有「最高指示」的理論支持而

使「紅總站」一派在口頭上不能也無法反對，但是，面上和內心分裂，表現在行動上，就是「桌上握手，桌下踢腳」。所以，最終農民還是作為一個工具被利用了一下而已。這次三幹會，表面上當然是「抓革命促生產」「農業學大寨」——這兩杆大旗，是誰也不敢明言拋棄的。而且，一家比一家舉得高。但在這高高飄揚的大旗後面，仍然是權力的爭奪。只不過，這個「回馬槍」，「兵團」殺的有理有節，有板有眼。

總站的郝忠德則認為是貧代會擾亂了正常秩序。他回憶說：

中央解決山西問題的「七月會議」傳達後，絕大多數群眾反戈一擊，平定反對籌委會的群眾運動基本結束，人們又暫時恢復了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工廠堅持運轉，單位到點上班，商店照常營業。我們初三 52 班的同學們就復課鬧革命，除回家參加勞動的十幾位同學（52 班農村生多），三十多位同學回校復課。當時，老師也積極支持，每天按時上課。其他同學們也積極籌備復課。在這時，社會上又動盪起來。原縣裡的一些幹部和縣武裝部調動農民進城，占了我們的教室，在學校召開會議，不能再上課了。

在郝忠德的回憶中，初 52 班屬於已畢業而「返校鬧革命」的班級。「占教室」是指縣裡召開農村幹部參加的三級幹部會議時，一般要利用學校假期時間居住和使用教室、宿舍和食堂。《中國共產黨平定縣歷史紀事》記錄道：

本年（1968 年），平定縣中小學生在「復課鬧革命」的口號下返校。但教學秩序未恢復正常。學校課程設置有政治、語文、數學、工業基礎知識、農業知識。學習毛主席語錄或《毛澤東選集》上的文章。「軍宣隊」、

「工宣隊」、「貧宣隊」分別進駐城鎮和農村學校，學政治、學工、學農、學軍成為主課。數理化等自然科學被作為「修正主義黑貨」。學生文化素質下降。

這個記述，是從官方的角度看到的。前面郝的回憶，是從一派的角度說的。其實，真正的學習者並沒有這麼幸運。首先，沒有教材。其次，政治說教是主要內容，其他的教學內容，基本沒有。第三，學生數量少，許多在兩派爭鬥中居於「逍遙派」的人根本沒有回校。在校的學生，也忙於「革命」，兩派面不和心更不和，劍拔弩張，橫眉相向。當時在平定中學高四班讀書、當了「逍遙派」的李金田回憶說：

叫我們回學校「復課鬧革命」，課是復了，但是沒心思上課。反正上不上一個樣，上了也沒有出路。同學們又各自分成兩派，我們這些哪邊也不靠的人就成了姥姥不親舅舅不愛的角色。班裡來了兩位「工宣隊」員，一個是同意煤礦的，姓王。那時候，他給我們講話，一開口就是「孩孩們不念書每天干甚」。後來，我退休之後，經常在街上見到他。我問他那時候進駐我們學校的背景，他說：「嗨，那有甚背景，人家叫我去，咱就去唄。」另一位比他年輕些，忘了姓什麼。他們進校沒多少日子，由於同學們又鬧兩派，課也有一搭沒一搭的，就又撤走了。我們就再一次樹倒猢猻散，抓革命的抓革命，促生產的促生產，乾脆各幹各的了。我呢，工分要緊，促生產還能掙點勞動糧，起碼能吃飽，就又回隊裡墊地去了。

1968年12月，平定縣公安機關軍管組成立。12月15日，一度退出地方「文革」的軍隊再度介入。平定縣核心小組與「支左」領導小組上報地區革委會《關於對平定縣公安機關實行軍管的請示報告》得到同意批

覆，平定縣公安機關由平定駐軍與平定縣人民武裝部共同實施軍事管制並成立軍管小組，組長由縣人武部部長李計春擔任，副組長由駐軍 808 部隊軍官王金章擔任。軍管組為權力機構，原來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員一律歸口，受軍管組領導，啟用新公章。軍管單位包括公安、檢察、法院三個政法部門。軍管的實施，使平定避免了衝擊武器庫和監獄，也使武鬥傷亡因武器制約而壓低到最小程度。在山西武鬥衝擊監獄搶奪武器的嚴重形勢下，對平定的局勢起到了穩定作用。

軍管使得平定城有了一種肅殺和莊嚴。夜裡，軍隊會有巡邏隊和哨兵在大街上站崗。儘管沒有實行宵禁，但一到夜裡，行人稀少，行色匆匆。

武鬥升級

1969 年 1 月 20 日，新年剛過，舊年未臨，在兩派問題仍然沒有解決的情況下，一場武鬥又突然降臨了。潘佩經回憶當時的情景：

1969 年，平定元·二〇武鬥的前奏是貧協會在平定召開了三幹會，農民出的大字報主要是紅指的學生們去弄的。一天貼大字報的時候，發生了摩擦，兩家都回去組織人，在紅指的門口就打起來了。一會紅總站的人撤了，我看不行就決定去遊行，在街上就又遇上紅戰團了。我們趕快去佔了手管局，前後都安排上兵團的人，手管局成了武鬥的據點。紅總站的杜興光吹著號，組織人排著隊往裡衝，然後又從姐妹商店的牆上往裡衝。東北角是劉振傑、李增鎖、李霖林守著；北面是藍狗貨和河神爺，我來回指揮。第二天，他們又組織人從東風飯店方向進攻。最後也沒攻進來。

「兵團」占據了手管局大院，「紅總站」也不甘示弱，立即占領與手管局大院相距不過 50 米的縣人民劇院。這兩處地方，都是城裡街內的制高

建築物，而且劇院在手管局東邊，扼守著「兵團」去東門口貼大字報的去路。平定縣城的兩派武鬥正式開幕了。

兩軍對峙，似大戰的嚴酷，卻又似兒戲的輕鬆。兩派各占一處制高點，武鬥中並不忘記文鬥。所謂文鬥，並不是大字報，而是大喇叭。「兵團」派的占領處有一個操場，操場上豎起兩根相接的高杆，杆頂上是一邊五個共計十只 25 瓦的高音喇叭。喊一聲，距城數里的大小峪河頭後溝都清晰可聞。平定中學高四班一位女生當起了播音員，喊著「紅總站不投降就叫它徹底滅亡」。「紅總站」所占領的劇院沒有空場，卻有高屋頂，正好應了「高屋建瓴」的成語。他們的高音喇叭一字排開，響起時震耳欲聾。據當時在劇院擔任播放的大醜說：

手管局安了 10 個喇叭，是兩個一根根安在一個口口上（串聯）。紅總站一開始是 4 個喇叭，後來加到 6 個，接了一根 12 米杆。喇叭用廣播線作迴路，是張立德（音）想出來的辦法。

這兩組喇叭，弄得平定城內十分熱鬧，但街上卻行人稀少。商店照樣開門。武鬥雖然厲害，但兩派人卻都沒有砸搶商店。白天，街上東來西往的人們，看著手管局大門樓子上堆放著的沙袋和戲院二樓上晃動的人影，也似乎並沒有十分的害怕。那時，平定城內流傳一個故事，說賣肉的成壽哪一派也不得罪，誰要肉給誰送。送肉過去，武鬥站崗的人明明看準是誰也要大聲喝問：「誰？口令！」成壽答：「成壽。」問：「幹什麼？」（盡是廢話，平定城就連小孩都認識賣肉的成壽，誰也想割塊肥肉呀，那時候的豬，似乎盡是瘦肉。）答：「送肉」。於是，兩派陣地，賣肉師傅如履平地，暢行無阻。

兩派各有靠山，但靠山實力卻是有區別的。陳永貴威望高說話威力

大，但他實力不行。平定的事，他來指手劃腳一番，罵罵「兵團」派「這是讓你打日本人哩？」可以，但是他說他的，兩家打兩家的。儘管「紅總站」手中握著「最高指示」「永貴好」「農業學大寨」，但「兵團」也有關於解放軍的「最高指示」，「全國學人民解放軍」。你說的，我不答腔；我喊的，你也不理會。反正「最高指示」太多，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語），各人的觀點，總有理論根據，總能自圓其說。但是，「兵團」所依靠的軍方，是有實玩意的，這就是槍。

位於上城街的平定師範，由於隸屬關係不在本縣而在晉中地區，一開始介入不深。但平定師範內部，兩派分裂也很厲害。「紅司」一方，以馮拉科為首領，女生居多。馮拉科曾是平定師範學生會主席，後來成為籌委會的委員。另一方以張三恒、「麻包」為首，男生為主，名叫「紅三司」。「紅三司」的袖章，就是陳永貴親筆題寫的。「麻包」真實姓名叫張燚（讀「義」），昔陽人。他的觀點是緊跟陳永貴的「紅總站」，似乎並不奇怪。但是，「文革」後期，「農業學大寨」運動風起時，他已分配工作回昔陽教書，職業穩定，收入穩定，但他卻站了出來，上訪告狀，貼大字報，揭露昔陽縣和陳永貴虛報產量等弄虛作假的事，曾被投入監獄而不屈不撓。在昔陽，曾有「『麻包』背乾糧上北京告狀」的故事流傳甚廣。這樣看過去，他的正義感，確是難能可貴的。但在當時，他對自己的同學，也沒有留情。

武鬥開始，「紅司」被迫退出學校，「紅三司」成為平定師範的占領者。上城地處高處，東可控制下城，西可退走城外，南可走城南河道繞往東關大道上，與陽泉昔陽兩頭遙相呼應。於是，平定師範成為武鬥中「紅總站」的一處陣地。

兩家近在咫尺，相互對峙，一開始並沒有槍林彈雨、拼死搏擊。更多

的時候，還是話語多於行動，恐嚇多於動手。但是，既是武鬥，必然會有衝突。衝突也是為衝突而衝突，衝突的理由反倒位退其次。武鬥升級進入真槍實彈之後，發生了一連串的事件，比如總站敗退昔陽，以及下一章所描述的馮拉科等被總站人員打成重傷以及張九崗和李成柱被兵團人員打死的慘劇等等事件。

如前所述，近在咫尺的陽泉歷來對平定的影響就很多。我們在前面已經討論了陽泉的武鬥。平定的武鬥規模與嚴重性都不及陽泉，但是就群眾組織的分裂與重組方面是和陽泉一致的，既有兵團又有總站。就武鬥來說也是相互支持的。在當時，平定「兵團」一派的力量比「紅總站」明顯勢強。如上章所述，這是由於「兵團」走了農村路線，農村的力量進入城裡，成立了「貧代會」。「貧代會」是當時宣導成立的半官方組織，雖說沒有政權機構的權力，但在毛澤東「貧下中農領導一切」的指示下，其權威性還是很強的。即使是反對的一派，也不能公開地否認「貧代會」。貧代會入駐縣城的縣級機關和郵電局等要害單位，雖說不懂業務，管理上形同虛設，但有這麼一個機構，在雙方較量的力量上，明顯地向一方傾斜了。尤其是農村的武裝力量——民兵，大多數都是由大隊一級就可以調動，這就更使天平的砝碼向「兵團」一邊加了一粒。於是，「兵團」便有了主動進攻的底氣。

如前所述，雙方武鬥據點，紅總站占領的戲院和兵團占領的手管局大院，相距不足 50 米。雙方都安裝了高音喇叭，聲震全城。由於雙方的武鬥據點都在臨街位置，所以，儘管商店照開，市民的日常生活，畢竟要受到一些影響。位於姑姑寺的劇團宿舍兼辦公與排練場，被「八一火海」占據，成為這個組織的據點。為了防止另一派襲擊，他們用磚頭把窗戶壘住。

趙成秀在〈我的文革歲月〉中回憶紅總站總部的情況：

1969年冬天的平定，寒風肅殺。文化大革命中對立的兩派——紅總站和兵團改變了以大字報為武器的論戰，開始進行武裝對峙，越來越顯得火藥味十足。平定劇院是紅總站總部的所在地，常委們常常在這裡開會，面對日益嚴重的形勢，這裡成了他們固守的據點，一方面，常委們給大家講形勢、講策略、講紀律，要求下屬組織和個人決不能出去武鬥，另一方面也要做好應付兵團突然進攻的準備，備好棍棒和自製手榴彈。屋頂上的大喇叭播送著他們的激揚文字，顯示著絕不妥協的意志。而兵團所占據的手管局僅與劇院相隔不到百米，十個大喇叭聲嘶力竭喊著：「紅總站不投降就叫它徹底滅亡！」，聲音和氣勢明顯佔據著優勢。

雙方磕碰不斷，總站一派的張九崗被兵團打死。我們將在下一章論述。所幸的是，死人的事這時沒有再發生。這樣的僵持延續到冬天。兵團派先出手了。潘佩經回憶說：

他們占了戲院，這就斷了我們的路，上下很不方便。在對峙了一個月後，一天晚上大約8點鐘左右，兵團的一名負責人（記不清是誰）說，你帶上紅指的人和他（指黃貴堂）去把紅總站的人打跑。我們於是抬上梯子，悄悄地靠近了文化館的房子，黃貴堂第一個上了房頂，就被對方發覺了，扔過來一個自製手榴彈把黃貴堂的腿炸傷了，我們立即背上黃貴堂撤了回來。第二回攻打戲院我沒參加，聽說是從郵電局對著的房上往過打，史紅德和王克儉披上被水浸過的厚被子，抬上裝炸藥的火爐過去先炸了門，後炸了戲院的高音喇叭。董福昌在郵局這面掩護。紅總站一看不行連夜撤回師範。趙岐山撤出的時候中了一槍，子彈打在左屁股上。幾天後兵團又向師範出擊。實際上兵團的人到達師範時，紅總站的人已經撤走了

而當時在戲院負責值守高音喇叭的大醜則說，其實，戲院早就沒幾個

人了。黑夜有五六個人，白天基本沒有人。所謂地雷，都是土造的。用火爐裝炸藥，爆炸力是相當強的。沒有死人，實屬僥倖。當時擔任城關鎮城裡大隊治保主任的張成身（風池）親歷了這次進攻。他說：

武鬥起來，先打的戲院，把「紅總站」的喇叭放倒。打的時候，用洋火爐裝上炸藥，穿上雨衣，把被子潑濕，衝過去炸倒的。在東門口的羅鍋橋上架著機槍，有兩個排民兵守著。我是在戲院對過郵電局的房上。

「紅總站」抵擋不住，便連夜撤往上城。張成身說，「紅總站」撤退的時候，是走小彰化坡順南營到的上城。這就是說，「紅總站」是從劇院的後面撤出，越過嘉河，然後走的彰化坡。因為南營地處高地，只有幾條路可以上去。當時參與了兩派武鬥的河頭村教師胡彬對此事記憶猶新，他說：

我記得是 9 月 11 日，是昔陽縣奪權的紀念日〔這裡日期似有誤，昔陽陳永貴奪權是 2 月 11 日〕，那天，「兵團」的大喇叭放著毛主席「鐘山風雨起蒼黃」的歌，我就叫「紅總站」也放毛主席詩詞歌〈西江月·井岡山〉。突然，外頭驚天動地地響了一傢夥，郝守映就下命令撤出戲院。我跟著我們的人，從葛家院串院跳到嘉河，看見趙岐山挨了一槍。寶憲用「獨角龍」〔一種自製土手槍——編者注〕打了一槍，我趕緊擺手讓他快走。我們走彰化坡到南營再到師範，在城牆上挖工事，做出要堅守的架勢。兵團的人也在準備進攻。有一回，高振發用木棍挑了一頂帽子想試一試，對方就「叭」地打過一槍來。

這次武鬥，除了張九崗之外，儘管沒有死人，但是隨時都有死人的可能性，所以雙方都比較小心，總站則採取了打不贏、守不住就跑的態度。

「紅總站」撤到上城後，便以平定師範為據點，把學校的大門鎖了，用石頭、桌凳壘了。這時「紅總站」還有一部分人在西關黨校駐紮。大醜回憶說，「黨校的人接到命令，就在胳膊上繫上白毛巾，到上城集中了」。當事人翟全臣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

兵團背後有部隊支持，用的都是半自動步槍〔這一點有點誇張〕，我們的武器就是木棒、磚頭和土製手榴彈。土製的手榴彈就是一根鋼管，中間放上火藥兩邊用黃泥封了，幹是聲音大沒有殺傷力。人家攻過來了，我們就扔上一個，嚇退了就算了。因為當時李守珍和我們說「不能弄死人，誰弄死人，誰以後要吃槍子兒」，所以我們也沒死守，人家一打槍我們就守不住了。

總站的領袖之一荊履榮在訪談時說：「當時，李守珍和我開會要求，打人不要打傷，開槍不能打要害部位打死人，一死人就是大事，遲早是你的事，就要出問題」。看來這個警告還是有作用的。翟全臣說：

我進去就和李守珍說：「不行，沒有武器守不了，撤哇老李。」從戲院撤出來，趙岐山胳膊上挨了一槍，我背上他繞路回的師範〔上面潘佩經說是屁股。屁股一說比較可靠，否則不用背的〕。後來守在師範也是還沒等人家攻上來了我們就都撤到昔陽了。

我記得我們當時好像有步槍、手槍。手槍是兩把五四式，這兩把槍是銀行的，可是子彈不多。牛司令好像手裡也有一把槍，不知道是咋來的。

這裡所說的「牛司令」，是牛增福，化肥廠的技術教員，當了「紅總站」的總司令。他告訴我們當總司令的經過：

1965年，後半年開始了文革，北京「紅炮手」來發動的。我們組織了造反隊，有400-500人。當時廠裡共有1000人左右。我們鬥了廠裡的當權派孟新田，因為他要解雇合同工，還有人因為有病廠裡不允許在化肥廠幹。我們派郝守映和張秋雲去和「紅總站」聯絡，加入「紅總站」。

當時「紅總站」的總指揮是郝守映，政委是李守珍。我們的戰鬥部隊有三千人，按軍編制，我是總司令。工業系統的人是第一軍，主要是化肥廠的，軍長是翟聯盛。第二軍是其他工業上的人，郝和森任軍長。第三軍主要是手管局系統的人，軍長是李振江。馮瑤卿是副司令。成立三軍後，貼大字報，擁護陳永貴，受核心小組領導，就是閻扣成、劉子義和梁子銘他們。

當時在戲院和「兵團」對峙時，我帶人守戲院。這裡是平定劇團「八一火海」的根據地。當時我們有50到60人。白天沒事，戰鬥主要是發生在夜裡。他們打了幾次都沒有打下來。其實我們也沒有什麼武器。鋼管做的手榴彈而已。沒有死人。後來實在守不住了，才退到師範，然後退到藥林寺，待了兩三天之後，去了昔陽。當時共有兩千多人。

關於牛司令的故事，據劉維忠回憶：

在師範大院裡，牛司令還組織了一次閱兵，紅總站第一軍全副武裝，戴柳條盞，拿木棒，衣服裡裝上石頭，從上城列隊走到化肥廠，洗了個澡又回了師範，這一下總站的士氣就又上來了。但是後頭師範也讓兵團攻下來了，總站就撤到昔陽了。

閱兵確實可以起到提高士氣的作用。但結果卻也未能力挽狂瀾。

總站武鬥失利、決定撤退到昔陽

集中到上城的「紅總站」武鬥人員，當時的思想是比較混亂的。首先，吃喝便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撤退，數百人（牛司令上面說是兩千人）撤往哪裡，都沒有一個定數。那幾天，作為「紅總站」一派骨幹力量的和秀，已經將自己緊鄰平定師範的大門反鎖頂死，把自己的老父親接到師範，隨時準備走了。作為他的近鄰，返鄉務農脫離「文革」爭鬥的李金田親見他翻越自家的院牆出入取衣物。三、四天之後，「兵團」發動了又一次進攻。張成身回憶說：

三、四天以後，黑夜裡董福昌帶隊，到師範大操場圍牆外頭扔手榴彈。武鬥的時候有命令，告訴以擰走人為原則，不許傷人，歪牛家兄弟三牛因為扔手榴彈拉了弦沒有扔上去，彈回來被炸著了。

這種「有命令」的行動，總命令從何地何人口中發出，下層人物不知曉，上層人物緘口不言，現在已無人得知。但「兵團」一派能調動民兵，而且裝備精良，彈藥充足，實是有備而來，有力量作後盾。在「打仗」時儘量不要傷人，看來兵團也比較注意。張成身說：

我們民兵的編制，一個班十二個人，正班長帶手槍，副班長持衝鋒槍，一個班一挺輕機槍，機槍有三十發子彈。其他人是步槍，每個人有十五發子彈，還有四顆手榴彈。

在「紅總站」集中撤退到上城平定師範之後的第三天夜裡，「兵團」向上城發起了攻擊。攻擊是從大坡方向開始的。家住上城師範附近的李金田親歷了那個驚心動魄的夜晚：

「紅總站」占了上城，就開始試製土炸彈。我遇了兩次。一次是我在生產隊勞動，在大坡頂上積肥的煤灰堆裡刨出來一個土製手榴彈。因為那幾天陽泉也有人在上城支援「紅總站」，因此估計是他們丟了的。

那是用 6 分鋼管製作的，兩頭封著泥，用膠布貼了口。拿開膠布，裡頭是一個拉火管。後來，住在平定師範的人開始試製土炸彈。炸彈是拿鐵茶壺裝上炸藥製成的。

那天我正上茅房〔廁所〕。我家茅離師範餵豬的小門不過 20 米。他們一點土炸彈，那傢伙「咚」地炸響了，震得地皮顫。一塊鐵片「日」地從我頭頂飛過，嚇得我趕緊跑。

在這兩天裡，每到黑夜，大坡方向就「咚咚」地有手榴彈炸響的聲音。即使白天，我們生產隊積肥也不敢去大坡那邊。有個迷淨工分老頭名叫郭慶和，我們說不敢去他非要去，還說他是老百姓誰也咋不了他。結果他一出去，在地裡還沒刨兩下，手管局那邊「叭」地響了一槍，聽著子彈「哧溜」一下從老漢頭頂飛過去，嚇得他連鋸頭也沒拿，趕緊跑回來。

過了兩天，就開始攻上城。那天晚上，天剛黑，大坡上槍聲手榴彈聲就響起來了。我們都不敢出門。到晚上十一、二點，聽到人聲很嘈雜，汽車的聲音很大，都是往沙坡方向的。響了一陣，就一點聲音也沒有了。

約莫十二點，就聽到師範大門方向「轟」的一聲巨響。那聲音震得人趴在炕上還幾乎彈起來，我家廚房的那扇門是有門轉的老式門，「咣」的一聲就摔在地下了。緊接著一陣槍聲和手榴彈聲，到後半夜，就一點響聲也沒有了。

第二天吃了早飯，我們都到師範門口的李家，聚在一起說昨天夜裡的事。到了師範門口見師範三四寸厚的大門被炸下一扇來，躺在地下，另一扇的下邊被炸飛了，紅門上露著白茬，桌椅板凳扔下一院。上城街的電線被打斷了，一綹一綹搭拉在地下，到處灰騰騰的。

進了李家，他家八仙桌上的土落下厚厚一層，一寸多寬的窗櫺格上，沒有一塊完整的窗戶紙。李家人給我們形容昨晚的情景，說聽見街上「咕咚咕咚」都是人跑的聲音，槍聲劈哩啪啦到處響。有人吶喊「炸門！炸門！」就聽見咚咚的人在跑，忽然一聲炸響，地動山搖一般，全家人都嚇得鑽到桌子底下，以為房子被炸塌了，一夜沒敢睡。聽到天明沒人聲了，才敢迷糊了一會兒。

我們幾個夥伴相跟到師範裡邊去看。師範門口鋪的那塊大青石，被炸得四分五裂的，院裡頭到處是破桌爛凳和石頭瓦塊。張九崗的屍體也沒人管〔張九崗慘案見下一章〕，躺在那裡。後來我們相跟到李家圪嶺的夥伴家，他叔叔家的房角被汽車蹭刮了一下，齊整整被削了一溜，露著磚茬。聽他叔叔說，那是「紅總站」的汽車從沙坡走的時候刮的。

親歷「紅總站」撤退的大醜說：

「紅總站」在戲院、師範、黨校都有人。撤退的時候，黨校的人胳膊上繫著白毛巾，聽命令到上城集中，一齊撤到昔陽的。

親自參加趕走「紅總站」的張成身則從另一個側面回憶：

「紅總站」從沙坡撤走時，沙坡其實有人，支著三挺機槍，但是沒打槍。到東關馬東社那裡時，那裡埋伏的人有人打槍，把「紅總站」汽車的一個輪胎打得漏了氣了。

他再次強調了不許傷人的指示。同在城裡大隊但派性觀點是「紅總站」的杜興廣也親歷了那次撤退，他回憶說：

我那時候在煤窯上幹活，下了夜班，走到手管局門口，武鬥的學生問我幹什麼的，我說我是刨煤的，和煤搞武鬥的。學生們沒聽懂，就把我拉進手管局，打我。是爛狗貨（蘭苟和）才給他們解釋清楚了。我對這夥娃娃們不服氣，就乾脆入了「紅總站」。

撤退的那天，我們都坐卡車走，汽車上蒙著用水濕了的氈和被子，只露兩個窟窿。我坐的那個車上，有二十幾個女的，其餘盡是老的。車過了昔陽，我才從棉被下出來。李成柱也是「紅總站」。他被「兵團」打死了〔關於李成柱慘案，見下一章〕。和秀〔城裡大隊社員，「紅總站」造反派骨幹〕從昔陽回來，照了相，給了陳永貴。他照完相跑到流杯池，被兵團發現了。他趕緊才跑了。

對於這個過程，總站的郝忠德的回憶和看法是：

68年冬至69年2月間，平定城的局勢異常的嚴酷。一些幹部和軍人調動農民進城，公然製造事端，挑動群眾武鬥，並唆使群眾組織中一些人大打出手。南關張茂生被自稱兵團的一夥人暴毆，打得渾身是血，昏迷不醒。印刷廠職工郝和生傍晚在回家的路上被一夥暴徒舞弄棍棒亂打，差點喪命，左腿骨粉碎性斷裂。當時城內人人自危，恐慌不安。為防止這些暴徒的襲擊，紅總站就把人們集中起來，在平定劇院天天開大會，在會上講形勢、講政策、講策略、講紀律，總之不讓下屬組織及任何個人出去武鬥。

這時一夥武鬥人員竟然搶占手管局辦公大院，在房頂上築工事、修掩體，集中打手，建立起武鬥據點。因為沒人與他們打鬥，他們就躲在大院門洞內窺視，伺機捕擊過路行人。那天城關鎮幹部張九崗像往常行走在大街上，當他走到手管局院大門口時，忽然從門洞內衝出一夥打手，將這位

在文革中從不參與任何組織活動的老革命軍人擰住雙臂，連推帶搡，拉進院內。幾天後在他家鄉平定寧艾村前河槽裡發現屍體，慘不忍睹……〔見下章敘述。〕

面對慘無人道的暴行，持紅總站觀點的群眾不得不在平定師範集中起來，相互有個依靠照應，以防不測。紅總站也成立了以工人為主的三軍自衛隊，以化肥廠牛增福為總負責。這時武裝部發放槍支彈藥，武鬥暴徒們有恃無恐，竟向手無寸鐵的紅總站群眾開槍。

平定劇院是紅總站的播音點，暴徒們多次用半自動、衝鋒槍、輕機槍、軍用手榴彈攻擊。裡面的人被迫撤出時，紅總站的負責人、原東關小學教師趙岐山左臂中彈，鮮血從袖筒冒出。

一輛河北汽車路經平定，司機（被）槍擊身亡。平定這座千年古城血雨腥風。在平定師範集中的人們也遭到數次的槍擊和手榴彈的攻擊。面對槍彈的攻擊，群眾自發地用鋼管、火藥製土手榴彈，在遭到攻擊時扔幾顆自衛。不能再這樣下去，紅總站負責人同昔陽革委聯繫，疏散群眾，以免造成更大的傷亡。經昔陽革委請示上級同意，平定紅總站的群眾扶老攜幼、背井離鄉到昔陽避難。

趙成秀對這次武鬥以及紅總站撤退到昔陽的描述是這樣的：

兵團向戲院發動進攻，用手榴彈和炸藥將按在戲院屋頂的大喇叭摧毀，亂戰中，一顆手榴彈落入戲院旁的民居，居民王瑞蘭當場被炸傷，後來轉到昔陽醫院不治身亡。¹¹紅總站的常委們見戲院難以固守，頂不住兵團的火力，只得被迫撤離，轉移到平定師範的紅三司駐地，撤離中，常委

¹¹ 趙成秀這裡敘述有誤。該位婦女是本書作者之一的同學王連喜的母親。他曾問過王，王說是嚇死的，不是炸死。而且也不是當下死的。其母有病躺在家，聲音太大，受了驚嚇，後來病情加重死亡，而不是在武鬥中被炸傷然後死亡。

趙岐山胳膊中彈。〔如前所述，應該是屁股中彈。但是具體如何，無法考證。〕

到了平定師範之後，兵團仍沒有放手，繼續對紅總站施加壓力，在陽阪坡前擺下進攻的架勢，還派人到平定師範的操場上投放手榴彈，製造恐怖氣氛，逼紅總站離開平定。紅總站自知難以和武裝部支持的兵團抗衡，決定撤退。當時，有一些毛頭小夥子還想自製武器，與兵團決一死戰，但遭到常委們的一致反對。

在平定師範的第三天，聚集在平定師範、縣委黨校等地的紅總站骨幹陸續撤出平定，到臨近的昔陽縣避難。核心小組成員閻扣成、劉子義、梁子銘，以及王來金、王慶雲、趙生鈺等總站支持的老幹部因無法在平定繼續工作，也到了昔陽。這次武鬥似乎以兵團的勝利、紅總站的失敗而告暫時結束，但在道義上紅總站卻贏得了群眾，更重要的是，避免了一場更大的流血衝突。

趙成秀說這次武鬥他並沒有參加。上述所有情況，都是紅總站文衛大軍的頭頭王希考告訴他的，王是這次武鬥的親歷者。

「紅總站」一派的人被趕到昔陽，一些追隨「紅總站」的人也追到昔陽。一些人的家屬也到了昔陽，比如上面提到的和秀的父親。荊履榮在訪談中也提到過年時，他的老婆、幾個孩子以及父親也都去了昔陽。

2007年9月6日，當年「紅總站」一派的領軍人物李守珍接受了筆者之一的採訪。此前，在平定擔任宣傳部副部長兼文化局長後又擔任陽泉藝校校長的他，對這一段經歷緘口不言。但這一次，他還是向筆者披露了他鮮為人知的一些經歷和想法。之後的次年春天，他因糖尿病併發症而故去，享年古稀之壽。他說：

「文革」一開始，我也是走資派，在劇團被奪了權。所以「一·二二」和「三·二八」奪權，我都沒有參加。後來，我參加了「文革」。加入「紅總站」，是因為「紅總站」的人受壓的多，我也有這種心態。

當然，受壓的情況不一樣，造反的心態也不一樣。但因為受壓，一旦有機會，就會鬧起來。這種壓制，其實在「文革」前，社會上就顯現出來了，只不過，「老人家」（指毛澤東，「文革」中流行的稱呼）利用了這種情緒。

「文革」一大亂，我心裡就有了想法。我感到這麼鬧下去，長久不了。「老人家」不是常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麼？因此，鬧派性歸鬧派性，但我心裡清楚，千萬不敢打死人。打死人是要償命的。

至於我當了頭頭，那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把你推到那個地方了，越弄越大，越弄越收拾不住。「紅總站」那麼多人，又是各歸各家，只是這麼聚到一起，其實是誰也管不了誰。

像和秀、劉林、陳愛祥這些人（「紅總站」骨幹分子，據時人傳說，是打、砸、搶比較厲害者）和我們並不接觸，我沒有和人家打過交道。因此，他們幹些什麼，我們也管不了。

李守珍在這裡提到的參加造反派的原因值得深思。山西省的劉格平、袁振等人起來造省委的反，原因之一也是他們當時在山西是受壓的。其時山西省領導圈子裡的山頭主義、地方宗派主義比較嚴重。幹部圈裡流行的順口溜說山西是「太行的天下，太岳的黨，晉綏幹部後娘養，晉察冀幹部歇涼涼」。不是太行、太岳派的幹部不容易得到晉升。而劉格平他們卻都是外來人。劉格平、劉貫一、陳守中、劉志蘭都是因為政界鬥爭失利、被「迫害」後被安排到山西的。所以他們在中央的支持下積極參加造反，也

是可以理解的。¹² 各種各樣的權力鬥爭顯然是造反的主要原因之一，或許路線鬥爭是其次的。

總站的昔陽生活

關於總站撤退到昔陽一事，荊履榮說當時的安排是這樣的：

我到師範後就到昔陽去了，安排聯繫平定紅總站到昔陽的有關事情了。我回昔陽先請示趙滿倉，趙說不管有多少人都撤過來吧。就住在毛家溝、毛家山、明子溝和安坪吧。然後，我去安排衣食住行的具體事情。讓大寨接待站提供了被子，昔陽糧食局提供了糧食。剛出去大概五百多人，毛家山住了 60 多人，毛家溝住了 50 多人，明子溝也是 60 多人，安坪住了 100 多人，昔陽城裡也分散住了一些人。

王增福《糧食工作回憶》從本單位角度記述了「紅總站」撤到昔陽時的情景：

1969 年 1 月中旬，兩派開始武鬥，武鬥日甚一日。1 月 26 日，城關所有的糧食職工，一夜之間，全部離崗撤走。臨行前把所有的糧票，包括縣局的、城關糧站的全部帶走，所有的公章也都帶走，並從銀行提款 10,000 元。第二天，糧食門市部就無法進行正常營業。

留下的職工，在縣人武部和解放軍支左領導組的支持下，成立了平定縣糧食局臨時生產領導小組，推選高松年為組長，劉煥梅、李恒秀為副組長。刻製了臨時領導組公章，並派翟芝瑞去陽泉市糧食局借回糧票 500,000 斤，又從其他單位借來人員，才開始營業。1 月 28 日，紅總站的

12 見前引余汝信、曾鳴，「文革『全國第一奪』：山西一·一二奪權概述（下）」。

全部人員撤離平定，去昔陽駐紮。

這有點兵團撤退東鄉時的情況，需要重打鑼鼓另開張。他的記錄，證實了雙方武鬥最激烈的高峰期是 1969 年 1 月 26 日，這也應該是「紅總站」撤往昔陽的時間。

武鬥之後，「紅總站」撤到昔陽。為什麼到昔陽？因為「紅總站」是陳永貴支持的。他要不表態支持，一來「紅總站」起不來這麼大勢，二來武鬥一敗，也就散了。平定離昔陽那麼近，和昔陽同屬一個專區，晉中地區又是昔陽派的人掌權，所以就到昔陽去了。一到昔陽，其實就沒有什麼組織了，有親戚朋友的投親靠友，沒有親戚朋友的集體安排到一個地方。吃喝什麼的，又不是白吃白喝，都要交錢交糧票的。這一點，作為撤退到昔陽的「紅總站」派人員，城裡大隊的杜興廣說的更具體：

到昔陽以後，學生、教師和劇團編到一起，住在安坪。和秀走時帶著他大〔爸〕他媽，也都住在安坪，工人住在毛家溝，農民住在明子溝〔音〕，有七八十個人。

農民中閹派性的，南關和後溝厲害。後溝以劉啟為首的，是「紅總站」，一下走了一半人，把大隊的存款都從平定銀行取出來，存到昔陽。

後來，咱大隊（指城裡大隊）去昔陽調糧，和秀不讓辦手續，是我給辦的，把拉糧車送過界牌嶺去。

我住明子溝時候，天天上地。那地方人不會種菜，咱在家天天作務菜，就教他們，買菜籽、作務。我在明子溝，給人家種了二十多畝園地。種地是白乾。後來回來，還補交了錢和糧票。

荊履榮也描述了在昔陽的生活。他說在昔陽期間：

(大家)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不准擾民。要求大家一定要聽村支部的安排，參加勞動。當時昔陽的農村還是很穩定的。我們堅持誰出問題，拿誰試問，所以在昔陽期間，沒有出問題，大家表現都很好。就我們回平定以後，劇團還到毛家山多次演出。

趙成秀在他的回憶文章〈我的文革歲月〉中記述了這段歷史：

紅總站撤出平定，正好春節就快到了，我便攜妻子回到昔陽老家。撤到昔陽的紅總站人員大約一千多人，紅總站的總部設在安坪村，機關幹部大多住在兩縣對口的單位，工人和農民則住在安坪、坪上、毛家山一帶。紅總站的常委們十分重視對隊員們的教育，要求他們遵守當地的風俗習慣，適當參加些勞動，和社員們搞好關係。離開了喧囂的戰場，常委們頓時感到寂寞和無奈，只得被動地等待時局的變化。昔陽是安定的，沒有派系鬥爭，昔陽縣委也不干預紅總站的工作，這給紅總站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休整機會。我家位於縣城的中心，好多縣機關都是近鄰。我常常到這些機關和寄居的平定人聊天，有時也跑到安坪和那裡的戰友見見面，幫助他們做些事情。我家也常有平定的客人來訪。

當時的情況，看來總站也只能靜觀其變。關於從銀行取錢的事情，戎崇璽是這樣說的：

上昔陽前兩天就感覺事情不對了，就從平定銀行取了 40 萬，裝了一麻袋錢，10 塊錢一張。拿到昔陽放在那邊的銀行。當時有 3000 人在毛家溝、安平、河西、毛家坪安排住宿。

他們和那裡的人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戎崇璽說後來開廠時還用毛家溝的人看廠子。但他所說 3000 人的數字，其實沒有那麼多，應當說，1000 人左右是比較可靠的。

撤往昔陽時，平定銀行一個戰鬥隊曾經私自帶走一批現金，平定糧食局一個戰鬥隊曾經私自帶走一批糧票。由此可以推測，「紅總站」的撤往昔陽，是一次有步驟、有指揮的統一行動。但是，時過境遷，當時人們是用什麼樣的方法，能夠在符合財務手續和保管手續的前提下取出大批錢和糧（糧票即糧食）帶走，當事人是誰，已經無從得知了。《中國共產黨平定歷史紀事》對這段歷史是這樣記載的：

1969 年 1 月 20 日，中央解決山西問題的「十二月會議」後，在解放軍的說服下，兩派頭目一起舉辦了學習班，意在搞大聯合，但沒有形成，反而受山西大形勢的影響更加對立了，持「兵團」觀點的人認為，大形勢對自己有利，被迫轉到鄉下和外地的「兵團」頭頭和「兵團」派觀點的領導幹部，陸續回到縣城，佔據了手管局大院，迫使機關停止辦公 40 餘天。

1 月 26 日至本月下旬後，兩派爭鬥頻繁。城關糧站所有職工一夜之間全部出走，把所有的糧票、公章和從銀行提的一萬元現款一併帶走，第二天無法營業。在解放軍的支持下，留下的「兵團」派職工，成立了「平定縣糧食局臨時生產領導小組」，推薦高松年為組長，刻製了臨時公章，又借款、借糧票，才又勉強營業。

1 月 29 日，「兵團」佔據人委大院和手管局，「總站」佔據劇團、戲院和平定師範，兩派不斷出現摩擦。「總站」打了「兵團」的蔣寶山，「兵團」抓住了「總站」常委張九崗，並鬥打致死。「造反派」武鬥造成了機關不能辦公，工廠停產，醫院停診的嚴重局面。

7 月，「總站」被「兵團」一派趕到昔陽後，其中有一部分中學生不

願在農村參加勞動。總站決定由董某（中學生總站副指揮）帶隊到昔陽、平定交界處的「婆婆泉」廟內居住。這些中學生住在那裡後，經常到附近的村莊甩炸藥包、扔土手榴彈、打槍，有的還阻擋一些村交公糧，鬧得附近村民不得安寧。村幹部分別到平定縣人委大院找到「兵團」負責人，請求派人前去制止他們的行為。「兵團」武鬥隊約五六十人，兵分三路進攻婆婆泉。「總站」派被迫撤到昔陽的毛家山、毛家溝、安坪一帶。



圖 11-2 紅總站的同學於 1969 年的合影

資料來源：耿忠榮提供。

總站郝忠德並不認為是總站在騷擾百姓。他的回憶是：

為穩定山西，昔陽縣根據上級的指示，動員在昔陽滯留的群眾回去搞聯合。紅總站決定，先遣紅戰團二十幾名學生，回平定婆婆泉山廟探觀勢態。當平定方面得知後，不是以歡迎的態度，主動聯繫協商搞聯合，而是認為攻擊昔陽的好機會。他們組織指揮武鬥隊，以侵擾當地村民為藉口，開始行動發起攻擊。那天武鬥人員分路向山廟運動，妄圖把學生圍堵打的向昔陽境內退卻，武鬥隊就能隨後尾追進擊昔陽。但學生分散隱蔽在高粱、玉米地的青紗帳裡，武鬥隊員們衝向山頂，不見學生，在山頂轉來轉去，試探幾次都不敢越過眼前的縣界。這些人心裡有些虛，膽子有些怯，這畢竟是大寨、陳永貴所在的昔陽縣啊。到下午，亂槍打傷一名學生，抓走三名學生，回平定城交差。

過了兩天，在地處兩縣交界的上馬郡頭村集結了全副武裝的武鬥人員，這次來的有專業武鬥人員，還有調進城武鬥的農民，甚至有些幹部都背著槍，傾巢出動要向昔陽大舉進攻。晚飯後，個個酒飽飯足，槍上刺刀，彈上膛，躍躍欲試正待命進發。中央對山西的七·二三布告廣播真及時，針對性很強。下達的命令不是進攻，是停止一切行動。來參加武鬥的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慌了神，紛紛湧向汽車，連擠帶爬上車，急忙連夜撤退。回去後把發放的槍支、剩下的彈藥如數收繳，撤除武鬥據點，解散武鬥人員，縣武裝部和支左辦無條件執行上級指示，用汽車接回在昔陽的幹部和群眾。至此平定的武鬥才終結。

關於總站從昔陽返回平定搞大聯合的事情，我們在後面一章會講。不過關於這最後一次武鬥，潘佩經的說法是：

收繳武器之前最後一仗在南後峪打的，紅總站以毛家溝為據點，經常到南後峪騷擾，兵團決定收拾他們一下。當時婆婆山上有個廟，總站把它做了一個據點，我們先把這個據點打了下來，還抓住三個人，包括糊糊小（戎存璽，平定高三班學生，「紅總站」的骨幹）。當時是賈文才領人往上衝的，一梭子就將總站嚇走了，可是他們還在打槍，老賈也負傷了。這件事的第二天就下了收繳武器的通知。

城裡大隊的張成身也親歷了這次武鬥：

「紅總站」到了昔陽，一般人住在毛家山和婆婆山，頭頭住在昔陽。他們經常到藥林寺來騷擾，我們集中到上馬郡頭村，去了兩次。在上馬郡頭村，「兵團」人山人海，準備打昔陽和打藥林寺。第二次準備打，但不能越過縣界打，正在商量，「七·二三」布告下來了，要求收繳武器，連夜緊急撤退，回到城裡。

據劉維忠回憶：

紅總站的人在昔陽待了兩年〔作者注：應該是 7 個月〕之後，為了大聯合，解放軍又把紅總站叫了回來，大聯合後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各大小單位都有自己的革委會，既吸收兵團的人員，也吸收總站的人。雖說是大聯合了，但雙方在各方面還是在爭。紅總站從昔陽回來以後，牛增福、郭旭明、丁世民和胡志芹他們就都給打成現行反革命了，記得開會的時候一人掛一個大鐵牌牌。

「七·二三」布告，是在山西武鬥無法遏制的情況下，中央下發的公開文告。¹³這份文告，一改以往對「革命行動」讚揚稱頌的口吻，措詞嚴厲，針對性強，定性明確，政策清晰，是「文革」整個過程中極為罕見的文告。不過該布告還是認為所謂打砸搶抄等行為是一小撮階級敵人和壞頭頭的問題。布告要求鬥爭「雙方立即無條件停止武鬥，解散各種形式、各種名稱的專業武鬥隊，撤除一切武鬥據點，上交一切武器裝備」、「武力強占地盤，拒不執行本布告、負隅頑抗者，由人民解放軍實行軍事包圍，發動政治攻勢，強制繳械。逃跑流竄者，由人民解放軍實行追捕，歸案法辦」。布告還說「凡分裂革命大聯合、破壞革命三結合的行動，另立的山頭，一律都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認。重新拉起的隊伍，都要立即解散，實行歸口大聯合」。

2007 年，我們在採訪當年親歷此事的一批當事人時發現，時過境遷，往日劍撥弩張的暴戾之氣一點也不見了蹤影，甚至連一點尤怨之心都沒有。談笑風生中，一切往事，包括流血，都如同在說別人的事情。但同時，許多親歷的風雲往事，也隨著時光的磨蝕而成為了殘缺不全的片斷記憶。即使如此，這些歷史的殘片仍然顯現著當年整個事件的風貌，因而使得它更為彌足珍貴。

這些其實都是後話，當時趁著對立派被趕到昔陽的平靜，以「兵團」派為主流的平定縣各個層面開始忙著整頓。先是成立了「工代會」，即「工人代表大會」。但是，平定是一個農業縣，工人少，純粹的產業工人更少，於是「貧下中農代表大會」以「貧下中農領導一切」的姿態，進入縣城，並進駐一些要害或相對混亂嚴重的部門。「紅衛兵代表大會」則是學生階層的領導機構。「三代會」的建立健全，為平定的穩定打下了基礎。

13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布告」，1969 年 7 月 23 日。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一切似乎都兆示著毛澤東的預言：「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不過，兵團被趕到鄉下時，總站試圖成立各地政權，並未成功。現在總站被趕到昔陽，兵團似乎也沒有能夠成功地建立政權。一派掌權畢竟無法長久。那麼大聯合之後又如何呢？



圖 11-3 平定縣工代會成立遊行，1969 年

資料來源：李俊瑞提供。

武鬥的後果：多人重傷、三人致死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

——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於《人民日報》、《解放軍報》
1968年4月10日社論〈芙蓉國裡盡朝暉〉¹

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

——毛澤東最新指示，1967年10月7日²

1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社論，「芙蓉國裡盡朝暉：熱烈歡呼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1968年4月10日。

2 中共中央關於毛主席視察各地講話的通知，1967年10月7日，中發〔67〕313號。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不過在討論大聯合和建立革命委員會之前，我們將先討論在兩派武鬥期間發生的幾個打人案件以及張九崗和李成柱被打死的慘案。平定當時其實有三個人被打死。其中一位是河北人楊勇志，在路上被流彈誤傷打死。對其家人來說，無疑是飛來橫禍，給家裡人帶來的悲劇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們對該事件瞭解不多，所以本章主要討論另外幾個打人事件與張、李慘案。張、李慘案可以說是平定武鬥最嚴重的後果，也是文革兩派暴力的頂峰。在討論文革時，人們不可能不對文革暴力進行深刻反思。這也是我們寫作本章的初衷。正如這幾章所述，如果是亂了群眾，傷害了群眾，而不是鍛煉了群眾，那很難說是革命形勢一片大好，也不是「芙蓉國裡盡朝暉」。如果這些群眾，無論是打人的還是被打的，都和資產階級、剝削階級、國民黨反動派沒有絲毫關係，那麼這個大革命的目不是更應該受到質疑嗎？

馮拉科和董銀明被打成重傷

我們在前兩章已經提到不少兩派之間在武鬥時被打傷的人物以及張九崗和李成柱慘案。本章主要將重點討論其中幾個在前面也提到過的重要案例，來看一下武鬥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首先是兵團的兩個案例。他們被總站的人打得很慘，但幸運的是他們沒有被打死。其實在此之前，郵電局職工蔣寶山上班時在單位門口就已經被紅總站一派捉住，把腿打折了。不過我們先來看平定師範「紅司」的首領馮拉科例子。馮自己回憶說：

1968年4月份，聽說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向中央要開槍權，「紅總站」的人就上街遊行抗議。4月13日，我和同學蘇如祥準備去陽泉火車站坐火車去太原瞭解情況。傍晚，走到義井電瓷廠時，碰上了平定紅總站的葛懷義。他對陽泉紅總站的人說我是平定「兵團」的頭，要去陽泉搶槍。

他們就把我扣下來，押到陽泉煤管局的樓上。第二天下午，就把我交給平定紅總站了。回到平定後，先把我關在東關自行車社，毒打我一頓後，我的同學趙岐山把我訓了一頓，接著就要把我送到炮臺。走到半路，我拔腿就跑。因為我練過長跑，他們追不上我。但是，炮臺也有紅總站的人，我又被逮住了。他們給我的頭上套上面袋，又打了我一頓，還刺了我兩刀。一刀在膀子上，一刀在後腰部，流了很多血。接著又把我送到師範二院的教室裡，讓人看著我。我的血流得太多，呼吸很困難。看門的一看不行了，就報告了頭頭，頭頭就讓竇憲、竇勝把我送到縣醫院。縣醫院看我生命垂危，就把我轉到陽泉市立醫院。醫生後來告訴我，其中一刀刺到了肺葉上。我住院一個多月，回家休養了半年多才好。後頭有人告我拿刀砍我的是王龍文，是冠莊瓷廠的工人。

那會被打死的人還有李成柱，我聽說他抓起來給送到政府後的報社了，我和柱家爹就去看去，人已經打得不行了，我問他爹「有奈何沒奈何」，他爹說了個「沒奈何」，出門就走了。

李成柱的案例我們下面再講。關於馮拉科的被打，當時在「紅總站」裡參加武鬥的城裡大隊社員杜興廣回憶說：

有一個人，被竇憲的人給捅了一刀，弄到師範女宿舍那裡，頭上套著一個面袋，他們讓我看住他。後來，我把他放了。

郝忠德說：

馮拉科被刺是發生在 1968 年 4 月間的事。當時形勢還穩定。紅總站下屬的一個組織懷疑他搶槍，於是捉了他。他因為逃跑被一個人刺了兩

刀。紅總站領導得知後，馬上安排送往縣醫院。刺得不深，沒有生命危險。為徹底治癒不留後遺症，又轉往陽泉醫院。縣核心小組對此事高度重視，嚴厲責成紅總站嚴肅整頓，總結教訓，杜絕發生此類事情。

從郝忠德的回憶和馮拉科的自述中可以看出，馮拉科被刺事件是雙方「刺刀見紅」的發端。

另外一個被總站打的是董銀明，時任平定郵電局「郵電戰團」首領，是「兵團」派的骨幹成員，他談到自己的一些遭遇：

高家掌會議是 1968 年的事，面對當時的武鬥局勢，縣裡的幹部準備開會研究如何控制局勢，但是城裡已經亂得不行了，就決定在高家掌開會。我先去了高家掌，楊志忠也到了，但是有好多幹部來不了，我就和楊志忠說我回去牽制住總站家，讓其他幹部喬裝來開會。回了縣裡以後我就故意在街上露面，其他的人趁黑夜化了妝就都去開會了。完了以後我就回了局裡了。因為高家掌會議我被總站家抓到了政府招待所小二樓，他們用小皮鞭抽我的背，脊背全打爛了，頭上也給打了兩個大包。我們的人悄悄把我送到魏德卿家，不久又轉到八〇八部隊炸藥庫。部隊把我保護起來了。過了十幾天，總站家知道消息了就集合了十幾個人來部隊要人，我半夜就又被人接走了。不敢直接去娘子關車站，怕讓人抓住了，步行回了城裡，後來又到了太原的醫院看傷。從太原回來後在皮影廟被總站逮住了，閻扣成直接出面和我談聯合的事，我說這事我管不了，得找兵團。過了幾天就放了我了，但是我回到局裡以後就被強行控制了。

張九崗和李成柱被打致死

張九崗是被亂人打死的。張九崗是當時城關鎮的一名幹部。他在「文革」中觀點傾向「紅總站」，但並沒有深入參與武鬥。「文革」前，他被派出蹲點下鄉。與老百姓的關係搞得很好。當時是中學生的李金田對他有比較深刻的印象：

張九崗到戶下吃飯，一進門就揭鍋，看是兩樣飯還是一樣飯。那時候農民吃白麵很少，一年也吃不了幾頓。城裡大隊一小隊的人，雖說是農民，但住在城裡，總覺得客人來了，又是幹部，想方設法要給吃派飯的單另做一碗白麵條。張九崗一揭鍋，看到是兩樣飯，扭頭就走，到外邊小鋪買兩塊攏合著玉茭麵的餅乾，就點水，就算。要是一樣的「一混鍋飯」，就端起來，沒好沒賴，吃了把錢和糧票往桌上一擱，從沒有不給過。因此，社員們都很喜歡他。

當時在「紅總站」管播音的大醜的看法是：

張九崗在城關鎮和翟雙成合不來，他在城關鎮有什麼事，就到「紅總站」抖擻出來。

翟雙成當時是城關鎮的黨委書記，第一把手。他的觀點是「兵團」派。城關鎮兩位擔任領導職務的幹部之間的工作分歧和個人意氣，是否兩人分野兩派的原因之一？兩名領導幹部觀點上的分歧，是否導致張九崗命喪九泉的原因之一？時過境遷，當事人皆已作古。思想深處的東西，是很難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張九崗被打死的細節，當年沒有查清，現在更無從知曉。因為是命案，非同小可，當年的追查最終連參與者都未能澄清，更遑論打鬥的細節。而現時，參與者有的已經作古，在者也多對此事諱莫如深。在後來的整肅運動中，由「兵團」一派的領導者承擔了責任，也因之受到了刑事處理，後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減刑。這一點，我們在後面會敘述。

張九崗被打死時的情景，當時是平定中學高四班學生，「紅指」（屬兵團）領導者之一的葛秉臣回憶了張九崗被抓到手管局時的情況以及那位河北人被打死時的情況：

文革時平定死了三個人，張九崗、李成柱和一個河北人。張九崗的事情我知道。當時我在貧宣隊開會，看見貧宣隊的幾個人去弄人。學生沒有參加，主要是貧宣隊管的這個事情。出去就把張九崗逮住了，之後被送到手管局，被拳打腳踢一番後〔主要是平中的學生〕，又轉送到縣委後面的一個小樓裡。這會兒我領著人去糧站拉糧食去了，後來的事，就不太清楚了。後來，劉玉榮告訴我，他聽圍觀的人說，周存元打張九崗打得最凶。後來張九崗被打死了，劉懷祿和董福昌〔作者注：兵團負責人〕就將人擺成摔死的樣子，這就埋了。埋了覺得不妥，就又挖掘來扔在寧艾的河裡裝成是淹死的。因為這，劉和董都吃了官司。李成柱的事情我不太清楚。那個河北人是這麼回事，當時是十三縣聯防，當時有個動員小分隊，動員小分隊主要有李二卿、李建一和穆永祥。這個河北人可能是路過的，前頭的防線讓他停下，他開著車也不停，貧宣隊的人就和守橋頭的人說「開槍哇？」「開哇」，說完一開槍就給打死了。

據大醜講，「張九崗死後，我們去找武裝部講理，要求處理，但沒弄下個結果」。

張九崗的遺體後來被總站移回了平定師範。那時候，平定師範已經成為武鬥一方「紅總站」的據點。平定師範的大門被用石塊和課桌凳壘住，不能出入。平定師範另有一個後門，是用鐵焊的，可以出入車輛。正在生產隊勞動的中學生李金田親見了張九崗死後的慘狀：

我那時已經回隊裡勞動了。雖說是跟著「兵團」鬧騰過一兩回，但那是以前的事，這會已經當起「逍遙派」了，不參加武鬥，又是個年輕人，「紅總站」幾個有名人物比如和秀都是鄰居，所以人家也不拿我怎麼樣。那天聽說張九崗死了，抬回來在師範，就跑進去看。張九崗的屍體被放在高臺階教室背後的一個辦公室的外間，放在一個長條椅上，身上盡是泥和沙。一隻眼珠子耷拉在眼眶外頭，那個眼眶是一個紅窟窿，樣子很可怕，與每天在上城這家進那家出的「老九崗」完全不一樣。這時候，武鬥打得狠厲害，他的屍體被放在大禮堂旁邊長梨樹小院的一個小房子裡。「紅總站」往昔陽走的時候，也沒人管。後來，平定師範的幾個老師嫌屍體有臭味，就用磚和泥把那個小屋封嚴了，誰也躲著不往那邊去。再後來，平定師範要復課，校醫趙醫生就把屍體處理了。處理的時候，我們沒敢去看。據師範的老師說，趙醫生戴了好幾層口罩，渾身上下噴上酒，進去用鐵鍬把骨頭弄到棺材裡，讓他家人弄走埋了。

一個比較親民的幹部，一個正當壯年的生命，就這麼無謂地、不明不白地消逝了。幾十年後，當年參加平定「文革」的趙成秀撰文〈張九崗被殘害內幕〉，回憶了張九崗的生平與這一慘案的發生：³

³ 見趙成秀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3457b60100yja9.html。上網時間 2015 年 4 月 26 日。

張九崗原籍昔陽縣石坪村，後遷移到平定縣寧艾村。小名義倉，1920年3月生。他出身於一個貧農家庭，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父親靠給地主當長工維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因家境貧寒，大姐早早就嫁給了人，民國九年鬧饑荒，又不得不把二姐賣到河北井陘，從此三十年杳無音信。父親去世後，留下母親和兄弟二人，哥哥在本村給地主當長工，媽媽給地主家奶孩做飯，九崗從八歲起就給地主放牛、拾糞，受盡了苦難和欺凌。

.....

1945年抗戰勝利後，25歲的九崗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先是當武工隊獨立營戰士，後任42團一連四班的副班長、13縱隊38旅112團二營四連二班班長。在艱苦的革命戰爭中，雖然曾有過貪生怕死、回家享樂的退坡思想，但在黨和軍隊的培養教育下，堅定了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在河南安陽的黃營戰鬥中榮立戰功，受到上級的表揚。1948年，在臨汾戰鬥中不幸腰部負傷，留下了殘疾，不得不退伍回家。1949年2月12日經寧艾村黨員魏富科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

1962年底，張九崗調入城關鎮，擔任鎮營企業的負責人。文化革命開始後，平定分為紅總站和兵團兩派，雖然他持紅總站觀點，但並沒有參加任何組織，也沒有參加對立、激烈的派性鬥爭。在各行各業生產秩序極其混亂的情況下，仍然堅守崗位，經常深入街道、廠礦，解決生產中出現的問題，在隆隆的機器聲中，迴響著他和藹的囑咐，在深深的巷道裡留下他疲憊的腳印，受到街道居民和廠礦職工的讚揚，都稱他為老實巴交的好人。

之後，趙成秀的回憶就和前面幾位的回憶類似，即張九崗被拉進手管局，被圍攻、追問、毆打。不過他著重講了兵團頭頭的責任，認為他們非

但沒有勸阻對張九崗的毆打，反而在他被打死之後，試圖掩蓋真相、混淆視聽、逃避責任。他接著描述了總站當時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情況：

但是，事實就是事實，偽裝應該剝去。紅總站對張九崗的慘死無比憤慨，對兵團所編造的謊言心知肚明。他們把張九崗的屍體從寧艾運回到紅總站的下屬組織——平定師範紅三司，準備抬著張九崗的屍體在街上遊行，抗議董、劉等人的罪行。只是因為平定武鬥很快升級，紅總站被兵團趕出平定，流居昔陽，張九崗的屍體被人封存在平定師範柏樹院的一處小屋子裡，任其腐敗發臭。可憐一個共產黨員、復轉殘廢軍人、國家幹部落得個拋屍荒野的下場，令任何有良知的人扼腕痛惜，悲傷垂淚。

一位立過戰功的三等殘廢軍人張九崗被殺害了，那年他 49 歲。

其實，總站在這個問題上的處理方法也是有問題的。他們讓張九崗陳屍於平定師範，而不是及時將他入殮下葬，本意是向兵團示威、向社會控訴兵團的罪行。在離開平定去昔陽之前他們也沒有做任何事情，而是讓他繼續陳屍在師範。這本身也是對死者的不尊重，對自己同志的不負責任。而且在趙成秀下面的敘述中，也看不到總站對張九崗的妻子董芝英以及他的五個孩子有什麼具體的幫助。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是兵團還是總站的造反派們都沒有起碼的對人的尊重、對人命的珍惜的概念。但是這也是那個時代的特點。只是現代人應該深刻反思，看我們現在是不是比以前有進步，怎樣才能不重演這些歷史的悲劇。

趙成秀接著敘述了張九崗慘死之後，他的妻子董芝英面臨一個人需要撫養三男兩女五個孩子的困難，以及和李成柱的妻子郭建華如何開始了漫漫的上訪路，到晉中、太原等地，往返多次，才拿到落實政策的公函。但是一直到 1977 年 6 月 15 日，董芝英才收到中共平定縣委發來的「關於張

九崗同志被殘殺乙案的處理決定」。追究了兵團領導董福昌、劉懷祿、李田柱等人的刑事責任，為張九崗徹底平反，恢復名譽。趙成秀接著寫道：

文件對善後工作也做了明確的規定，指出：「從張九崗停薪之日起，張的妻子和因患病喪失勞動力的大兒子，每人每月發給生活費 8 元，撫養終生。其餘不滿 17 週歲的子女每人每月發給生活費 8 元，到滿 17 歲為止。」

.....

2011 年，當作者打問張九崗一家的情況的時候，寧艾村黨支部書記說：董芝英早已去世，他們的大兒子、二兒子相繼去世，兩個女兒出嫁後，有一個女兒也不在人世了。

總站另外一位被兵團打死的人是李成柱，平定供銷社的一名職工，文革「觀點」是「紅總站」派。趙成秀也撰文回憶了李成柱慘案的經過。⁴他說：

李成柱，平定縣城關鎮城裡街人。父親李保田，在舊社會開過小雜貨鋪，解放後他響應中國共產黨公私合營的號召，加入到供銷社的行列。1956 年 1 月 21 日，李成柱接父親的班，成為城關供銷社的一名售貨員，在營業員這個平凡的崗位上，積極工作，成績顯著，曾出席山西省勞動模範代表大會。文革中，持紅總站觀點，參加了紅總站一些活動。平定於 1969 年 2 月發生武鬥之後，李成柱隨紅總站人員撤離縣城，在昔陽避居。

1969 年 4 月，平定紅總站雖然寓居昔陽，但兩派的對立仍未消除，平

⁴ 見趙成秀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3457b60100yvyb.html。上網時間 2015 年 4 月 26 日。

定縣城仍處於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紅總站人員不敢輕易回家探親。15日，成柱思念懷孕七個月的妻子，聽說妻子在陽泉馮家莊娘家居住，不顧同樣避難的同志的勸告，買了雞蛋、豬肉等營養品，坐昔陽至陽泉的公共汽車到丈母娘家看望。令人想不到的是，一場噩夢正在等待著他。

就在這天下午，他在乘車去陽泉的路上被人發現，抓到被兵團占領的平定人委會駐地。因為李成柱與總站常委趙岐山是姻親關係，李是趙的大舅子，兵團想從他嘴裡瞭解到一些總站的情況，問不出來就打。結果被打得半死。第二天，他被送到陽泉礦務局醫院，17日讓李成柱的父親將身受重傷的李成柱領回家。這也是上面馮拉科到李成柱家發現的情況。一個29歲的生命就這樣被消滅了。後來由其所在單位供銷社，買了棺材裝殮下葬。而李成柱25歲的妻子郭建華則面臨著撫養年邁的公公、五歲的女兒進雪、三歲的兒子進忠以及尚在肚子裡進明的巨大責任。其肝膽俱裂的淒慘狀況是常人無法想像的。趙成秀接著描述了郭建華後來到縣裡要求落實政策的情況：

1971年9月13日，曾權傾朝野、被稱為副統帥的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批林整風在全國轟轟烈烈開展起來。小兒子進明剛剛過了週歲的生日，郭建華為了一家五口人的生計不得不在房產所打臨〔零〕工。一天，她和其他房產所的工人到新擔任恢復後的平定縣委書記的李計春宅院裡修房子，郭建華見到李計春就哭著說：「李書記，俺那口子冤死一年多了，縣裡的領導也該落實落實政策了吧！」李計春一聽，臉色立刻變得陰沉起來，不耐煩地說：「死了就死了，落實什麼政策？」郭建華一聽，怒火中燒，也扔過一句：「反正得給我個說法，不然我到省裡告狀！」李計春說：「你就是到中央也不沾！」後來，郭建華又找到平定縣軍管會，一

個姓楊的不僅不管，還狠狠地罵了她一頓，並威脅她再鬧，就把他送到監獄。為此，郭建華病了十多天，等病一好，她又去找李計春，李只說「研究研究，這不好弄」，以此敷衍。

縣委書記的冷漠，軍管會的絕情深深地傷害了郭建華的心，她下定決心，要抗爭，要真相。她親自寫了大字報，張貼到東門口，和三個孩子一起站到大字報下，揭露打人兇手的罪行。圍觀的人有的說：「這真像秦香蓮告狀！」有的暗暗垂下同情的眼淚。當有人貼出反駁的大字報，她就再寫，予以回擊。輿論的力量雖然是巨大的，但執政的主要領導仍沒有順乎民意，李成柱的冤案仍舊如石沉大海。

但是，郭建華並沒有放棄。她還是繼續上訴。

1972年，春寒料峭，郭建華見在平定找不到說理的地方，便踏上了漫漫的上訪之路，她暗暗對自己說，就是磨破嘴皮、磨穿鞋底，也要找到個說理的地方，為丈夫討回公道。她請人寫好告狀信，抱著進明，帶著公公赴京告狀。到了北京，沒錢住旅館，就住在火車站的候車大廳。她買了紙和筆，將告狀信謄寫了一份，徑直向公安部走去。到了公安部的大門前，門衛的解放軍戰士不讓進去，不過，態度很好，把她介紹到公安部接待站。到了接待站，告狀的人排著長長的隊伍，第一天沒有輪上，第二天又等了半天，接待站的工作人員根據她的陳述，寫了一個公函，要她回山西落實。

郭建華對此並不滿意，就又和公公一起到國務院找說理的地方。路不好找，左拐彎右拐彎，不知碰了多少釘子，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自稱為408首長的人。此人聽了郭建華的申訴，見老的老，小的小，十分同情，連忙和藹地安慰郭建華：「孩子媽，不要哭，不要哭，你的事對於全國來

說，是小事，但對於你來說，就是大事，你要相信黨，相信政府，如果誰欺負你，給我打電話！」他還派人把這祖孫三人送到北京火車站，買了火車票，送回山西太原。

在太原，郭建華找到當時的省革委信訪辦公室，信訪辦又介紹到公安廳，公安廳寫了公函，讓他們到晉中。郭建華未停腳直接到了晉中地委，見到了地委書記李韓鎖。李韓鎖很耐心地接待了她，並讓她先回平定，並告訴她，晉中地委會責成專人督促平定立刻落實此事。不久，晉中落實政策辦公室負責人直接來到平定，召集平定縣革委會全體人員對查清李成柱被害案進行督查。當時革委會的主要負責人雖然口頭答應，但限於種種阻力而未能展開工作。這期間，郭建華從太原到晉中，再回平定，往返不知多少次，也曾多次闖過縣委常委會，在平定縣革委會主要負責人面前哭訴過，怒斥過，但還是感動不了被派性蒙了眼睛的領導人。

1975年春，郭建華又背著小兒子上了北京。見到那位408首長時，首長聽了她的情況反映，十分驚訝和震怒，立即又寫了公函，還親自給晉中通了電話，責令他們儘快落實政策。李韓鎖接到電話，責成樊貴鎖來到平定，會見了當時的縣委書記郭存華和副書記鄭忠華，傳達了中央的精神。

在郭、鄭二位領導的主持下，縣委著手對殘害張九崗和李成柱的兩起案件的調查工作進行安排部署。劉志義總負責，以張映江為首組成專案組。至此，郭建華心裡踏實了許多，她在等待一個合理、合法的結果。

以劉志義掛帥的專案組是一個秉公執法的堅強班子，他們立即行動，將所有的涉案人員都集中到流杯池山上進行隔離審查。劉志義是恢復公檢法之後的公安局黨委書記，素以為人正直、辦案清明著稱。張映江是多年的老檢察，經驗豐富，做事幹練。他們走訪知情者，深入民間調查研究，工作慎密而高效，掌握了大量的證據。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的感召之下，涉案的壞頭頭和打人兇手通過背靠背的揭發和面對面的對質，

澄清了事實真相，真正辦成了永遠不可能翻供的鐵案。

終於，平定縣委與 1977 年專門為李成柱案發了「關於對李成柱同志被致死乙案的處理決定」，追究了兵團頭頭董福昌、劉懷祿、李田柱的責任。董被判刑 20 年，劉 15 年，李 10 年。其他參與者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分。趙成秀接著寫道：

45 號文件還對李成柱的平反問題和家屬的撫恤進行了妥善的安排。指出，李成柱「自參加革命工作以來表現較好」，「對李成柱同志的污蔑和攻擊，應予否定，給予平反」。「對李成柱的直系親屬供養費」，「李成柱同志的父親從李成柱停薪之日起，每月發給生活補助費 8 元，供給終生。對其不滿 17 週歲的子女每人每月發給生活補助費 8 元，到滿 17 週歲為止。」李成柱的妻子郭建華已於 1975 年 10 月安排了工作。

縣委的文件下達不久，縣裡在平定劇院召開了「李成柱同志追悼會」。平定縣城的人民群眾自覺湧入會場，只見，舞臺中央懸掛著由白花和黑紗裝飾的李成柱的遺像，李進雪、李進忠、李進明三個孩子並排站在遺像之下，白花在胸前微微下垂。各單位和友人送來的花環簇擁在舞臺的四周，挽聯掛滿劇院所有的牆壁，舞臺之下人頭攢動，連走廊也擠得水泄不通。郭建華站在講臺之上，訴說著丈夫被害的慘狀，上訪道路的艱辛，也深深感謝黨和人民群眾的關懷。劇院肅穆而又寧靜，所有在場的人或臉色凝重，或暗自垂淚。

平定「文革」武鬥階段被打死的另一個人，就是葛秉臣提到的那位河北省的楊勇志，石家莊市色織廠供銷科幹部。他的死，由於沒有涉及到派性，完全是誤殺，也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不是在爭鬥場面的情況下隨意

向人開槍，和在武鬥中讓人傷亡一樣，使人感覺到草菅人命和秩序混亂、社會動盪的可怕。



圖 12-1 李成柱追悼會，1979 年 1 月 3 日於人民劇院

資料來源：由李俊瑞提供。

而導致雙方大打出手武鬥迅速升級的，據岳智明的回憶，是蔣寶山被打。蔣是平定郵局的職工，在上班出外勤時在郵電局門口被「紅總站」一派打折了腿，「兵團」一派因此而報復心大增，才使兩派越打越厲害的。

前述馮拉科和董銀明的被打，時間要比張九崗、李成柱的死靠前一些。之所以把這些死傷事件放在一起記述，是要說明：兩派中，沒有欺凌者和受氣包的角色劃分。用方言俗語總結，叫作「都不是省油的燈」。但

是當時的人們對人的生命的蔑視，似乎是不能完全用階級鬥爭的意識來解釋的，因為他們連階級敵人的格都夠不上。或許這種不講理的、動不動就打人致殘、致死的暴力行為，要從中國的政治文化、專制制度中來找原因了。否則我們無法解釋為什麼本來是善良的人們會互相殘殺。從被訪者的敘述來看，或者從本書兩位作者對涉案者的多多少少的瞭解來看，這些打人者和被打者，都不是壞人。在私人接觸中，我們還會發現他們可能還是很好的人。但是為什麼發生這樣的悲劇呢？

無論在何種條件下，僅僅因為對某些事物的觀點不同便暴力相向，是十分不可取的。聯繫到建國前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情境，不是很發人深省嗎？在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充斥社會，在「非此即彼」的極端思維統治人的思想，在無法無天的、只知道暴力解決思想認識問題的環境下，這樣的事件不是經常發生嗎？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文中所提到的因為張九崗和李成柱案件被判刑的董福昌、李田柱、劉懷祿的刑期有幾次反覆。根據劉懷祿的回憶，一開始董被判 20 年，劉 15 年，李 10 年。之後減刑，董 10 年，劉 7 年，李免於刑事處分。1976 年法院覆議時建議各獲三年，但是縣委決定董 7 年、劉 3 年，並建議追捕李田柱。1976 年 12 月，中共平定縣委曾分別以平發〔1976〕276 號、平發〔1976〕285 號文件作出覆議「覆議報告」。276 號文件中說：

董福昌、劉懷祿等人致死人命一案，經縣委常委會議在今年七月份研究決定：同意平定縣法院對董、劉二犯所犯事實的結論和此案的定性意見，唯在判處刑期上決定對董、劉二犯各處有期徒刑三年。……根據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精神，聯繫董福昌所犯事實，經研究討論，重新提議對董福昌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對劉懷祿執行原處刑三年。

285 號文件說：

……故〔原決定〕依據黨的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對李田柱免於刑事處分，並建議陽泉市委給予該李黨紀及行政處分。……經覆議認為李田柱所犯罪惡，性質嚴重，原處決定，顯係重罪輕處。故否定原處理決定，呈請對李田柱進行追捕法辦。

董似乎是因為表現好而提前釋放，被分配到同意煤礦。後在東回老家因煤氣中毒而身亡。

貌合神離的拉郎配：大聯合 與平定縣革委會的成立

你們有希望嗎？還在大打嗎？你們要組織大量宣傳隊，要宣傳嘛！

——毛澤東於 1968 年 8 月 15 日接見部隊
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人員時對劉格平說的話¹

凡分裂革命大聯合、破壞革命三結合的行動，另立的山頭，一律都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認。重新拉起的隊伍，都要立即解散，實行歸口大聯合。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山西問題的
「七·二三」布告，1969 年 7 月 23 日²

1 見圖 13-1 中共平定核心小組傳單。也見前引東方直心，《毛澤東大傳》，載於烏有之鄉網站：<http://www.wyzxwk.com/Article/cpers/2015/04/343068.html>，上網日期 2015 年 10 月 3 日。

2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布告》，1969 年 7 月 23 日。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

——毛澤東於 1967 年對上海「一月風暴」成立政權的指示³

本章再回到第 11 章所講的兩派的爭鬥、聯合與政權建立的問題上來。儘管中央三令五申不要武鬥，儘管毛澤東在 1967 年就說要建立革命委員會，但是在山西，毛澤東和中央所有這些指示都沒有能夠真正落實。直到 1969 年中央下了死命令兩派也已經打到筋疲力竭的時候，大聯合才終於實現，但還是一個貌合神離的聯合。本章先敘述山西的武鬥以及種種制止武鬥的努力，以及平定兩派大聯合的過程與建立革命委員會的過程，還有平定中學學生畢業分配的問題。

山西的武鬥、九大的召開與中央制止武鬥的努力

正如前面三章所述，從 1967 年起，一直到 1969 年初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後，山西以及平定的武鬥就沒有停止過。中央多次召開解決山西問題的會議，但是由於中央文革自己連是非都搞不清楚，根本就談不上問題的解決。比如 1967 年 11 月底到 12 月底，中央在北京召開解決山西問題的會議，會上周恩來強調嚴禁打砸搶抄抓，立即停止武鬥，拆除武鬥工事，不准衝擊軍事機關，不准揪鬥圍攻解放軍。但是會議的內容還是支持劉格平一派。⁴之前的幾次 7 月會議也都是如此。於是，山西

3 毛澤東，「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建立革命委員會」，1967 年，具體日月不詳。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4 前引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 641-42 頁。

的武鬥仍然在繼續。正如上面我們引述毛澤東的話，連他都不知道為什麼還在打。甚至認為只要「組織大量宣傳隊」就可以解決問題（也見圖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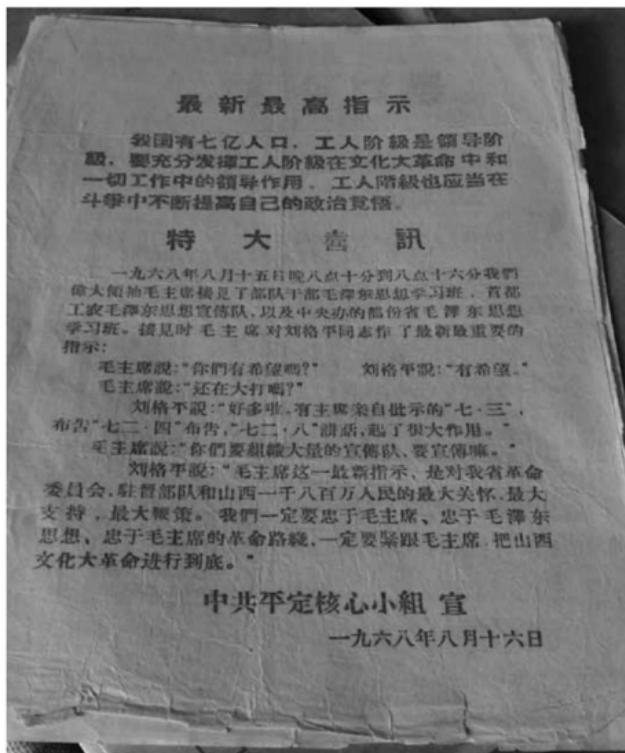


圖 13-1 中共平定縣核心小組傳單（原文為紅色字體）

資料來源：作者自拍。

1969年，「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動盪不安的第三個年頭。在各地的兩派鬥爭鬧到動用機槍大炮以至坦克的地步的時候，在一些地方的軍隊由介入地方文化革命到捲入兩派鬥爭的時候，在「文革」狂潮以「揪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蔓延到「揪軍內一小撮」從而使一些地方軍隊出現內亂的時候，在各地的工業生產陷於停滯不前的境地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69年4月1日在北京召開了。

「長江滾滾向東方，葵花朵朵向太陽。滿懷激情迎九大，我們放聲來歌唱」，大喇叭和收音機裡整天播放著這首歌曲。在一部電影記錄片裡——那時候，電視還是個稀罕物——在毛澤東和林彪兩邊排列的中央領導層裡，有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康生、陳伯達等人長達十幾秒的特寫定格影像，還有以朱德為首的一晃而過連眉眼也看不清楚的近景影像，讓不懂影像如何表現政治的普通老百姓也看出了門頭腳道：得寵的新貴和遭受冷淡的老領導人們陣線分明。毛澤東在個人崇拜達到頂點時，他的好惡明顯決定著整個共產黨領導層裡的人物命運。然而，以朱德為首的一批人的出現，也在說明著，新得寵的一批人物，仍然未能完全把握整個中央決策層的全部決策權。

毛澤東在開幕詞中說：「我希望這一次代表大會開得好，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後，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當時沉浸在狂熱中的人們，當然地把這句「最新最高指示」當成一個偉大的號召，絲毫也沒有覺察出「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精確用詞中的「希望開得好」和「團結的大會」背後的良苦用心和深刻含義。據統計，在此次大會上共有中央委員170人、候補中共委員109人入選，其中中共八大的原中委和候補中委僅有53人。而其中最為「創新」的，是把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寫入黨章，並在大會報告中給已被打倒的、身亡名裂的劉少奇加上莫須有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罪

名，並且編織了一套貌似翔實的證據材料。前者直接破壞了中共一貫宣導的「民主集中制」，「欽定」接班者——儘管不是封建帝王的家族世襲；而後者則把一位僅僅在建國方法上持一些不同意見的黨和國家的高級領導人鐵定成「篡黨奪權」圖謀已久和組織反黨集團的陰謀家。

但是普通老百姓並不瞭解當時發生的這一切的背景。在 4 月 1 日至 4 月 24 日大會召開期間不斷在深夜傳來「最新最高指示」和大會「喜訊」，而每一次有這樣的消息時，平定縣城就會在深夜舉行慶祝遊行，「東風商場」等商店都會在半夜時分開門營業，這使縣城的人們都感到非常興奮和好奇。通常在一個人口並不稠密的小城，一入夜則寂寥無聲。現在突然半夜裡手管局的大喇叭聲震全城（當時兵團還占領著手管局），街頭敲鑼打鼓的人流上下往復，「東風」商店在半夜開門營業，這就足以讓他們興奮。然而，燈光明亮的商店卻只有幾名呵欠未停的女售貨員和幾個身無分文的小青年面面相視，市場並沒有因為這次大會的召開而呈現哪怕一點繁華。參加「文革」已經三年、滿懷熱情的和早已疲倦的平定中學的學生們並不知道，隨著「九大」的召開，國家權力機關一切都似乎無人掌管的局面行將結束，帶給他們的，是學生身分的消失和農民身分的開始。尤其高三、高四兩個班那些原來憧憬大學生活而被現實打得粉碎的學生們，命運賜予他們的新的身分將是「有文化的新農民」。「造反派」「紅衛兵」身分將結束，「有文化的新農民」的身分將開始，也是他們被「文革」運動拋棄的開始。

然而，九大的召開並沒有讓山西問題立刻消解。山西自從「文革」開始，就率先奪權，成為全國的標杆。但是，也就是從那時候起，山西就一直刮著颱風，而且越刮越猛。中共「九大」召開前後，國內尤其是山西形勢並不像歌詞唱的那麼美好，人們所看到的熱烈和歡騰，只是一個很淺的表象。山西兩派全武行的鬥爭，就像一輛高速行駛的列車，巨大的慣性在推著車子高速向前。



圖 13-2 平定縣慶祝中共「九大」閉幕遊行，1969 年 4 月 26 日

資料來源：李俊瑞提供。

即使中共中央前後四次出面解決山西武鬥問題，即使中共「九大」召開，山西的武鬥還是未能制止。無奈之下，1969 年 4 月，中央再次著手解決山西問題。⁵

(1969 年) 4 月，因晉中、晉南連續發生武鬥事件，引起中共中央、

5 陳瑞、溫晉生，「『文革』時期發生在晉中地區的武鬥事件」，載於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輯並出版）《山西紀事》（1949-1978），2012 年。

國務院、中央軍委的重視，周恩來指示陳伯達、謝富治等，責令山西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迅速查明情況解決問題。

5月21日，劉格平、謝振華、張日清、陳永貴、袁振等人聯合向中央呈送《關於介休情況的報告》。報告說：介休兩派長期武鬥，嚴重對立，影響很大，煤炭生產無法進行，依靠介休現有的三支兩軍人員扭轉不了混亂局面。因此，擬請中央派部隊進駐介休宣傳毛澤東思想，收繳武器，清除武鬥據點，解散武鬥隊，歸口鬧革命實現革命大聯合，等等。

5月24日，周恩來在這個報告上批示：「建議永勝〔黃永勝，時任中共中央軍委辦事組組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同志務於今日下午召集謝富治、鄭維山、陳先瑞三同志一談，如能調一個團的兵力去介休、汾西趁熱打鐵，只用徒手宣傳『七三』『七四』布告，大力勸說上交武器，由劉（格平）、謝（振華）、陳（永貴）三人保證雙方不受歧視，一碗水端平，大力號召響應毛主席在九大『團結起來，爭取新的勝利』的指示，必能有效地改變晉中、晉南武鬥和停產的長期不決的局面。這是山西領導第一次聯合呼聲啊！應予積極支持。」周恩來為制止內亂消除派性，根據形勢，做出了十分明確的指示。根據這一指示精神，軍委調陸軍第六十三軍第五五九團進駐介休制止武鬥。

派解放軍去制止武鬥，就是毛澤東所講的派「宣傳」隊。但是他們的任務不是「宣傳」，而是制止真槍實彈的武鬥。正如文革的發展所揭示的，派「宣傳隊」是不夠的。還要軍管。

6月中旬，由袁木、張廣友、朱承修等人組成的中共中央調查組到山西的太原、晉中等地武鬥現場瞭解情況，調查研究，調查組回京彙報情況並參加了起草制止武鬥布告的工作。

……7月23日，毛澤東批示「照辦」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布告》簡稱《七·二三布告》發布。……

8月14日和8月19日，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中共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連續在平遙、孝義（時屬晉中地區管轄）兩地召開大規模的貫徹落實《七·二三布告》大會，要求下定決心採取措施，徹底解決武鬥問題。與此前後，晉中各縣在解放軍駐地指戰員的支持下，運用各種工具宣傳布告，收繳武器，拆除武鬥工事，舉辦學習班，動員各種群眾組織消除對立情緒實行大聯合。……

9月5日，中共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決定對中共晉中地區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成員進行調整。之前的7月22日，中共晉中地區核心小組改名為中共晉中地區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成員9人，王振國任組長，劉新田、劉長希任副組長。調整後劉燕飛、張哲生、蘆炳生、田虎中、趙滿倉、張懷英、陳爾雲、陳永和等人離職，新增加的人員是劉秀傑（187師副師長）、李華（107師副政委）、李風華（軍隊幹部）為核心小組成員，與原有成員劉新田、劉長希、趙鑑、劉漢如、宋志明等共8人，由劉秀傑代理組長。

9月16日，經山西省駐軍支左領導小組研究批准，晉中地區成立駐軍支左領導小組，其成員為李華、張恒才（4655部隊）、劉秀傑（4593部隊）、李風華（4602部隊）、劉長希、趙鑑、李惠（晉中軍分區）、等7人組成，李華為組長，劉秀傑、劉長希等為副組長。9月30日增補李風華為副組長。新的核心小組擔負起了消除派性、制止武鬥、恢復晉中工農業生產的艱巨任務，以劉秀傑等為領導的晉中核心小組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做了大量工作，盡力克服派性造成的混亂，使晉中能在當時的條件下，逐步消除「文革」創傷，儘快發展。⁶

6 同上

看來只有解放軍全面介入，幾乎就等於軍管，問題才能解決。晉中其他地區武鬥情況嚴重，陽泉也非世外桃源。「九大」前後，陽泉的兩派打鬥仍舊未能停息。在中央召開的解決山西問題的會議上，陽泉「紅總站」的首領梁寶貴當面頂撞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使江青大怒。由於「反中央文革就是反中央」，勢頭正旺的陽泉「紅總站」突然失勢，陽泉頓時成了「兵團」當政的天下。

處在陽泉「兵團」執掌天下和昔陽「紅總站」一家當政中間地帶的平定，可謂「犬牙交錯」之地。儘管平定「紅總站」去了昔陽，但千人外流他鄉，總非長久之計。二虎相爭，必有一傷，那麼，兩派怎麼聯合呢？革委會如何建立呢？

平定兩派的聯合與革委會的成立

軍管加上兩派的聯合至少是支持，看來是重建政權的唯一辦法。荊履榮在訪談中也談到了大聯合，但是這是兩派代表於 1969 年 8 月被叫到太原進行談判之後所實現的大聯合。這時似乎大家已經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從昔陽回到平定後，搞大聯合。山西省的 12 個縣，平定、和順、太谷、祁縣、文水、交城、平遙等，強行要求先坐下來，搞大聯合了。一派派五個代表，集中到太原海子邊招待所，好吃好喝，搞大聯合，會上兩派吵吵鬧鬧，下來兩派頭頭，個人之間說說笑笑，嘻嘻哈哈的，最後兩派在聯合聲明上簽了字，平定的大聯合就完成了。

那麼兩派都達成了怎樣的協定呢？在這份由兩派代表和解放軍代表在 1969 年 8 月 31 日簽署的、名為「平定縣無產階級革命派關於革命大聯合

和革命三結合的協議」中，兩派都首先檢查了自己，作了自我批評：

〔我們〕十分高興地參加了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舉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習期間，我們通過認真學習毛主席親自批示的「七·二三」布告、中央 42 號文件、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聯繫實際，各自鬥私批修，狠狠批駁了反動的資產階級派性，思想認識大大提高。我們深深感到，在文化大革命當中，由於一小撮階級敵人的破壞搗亂，由於我們頭腦中反動的資產階級派性作怪，長期分裂，打「內戰」，嚴重干擾了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致使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不能很好地貫徹落實。我們內心感到很慚愧，確實對不起偉大領袖毛主席，對不起平定縣 27 萬人民。我們再不能分裂下去了，大敵當前，必須團結起來，共同對敵。如果再搞派性，就是最大的犯罪，就是幫帝修反的忙，我們雙方代表在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晉中地區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領導下，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平定縣人民武裝部、平定駐軍的大力幫助下，經過充分協商，以只爭朝夕的革命精神，迅速達成了革命大聯合和革命三結合的協定。

但是他們還是將問題歸咎給「階級敵人」、「資產階級」，儘管他們自己也說不清楚誰是「階級敵人」，誰是「資產階級」。「大敵當前」的敵人是「帝修反」嗎？「帝修反」是如何指揮他們武鬥的呢？自然全是沒有意義的套話和大話。協議的第一條是：

……決心以敬愛的林副主席為光榮榜樣，刻苦地、認真地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真正做到用毛澤東思想「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畫，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堅決反對那種對毛澤東思想陽奉陰違、口是心非、表裡不一、各取所需的兩面派作風。

不過他們至少知道自己是「陽奉陰違、口是心非、表裡不一」的，不光是只有「階級敵人」、「帝修反」才這樣。第二條是要：

深入持久地開展革命的大批判，當前大批判的任務是，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產階級派性，批判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劉少奇的反動「黑六論」，批判無政府主義思潮，批判黨內和革命隊伍內部違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政策的錯誤傾向，批臭「唯我獨左」「唯我獨革」「以我為核心」「一派掌權」的錯誤思想，同時要狠狠地批判和打擊社會上的資本主義傾向。

在這種大的政治生態下面，人們也真的無法期望總體形勢會有什麼改觀。第三條是他們對革委會、解放軍的態度：

……堅決支持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堅決支持晉中地區革命委員會，堅決支持晉中革命委員會和縣支左領導小組、人民武裝部批准的各級革命委員會和革命領導小組。對某些不夠完善的，可本著政治平等，聯合掌權的原則，進一步搞好革命大聯合，進一步加強革命委員會的領導，只能補臺，不能拆臺，對至今尚未實現革命大聯合三結合的單位，要求解放軍說服兩派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儘快解決這些單位的問題。對於在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支持下，按行業、按單位、按系統實現的革命大聯合，要支持它、愛護它；不夠完善的，可本著協議精神，進行調整、充實和補臺。

正如後面的發展所證明的，即使軍管了，問題也無法解決。第四條則是要支持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舉世無雙的人民子弟兵，是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堅強後盾。他們在我縣的「三支」「兩軍」工作中，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堅定地支持了左派廣大革命群眾，為人民立下豐功偉績。我們要一如既往地相信、依靠、熱愛、學習解放軍，更大規模地開展熱烈的擁軍愛民運動。堅決同挑撥軍民、軍政團結，破壞鋼鐵長城的階級敵人進行無情鬥爭，誓死捍衛偉大的鋼鐵長城。

這實際上是保證服從解放軍的領導，無論其領導是否有方。不過正如前面所說，在這種大環境下，解放軍也不可能完全能夠「領導有方」的。他們也有他們的局限性。另外，協議的第五條，兩派承諾「嚴格遵照毛主席的幹部政策辦事，堅決反對以資產階級派性對待幹部的錯誤作法。相信和依靠幹部的大多數，大膽解放革命幹部站出來革命」。第六條「以大慶、大寨為榜樣，狠抓革命，猛促生產，遵守勞動紀律，搞好工農業生產，積極支援前線。對那些不遵守勞動紀律，擅離職守，超期外出不歸口的錯誤行為，要進行堅決鬥爭」。第七條承諾「對那些破壞社會治安、破壞抓革命促生產、破壞革命大聯合和革命三結合、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壞分子，堅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第八條報告了革命委員會的構成：

……縣委員會全委會由 67 人組成，其中革命領導幹部 14 人，占 20%（兩派各七人）；軍隊代表 10 人，占 15%，革命群眾代表 43 人，占 65%（其中總站 22 人，兵團 21 人，委員中要有一定數量農村人民公社貧下中農代表；要照顧各行各業的代表性；婦女代表一般不少於 8%）。

革命委員會常委由 17 人組成，其中革命領導幹部 6 人，占 35%；軍隊代表 5 人，占 29%，革命群眾代表 4 人，占 24%。模範人物 2 人，占

12%。常委名單報上級革命委員會審批。

革委會下設辦事組、政工組、生產指揮組、人民保衛組。具體辦事人員另行確定。

從革委會常委的比例上看，領導幹部又把權力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不管是哪一派的領導幹部。革命群眾基本靠邊站了。如下所述，造反派組織即日解散。

兩派承諾「協議簽訂後，立即解散總站、兵團等一切跨行業組織」。在協議上簽字的有：

兵團方面：李田柱、董福昌、潘佩經、魏德卿、劉玉榮、劉懷祿、翟雙成、楊志忠、高連冬、李六孩。

總站方面：郝守映、李守珍、趙岐山、王保壽、潘二明、王侃、張慶壁、吳滿堂、張玉璽、張鐵鎖。

中國人民解放軍代表：人民武裝部代表：政委：左治貞、副政委：王文章、田守志；624部隊代表：副政委：尹延奎；4757部隊代表：副團長：戴洪學；1242部隊代表：副主任：袁繼興。

太原海子邊的這份協議，結束了「紅總站」一派流亡他縣的命運，他們可以比較體面地以不算失敗的心態返回縣城。但是，儘管兩派的協議表面是半斤八兩不偏不倚，但大夥都心照不宣——「紅總站」在平定是失勢了。因為在縣領導班子中，掌握實權的是軍方，而軍方顯然和「兵團」是站在一條線上的。尤其是當「紅總站」被解散後，他們再沒有了抱成團的力量。回到單位，原先有位子的，位子早已被「抓革命促生產」著的「兵團」一派人物占了；原先沒位子想造反弄個位子的，現時基本成了空想。

他們只能縮頭縮腦或者梗著脖子硬頂。戎崇璽在敘述這段歷史時說：

我們在昔陽住了兩年〔作者注：應該是 7 個月〕。67 年底〔似應 68 年底〕先去藥林寺，大年初一走到昔陽。69 年 7 月 23 日布告以後，8 月 4 日被兵團去車接回來的，當時是全國大聯合結束文革派系鬥爭、收繳武器，群眾組織都是革命組織，不能擁有武器。30 日回來，第二天，董命長派人來看我。當時被「抓」回來以後被看守了一黑夜。周令紅跑進來看我，我讓周出去給我弄一盒煙，給我一盒牡丹煙。王學良進來打了李繼光。我當時蓋了四床被子，把腦袋裹住，怕被打壞了。外邊的人一會一會地拉三八大蓋槍拴嚇唬我。

顯然，他們的回城並沒有像荊履榮所描述的那樣「相逢一笑泯恩仇」，而是像他們檢討的那樣，「陽奉陰違、口是心非、表裡不一」。具體發生了什麼，人們的敘述在細節上可能會有出入，但是大概的事實出入應該不大。兵團顯然有報復心態，總站還在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這一點似乎是肯定的。郝忠德回憶他們從昔陽返回時的情景：

接我們的汽車把我們從昔陽接到平定俱樂部大院下車。剛下車，一名軍人點名：閻扣成、劉子義、梁子銘……當劉子義走出來的時候，那個軍人上前推他，劉子義甩了一下胳膊。那軍人說：「到那邊集中。」我們頓時緊張起來。幹部點完後，點名到董鋼，緊接著叫我，當時心裡一緊，有種不祥的感覺。一共叫出去了十三名學生，十一名社會青年，有竇憲、聶振發、張合等。我們被帶到了師範，控制了起來，說是批捕對象。後來聽劉兆麟（原縣革委辦公室副主任）透露，當時上報紅總站批捕 64 人，兵團 5 人。64 人因證據不足沒〔被上面〕批准，5 人因死人事件批覆准予逮

捕。……〔縣革委本來想〕將紅總站勢力給予毀滅性的打擊，上級的批覆卻給〔他們〕當頭一棒。

城裡大隊的民兵連指導員賈同茂也是「紅總站」派，但他選擇了一條「君子動口不動手」的道路。因為他清楚，光造反不勞動，掙不下工分還是白搭。當武鬥開始後，他專門聲明不參與武鬥，同大隊的另一派也拿他不當事——大夥都是低頭不見抬頭見的，人家光嘴說手不動彈，觀點雖然不同，卻也沒傷害誰，因此都相安無事。「紅總站」集體流亡昔陽，他也沒去，該幹什麼還幹什麼。因此，當同大隊流亡昔陽的和秀、杜興廣他們被接收回大隊時，他反而是「接收大員」。他回憶說：

咱大隊（指城裡大隊）跑到昔陽的人不少，和秀、樂小（杜興廣）、梁承富、旦兒（石鳴岐）。後來他們從昔陽回來，在奶奶廟開的會（注：即原職工俱樂部），讓各家領各家的人，我記得領回來王寶孩（王成佑）。

趙成秀在他的回憶文章〈我的文革歲月〉中記述了這段總站返城、大聯合、革委會成立的歷史：

1969年8月23日之後，被平定「兵團」一派打出去流寓昔陽的「紅總站」一千多號人被陸續接回自己的家鄉平定。在昔陽避難半年多的時間裡，「兵團」一派在武裝部的支持下，已經獨掌了平定的大權，所以，紅總站只能被動地接受已經形成的格局。首批從昔陽回來的人員是在平定職工俱樂部下的車，剛下車，就有一個軍人像押囚犯似的點起名來：閻扣成、劉子義、梁子銘……當劉子義走出來的時候，那個軍人還上前推他，劉子義生氣地甩了一下胳膊。這批人被帶到平定師範接受「審查」，並有

64 人被列入逮捕的黑名單。只是當時的晉中革委會和核心小組沒有批准而告吹。就這樣，從昔陽陸續返回的人懷著失落和落寞的心情悄然回到了自己的單位或家中。

他的這段回憶與郝忠德相同。趙成秀接著說：

9月12日，平定縣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革委會常委的組成人員：屬紅總站一派的有：領導幹部代表閻扣成、張玉璽、王來金；群眾組織代表李守珍、郝守映；勞模代表趙綱。屬兵團一派的有：領導幹部代表楊志忠、高連冬、李六孩；群眾組織代表董福昌、李田柱；勞模代表張瑾瑤。支左部隊代表：左治貞、李計春、王文章、韓金聲、郝虎。革委會主任左治貞；副主任閻扣成、李計春、楊志忠。慶祝大會在職工俱樂部的廣場上舉行，萬餘人參加，氣氛隆重而又熱烈。大會結束以後，舉行了盛大的街頭遊行，領導幹部高連冬和王來金抬著「平定縣革命委員會」的大牌，在若干群眾的簇擁下，隨遊行隊伍將「大牌」掛在原縣人委的大門上。

平定縣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在平定「文革」的歷史上，是一件可記可敘的大事。但它的建立，並不是水到渠成，而是一道令下後發生的事情。在三年大亂之後，全國的無政府狀態已經到了連中央也無法控制的地步。奪權容易，奪權後的政權空白卻很難填補到位。在中央的再三指令指揮下，到 1968 年 9 月，全國（除臺灣省）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總算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在各省級政權機構建立之後，下邊的機構建立就比較有章可循了。這也是當時形勢的需要：劉少奇這個「文革」的主要對象已被打倒致死，急需以黨的名義給他定一個罪名；武鬥已經使國家的經濟陷入停頓，急需剎一下天下大亂的車；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

代表大會終於召開，建立了新的中央。

1969年9月，縣委主要領導人和兩派代表參加了由省革委在太原海子邊召開的全省各縣主要領導人及兩派代表討論會之後，平定縣革命委員會的主要領導就已經產生：主任左治貞，副主任李計春，都是軍方代表。14日至21日，召開了全縣三級幹部會議，推選出縣革委委員67人，並成立了辦事組、政治工作組、生產指揮組、人民保衛組等。

平定縣革命委員會成立的時候，照例鑼鼓喧天鞭炮齊鳴。縣革委領導親自抬著新制的革命委員會牌子遊行。（見圖13-1、圖13-2）原來縣晉劇團「八一火海」的造反派們，這會兒都以樂隊隊員的身份，吹吹打打地走在慶祝遊行的行列裡。一位張姓的退休老工人在看掛牌的人群裡擠著看熱鬧，被飛來的炮仗崩瞎了一隻眼睛。革委會的建立，標誌著三年兩派之間「你呀起來我呀下去」（張瑾瑤對「文革」下的斷語）的動盪結束，也標誌著三年權力爭奪最後的歸宿。今後的遊戲規則可能會有變化了。

劉懷祿回憶說：

1969年後大概是半年正式成立了革委會，原來的副縣長楊志忠成了革委會的〔副〕主任，革委會下面分為四個組：辦事組、生產組、政工組和組織組。69年群眾選我當了兵團的政委，所以三結合成立革委會的時候我也進了革委會，先是在辦事組當副組長後面又當了組長。

對平定縣革命委員會的成立，總站的郝忠德的看法是：

平定縣革委終於成立了。自縣委、縣政府的被衝擊終止後，平定的各種政治勢力為謀求取得這個政權就開始相互爭奪，各個群眾組織被分裂為

對立的兩大派。軍隊介入後，也加入了爭鬥中，使兩派群眾組織的對立日益惡化，鬥爭越演越烈，平定動亂的局勢更加嚴重。中央對山西的七·二三布告發布後，平定以軍管的形式籌建縣革委，軍人在政權中佔據了統治。但軍人的統治是過渡性的，大局穩定就完成使命。後因「林彪事件」使它延續了四年多。平定紅總站在全縣工礦企業單位及幹部中佔了絕大多數，在兩派鬥爭中未觸犯中央一系列通告、命令、通知和布告，在革委委員中比兵團派多占一席。原核心小組長閻扣成結合為副主任、核心小組成員。……軍人政權卻以派劃線，實行高壓手段，一碗水沒有端平。



圖 13-3 平定縣革委會成立遊行，1969年9月12日

資料來源：李俊瑞提供。



圖 13-4 平定縣革委會成立挂牌遊行

資料來源：李俊瑞《一方水土》，第 137 頁。

的確，革委會成立後，軍隊代表是否能夠一碗水端平，是有爭議的。革委會成立後，緊接著，調整了縣一級中共領導機構：9月14日，根據黨中央關於在革委會內建立黨的核心小組的指示，縣革委會全體會議討論研究決定成立平定縣革委核心小組。核心小組由5人組成：左治貞（縣人武部政委、縣革委會主任）任組長。李計春（縣人武部部長、縣革委副主任）任副組長。成員有：王文章（縣人武部副政委、縣革委委員）楊志忠（縣革委會副主任）、閻扣成（縣革委副主任）。五人中三人為解放軍，另

外兩人一派一個名額。軍管的意味非常濃烈。

之前的「走資派」怎麼辦？

其實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是無法回歸正常的。而且即使回歸「正常」，從現在眼光來看，也很難說是正常。在建立政權班子時，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是配備革命領導幹部。以前的「走資派」經過「七鬥八鬥」，接受了「再教育」，一些人現在可以「站出來」了。「文革」前的縣委副書記、平定縣號稱「郭（存華）朱（永）鄭（忠華）」三大「走資派」之一的鄭忠華，也被摘掉「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稱號，站了出來。他在《我的回憶》（趙成秀收藏本）裡記述了不少他自己的經歷與看法。我們轉錄一部分，可以讓我們瞭解一下，當時是如何「處理」之前的「走資派」的：

一九六九年，原來縣委和縣政府的幹部集中在西關黨校辦學習班，縣革命委員會根據解放老幹部的指示，認為原縣委的老幹部中，我和曹黑小二人問題不大可以提前出來工作，工作前向群眾作個檢查，就算對文化大革命這一段作了結論，檢查的好壞是能否出來工作的關鍵。

檢查什麼？群眾對我有什麼看法、意見和要求？我多方面徵求了幹部群眾的意見。大家對我很關心，提了不少意見，總起來是三條：一、要好好準備一下，檢查的好壞關係著能不能出來工作的大事，對問題要提的高些，認識的深些，不要怕上綱上線，大家就會滿意的；二、你的檢查和老曹不一樣，人家沒有文化是個老粗，檢查的深淺、高低、好壞都沒有關係，大家會原諒。你就不行了，人們認為你是有文化，水準高的人，檢查不下個樣子，人們是有意見的；三、你檢查的好壞，能不能過關，不是你的問題大與小，這個人們都知道，核心的問題是你對兩派看法和態度，要支持現在掌權的這一派，你就檢查好了，出來工作就不成問題，否則檢查

的再好也不行。

我對大家的意見進行了分析，覺得他們提的很誠懇，對我都是關心的。第一種意見比較抽象籠統。第二種意見比第一種具體，標準是比老曹的檢查高些，但是沒有指出檢查的內容和重點。第三種意見提的很重要，說出了大家最關心的問題，並且指出了檢查的傾向性和能否成功的可能性。

看來即使是之前的走資派，在被解放的時候，也需要權衡兩派的關係。儘管從下面的敘述來看，鄭忠華還是不太情願這樣做，他認為自己要從革命的利益出發來檢討，而不是任何一派的利益。

我該怎麼辦？檢查為了什麼？為了過關，還是為革命？為了個人，還是為人民？我覺得能不能正確對待兩派群眾，是一個共產黨員、革命幹部的立場問題，也是能不能繼續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問題。不能為了一時的過關，應該為長期的革命。時間很緊只準備了一天就開檢查會，那天到會的人很多，都抱著好奇的心情，想看看兩個當權派是誰家的人。

老曹是第一個檢查的，他在檢查中沒有說到對待兩派的事，可能是有意回避這個難言的問題，只講了自己有罪對不起黨，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人民之類的話。檢查後大家覺得感情真實，態度誠懇，符合本人的認識水準，但是帽子太大，沒有抓住對待兩派的主要問題。

老曹檢查完，接著我就檢查，這時大家的情緒不一樣了，都在聚精會神地聽著，想聽聽我的檢查究竟怎樣。我檢查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從農村到了城市，由一般幹部當了領導幹部，官大了群眾觀念淡薄了，犯了不少官僚主義的錯誤，這是我對待群眾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我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我對文化大革命是一直不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是革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命的，我認為我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化大革命不應該革我的命，所以我想不通，有怨氣，想出氣，一直想找出氣的機會，但是一直找不到，後來想到文化革命總有個結束的時候，到那時總會讓我說話的。但是運動的發展，出乎我的預料，沒有想到運動會長達幾年時間，更沒有想到我在運動中會死過七次，像這樣下去，我能不能等到運動結束，如果有個三長兩短，誰來給我出氣，誰來給我平反昭雪。所以我就從最壞處著想，做了死的準備，有一次我借回機關交黨費的機會，向管我的人請求回家看看，我把我的想法給我女人說了，讓她作兩件事：第一件要結存一點錢，準備作上訪路費。第二件把我的一生寫個材料作為上訪的理由，等我死了以後為我伸冤。我們兩人邊說邊哭。就這樣匆忙地安排了我的後事。說到這裡會場的人們掉下了同情的眼淚，整個會場一片肅靜，鴉雀無聲。

鄭忠華作為走資派在憶苦思甜，至少是在憶文化革命給自己帶來的苦。

第三個問題是我對待兩派的態度問題。這是大家最關心的問題，都在集中全力聽我怎樣檢查，光怕漏掉一字一句，看我究竟是誰家的人，表什麼樣的態度。

當時平定兩大派是一派叫「批劉鄧紅色聯絡總站」，簡稱「總站」，他們是支持地區核心小組的，也叫支持派；另一派「大聯合革命造反兵團」〔他的這個記憶有誤，「兵團」全稱為「山西革命造反兵團平定總團」〕，簡稱「兵團」，他們是反對地區核心小組的，所以也叫炮轟派。我想用兩派都想知道的一個例子來說明我的觀點，回答對待兩派的態度問題。

這個例子是：一九六八年秋末冬初，我和朱永、賈正杞剛從省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回平定不久，一天中午我吃過飯剛躺在床上，正準備午休，來了一個幹部，他說陳永貴、任井夫、張懷英在昔陽有事叫你和朱永去一次，現在就去，老朱在北礮石他家等著，我們已經見過他了，咱們路過礮石叫上他就走。

這件事非常突然，使我震驚，去不去，一時難以回答，那個幹部等的有點不耐煩了，經過反覆的思考，我說這幾天我正在鬧病吃藥，現在去不了，等我的病好些再去你看怎樣？他看了我想了好久表示不去，失望地說就這樣吧，我走了。我檢查到這裡，會場上的寂靜立刻的活躍起來，互相之間交頭接耳，明顯地看出一派滿意，一派失望。

畢竟是老幹部，在兩派鬥爭中知道如何做誰都不得罪的老好人。

接著我說，我不去的理由有三：人們急於想知道我不去的原因，會場的氣氛馬上沉靜下來。第一，我和朱永都沒有解放，更沒有出來工作，不是因為工作問題，人家是不會叫我們的；第二，就是有事要辦，〔否則〕在我們沒有出來工作的情況下，不會把我們叫到昔陽去談，這樣做不僅對我們不好，對平定的領導也不好，這是個常識，人家是知道的；第三，當時兩派都在爭取我們，都想讓我們站到他們的一邊，有一派曾經透露，要以批鬥的形式把我們揪到東山，讓我們表態支持他們，但我們是全縣的當權派，不能要一家，丟掉另一家，這是我們的一貫主張。根據這三條理由，所以我決定當時不能去。……

檢查以後，我和老曹等著分配工作。第三天地區革命委員會發來通知，讓平定原縣委的常委都到地區學習。學習的目的是什麼，學習的內容是什麼，我們顧不上考慮這些，反正叫幹什麼，我們奉命照辦就是了。原

縣委常委除了郭存華調到長治工作外，留下朱永、我和賈正杞、曹黑小我們四人，按照通知的時間，一起到榆次南門外，南馬道街地區手管局招待所報到。一到學習班的大門，有幾位解放軍和地方幹部，面帶笑容說話和氣地迎了上來，搶著給我們搬鋪蓋，領著給我們安排住房，並忙著給我們打洗臉水。學習班裡的牆上貼著紅綠彩紙的大幅標語，寫的是：「歡迎老幹部站出來革命！」「老幹部過去有功勞，但是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要鬥私批修！」……

.....

但是，檢查了半天，顯然沒有結果，而是更多的學習，更多的檢查。

頭天晚上，我們到各個房間看望了多年不見的老同志，看看各縣究竟來了些誰們。這天晚上躺在床上輾轉反側，思緒萬千，一點睡意也沒有。頭天晚上交城縣原來的縣長劉本芝同志到我們房間看了我們，第二天早上又來看我們。他說祝你們好好學習，我要回交城了。他一說大家很驚奇，互相交換著眼色，雖然都沒有說話，但是大家都認為，劉本芝同志一定是被揪回去批鬥了。可是看著老劉面帶微笑，神態自如沒有一點被揪的不快表現。我們問他，為什麼剛報到就要馬上回去？劉本芝同志說，報到前我已經工作了，接到地區的通知，我正在主持召開一個會議，不來吧，不知道地區辦學習班的意圖，來吧，正開會又走不開，所以走時縣黨委給地黨委寫了封信，如果能不參加學習的話，最好是讓我回去工作。和地區一說，地區同意縣裡的意見。他還說，這次學習班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專為解放老幹部舉辦的，學習後除了個別同志群眾爭議大的，都要分配工作，所以我就馬上回去了。

到學習班只有一天的時間，瞭解了好多重要情況，知道中央在關心我

們，有好多同志已經不是走資派了，早就參加了工作。前三天，平定認為原縣委的常委中只有兩人能出來工作，三天後就都可以參加學習分配工作，看來縣裡的認識同中央的指示距離還不小。

經過一個多月的學習，地區留我們過了元旦，學習班就結束了。結束那天，地革委的主要領導人都到會講了話，並且宣布了胡光隆由榆次縣調到平遙任縣革委主任，張潤槐由昔陽調到靈石任縣革委副主任。其餘同志都回原來的縣分配工作，希望老同志們要立新功，為人民多做貢獻。

各縣的老同志們，回到縣裡後都很快參加了工作。像太谷的牛振安、孟縣的梁和義，在電話會議上通知各公社說他們參加縣革委的領導班子，開始工作了，有事要向他們請示彙報和聯繫。他們也在電話會議上表了態，說他們過去有錯誤，今後請同志們嚴格監督幫助。就這樣簡單地都重新工作了。

我們回到縣裡也等著參加工作，但是從元月初，一直等了五個月，到六月初才宣布我和朱永任縣黨的核心小組成員、縣革委副主任，賈正杞到巨城任公社書記，曹黑小在政工組工作。

即使最後分配了工作，但是學習班漫長的學習，之後漫長的等待與沒完沒了的檢查，而其他縣的同事們一個個都分配了工作，鄭忠華顯然是有一肚子怨氣。

在等的五個月裡我們幹了些什麼？一月到三月七日，整整檢查了兩個多月，向縣裡的幹部學習班檢查，向縣委、人委機關的幹部檢查，向紅代會、工代會、農代會檢查，向各局的幹部、向全縣的三級幹部會議檢查……頻繁的、沒完沒了的檢查，群眾不耐煩地反感起來，在街上貼出了大字報：「問，平定的幹部為什麼不解放？答：解放了他們，我幹什麼？」

在群眾的壓力下，我們參加工作的進程向前推進了一步，停止了檢查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一九七〇年三月七日，讓我到古貝公社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朱永到巨城公社，賈正杞到冶西公社，三月初到六月初縣革委才接到地區革委的任命通知，才宣布了我們的工作。

鄭忠華認為他們之所以遲遲不能被解放，是因為縣裡楊志忠等人不願意讓他們出來。他認為是一場複雜的權力鬥爭。他的矛頭直接指向楊志忠。而且在文革多年之後還耿耿於懷：

我們遲遲不能出來工作，是群眾有意見嗎？否，是地區不同意嗎？也非。問題是誰來掌握平定的領導權，這場鬥爭在文化革命前就懷胎了，文化革命是十月懷胎一朝分娩。

文化革命前，縣委候補委員，張莊公社書記楊志忠，就官癮十足想進入縣裡的領導班子，因為他才德不佳不僅沒有進了領導班子，連縣委委員也不是。這個人雖然缺無產階級之德，無共產主義之才，但是野心很大，搞陰謀詭計頗有一套。文化革命一開始，他認為時機已到，就以革命老幹部的身份出現，以受害者為幌子，打起了造反的旗幟，組成了平定縣革命委員會的籌委會，他自命為「籌委會」的主任。從此，他拉幫結派，又組織了「東鄉政府」，在平定打起派仗來，一直打了二、三年，在武鬥中他唆使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打死了城關鎮副主任張九崗老幹部，打死了供銷社模範售貨員李成柱，打死了石家莊國棉廠採購員楊勇志。

鄭忠華這裡的敘述有誤導的嫌疑。楊志忠在文革開始前就是副縣長了。而且武鬥中人被打死，沒有發現與楊志忠有什麼關係。

一九六九年冬，平定縣建立革命委員會時，楊志忠是以一派的代表被吸收參加到縣裡的領導班子的。從此以解放軍為主，建立了兩派對等掌權的縣革命委員會。但是楊志忠並不滿足，他認為縣革委的一、二把手都是軍代表，他們不會長期留在地方，將來支左任務一結束，縣裡的大權不就是他的了嗎？結果原來縣委的領導人朱永和我又出來工作，而且進了縣的領導班子，這就成了他掌權的障礙，所以他一直反對解放我們，但是解放老幹部是中央的政策，推遲解放是可能的，不解放是辦不到的，這是形勢所迫，楊志忠對這個形勢很清楚，所以他採取了遲遲不解放，逼使地區把我們調離平定，以便排除阻力實現他掌權的目的。

他這種不能告人的目的，引起了群眾的公憤，所以在街上貼出了「平定的幹部為什麼不解放？解放了他們，我幹什麼！」的大字報，就是指著楊志忠說的。群眾的義憤，更使他感到我們不離開平定，他的目的難以實現。群眾的反對他可以不顧，難辦的是縣革委主任左治貞和他的看法不同，儘管縣核心小組形不成統一意見，但是左治貞心中有數，他不同意調走我們，也是逼使地區對我們下任命書的。楊志忠認為，既然縣裡沒有統一的意見，地區就不可能讓朱、鄭留到平定。

結果地區還是採納了左治貞的意見，於一九七〇年五月下發了任命書，朱永和我都進了縣裡的領導班子。這是楊志忠萬萬沒有想到的，對他實現掌權的目的是個嚴重的打擊，而且八月份縣裡就要召開黨代會選舉縣委班子，權力鬥爭迫在眉睫，怎麼辦？楊志忠認為朱永是平定人，一直在平定作領導工作，在群眾中的影響比他大得多，黨代會上他是競選不過人家的。沒有別的辦法，選舉前必須把朱永調走。於是楊志忠就利用派性的管道把朱永調到孝義縣了。

鄭忠華的這些敘述頗像文革中的一篇大字報，把楊志忠試圖排擠鄭忠華和朱永的情況講得有鼻子有眼，但是又沒有提供任何事實的支撐，也沒有任何人的佐證。他接著說：

楊志忠是怎樣利用派性這個「法寶」的？杜章華和地區革委主任劉秀傑是一個部隊的戰友，又是連襟，同時來晉支左，杜章華就是駐平定支左部隊的負責人，在支左中杜章華不僅是支持楊志忠這一派，而且和楊志忠打得火熱，相處很深，非同一般。平定建立革命委員會時，杜章華就調回地區政工組任副組長，成了劉秀傑的左右手，楊志忠就是利用杜、劉的特殊關係，非常突然地把朱永調走了。

調走朱永卸了一個包袱，減少了一大阻力，留下鄭忠華怎麼辦？採取了以假亂真的辦法，給我捏造了莫須有的罪狀，說我在解放後重新分管整建黨工作以來，全縣逼死了黨員幹部五十多人，而且這五十多人有名有姓，看來我的「罪狀」確實嚴重。地區接到這樣的檢舉揭發，感到吃驚，不得不立即組織人調查落實。但是縣裡黨代會很快就要召開了，縣委的人還已經報請地區，書記是武裝部政委左治貞，副書記是武裝部長李計春，除了解放軍兩位支左的任正副書記外，地方幹部必須有一個副書記，這是準備將來撤走支左人員後的接班人，當時報請的名單是我，所以楊志忠非採取措施不行了。地區既收到了縣委的人選名單，也接到了對我的揭發，怎麼辦？推遲召開黨委會吧，沒有理由，同意我的副書記吧，又覺得問題嚴重。所以地區決定除選舉解放軍二人的正副書記外，地方幹部暫不選舉副書記，等以後查清問題再說。

黨代會結束了，我的問題也查清了。平定死了五十多人確有其事，但不是整黨中死了的，是一九六九年冬至一九七〇年春，在「清隊」和「一打三反」運動中死了的。那時我還沒有重新工作。整黨期間死過三個人，

但都與整黨無關。比如城關公社小峪大隊死了一個五保老漢，因為孤身一人，雖然隊裡管吃穿，他總覺得活著沒有意思自殺了。另一個是辛興公社葫蘆大隊的一個黨員，在整黨工作隊還沒有工作他就跳崖了，是因為和家裡人生氣自殺的。還有一個是張莊公社神峪大隊的羊工，不是黨員，他女人是本村保健站的司藥兼會計，和保健站的醫生有男女關係，也有貪污問題，保健站曾經丟失過幾百元現款。群眾對此意見很大，要求查清她（他）們的問題。女司藥和醫生乘機採取了借力殺人的辦法，說丢了的錢是女司藥的男人偷了的，以便逼死她男人，她們來結婚。結果真的把那個人嚇得自殺了。

平定的整黨工作一直是全區的先進縣，曾經在平定開過兩次現場會。全區的整黨簡報，共刊出了三十二期，其中有二十八期都刊載了平定的整黨經驗。問題雖然查清了，楊志忠以假亂真的目的也達到了。

鄭忠華認為楊志忠在有計劃有步驟地阻止他進入領導班子。但是仔細讀來，還是沒有看到什麼翔實的證據，多數是捕風捉影。他繼續說：

我雖然沒有當選了副書記，但是仍然是縣委常委，問題很明顯，只要我在平定工作，他掌權就沒有希望。第一群眾對他有意見，第二縣委書記不支持他。所以黨代會的結束，權力鬥爭並沒有結束。為了掌權，楊志忠又採取了措施，提出了「趕走左治貞，揪出鄭忠華，扶起李計春，權力落到楊志忠」的奪權口號。為此，楊志忠上下奔走，四處串聯，大造輿論，抓住縣委副書記、武裝部長李計春想當縣委書記的思想，倆人一拍即合勾結起來，利用派性的管道，和地區革委主任劉秀傑串通一氣，一九七二年二月把左治貞調到平遙當書記，平定縣由李計春接任了書記，實現了趕走左治貞的目的。

但是趕跑左治貞、扶起李計春，權力如何就能落到楊志忠手上呢？鄭忠華語焉不詳。而且從下面的敘述看，是「趕跑鄭忠華」，而不是「揪出」鄭忠華。

左治貞一走，兩個月後四月份我調到「五七」幹校學習一年，幹校一結束我就調到壽陽縣委常委、革委副主任。這樣楊志忠的計畫全都實現了，就等支左人員一走，他就上臺了。正在欣喜若狂之餘，形勢變了。地區的劉秀傑調走了，陳永貴、賈俊、李韓鎖到晉中擔任了革委會正副主任。省革委主任謝振華支左犯了錯誤，集中全省各縣的領導幹部到省開了三個月會，批判了謝振華的錯誤。劉秀傑調走了，謝振華批判了，平定群眾貼出了大字報，說楊志忠是殺害張九崗、李成柱、楊勇志的罪魁禍首，要向楊志忠討還血債，楊志忠看到後臺沒有了，群眾起來了，形勢不妙住進了醫院，肝炎病加上一心掌權的思想病，二病歸一越病越重，臥床不起。批判謝振華的會議開始不久，楊志忠病氣交加一命嗚呼離開了人間。這場鬥爭就結束了。

鄭忠華是「文革」運動中平定三大「走資派」中唯一留下回憶文字的。儘管他的回憶文字有著他的傾向性甚至不乏偏激，甚至含有人身攻擊的味道，但他是當時領導層中的人物，知曉領導層面的權力鬥爭內幕。我們透過表面，還是能夠看到，權力鬥爭，正是「文革」鬥爭的實質之一。從上到下，概莫能外。鄭忠華在批判別人的時候，忘了自己也是權力鬥爭中人。而且他沒有提到的是，楊志忠後來還是當上了平定縣革委會副主任。

他的敘述中最有意思的是關於權力鬥爭的問題，不過如果楊志忠一個人就可以決定這幾個幹部解放還是不解放，而且還將革委會主任左治貞趕

走，把李計春扶了起來，顯得他的權力也過於大了一些，大得讓人不可思議。而且，鄭忠華的口氣也很像文革中的大字報的口氣。比如這樣的詞語：「缺無產階級之德，無共產主義之才」，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以及下面的「上下奔走、四處串聯、大造輿論」、最後在權力鬥爭中失敗後「病氣交加、一命嗚呼」了等等。

另外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或許有不少幹部，多少年後對文革中和他們進行權力鬥爭的人仍然耿耿於懷，有可能報復一下子的話他們是會報復一下子的。他們對文革的理解也是馬馬虎虎而已。多少年來，他們也沒有能夠跳出文革的思維來看中國革命的問題。而且即使是領導幹部，在權力之爭的漩渦中，個人的偏激情緒也是有的。所有這些都說明了文革反思的必要性。

糧食局以及其他單位的情況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王增榮在《糧食工作回顧》中所記述的平定糧食局的情況。他的回憶敘述了在縣城裡的兩派實現大聯合前後，支左部隊是如何力圖穩定形勢，組建各級三結合的領導班子的：

當時，駐糧食局支左部隊和臨時領導小組的主要任務，除了保證正常的糧油供應，就是一面往回叫離崗撤走的職工（大部分是回家或者投親靠友），一面組建各基層單位的領導班子。

縣人武部和支左領導小組決定，在大聯合的基礎上，縣糧食局組建革命委員會，基層單位組建革命領導小組。新建的領導班子，必須是三結合，即：領導幹部、軍代表（縣糧食局為民兵代表，農村糧站為貧下中農代表）、兩派的群眾代表。……

在建班前，各糧站的領導幹部和部分職工，參加了縣人武部和支左領

導組舉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搞了思想革命化，提高認識，統一了思想，然後回去，在公社的統一領導下，經職工討論，建立班子。到 1969 年 4 月，各基層單位的領導班子相繼都組建起來了。

城關單位離崗撤走的職工，一部分隨紅總站撤走的人員去昔陽，一部分回家或投親靠友。有的想回來，也不敢往回走。縣人武部、支左領導組決定，要抓緊叫人。根據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的方法，該拍電報的拍電報，該寫信的寫信叫。不論哪種形式，都要講清歡迎他們回來，保證人身安全。有的還有種種思想，暫時不願回來，想看看形勢再說：有的叫五六次才回來。大約在 5-6 月間，撤走的職工大部分陸續返回單位、上崗工作。

人員大部分回來以後，駐局支左部隊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鬥私批修、搞思想革命化。在提高認識、統一思想的基礎上，組織大聯合。兩派都選出代表協商，簽訂聯合協定，產生了大聯合委員會。大聯委建立後，當即解散了各戰鬥隊，不准再進行活動，由大聯委負責組建縣局革命委員會。……5 月 24 日，支左部隊和大聯委召開了糧食系統職工代表會，組建縣局革命委員會。……縣人武部、支左領導組確定，糧食局革命委員會由 17 人組成。由於撤走人員還有部分未歸，暫留 2 個名額，以後再補。17 個名額中，領導幹部 2 名，民兵代表 3 名（兵團 1、總站 2），群眾代表 12 名（總站 7 名、兵團 4 名、無派代表 1 名）。革命委員會常委會由 7 人組成（暫留 1 名），其中：領導幹部 2 名、總站代表 3 名、兵團代表 2 名。……

.....

1969 年 7 月 19 日，在縣城戲院召開了慶祝工交局、城關鎮紅衛小學、糧食局三個革命委員會和水泥廠、煤炭經理部、招待所、運輸公司等 15 個革命領導小組的成立大會。大會由支左領導小組、縣人武部負責人

主持，並宣讀了批准上述單位成立革命委員會和領導小組的文件。大會推舉我代表這 18 家領導講了話，表了決心。晉中地區、陽泉市等地的領導機關派代表參加了大會。榆次、文水、交城、榆社等縣發來了賀電。……

離崗撤走的職工，截止 1969 年 8 月 22 日，我局還有 13 人沒回單位。這時中央的「七·二三」布告已經發布一個多月了，如果撤走的人員再不回本單位抓革命促生產，就要按違反「七·二三」布告的規定處理。直至 8 月 28 日，我局撤走的職工才全部返回單位。

他們回來之後，是否像一些地方一樣會受到兵團的打擊與報復呢？王增榮說：

1969 年 8 月 30 日，支左領導小組、縣人武部召開了縣直各單位革委會負責人會議，李計春部長講了話。他說：「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輿論說現已成立的革委會要統統推翻，這是不可能的，個別的調整一下不可避免。我們要相信黨、相信群眾。」還講了以下三個問題：一、今天來的都是負責同志，現在是我們犯錯誤的時候了，稍不注意就可能犯錯誤。撤走的人員都回來了，「七·二三」布告有規定，對回來的人，不准歧視，不准打擊，如果掌握不好就要犯錯誤。二、各單位回來的人，不管人數多少，都要辦學習班，單位負責人親自搞。學習內容：「九大」毛主席講話，省革委的通令。在提高的基礎上，進行鬥私批修。三、嚴防違法亂紀。據說有的單位搞什麼批呀、鬥呀、打呀，這是不允許的，一旦發生問題要追究領導責任。各單位要開個會，研究一下。要加強組織紀律教育，嚴格掌握政策。現在是抓典型的時候，你不按布告辦事，就給戴上破壞七·二三布告、破壞大聯合的帽子。肚量要大，讓人講話天塌不下來。要沉住氣，往前看。武裝部派人去昔陽叫人 7 次。我們一定要冷靜。

1969年9月8日，左治貞傳達了兩派在太原達成的協議。他強調：對協議只能落實，不能抵制，不能干擾，更不能反對。各單位都要辦圍剿派性的學習班，批判無政府主義，多中心論一定要批倒批臭。特別要提醒兵團的同志，對回來的同志要熱心，不能歧視。回來的同志，也千萬不要搞小動作。

在辦學習班期間，清理了糧食系統離崗撤走職工帶出的糧票、現金，動用了的糧食、糧票、現金，該報銷的報銷，該核銷的核銷，該退回的退回。

學校的情況

學校的情況如何呢？趙成秀回憶了平師附小的情況。他說：

我也從我的老家昔陽返回了平師附小。因為學校沒有大門，沒有看門人，經歷了那場武鬥，附小被折騰得不像樣子。教室的門窗破損，院子裡垃圾遍地，院牆上還殘留著大字報的墨蹟，圖書室大門敞開，比較有價值的圖書早已被人盡數掠去，地上散落著一些被撕碎的地圖、畫冊的碎片。我所在的辦公室鐵鎖已被撬開，我的辦公桌的櫥櫃被砸壞，裡面所有的東西全都丟失，最令我心疼的是圖書：全套上中下冊的俄語語法；《古文觀止》上下冊；《隨園詩話》，都不翼而飛，這些都是我節衣縮食購買的。

學校復課了。雖然大部分教師已經返校，學生也坐到了教室裡，但教師中對立兩派的裂痕依然存在，學生中文革造成的散漫和迷茫影響著教學的正常進行。在新成立的縣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附小的風雷激戰鬥隊和八一八戰鬥隊實現了大聯合，並成立了領導組，組長為站出來的領導幹部溫成立，成員為風雷激戰鬥隊代表郝福喜、八一八戰鬥隊代表高忠明。為

了趕形勢，追時髦，平師附小改名為五七學校。

平定中學的情況如何呢？平定中學兩派學生被召回到教室裡，整天地討論、發言，搞起了「大聯合」。高四班「紅總站」派的骨幹學生曹建中是流亡到昔陽的學生首領之一。他的「檢討」令全班同學頗感興趣，因為他在昔陽流亡時，在婆婆山被「兵團」追剿，屁股上挨了一顆子彈。子彈並沒有擊中骨頭，而且是小口徑步槍子彈，殺傷力不大，但是卻讓這位只在電影裡見過中彈倒下狀的年輕人著驚不小。小口徑步槍子彈是鉛彈，熔點低。曹同學挨了一槍後嚇得大喊：「毒彈！毒彈！」旁邊的人不知他是說子彈有毒，還是說屁股中彈，因為在平定方言的土話裡，屁股蛋子也被叫這個音。這成了他們逃亡者們傳流的一段笑話。回到班級中，同行的逃亡同學把這段笑料抖了出來，引起全班尤其是女孩子的哄笑，弄得小曹挺沒面子。他竭力辯解，卻越抹越黑。

在幾天的鬧哄中，氣氛融洽起來了。三年分離後，坐到一起的同學發現：原來大夥並沒有什麼血海深仇，同學見面仍舊親密無間。當然，掌了權的學生精英教師骨幹在謀劃什麼，大夥無從得知。同學們在重新彙聚後，開始各自打起自己的小九九。畢竟，各人的前途命運，各人還是擔著心機的。儘管天天「鬥私批修」，鬥了三年，但「私字一閃念」，畢竟人人還是有的，鬥不盡。

社會上的兩派都不像學生這麼容易消除隔閡。城裡大隊的杜廣興在兩派鬥爭中是個活躍人物。在流亡昔陽返回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回憶說：

昔陽回來，我被打成反革命。大隊的一夥人拿銅炭（一種燃燒後氣體含一氧化碳高的雜質炭）燒了熏我。後來揪鬥我，在體育場開一萬人大會

批鬥。後來給我平反的時候，在小峪大隊禮堂開的，一個大隊去一個人，共有十七個人參加。郭和當時在公社，是他宣布的。張振聲（城裡大隊的主任）給我拿回來的黑材料，說燒了吧，我說由你。我不同意我的平反會那樣子，高有序說：就這，你還想咋？〔平定話：就這樣了，你還想怎麼樣？〕

不過即使是平定中學，派性還是在起作用的，正如我們在下一個部分所敘述的。

平定中學革委會成立、學生畢業分配

大聯合、建立革委會後平定中學的整頓，是讓學生離校。平定中學的學生，由於「文革」的緣故，已經連續三年沒有招生，也沒有學生畢業。1964 年起入學的初高中學生，成為了在校時間長於學制時間卻又未完成學業的「老三屆」學生。在武鬥開始後，大部分學生離校返家，少部分學生參加了武鬥。在流亡昔陽的學生被召回後，儘管也有一些首領級的人受到一些批判，但學生們早已沒有了「文革」初起時的新鮮勁兒，也失去了武鬥時切齒相見的凶狠勁兒，大家都人心惶惶地等待處理——不是處理哪一派，而是處理全體學生。

平定中學這時已經匆匆建立了學校的權力組織——革命委員會。原先被打成「走資派」的校黨支部書記蔡守惠官復原職，成為校革委會的第一副主任（主任空缺），體育教師王學良（兵團）和語文老師王盛強（總站）以及學生代表高三班岳智明（兵團）擔任副主任。潘佩經回憶說：

1969 年 9 月，中央強制要求聯合，把我們叫到晉中開會。幹部代表紅總站是閻叩成、張鐵鎖，兵團是楊忠志、李六孩，群眾代表有董福昌、劉

懷祿、郝守映、李守珍和我。在榆次軍分區劉秀傑的主持下，開了一晚上會，協定建立革委會。革委會常委是左治貞、李繼春、張鐵鎖、楊志忠、李六孩、閻叩成、王來金，結合進去的群眾有李守珍、郝守映、董福昌和劉懷祿，我是革委會的委員。

成立革委會就收繳武器，不論是自製的還是搶來的，全部都交給縣革委會。革委會成立後，抓回董鋼後訓話說「不投降就叫你滅亡」。緊接著，縣裡成立了三代會，我是紅代會的主任，王學良、耿長羅、李玉萍是副主任。

平中成立革委會，蔡守惠是第一副主任，王學良、〔王盛強〕、岳智明是副主任。當時還進駐了貧宣隊和工宣隊。

這以後就開始分配工作，紅戰團是一個不分，紅指的骨幹大都分配了。縣裡左治貞召開常委會批判郝守映、李守珍、王來金。新的革委會成立後其實還是在搞派系。後來紅總站就不行了，省裡的紅總站錯了，縣裡的紅總站也就錯了，這是一條線上下來的事，山西省紅總站的頭子楊成效被逮捕了。

他的回憶有一點需要說明：楊成效的被捕至被槍斃並不是用派性和軍隊偏向哪一派，而是在武鬥期間，楊有血案，顯然是在中央文革授意之下，被判處死刑的。據石名崗所主筆的山西文革書的記載：

據李輔回憶，楊成效早在中央學習班時就被控制，回山西時與學習班學員們乘坐著一趟列車，只不過沒有行動自由。回太原後被關押。據段立生回憶，省革委曾經召開常委會討論楊成效的罪行，決定判處楊成效死刑時，謝振華、曹中南、陳永貴、劉灝、宋傑、段立生等都參加了會議。……陳永貴在會上很不情願地承認，自己看錯了人，受了反革命分子

楊成效的欺騙。⁷

在平定中學，學生的畢業分配是一件敏感的事。據說，當時分配時還有一個插曲。當時參加「紅戰團」擔任過播音員的初中 55 班學生李愛華，被招工到第三鐵路工程局。他回憶說：

平定中學學生離校是「九大」以後，鐵三局招工走是在當年（1969 年）12 月 21 日。同時招工的有華北電力建設工程公司（河北電建）。鐵三局的代號是 3201，河北電建的代號是 160。招工走時，凡是站錯隊的骨幹都不要，一般參加了「紅指」的非農業戶口的，都能走。3201 走的時候，已經體檢了，又刷下去四十多個人。原因是：「紅戰團」照過一張合影照，題款是「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人很多。（見圖 13-3。）照相館的高權是「兵團」派。他把這張像交給了縣招工辦，招工辦說凡是像片上有的人一個也不能走，就又刷下去一批人。

他說的這個界限前面還有一個前提：當時是嚴格限制農業戶口人口流出的。進入平定中學讀書的學生，必須離縣城 4 里遠的，才可以把戶口遷入學校，而離城不足 4 里的，則必須走讀。遷入學校戶口的，統一由農村戶口改成城鎮戶口，供應糧也是 33 斤商品糧。而走讀生中，又有一部分是城鎮戶口市民家庭者。剩下的，就是居住在縣城或距縣城不足 4 里的農業戶口學生。在 1969 年的招工中，第一道封鎖線，被界出的首先就是這批農業戶口的學生，也包括擔任校革委副主任而剛在 4 里範圍內的岳智明，分配同學時，他都參加了意見，而自己卻不能分配而回了家。可見當時戶口限制之嚴格。而派別則是招工的第二條封鎖線。因此，一批學生被

⁷ 石名崗（主筆）《文革中的山西》，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5 年版，第 498 頁。

3201 或 160 招工，可能「紅指」領導者和一部分骨幹預先知道這些單位是流動單位，又是鑽山溝的，名聲好聽而其苦尤甚，因此「紅指」領導者和一部分骨幹沒去這兩個單位，而是留在當地。他們被分配到當時縣管的一些單位，例如高壓電器廠、燈頭五金廠、汽電廠等，成為這些招人羨慕單位的一名工人，而當時屬「紅戰團」的一批人，則大都回了家，城鎮戶口的，則下鄉插隊。當然，一些雖名義上是「紅指」而「喪失革命意志」回家躲避的學生，不管戶口如何，則一律不得分配。



圖 13-5 有名的「浪遏飛舟」照片，第一排左一為耿忠榮，左四董鋼，右一郝忠德，第二排左三為戎崇璽，右二張瀘雲

資料來源：耿忠榮同學提供。

當學校宣布學生離校時，高四班學生如同倒了樹的猢猻：最榮光的二位班幹部參了軍，一批「文革」精英去了工廠，另一批班級活躍分子去了 160 即「華北電建石家莊工程公司」，而占班級人數大半的站錯隊者和「文革」消極分子則被遣散返鄉。那一天，高四班已經提前返鄉務農的李金田和他的好友荊鵬、王炳文離校後在校圍牆豁子外的高坎上話別，荊鵬沮喪而不失感慨地說：「高中畢業生，全縣一年才出這四十個，就容不下給個

工作！」

但感慨歸感慨，在僧並不多但粥卻過度匱乏的年代，職業會決定人一生的命運。這批返鄉的站錯隊的或沒有「獻身革命事業」的學生，命運註定他們會經歷又一個十年的磨練和磨難，然後通過插隊分配、農村招工、保送進入大學成為「工農兵學員」、民辦教師轉正等，各自走出農村。全班倒數第二個走出農村的人是李金田，他跳出「農門」是在改革開放的一九七八年。

不管怎樣，「文化大革命」也同歷史上發生過的和將要發生的大的動盪變革一樣，會造出一個既得利益階層，也會造出一批犧牲者。嚴格地說，這實在不能算作一次兩派之間的報復，只能算作一次利益的分配。「不勞者和反對者不得食」是這次利益分配的原則。

時過境遷，郝忠德撰文回憶和評論這次命運攸關的分配：

我們 13 名被批捕的學生因證據不足放了後，學校召回搞聯合。回校後卻被批鬥，還脅迫作檢查，以種種罪名將紅戰團的骨幹排斥在聯合之外，選定幾名學生做紅戰團的代表，就這樣聯合了。

校革委成立後，緊接著以分配〔為名〕讓學生全部離校。因為學生思想最活躍，最具有反抗性，敢於造反，是最大的隱患，必須儘快根除。原校黨支部書記蔡守惠被結合為一把手。鐵三局、華二建、大陽泉煤礦的招工分配名額，紅戰團比紅指還多，甚至紅戰團的一些骨幹被寫在招工名單上，遭到兵團派校副主任王學良等人的極力反對。

蔡守惠陳詞力爭把名單報到縣裡。經體檢後，學生全部離校。下來通知招工走的時候，突然宣布 47 名學生被縣裡取消分配名額，據說是因照了一張分別留念的像，又說招工方不要紅總站觀點的，總之表現了蔡守惠

這個老幹部的高明之處，在分配離校時穩住了學生，分配不公怎也算不到他的頭上。

紅指的大部分骨幹也與這次國有大中型企業招工的良機無緣，因為他們為爭奪這個政權僅僅邁出人生的第一步，鞏固維護一些人在政權中的統治地位〔的責任〕，還要他們肩負起來，也預示著為權力所付出的一切還得將由他們自己來承擔。而這些青年學生卻抱著美好的憧憬與期望，也不忍離開這片已付出而未收到碩果的熱土，被分布〔配〕在縣屬小廠礦企業服務行業自我榮光地上崗。紅戰團大部分是非農業戶口，又被召回學校，辦班動員到農村插隊。

學生離校的草率和匆忙，顯示學校以至縣裡對這批滯留在校學生的顧慮和自身工作的無序。他們甚至連畢業證書都差點沒有頒發。高四班的一名原班幹部想到這件事，但無論上級還是市面，根本買不到鉛印套色印製的那種畢業證書。好在學生們經歷「文革」，有幾個人已經因刻傳單成為刻鋼板的熟練手。他們搞來一張舊畢業證，把上面的文字按筆劃描下來，再按照當時的流行樣式，在封面畫上毛澤東戴軍帽的半身照和「金光四射」的圖紋，並且給「偉人像」用紅色油墨套了紅。於是，那幾屆學生，都領到一個 64K 本的油印畢業證書，紙質是一種叫「繪圖紙」的厚紙，印章則是「平定中學革命委員會」的章。這種印章，只使用了這幾屆學生的畢業證書，因而明顯地印著那個時代的烙印（見圖 13-6、13-7）。

隨著學生的離校，平定「文革」的主力軍作鳥獸散。得到革命成果的和沒有得到的，懷著不同的心境去了各自的位置上。沒有了聚合的能力，也就沒有了聚合的力量。他們的離散，標誌著平定「文革」大動盪的結束，也預示著平定「文革」將以一種新的形式表演下去。



圖 13-6 平定中學畢業證封面

資料來源：作者自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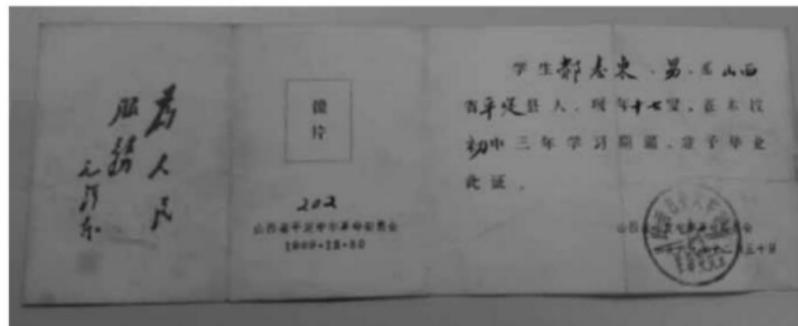


圖 13-7 平定中學畢業證內頁

資料來源：作者自拍。

這一批名叫「老三屆」的學生，就這樣以「文革」急先鋒和闖將開頭，以絕大多數打發去農村結束，走完了他們的「文革」之路。這一批學生，尤其高三、高四這兩個高中班的學生，可以說集中了全縣莘莘學子的精英。他們本來期望而且能夠成為又一批國家建設的棟樑。但是，他們積極投身的一場大「革命」，給予他們的卻是這樣的回報。這裡引用作家馮牧的一段話，算作對他們人生付出的總結（〈生活——作家的搖籃〉，載1985年3月25日《人民日報》）：

從20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70年代的十幾年中間，在我國的國土上出現了一個有如狂風暴雨般的勢不可遏的事件：數以千萬計的城市青少年學生，在「接受教育」的名義下，上山下鄉，到邊遠貧困的農村地區去，開始了難於想像的艱苦繁重的體力勞動生活。歷史證明：生活的進程是不會按照人們的主觀臆想和如意算盤而發展的。廣大人民、特別是廣大青少年，為這場狂熱的運動所付出的代價，是過於沉重了。上千萬的純真無瑕的青少年，在艱苦的勞動和坎坷的遭際中，也許獲得了某種有助於他們思想和體力成熟和發展的收益，但是，一個無可回避和無可補救的問題是：數以千萬計的青少年（在他們當中肯定有許多人是富有才能和理想、甚至是在某方面是才智過人的），卻因而喪失了繼續學習、繼續獲得科學文化知識、從而也就喪失了發揮自己的才華和創造潛力的機會。同時，在那樣的動亂形勢下，也不可能使他們對於祖國的建設事業作出有成效的貢獻來。他們當中的意志堅強者和體力堅強者，在某種機遇中，也可能衝破困難，自學成才，在生活的激流中有所成就，後來成了藝術家、作家、學者甚至體育冠軍。但是，我確實也看到大量的有過這種生活經歷的青年人，常常是懷著一種沉重的惘然若失的心情來回憶起自己的這段令人心酸的生活經歷的。幸乎，不幸乎？

儘管馮牧說的是上山下鄉的知青，但是對文革中過來的所有年輕人來說，又都何嘗不是如此。

由共同奪權到分裂攻訐，以致動用武力流血死傷，雙方對立達二年之久，遺留在思想上的傷痛和派性宗團延續數十年，至今仍未能完全消除，其實質並非當年所宣稱的「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而是一場裹挾著不同目的、不同訴求的自上而下的無厘頭混亂，一場鬧劇與悲劇。在山西，省級層面的意見分歧和爭奪權力，中央領導層面的隨意表態，個別有影響人物的無知參與，是形成自上而下動亂的原因之一。在這場動亂的參與者中，有爭奪權力、爭奪席位的少數幹部和造反派成員，有不滿自身境況表達個人訴求的社會底層人員，絕大多數則是被以各種冠冕堂皇的道理所裹挾的普通公民。在平定，這各種不同的因素混雜在一起，使本縣在兩派分裂的過程中矛盾交織和不斷轉化，表現出數番此起彼伏的狀態。

軍方奉命而執行穩定局勢的任務，極少自身的功利目的。所採取的策略與辦法儘管有失偏頗，但屬不得已而為之，從客觀上講還是有效的。「一邊倒」式的暫時的穩定，使得掌握領導權力的軍方能較為從容地進一步穩定局面，建立與鞏固權力機構，但是人民的生產生活卻很難走上正常軌道。文革的思維還會繼續折磨平定人民，鞏固政權的方式還是階級鬥爭的方式。於是，此後的文革只是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而已。鬧劇、荒唐劇與悲劇仍未結束。學術界有一個三年文革的觀點，但是從平定的情況來看，文革遠遠沒有結束。這是我們為什麼還有下面幾章的原因。

鞏固革命成果：清隊、 一打三反、清理三種人

望你們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學習新華印刷廠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並且注意總結本地區的經驗。在清理廠礦，機關和文教系統中的教職員工的階級隊伍的工作中，進行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工作。要堅決貫徹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穩準狠地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轉發出
「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的批示¹

在提拔中青年幹部時，必須對「三種人」保持警惕。就是說，決不能提拔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對這些人一個也不能提拔，已經提拔的，必須堅決把他們撤下來。

——陳雲於1982年7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²

1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轉發毛主席關於『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的批示」，1968年5月25日，中發〔68〕74號文件。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 陳雲，「陳雲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摘要」，1982年7月30日。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文化大革命」到了這時，到了大聯合與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兩派的武鬥烈火，總算撲滅了。不過儘管大規模動槍動刀、真槍實彈、流血死人的運動形式，總算走到了盡頭，但是各地兩派群眾還在明爭暗鬥。兵團掌權時鬥傾向總站的人，總站掌權時鬥傾向兵團的人。而且這種鬥爭也會死人，儘管很多人是自殺。實際上，在平定，在這個時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遠遠超過了文革的其他時期。所以說，還是很殘酷的。人們的思維還是階級鬥爭的思維，既然是階級鬥爭，就還是你死我活，還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而是暴力，包括語言暴力和身體暴力。

中共「九大」以後，中央權力進行了再分配。但是，在各個省分，權力仍然掌握在軍隊手裡。「在『三支兩軍』過程中，各軍區司令員更以兼任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的形式主導地方政權以至於『九大』前後形成了一個軍政不分的局面。當時中共一度被蘇聯稱為『軍事官僚集團』。」³ 其實是近似軍管。

這是不得已而為之。地方上的派性，從幹部到群眾，已經到了有我無他的地步。只有軍隊，似乎還能相對中立一點，使各地剛建立的黨政權力組織能夠穩住陣腳。

接下來，按照以往搞運動的慣例，「群眾運動」結束，「運動群眾」的老一套辦法就又使上了。

從 1970 年開始，運動就回到了原來的模式，就是領導層下令整一般人。這些登上領導層的人，多為原來的幹部。即使有一些新人，思維方式也和舊人相同，對這種運動方式也久見久熟，輕車熟路。因此，整起人來毫不手軟，也很順手。《中國共產黨平定縣歷史紀事》說：⁴

3 見〈「言事兩權分立」與四人幫的覆滅〉，《南方週末》，2014 年 9 月 14 日。

4 平定縣史志辦公室編著，《中國共產黨平定縣歷史紀事》，2000 年，第 211 頁。

(1969年)11月1日，平定縣革委會決定成立「平定縣革命委員會門批改辦公室」。在全縣開展「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運動（即打擊反革命、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及反對鋪張浪費）。許多群眾被無理批鬥。……

(1970年)2月初，平定縣革命委員會組織全縣各界群眾宣傳貫徹中央關於「一打三反」的3個文件。分別是：中發〔1970〕3號文件《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5號文件《關於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6號文件《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統稱「一打三反」文件。縣革委通知各地群眾收聽有線廣播，公社、大隊設會場組織幹部學習收聽。

「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是在中共「九大」召開以後中央部署的新的運動任務。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後，開始「打擊反革命」運動。與此同時，又開展「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的「三反」運動。「一打三反」運動中，最沒有具體標準、最難以把握和操作的就是「一打」，即打擊「反革命」。而打擊反革命又和清理階級隊伍結合在了一起。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開始在全國大抓「五·一六」分子。這幾項運動，尤其是政治方面的運動，例如清查「五·一六分子」，沒有任何定義，沒有政策界限，沒有實施辦法，基本形成「說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的局面。上邊政策不清，下邊就無意或有意地趁機會整人抓人，隨意性很大。這一年，「文革」運動的其他運動項目還有「整黨建黨」、「住幹校」和「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總之，中共「九大」以後，中央的意圖是力求建立秩序。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已經在高速狂奔的「文革」的「階級鬥爭」列車能剎得住麼？

在平定，縣主要領導緊鑼密鼓地狠抓「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群眾運動」，「加強領導班子思想革命化建設」（縣革委會向上級報告語），並且組織召開首屆「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會」和全縣三級幹部會。大部分幹部——包括新秀和原來的中層和一般幹部，都被集中到縣委黨校，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這是將被起用的徵兆。一切都顯示著，平定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歷經三年的起伏動盪後，開始朝著表面上「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發展了。

清隊、一打三反與繼續批鬥走資派

根據翟治璧的回憶，在 1969 年 9 月成立革委會後，縣人委機關的大部分幹部都進了學習班。到 1970 年 4 月 24 日，學習班變成了「縣委、縣人委機關幹部學習班」，挪往宋家莊。名冊上共有 196 人，實到 133 人。在學習班時，他們繼續鬥當權派。翟回憶說：

我們組 16 個人，我被選為組長。「一打三反」開始後，調整了組，和計委、統計合在一起，我仍為組長。我們這個組還管了兩個人：梁子銘，是縣委辦公室主任；史蘇明，老宣傳部長。對他們兩人我的原則是一不給派重活，二不組織批鬥。幹活量力而行。我們那裡三個月沒有開過一次批鬥會，但他們會被別人弄去批。其他人要嚴格執行幹校作息時間表，〔早上〕五點到地，七點吃飯，八點又到地，十一點「天天讀」，十二點吃午飯，然後睡會覺，四點又到地裡，八點回來吃飯，到九點到十一點搞運動。農活通常有拉排車、拉大糞、拉犁、刨地等。

我們組有個幹部叫趙曉華，是部隊轉業的，是解放戰士。在部隊經過審幹，還入了黨。分配時我閱過他的幹部檔案。審幹結論很明確，沒有嚴重的問題，但有人揭發他有問題，要揪出來批鬥。學習班領導組要揪鬥

他，我說我知道他沒問題。學習班領導組認為我認識沒有上去。一天晚上 12 點，要開緊急會議，解決我的認識問題。我頂了他們。結果第二天在職工俱樂部召開的的三次「寬嚴大會」上，還是把人家揪上臺。到落實政策時，才又平了反。

根據翟治璧的回憶，1970 年 1 月，「一打三反」升級，核心小組除閻扣成外，都以反革命分子被揪出來交群眾批鬥。劉子義、梁子銘都被召開大會揪出來，公安局的戎俊來、郗景秀、張耀文都是以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名義被揪出來的。被結合到革委會的紅總站派幹部王來金回憶說他被看作是鑽進政權內部的反革命分子，要實行逮捕，後因省裡有要求，才被打發去修鐵路。儘管對幹部們的批判和整肅遠遠趕不上對文革剛開始時就已經批鬥過的那些所謂「牛鬼蛇神」以及所謂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們的再批鬥，但是還是發生了死人事件。下面是趙成秀在〈我的文革歲月〉中的記述：

縣革委將原縣委、人委機關的所有人員（包括勤雜人員）幾百人都集中到西關黨校辦學習班，大搞揭、批、清，帶頭鬥、批、改。原縣計委主任付寶徵，因在集市上買吃了一碗三鮮湯，感慨之下寫了一首打油詩，其中有「三鮮三鮮害人不淺，一碗三鮮夠我三天」，便以不滿現實、反對社會主義的罪名遭到沒完沒了的批鬥，懾於被監管的壓力，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利用上茅廁的機會投入糞坑自殺。

正如我們在後面的資料中將看到的，平定縣在清隊和一打三反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文革中的其他任何時候。多數是被羅織罪名的普通老百姓。王來金說他曾經和左治貞理論過，說在長達三年的文革中，在沒有政權時，在大亂中，才死了三個人。反而在革委會成立後，卻死了 150 多人

(我們在後面引述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官方資料似乎是 70 人，具體數目不詳)。這是多麼嚴重的問題。他認為左治貞因此對他懷有不滿，而把他趕出革委會，打發他去 3202 修鐵路。

清隊、一打三反與文教衛生系統的情況：總站人士以及其他九類分子被整

平定的「清隊」和「一打三反」運動是在一個複雜的政治背景下開展的一個複雜的政治運動。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從「文革」開始至此為止，一直處於渙散狀態。社會秩序有所恢復後，黨內整頓就顯示其迫切性，「整黨建黨」運動便應運開展。與此同時，社會秩序逐步趨於平穩，學校開始招收「學工、學農、學軍」式的學生，縣裡召開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一些縣重點企業如平定鋼鐵廠動工興建，農業學大寨運動在政治色彩尚不十分濃厚的狀況下開展，並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以軍方為代表的縣黨政機構，在處理「清隊」、「一打三反」運動時，仍然「左」氣很大，整肅的絕大部分精力放在那些出身不好的「牛鬼蛇神」們上，其力度使一些被整治對象不堪忍受而自殺。在這樣的氣氛下，「紅總站」一派骨幹被作為階級鬥爭對象之一，受到整肅，情況有時也很慘烈，尤其是對出身不好但又參加了總站的人的整肅。

但是接替張日清代表軍方介入地方「文革」的謝振華，很快地由於與步步上升的陳永貴產生分歧並被一部戲劇《三上桃峰》所累，被中央點名批評，一落千丈。軍隊很快撤出地方黨政。1974 年 3 月，原「走資派」王謙主持山西工作。在陳永貴的主導下，「農業學大寨」運動的階級鬥爭火藥味越來越濃，「紅總站」觀點的一派人開始掌權，昔陽外派幹部之風大作。「清隊」、「一打三反」和「批林批孔」運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批《水滸》運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攬合在一起，「階級鬥爭」的風向突然又刮向了「兵團」一派的人。

下面我們先看對總站的整肅，之後再看對兵團的整肅。王增榮《糧食工作回顧》記錄了當時縣裡對清隊和一打三反的要求：

領導班子建立不久，就連續地搞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清理階級隊伍（簡稱清隊），打擊現行反革命，反對官僚主義，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簡稱一打三反），整黨建黨、整團建團等運動。

1969年10月29日，縣革委召開農業學大寨會議，清隊工作也在這次會上做了部署。縣革委主任左治貞做了報告，講了農業學大寨問題，強調當前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新特點，階級敵人破壞的十種表現，農村資本主義的十種傾向，清隊的主要意義。縣人武部李計春部長對清隊工作做了動員報告，講了國際形勢、國內階級鬥爭情況，清隊的方法步驟。

這天晚上，地革委召開了電話會議，講了清隊工作要在1月份陸續展開，選擇單位先搞試點，分期分批逐步開展，點面結合，穿插進行，在清隊中一定要落實政策。

1969年11月19日，縣革委召開了清隊工作會議，左治貞做了報告，他說：「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從今天起就全面開始啦！清隊工作，已做了充分的準備，必須明白清隊是清什麼？主要清理革命隊伍中的九種人，除此外，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清隊不能有派性，派性掩護階級敵人。要組織一部分人進行調查，要向外調人員交代請政策，要重材料、重旁證，不輕信口供，更不能搞逼供信。……」

縣革委清隊會議後，局革委召開了常委會，分析了當前職工的思想情況，有沒有九種人（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叛徒、特務、內奸、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對全系統150多個職工逐人進行了分析摸底。認為糧食職工的出身歷史都很清楚，歷次運動都未發現可疑的政治問題。經過摸底分析，沒有發現九種人的問題，但仍須發動職工深挖細

找。當前，雖然群眾組織都已解散，但職工思想上的派性仍很嚴重。各派都怕對方搞自己的問題，但對另一派，卻拼命地揭問題，只要抓住一點，就上綱上線，揪住不放。……

這顯然有點像 1957 年抓右派一樣，就是沒有，也一定要牽強附會地找一個或者幾個出來，才能說是工作有成績。王增榮接著說：

1969 年 12 月 19 日，晉中地革委召開了電話會議。地革委主任劉秀傑講了以戰備為綱搞好清隊的報告。他說：「大敵當前，要不要搞好清隊，要不要搞好生產，這些問題都要研究。不能把清隊工作放在戰備之上，也不能只抓戰備不抓清隊。要以戰備的姿態搞好清隊，清隊和戰備是統一的，不能對立起來。」

電話會結束後，左治貞當即講了話，他說：「劉主任的講話，主要是轉局問題，以戰備為綱促進清隊。我們要注意落實政策，進一步克服派性，不符合政策的要糾正。特別注意〔不要〕人身攻擊和逼供信。大字報不上街，不要亂點名，凡是揪鬥的對象，要報縣革委批准。一定要把群眾組織犯錯誤和真正的敵人破壞區別開來。要繼續批判派性，圍剿派性。革委會的兩派代表，都不要庇護敵人。」

如此看來，還是很講政策，很負責任的。只是思維仍然是階級鬥爭的思維。王增榮繼續說：

1969 年 12 月 28 日，張玉璽傳達了地革委清隊工作會議精神，他說：「劉秀傑在東方紅廠清隊現場會上的總結錄音中，批評了一些單位利用清隊，開除這個、下放那個的錯誤做法。有些領導不顧大局，將來會自己搞掉自己。批判要對準敵人，絕對不許把批判矛頭對準哪一派群眾。清隊就

是清的九種人。外調人員必須兩派都有。」

儘管從地區和縣裡的精神上講，不能鬧派性、不能搞逼供信，一定要公平公正，但是在實際上，完全是另外一碼事。下面我們看具體情況有多麼離譜。趙成秀在〈我的文革歲月〉中，提供了更多的背景，並回憶了文教衛生系統的情況，尤其是對原紅總站人員的整肅。他說：

1969年8月23日之後，被平定「兵團」一派打出去流寓昔陽的「紅總站」幾百號人被陸續接回自己的家鄉平定。在昔陽避難半年多的時間裡，「兵團」一派在武裝部的支持下，加緊了一派獨掌平定大權的步伐，先後建立了「工代會」、「貧代會」、「學代會」等組織。所以，「紅總站」的歸來並沒有鮮花，也沒有掌聲，個個都懷著失落和落寞的感情悄然回到了自己的單位或家中。但他們沒有想到由左治貞領導的一場「清隊」和「一打三反」的「左」傾整人運動正在等待著他們。

〔1969年9月12日平定縣革委會成立。〕……1970年元月至1970年5月中共中央連續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關於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和《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第三號、第五號、第六號三個中央文件，這三個文件都由毛澤東主席批了「照辦」二字，所以又簡稱三個「照辦」。其主要內容是：在全國上下掀起一個打擊現行反革命犯罪，反貪汙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的群眾運動。這是「文革」期間繼揪鬥「走資派」、「反動權威」之後又一個階級鬥爭的新高潮。

當時，掌握著平定縣革委會主任和核心小組組長大權的武裝部部長左治貞（左應該是武裝部政委），也許是出於對三個「照辦」的曲解，也許是出於在河北某地支一派壓一派的慣性，罔顧中央再三肯定的「兩派都是

革命組織」的指示以及「兵團」和「紅總站」所達成的協議，利用「派性」，在全縣開展了對「紅總站」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大清洗運動。而在城裡學校所舉辦的文衛系統學習班成為這一次運動時間最長、影響最大、造成的冤假錯案最多的一個「範例」。

那麼，都有哪些冤假錯案呢？趙成秀認為這次運動是針對總站的組織骨幹的：

平定縣文衛系統學習班在位於聖廟的城裡學校舉辦。對於左治貞來說，「一打三反」先從縣直文衛系統開刀是有其深意的，因為這個系統在平定的「文革」中，「紅總站」不僅人數占了絕對的多數，並聚集了比較多的組織骨幹、優秀人才，而且輿論上也佔據了很大的優勢。整垮這部分骨幹，就等於讓紅總站這一派全部繳械投降。

學習班的領導組由五人組成：城裡學校的校長張忠智任組長，成員分別是平定師範革委會主任劉梓恒、平定中學革委會主任蔡守惠、工宣隊領導吳滿堂，還有一個軍代表。參加「學習」的有平定師範、平定中學、平定醫院、平定劇團、城裡學校、五七學校（原平師附小）、城關聯校等文教衛生單位的四百餘名教育、衛生、文化工作者。集中住在城裡學校的教室和宿舍裡，統一起灶，不准隨便外出。學習班從 1970 年 1 月 23 日開始，直到 4 月 24 日結束，歷時 100 天，所以又被稱為一百天學習班。

看來是軍代表和復職以後的走資派要一起來整造反派了。矛頭對準了原紅總站的頭頭。趙成秀繼續說：

學習班是由左治貞直接領導的，「學習」的每一個進程有領導組精心策劃，左就曾指示張忠智：「共性問題一般批判，個性問題重點突破。」

開學的前一天夜裡，學習班領導就以批判所謂的「一·二二」黑會，拉開了帷幕，並使學習班的空氣頓時肅殺起來。在上報給晉中地區革委會的《平定縣革命委員會關於召開落實三個『照辦』的常委（擴大）會議的總結報告》中，說：「文衛系統集中舉辦清隊學習班的前一天晚上（1月22日），郝守映召集文衛系統的趙岐山、李寶樹、王希考等七人開黑會，研究部署了對抗學習班的一套辦法。郝告訴趙：『要沉住氣，他們一定要弄你，其他人要保護岐山……』」但事實是，這天晚上，趙岐山同王希考、王瑞忠到郝守映家瞭解學習班將要搞些什麼，當時李寶樹、蘇丙魁、楊永效等人也在場，郝守映並未表態。郝曾經是「紅總站」一派的骨幹，又是革委會的常委，與本派同志們接觸應該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而郝未發一言，說明他的原則性是很強的，怎麼能算是「開黑會」呢？左治貞要文衛學習班拿此事做文章，無非是給一派的群眾施加壓力，並給革委會中「紅總站」派常委郝守映增加罪名。

為將一派的骨幹置於死地，學習班採取了非常露骨的要整垮一派的批鬥方式。一是大會批鬥營造聲勢。「開班」伊始，校園中央是原聖廟戟門改成的辦公室，周圍赫然貼著大標語：「徹底批判郝守映、李守珍、趙岐山、趙成秀的現行反革命罪行！」其他標語充斥著「低頭認罪」、「罪該萬死」、「砸爛狗頭」等威脅性、侮辱性的語言。大會在文廟大成殿前舉行，張忠智主持，當二十餘名「階級敵人」被押上大成殿前時，口號聲驚天動地。這些「階級敵人」有：平定師範的關一之、吳覺民、申興兆、張德光、陳增清；平定中學的楊乙榮、陳元才；平定醫院的姜允〔永〕祿、陳金卿；城關聯校的光侗、趙岐山、石義祥；城裡學校的方浦、白耀進、王志昌；平師附小的史文華；平定劇團的俎明傑等。

這自然是文革的繼續。鬥爭的對象其實除了造反派以外，還有曾經在

文革初期被鬥過的所謂五類分子和「牛鬼蛇神」。其鬥爭方式也是文革的鬥爭方式。趙成秀說：

這些所謂的「階級敵人」有的是有歷史問題但早已下了結論的，有的是家庭出身地主、富農又出言不謹慎被抓住所謂把柄的，有的是五七年反右時被錯劃為右派的，有的是紅總站的頭頭，有的純粹就是普通革命群眾……他們在「清理階級隊伍」時已被陸續揪出，多數已被「鬥臭」。這次動員大會將這些人示眾，領導者的意圖非常明顯，就是對所謂「隱藏很深、未被揪出的反革命」以震懾，對紅總站一派施加壓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這一時刻成為歷史的時候，卻成為對文廟「萬世師表」的一種亵瀆和嘲弄。

大會結束以後，緊接著就是中會「拼刺刀」。所謂中會，就是幾個單位一起開批鬥會，採用的是拼刺刀的方法。「拼刺刀」本是軍隊練武、戰場廝殺的一種戰法，借用到批鬥會就成了革命群眾與「階級敵人」的短兵相接。平定醫院和東關小學分在一個組，鬥爭的第一個「敵人」就是平定醫院的外科大夫姜允〔永〕祿。領導組給他列的主要罪狀：一是給醫院寫「離崗聲明」，造成五十多名醫護人員或回家，或跑到昔陽；二是在廢舊的處方上寫上成吉思汗、毛澤東、默罕默德等名字，以此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三是在廢紙上畫了蛇、兔等畸形怪狀的動物，發洩對社會的不滿。

對姜永祿醫生的揪鬥，就是典型的文革思維方式與文革鬥爭方式。姜醫生最終被逼自殺。根據趙成秀的記述：

姜允祿祖籍山東黃縣人，後舉家遷入北京，他出生於北京南苑郊區，家境並不富裕。上山西醫學院時享受著國家的助學金，是中國共產黨培養出來的合格大學生、醫學人才。他和夫人金德友一同分配到平定醫院以

後，兢兢業業，醫術廣受好評，被稱為縣醫院「第一刀」。姜允祿是個自尊心極強的知識分子，開始他矢口否認所有對他的指控，他曾經起草過一個「離崗聲明」，但醫院並未採用，紙上的寫寫畫畫也只是無聊下的消遣，怎麼和反對毛主席掛上鉤？但是，禁不住極左分子一次次的拼殺，只得違心屈從，被逼自殺身亡。

自學習班開班以來，姜允祿與妻子金德友一直不允許見面，金德友聽說丈夫不幸去世，悲痛萬分，經多次要求，才讓她與丈夫告別，金德友只見他蒼白的臉，脖子上套著一根繩子。他並不知道妻子還懷著他的孩子。遭受重大打擊的不僅是金德友，還有姜的家人，因為大哥的去世，弟弟和妹妹相繼得了癌症辭世。

當然，弟弟妹妹得癌症不見得和大哥的去世有關，但是和文革中其他那些被致死的人的情況一樣，一個人的自殺是一家人的悲劇。根據文革的思維，自殺只能證明自殺者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只能遺臭萬年。趙成秀繼續介紹當時的情況：

就在姜允祿自殺的第二天晚上，學習班領導組召集文衛系統全體人員在後操場開會，張忠智操著大嗓門聲色俱厲地說道：姜允祿的自殺嚇不倒我們，我們要繼續將「一打三反」運動進行到底。他還要求金德友還有那些反革命分子要和姜劃清界線。工宣隊的人也在私底下說：死個把人怕什麼？死了活該！由此，學習班的白色恐怖日盛。

批鬥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小會人人過關。學習班的小會就是以單位召開的批判會，採取重點批判和自我檢查相結合的方法。凡是站在紅總站方面的，凡是跑到昔陽的，都要檢查自己，揭發別人。我記得，學習班的中會我只「出席」過一次，我們附小和廣播局合為一組，我被推上臺，廣播局的一個胖職工（恕我不知道他的名字）狠狠地推搡了幾下，並踢我的小

腿，口中發出暴雷般的怒吼，直嚇得我心驚膽戰，但多數時間是在小會上挨批。

趙成秀開始介紹自己文革開始時就被批判以及這次運動中被批判的情況：

我出身於貧農家庭，在共產黨的培養下長大，成為一名人民教師。我愛寫日記，常好通過記日記抒發感情，練練筆桿，文革剛開始，平師附小領導號召教師向黨交心，我出於對黨的一片赤誠，便把我從師範畢業之後參加工作至 1965 年的四本日記交給了附小的主任，令我想不到的是，這竟成了整我的黑材料。他們把我的日記抄寫成大字報，張貼於城裡學校大門之外，還將我的日記本打了頁碼，分給門批改積極分子，任意翻閱和解讀，然後逐個發言，逐條批判，有的上綱上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有的暗裡發出竊竊的嘲笑之聲，刺得我的靈魂隱隱作痛。

前面說過，學習班開始時，大標語上將郝守映、李守珍、趙岐山、趙成秀並列為四個現行反革命，當時我竊想，郝守映、李守珍、趙岐山為紅總站的一二三把手，我既不是紅總站的頭目，也沒有做過打砸搶的勾當，和他們並列起來是不是太抬舉我了？直至後來翻閱檔案才知，平定縣革命委員會在給晉中地區革委所寫的《關於召開落實三個「照辦」的常委（擴大）會議的總結報告》中說：王來金、李守珍「明知道方浦、趙成秀是現行反革命分子，卻要用他當『秀才』寫文章，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

左治貞還對張忠智等人說，像趙成秀這樣寫黑日記的人，夠得上槍斃。（我很懷疑左認真看過我的日記，他所獲得的資訊也是局限於某些人的彙報和曲意解讀而已）。他們的調子是早就定好了的。其實，我當時並

不認識王來金，和李守珍也只是相識和敬重而已，我就給紅總站寫過一篇文章：〈告全省人民書〉，主要是揭露「兵團」個別人挑動武鬥，將另一派群眾趕出縣城，並兇殘殺害無辜群眾張九崗、李成柱的罪行。這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嗎？

作為「紅總站」的第一號人物，李守珍受到了比較大的衝擊。雙方簽訂大聯合協議，作為一方代表，他被選派進入縣革委，是掛名但不擔實責的縣革委委員。據與他同派別的人零散的回憶，他被幹部層「拼刺刀」了十幾次。由於他的口才好，說理有據，每回都能把和他「拼刺刀」的人說得沒話可說，才沒有被打成「反革命」。

「拼刺刀」是歷次運動中的一個小發明。在解放軍內，「文革」前曾經搞過大練兵，大練兵中對步兵的單人訓練有一項「拼刺刀」，講究的是「敢於近敵」「敢於刺刀見紅」，這是在武器技術比較落後的條件下一種以弱戰強的辦法。後來引申到政治運動中，就是敢提尖銳問題，敢於面對面辯論。這種辦法，並未用於對「牛鬼蛇神」，因為對這些人，是無需辯論的，只憑他們的歷史，就能定性。對於想把某些人也定性成敵我矛盾卻又苦於沒有證據時，才使用「拼刺刀」，目的是以某些事實推出一些結論，並使被「拼」的人服貼。李守珍以文才和口才在平定聞名，熟知「拼刺刀」被拼倒的後果，當然會據理力爭。

原總站的領袖之一荊履榮也回憶了文衛系統尤其是他自己挨批的情況。他說因為自己人好、專業強，所以才沒有被打成反革命，儘管也受了不少罪：

大聯合起來以後，專門開展了批判郝守映、荊履榮的運動，「七二三」布告，開始鎮壓反革命，接著「一打三反」和「清理階級隊伍」，這些運

動讓許多人，對文革已經心灰意冷。這時全縣開始大辦學習班，李守珍在縣委常委會上被批判，在全縣文衛系統集中召開的大會上，趙岐山揪出來了。我在劇團被批鬥，縣委書記左治貞和我談話，認為我是好人，決定在單位揪鬥，不在系統鬥。我住在單位，房子裡都貼滿大字報，冬天揪鬥時，先放我在火爐旁，大家圍攻，讓我出一身子汗，衣服也濕透了，然後馬上揪到院裡在鬥，衣服馬上結了冰，讓你凍得發抖。有時又把我揪到系統，鬥了幾次。

縣級幹部是鬥梁志銘和劉志義。這些都是紅總站的人了。這一段我們集中住單位，老婆去食堂打飯，人家給我打病號飯。大家認為我是一個好人。

「一打三反」、「清隊」，大概是四五個月的時間。然後是「揭、批、改」，進入了改的階段。我近乎變成反革命，帽子拿在群眾手中，隨時可以給我戴上了。但軍代表說：「你定性不是反革命，你藝術還行，別人也替不了你，縣裡要搞劇團，你就留在劇團吧！」而原來劇團的人，全部下放到了二輕系統當工人去了，我的老婆分配到了燈頭廠去勞動改造去了。

到後來，我上了臺，才又把劇團的人都調回來。當時劇團的書記是李有全，這是個好書記。有政治見解，特別對文革有自己的看法，然而他又沒有明顯的派性。他和我經過幾次深刻的談話，後來我才黨員轉了正，當了劇團的副書記。

〔訪談者問：當時批你是什麼罪名？〕我是紅總站的頭頭，什麼罪名由人說。這時把「三代會」和劇團合併，然後排樣板戲，排不下去。王治魁問我怎麼辦？我說要新招一批人，從基本功抓起，把「三代會」這些「白毛」分配出去，調一部分老人回劇團來。所以縣裡才在 70 年招了幾十個人。這時我主要精力是抓 70 班了。後來 70 班排了《沙家浜》，到晉中會演，一炮打響。後來，我到文化館，當館長，副科級。1984 年 10 月離

開平定。

趙成秀繼續介紹文衛系統的情況，他認為是左治貞鼓動將紅總站的人打成地富分子與壞分子：

在文衛系統裡，最受領導組重視的是東關小學。其中趙岐山自然是重點。他不僅被扭送到當時的專政委員會結结实實捆了一繩，帶回城裡學校東關小學教師宿舍後又被派專人看管起來，不讓他睡覺。縣革委會主任左治貞親自深入東關小學，說，地主和富農出身的可以打成地富分子，不是地富出身的也可以打成壞分子。領導組還派「兵團」骨幹朱存業等人進行演講，揭露「紅總站」一派所謂的罪行。老教師苗瑛只是紅總站的一個普通群眾，因給趙岐山保存過筆記本，便對他進行沒完沒了的批判，還因苗老師管過學校工會的帳目，組織人查他的帳，說他貪汙了五分錢，苗說清原因後，又污蔑他挑動群眾鬥群眾。1971年「三·八」婦女節，還專門組織女教師召開了對老校長光侗和老教師尚振漢的批鬥會。

城裡學校「一打三反」的火藥味也很濃，因為這是張忠智直接管轄的地界。除將方浦、白耀進、王志昌揪出來公開批鬥外，以紅總站派占多數的教師中，都檢查自己站錯了隊。跑到昔陽的青年教師高琦租因「反戈一擊」有功，很快過關了，而老教師郭啟元、胡振海就不那麼幸運，郭老師因岳父是「資本家」（其實是一個開明的工商業主），胡老師因出身中農，他們檢查了好幾次都過不了關。

另外一個荒唐的事件是破獲所謂平定中學的投修叛國集團，其人數占到全校教職工總數的三分之一。已經在文革初期批鬥過的一些人如果能活到現在的話，又要再被批鬥了。趙成秀介紹說：

小會戰果最為「輝煌」的要數平定中學。據稱他們破獲了一個由右派分子楊乙榮、陳元才，壞分子陶予組成的隱藏很深的投修叛國集團，並寫成了七八千言的專題材料，以平定縣革命委員會文件的形式上報晉中地區革委會。材料說，「群眾揭發，楊乙榮 1962 年大肆叫囂『要殺共產黨』；陳元才家中長期保存刻有國民黨國旗與黨旗的偽銅幣、頭像的銀元、子彈殼等」，「文化革命中，陶予跳了出來一度蒙蔽群眾，竊取平中大會執行主席之要職」。材料中還說，「在黨的政策威力的感召下，楊承認了他是企圖投修叛國小集團的策劃者與組織者，是『高級參謀』」「1967 年冬，楊、陳、陶等人乘文化大革命一時混亂之機，在中學菜窖開黑會，密謀投修叛國，武裝暴動。」「越境措施訂得周密詳盡。」材料還列舉了他們從 1962 年以來的一系列「罪狀」，如製造謠言，惑亂人心；收聽敵臺，盼修想蔣；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公開為大叛徒劉少奇翻案；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讚揚蘇修資產階級專政；結夥誣告解放軍，破壞復課鬧革命。等等，等等。

據 1975 年落實政策時參與此案的同志證明，所謂「投修叛國」集團是某些人「根據一些表面現象，做了唯心主義的分析，以感情代替了黨的政策」而編造出來的。因「投修叛國」集團所牽涉的無辜群眾就達 27 人（其中骨幹 9 人），占全校教職工總數的三分之一，占到紅總站一派〔教工〕群眾組織總人數的 81%。此案還寫成報告上報晉中革委會和山西省革委會，引起整個晉中地區轟動。

中共平定縣委平發〔1976〕214 號文件「中共平定縣委關於對平定中學『準備投修叛國反革命集團』乙案的復查處理決定」這樣記述了一個驚動全省的大而莫須有的案件的產生過程：⁵

5 見平定縣檔案館藏中國平定縣委平發〔1976〕214 號檔。

一九七〇年春，縣直文衛系統舉辦的清隊「一打三反」學習班結束後，根據當時上級指示，平定中學校革委開展了火線整風。接著就發動全校職工群眾，掀起了查敵情、找黑點、挖黑根的高潮，揭發了學校的形形色色的問題。在此基礎上，校革委進行了分析研究，認為平定中學好多年來就存在有一股子暗流，即：《地下黑俱樂部》。校革委根據群眾的揭發，認為楊乙榮、陳元才、陶予等三人，平時思想落後，接觸頻繁，他們個人在歷史上又有一些問題，社會關係又比較複雜。運動中，他們又相互之間揭發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問題。於是就把他們視為這個《黑俱樂部》的骨幹。同時又把平時和他們接觸較多，關係比較密切的同一派的十八個教師，認為是這個《黑俱樂部》的周邊人員。這樣分析的結果，由二十七人參加的平定中學的《地下黑俱樂部》就產生了。這個《地下黑俱樂部》產生之後，平定中學校革委就以《地下黑俱樂部》為報告，上報縣革委。當時縣革委主要領導，看了這個報告後，讓縣革委辦公室搞個材料。於是，縣革委辦公室就在這個報告的基礎上，加以修改，把《地下黑俱樂部》的題目就改為「平定中學革委會破獲準備投修叛國反革命集團」了，並形成了平革〔1970〕41號文件，分別上報了地委、省委，以後，地委又把這個「破獲準備投修叛國反革命集團」的報告，發至晉中各縣，同時地委、省委又在簡報上分別發表過。這就是《破獲準備投修叛國反革命集團》形成的全部過程。

不清楚當時平定中學的領導以及一打三反的積極分子們是真的相信有這個「準備投修叛國」集團呢，還是為了表現自己的革命，所以捕風捉影、羅織罪名呢？從文革思維的角度來看，或許兩者都有。當時的上報執筆者魏德卿在證明材料中寫道：

在「一打三反」運動中，平定中學職工揭發了一個以陳元才、楊乙榮為主要分子的投修叛國集團的問題，縣委主要領導讓縣委辦公室搞個材料。於是，我就讓平定中學「一打三反」辦公室的同志寫向縣委的報告。平中寫了幾次，不太成功，思想性不強，重寫了幾次。最後一份寫的情節比較細緻，思想性較好。我□在此基礎上略加修改，以「從平定中學的投修叛國集團看階級鬥爭的複雜性」為題，以縣委文件形式，經縣委領導批准印發了，並上報地委、省委。後來地、省都在簡報上轉印了。

所謂思想性較好就是要上綱上線，階級鬥爭的觀念要強，一定要有階級敵人。於是，黑俱樂部就變成了投修叛國集團。知識分子們再次遭到整肅和清理。

當時平定中學的教師、在改革開放後擔任該校校長的晉如祥在〈「文革」平中「投蘇叛國集團案」〉一文中記述了這個涉及到多人的冤案的來龍去脈（載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山西紀事》）：

在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儘管有「寧可跌在屎上，也莫跌在嘴上」的告誡，但因言獲罪的人還是常有。「文化大革命」時期，平定中學（今平定一中）搞出的「投蘇叛國集團」大案，就是由幾句閒話被曲意製造的。

事情還得回到 1964 年，那年 5 月中旬，縣裡向各單位抽人開展人口普查。平定中學讓張天福帶隊，領著我、陳元才、黃義遲等 4 人到縣上報到，參加培訓學習，而後分配去黃統嶺公社接受任務。縣裡規定 6 月 1 日全縣統一開始工作，1964 年 5 月 31 日打旱，我們從平定坐車到陽泉，趕趁陽泉到西南昇的首班公車。那時，路況差，車速慢，到西南昇時已經中午，又渴又餓，下車後便到西南昇僅有的一家飯店喝水吃飯。與我們同桌的是幾位從工作服上得知為陽泉市建築公司的人員，他們在閒談時說：

「陽泉市法院近日公判了一個人，是從內蒙古二連車站往外蒙古逃跑時被抓回來的，獲刑 13 年。」這時陳元才老師插話說：「那是在玩命，沒被邊防軍開槍打死算其運氣好，瀋陽文工團有個小提琴手，是從鏡泊湖偷渡到蘇聯的，聽說在波蘭文工團伴奏。」黃義遲老師接著說：「我在福建師院讀書時，學院緊靠大海，有一天中午，從山上下來 4 個人，一同從海中向蔣軍盤踞的島上游去。」建築公司有個人問黃：「海邊離島有多遠？」黃說：「我也說不準，反正距離不近，體力差的很難游過去。」後來彼此又說了其他瑣事，張天福和我都未參言。大約在飯店待了一小時，我們就動身往黃統嶺趕路。去後，公社安排一人包一個村，張天福去小嶺，我到白甘泉，陳元才到鋪北，黃義遲去黃家，6 月底一同回公社交卷，集體返校。

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擂響「文化大革命」的戰鼓。平定中學的楊乙榮、陳元才、陶予三位老師被接連掛牌遊街示眾。

楊與陳在 1957 年反成右派但早已摘帽，陶予是陳的愛人。按理說摘了帽就不是右派了，可這是豬腦子的想法。那年月只要掛上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的號，其政治生命就被判了死刑，甚至連老婆孩子都搭上。而運動一來，便將這些手裡的獵物拉出來，再次撕裂其傷口，鞭打其「罪行」，讓其遭受更多的侮辱與痛苦，從而張揚凸現革命風暴的威懾力。

陳元才為躲避這一殘酷的鬥爭，曾跑到搞過人口普查的黃統嶺鋪北村，但這種自我保護的行為太脆弱了，沒幾天就被「捉拿」回來。而當年他在西南昇飯店說的話也被有人用大字報捅出來，正好 16 條公布後，紅衛兵開始大串聯，所以當時無人揪扯這事。

.....

三年的派仗，無形中減少了對批鬥對象的批判頻率，給了其一段喘息

時間，接著災難的日子降臨了。1970年元月，縣革委將文衛大軍即平中、平師、平師附小、城內學校、縣人民醫院等單位元的全部職工，集中到城內學校（今實驗小學）集體食宿，開展清理階級隊伍與「一打三反」運動。

平定中學首先被尋開心的仍然是楊陳陶，不過批判他們課堂放毒，向學生灌輸資產階級思想，向無產階級爭奪接班人等罪行。在當時的政治生態中，已屬於普遍性的大路貨，因這是教育系統整個「臭老九」群體的共同「罪行」。

清隊領導層深知，只有抓住個性問題，才能給被鬥者致命的一擊，於是陳元才數年前在西南昇飯店說過的幾句話，成了整人者首選的強項。他們拋開當時前後談話的語境，單獨把陳元才說的抽出來作為政治話柄，上綱上線分析，認為這些話暴露了陳元才早有投蘇叛國思想，斷定陳與瀋陽文工團那個越境叛逃的小提琴手互相認識，互有聯繫；認為陶予是陳的愛人，夫唱婦隨，心心相印，必為一夥；楊乙榮與陳元才同為右派，同惡相濟，沆瀣一氣，自然是同類，於是陳元才一人的閒談被演繹成三人的共同策劃。

方案既定，圍攻開始，領導喊盤，骨幹衝刺，小組鬥，大會鬥，揪在臺上鬥，鬥得楊陳陶三位老師焦頭爛額，心膽俱裂，只得俯首聽命，按需交代，自己加罪自己，甚至彼此撕咬，將功贖罪。於是以楊陳陶為核心的「平中投蘇叛國集團」大案便被製造出來，20多名教師受到牽連。其間，王壽祥和余林祥二人奉命找我調查詢問，我把當時在西南昇飯店吃飯時間談的情況如實相告，他倆未讓我寫書面材料，說是先回去彙報後再定。……

中國歷史上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悲劇一次一次地被重演。晉如祥繼續說：

1970 年清隊中，平中老師除楊陳陶外，受衝擊的還有六七人，如校醫孫壽，曾是八路軍的衛生兵，經不起戰鬥環境的艱苦生活，回家未歸隊，但也沒為日偽服務，懷疑其叛變失節被揪鬥。荊械老師同情弱者，被視為思想右傾，其父親叔父早年投身抗日，使祖父被抓進日本憲兵隊，家裡賣了好幾畝地，用錢托偽職官員活動，才救出其祖父。1965 年「四清」時，有重新審定成分的做法，荊械說要重劃的話，他家土改前三年就變為 7 口人 15 畝地，不應是富農。本來有「四清」才有此說，結果被上臺揪鬥說是他有翻案思想。商性齋（英語老師）、潘景霞老師的政治歷史問題，在 1955 年「肅反」運動時，已自我交代外調取證做了結論，結果也被揪上臺批鬥。文衛大軍在城內學校搞清隊，時間長達百日。……

隨後便是處分，楊乙榮、陳元才被開除公職送農村勞動改造，陳元才的愛人陶予被調到南坳，陶予難以承受夫君為她帶來這沒完沒了的苦難，痛心與陳離婚，一個完整的家庭隨之拆散。商性齋被遣送回家。荊械、李鵬被行政降雨級調往岔口、舊街。高啟聖、李淑琴（荊、李、高、李四人屬「投蘇叛國集團」成員）、趙文藻、潘景霞、陳增瑞、馬超俊、李慕光等調往農村。……

這樣一個「莫須有」的事情，當時的縣委領導卻以平定縣革委〔1970〕41 號文件的形式肯定下來，在沒有任何證據，沒有證人證物，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下，只是憑著想像和臆斷，就隨便地處罰數十個知識分子。一個學校，大半教師受到牽連和處罰，幾個「核心人物」被剝奪人身權利。對這些人的懲處，其實是「殺雞給猴看」，老師們並沒有這麼大的膽子去逆潮流而動，更沒有膽量或條件跑路或者躲避運動浪潮給他們的衝擊。他們面對類似的「莫須有」罪名和懲處，唯一的辦法，就是逆來順受。

這二位極富才華的優秀教師，楊乙榮被發配往岔口的紅嶺，陳元才被發配往古貝的牛角溝。這是一次真正的被發配。在此後的日子裡，他們將在農村苦打苦熬，直至「四人幫」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經過復查平反，才又回到講臺上。而在社會上，一些「有問題」的人以「全家插隊」的名義「上山下鄉」，被下放到農村。光榮的名義，使他們比戴著帽子下鄉的人能得到比較不壞的待遇。這些人都是運動中的被運動者，是一場運動必須付出的代價，並不在兩派的相互報復之列。

這一輪運動的對象，是那些知識分子中的家庭成分高者。因為老一代的「五類分子」中的「分子」大多年事已高或已離世，而且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歷次運動中基本上都受到處罰，現在世的都是被「監督改造」的，實在沒有什麼「階級鬥爭新動向」，再拿他們開刀也擠不出多少新鮮玩意，所以，那些現在供職於國營部門的家庭成分高者，尤其是在兩派爭鬥中或多或少參與其中者，就順理成章地成為運動的主要對象。

趙成秀在〈我的文革歲月〉中總結了平定文衛系統人員受到衝擊的情況：

在城裡學校所舉辦的文衛系統為期一百天的學習班究竟有多少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已無法做出精確的統計，但公開的處理和死亡人數確是有據可查的：其中，自殺和不明真相死亡的有平定醫院的姜允祿、段巧娥、陳金卿（防疫站）、梁世春（未查清死因）；公開逮捕並判處死緩的有城裡學校的白耀進；開除公職遣返回家的有平定師範的關一之、吳覺民、王鐵夫、申興兆、張德光、陳增清，平師附小的史文華，城裡學校的方浦、王志昌，平定中學的楊乙榮、陳元才、陶予，城關聯校的石義祥，等。平定中學的荊械則降了兩級。平定師範錯批、錯鬥、錯處理的達25人。

學習班結束以後，我和史文華回校參加勞動改造，挖地道、碾石膏粉，什麼髒活累活都幹。健康的摧殘不必說，最主要的是心靈的傷害。我遠離了我所鍾愛的講臺，遠離了我所熱愛的學生，剝奪了我工作的權利，這是我最難以忍受的。1971年春節，學校放假，所有的教師都回家和家人團聚，而我和史文華還天天在石碾邊轉圈，想起遠在昔陽年邁的父母，想起在爺爺奶奶跟前繞膝、未成年的我可憐的兒女，我不禁潸然淚下。我想死，但想到他們，我沒有選擇自殺，而是堅強地活下去，直等到改革開放的春天。也許是我出身貧農，社會關係也都是貧農，也許是不少同情者真誠的善心，我沒有如左治貞所斷言的「槍斃」，當然，我也不知道死亡曾多麼嚴重地威脅著我，如果知道，我將是另一種結局。

其他系統的情況

其實，其他系統的情況也很嚴重，對此趙成秀〈我的文革歲月〉記述如下：

在工業系統，屬於紅總站一派組織的領導人，牛增福、蘇丙魁和馮耀慶以現行反革命遭到揪鬥，尤其是牛增福，在全縣的「對敵鬥爭寬嚴大會」上被揪到臺上示眾，當場宣布為現行反革命分子，罪行是製造停工停產事故、使工廠損失二十餘萬元，還把借汽車說成是偷汽車。整整六年，換了好幾個工種，挨了不知多少次批判。他的工友李乃修因為在檢查裡寫了一個「牛增福同志」，成了批判的重點，後來還開除了公職。董偉僅僅是平定鎮黃農機廠一個普通職工，又是一個殘疾人，只因曾跑到昔陽，給紅總站辦過刊物，也被定為現行反革命，並遭逮捕，在一年多的牢獄中經受折磨，不幸去世。〔關於董偉的案例，我們稍後會繼續討論。〕

在手管局系統，下屬的自行車社補胎組組長李振家，係紅總站下屬手管系統的一個頭目，曾在文革初期批鬥過原「七一社」、「自行車社」和「黑白鐵社」的聯合支部書記劉成文，劉成文懷恨在心，利用「一打三反」的時機進行報復。他以聯合鬥批改領導組組長的身份，糾集多人，捏造所謂 18 個大問題、72 個小問題的罪行材料，將李振家打成現行反革命，並對李施以酷刑：戴重木牌、彎腰請罪、坐飛機、烤火爐、擰耳朵、打耳光……將李振家折磨得頭髮被揪掉，頭皮破爛，皮骨分離，胸、腰、手、腿等部位傷痕累累，折磨了一個多月。更為殘忍的是，當李振家汗流滿面，不堪忍受，慘叫聲不斷，跪地求饒時，劉成文卻冷笑一聲說：「哈哈！沒想到吧？頑固下去，死路一條！」在忍無可忍、自知毫無出路的情況下，李振家於 1970 年 4 月 4 日凌晨在王家莊村北邊自縊身亡。事後，劉成文為了逃脫罪責，宣布李振家是現行反革命，畏罪自殺，一切後果自己負責，並指使骨幹到處張貼大字報，大造輿論，聲討李振家的「罪行」。

這又是一個走資派報復造反派並導致造反派自殺的案例。趙成秀接著說：

在商業系統，在煙酒公司的批鬥會上，當場把公司會計潘子期打得半死不活，回家之後死亡。參加會議的一個職工看到這番情景，嚇作一團，回家後上吊自殺，副局長王守信為軍隊轉業幹部，也懼於批鬥會的巨大壓力自殺〔這裡回憶有誤，王守信沒有自殺〕。在這個系統，僅在「一打三反」中被揪鬥、批判的就達 47 人。

在廣大農村，全縣一個鎮十八個公社都舉辦了「一打三反」學習班，其火藥味與縣城相比有過之無不及。據後來縣政策落實辦公室統計，這一運動中受各種類型衝擊的人，城關鎮 28 人，城關公社 51 人，維社 18

人，南坳 34 人，冶西 38 人，鎮簧 85 人，張莊 48 人，古貝 20 人，南陽勝 13 人，石門口 72 人，柏井 19 人，槐樹鋪 30 人，東回 39 人，馬山 13 人，床泉 12 人，岩會 57 人，娘子關 50 人，巨城 59 人，岔口 43 人，簧統嶺 23 人。總共 782 人。據落辦的另一項調查中，武鬥或刑訊逼供打死、致殘的人數達 130 人，其中農民 110 人，運動中自殺的 69 人，全部是農民。據分管革委會辦事組辦公室的王來金回憶，全縣上報各地死亡人數時，上報到 150 人左右就再不讓上報了，可見，還有許多冤魂未列入死亡名單。平定縣在「一打三反」中的「經驗」和「成果」流毒晉中，波及全省。在全省的電話會議上，公開公布：全省 100 多個縣中，絕大多數都能按中央的要求，以穩定大局為重，抓革命，促生產，只有平定和壽陽穩定不下來，死人最多，受到通報批評。

趙成秀認為平定各地死亡人數會超過 150 人。而我們在後面引述的官方文件，說非正常死亡人數為 70 人。原革委會常委王來金在回憶中也說當時非正常死亡人數是 150 人。顯然，非正常死亡人數至少 70 人，但有可能超過 150 人。當然不管死多少人，即使是一個人也太多。趙成秀接著說：

在革委會成立之前，整整四年。雖然在「無政府」的情況之下，「兵團」和「紅總站」口水戰不斷，常有衝撞和打架的現象，就是在雙方武鬥開始之後，也僅僅由「兵團」打死三人，最後以「紅總站」主動撤出、避難昔陽而結束武鬥，未釀成更為嚴重的流血事件。但是，革委會成立之後，在「有政府」的情況之下，……主政者……罔顧中央、省和地區的一系列指示，派性十足，一意孤行，製造冤假錯案，亡魂逾百餘人之多，而且，……還大言不慚地說：「革命嘛，不是請客吃飯，哪有不死人的？」

應該說，這是擁有三十多萬人口的平定縣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悲劇……。

其實階級鬥爭和暴力就是典型的文革思維。「一打三反」是一場政治兼經濟的運動，「一打」是震懾，因為「反革命」並沒有一個法律上的界限，除了那些每次運動必打擊的「老運動員」之外，凡是對新的權力機構的指令不絕對服從的，皆可稱之為「反革命」，馬上清理，「立即取締，予以制裁」（毛澤東語）。而後面三樣，都是經濟方面的。這大概是對「文革」過程中對國有或集體財產混水摸魚發運動財者的懲罰。革命委員會是經過三年大動盪後在中央指令下建立起來的正式的權力機構，如果沒有權威，不能令行禁止，將會再度陷入動盪。這個運動，或許也是自上而下樹立權威的步驟，是在鞏固革命成果。「清隊」和「一打三反」兩個運動混和在一起，成為「文化大革命」惡之花的繼續開放。

下面我們繼續介紹一些典型案例。原「紅總站」骨幹、上面提到的化肥廠職工牛增福回憶說：

1969年7月，「七·三」、「七·二三」布告下來以後，為響應上面號召，兵團就請紅總站的人回來搞大聯合，紅總站回來以後，以讓上學習班為名，好多人都受到批判，我就給打成反革命了。我、張長路和李乃修是批判對象。剛開始我是重點，後頭李乃修因為在檢查裡寫了一個「牛增福同志」，就成了批判的重點，說法是牛增福是現行反革命不能稱同志，這樣叫不對，後頭還開除了他的公職。這裡頭還有個笑話：一次開會，軍代表說「打倒反革命分子牛某某」，我就和身邊的一個小女青年說：「你聽是打倒你了啊」，那女的就說「老牛明明是你麼，怎麼就是我了？」，我說「我是牛公公，你才是牛母母呢」。

我回來平定後就被抓了，送回家後有兩個解放軍看著我，他們勸我簽

大聯合的字，我沒簽，跑到親戚家住了幾天。後來回了廠裡就受罪了，批判了我七天。當時兵團的頭是劉玉榮，他批鬥我有幾個罪，一個是罵工人、罷工；另一個是搶汽車。搶汽車是這麼回事：當時撤到昔陽沒車，我就找人從工業交通局開出車來，這個事交通局的局長吳運載知道。用完車後車也是給的吳運載，根本就是借著用了一下。因為這些事情調查了我四十多天，沒有事實，後來就放了我，不過還經常批鬥我。當時的軍代表李子傑經常弄我。咱們化工車間大部分都是紅總站，兵團才十來個人，所以我也不在乎他們弄我，咱還是該幹甚就幹甚。

牛增福先生是比較能夠從容對付這些暴風驟雨的，或許他的幽默的態度是其致勝的法寶。我們在訪談他的時候，他已經半身不遂，但是仍然持很樂觀的態度，並給我們展示了他後來在工廠的諸多發明創造。他繼續介紹批鬥他的情況：

比如有一次，他們批我說我把化肥廠弄得天翻地覆慨而慷，我就開始笑，臺上臺下就笑成了一片。我總共受了六年的罪，期間換了好幾個工作，先是在焊工組，後頭到了翻沙車間，做過鐵器模型，學會開化鐵爐，以後又開了兩年化鐵爐，這就到了 72 年了。這六年下來我還沒摘帽，就給評了個平定的勞動模範。這個時候李子傑走了，換成手管局的王吉祥，我不敢見他怕有什麼亂七八糟的事，其實四清的時候我們就認識了，我覺得當工人就挺好。從昔陽回廠以後我又從車工幹起，幹過車間主任和生產科長，這都是王吉祥給我弄的。還管過一段時間發獎金的事。我當生產科長的時候全廠一個月大檢修一次，只要我在就天天看看哪有問題，每天都是黑夜一兩點才回家。後來從昔陽派來幹部，總站這頭才算又出了頭。這就是我文革期間的經歷。

牛增福的觀察，和趙成秀一樣，也點出了派性的問題。的確，兩派的鬥爭在階級鬥爭的旗幟下、在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的堂而皇之的口號下，仍然在進行著。而且還會繼續。原總站的人後來掌權之後，會反過來再整原兵團的人。這就是牛增福所說的，「總站」「又出了頭」。當然，從受害者群體的特點來看，清隊和一打三反的危害已經遠遠超過了派性的範圍。我們在後面會繼續敘述。

郭旭明（原縣委書記郭存華之子）當時也受到了衝擊。他回憶說：

文化革命一開始，我是當然的紅小兵。而後開始鬥當權派，當時我怕惹麻煩，根本沒有參與派性，一心搞生產。一打三反時軍代表來找我，要我好好揭發父親的問題，劃清界限。但是被揪出來鬥。最後由於我父親站出來了，他們沒奈何，但我又不想認錯，所以就讓我種地、拉大糞、當建築工人、和泥、搬磚，一直幹了三年，直到林彪垮臺，才讓我重回電工組。1971年九三事件林彪垮臺死掉，我才算作革命群眾，領導才開始重視我。

一打三反開始，我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原因是我說了兩句話，一句是「下定決心找對象，排除萬難還饑荒〔平定話：債務〕」，第二句是叫毛主席為「老毛」。1970年準備批鬥我了。我父親被解放出來成為革命幹部，原因是後來經審查父親不是地主富農，而是中農，同時父親已與家裡決裂，因此對我的批鬥就不了了之了。

可見那個時候，一句話就可以讓你成為反革命。即使和派性關聯不大。郭旭明繼續說：

反革命集團包括牛增福、翟連升、鄭茅生和我。化肥廠的供銷科長張

延慶會變魔術，在一次職工聯歡會上，因為變出了一個毛主席像章，被當場定成反革命，原因是「毛主席千年才出一個，怎麼能變出來？」翟連升研究「推背圖」，預算毛主席還能再當幾年主席而被打成反革命。他是化肥廠紅總站的副主任。

這些人的階級鬥爭觀念仍然非常之強。給人的罪名也非常荒唐。據縣革委會位常委王來金回憶：

革委會主任左治貞不執行省裡關於對等掌權的指示，堅持「支一派壓一派」的政策，認為我是鑽進政權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在這次運動中，全縣各單位批判鬥爭整死不少人，如七一廠的李振家非正常死亡，糖酒公司「逢元號」會計潘子奇的死，荊守財被嚇死等。在西關黨校辦學習班時，原縣計委主任因一句順口溜被批鬥而自殺。事情原委是他去陽泉喝了一碗三鮮湯，回來說「三鮮三鮮害人不淺，一碗三鮮夠我三天」。縣醫院大夫姜永祿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在一完小（現實驗小學）被批鬥致死。還有段××、陳××被鬥致死，醫院書記梁實存非正常死亡等等。文衛系統是這次運動的重災區。

翟治壁對王來金所談到的左治貞是這樣評價的：

左治貞有手腕，有一手。郭存華在所有縣委書記中是最突出的，下來就是左治貞了。左說要穩定形勢，必須支一派壓一派，但是穩定之後必須端平。

但其實他奉行的就是文革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山西的大形勢，兩派

對立在整個「文革」期間都是比較激烈的。兩派的爭鬥，不僅是群眾之間說不清道不明的糾纏，更有領導層之間的明爭暗鬥。平定的軍方支持一派打壓另一派，使得平定的形勢得到相對的安定。但是這是壓服而不是說服，是罔顧人命的殘酷鬥爭。在「剪不斷，理還亂」的兩派糾纏中，這個「不是辦法的辦法」必然會埋下隱患。但是，中國是個向來沒有和平爭論傳統的國度，從古至今，對不同聲音的處置一以貫之式壓制，以至禁聲，直至殺頭。「文革」中的軍人，包括左治貞，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們的思想和行為，也無可避免地會打上時代的烙印。

《西郊村》一書記載了西郊這個靠近縣城的村落在清隊和「一打三反」運動中的情況：⁶

1969年11月縣革委成立門批改辦公室，全縣開展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運動。當時平定縣造反派中，兵團勢力超越紅總站，從縣至大隊一批紅總站成員被兵團指控有打砸搶行為，是混進無產階級階級隊伍的壞分子，要揪出來批鬥。西郊紅總站成員李桂，被西郊兵團指控為蓄謀已久、欲替岳父報仇（如前所述，其岳父趙守信土改時期，誤被群眾運動鎮壓）。他還藏有手榴彈，妄圖報復西郊群眾。在批鬥大會上，李桂和在日本侵占時期當過漢奸特務的王廷貴一起被揪鬥。

九大會議後，根據毛主席的戰略步署，在全國開展門批改運動，建立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等。時年本村出身富家、在抗日時參軍、後來在中央黨校任教的郝文科戴著「知識分子臭老九」帽子忍辱回鄉「勞改」兩年半。50多歲的郝文科每天擔大糞出入在田間地頭。

在陽泉居住工作的富農子弟李珠，曾當過日本工廠工人把頭的郝在

6 見前引郝志東、郝志剛（著）《西郊村》，第166-169頁。

根，也都被下放回村。趙樞中因在陽泉第一醫院散布「流言蜚語」也被列為右派類人物，清理出醫院領導階層，文革前也被下放回村務農。此時的批判運動對象已擴展為九類分子。九類分子：地主、富農、反動派、壞分子、右派、叛徒、特務、走資派、知識分子臭老九〔這裡的九類分子和前面討論過的九類分子定義稍有不同〕。郝文科當時也作為臭老九身分進行批判。

1969 年冬，祖籍紅土凹村的縣級幹部、紅總站成員翟炳春，在兩派武鬥中被兵團指認有打砸搶罪行，逮捕入獄，實行群眾定案量刑。西郊群眾在大隊革委會領導下，在小學校院內南堂召開群眾大會，對翟炳春進行群眾民主定刑。舉手表決後定有期徒刑 15 年者為多數，定死刑死緩為少數。結果呈報縣委判處有期徒刑 16 年，後也平反。



圖 14-1 平定縣西郊大隊水利工地現場批判會，1971 年

資料來源：李俊瑞提供。



小口頭“一打三反”鬥爭會。 (1971年潘振明提供)

圖 14-2 平定縣小口頭大隊「一打三反」鬥爭會，1971 年

資料來源：李俊瑞《一方水土》，第 137 頁。



北整石現場批斗。

(潘振明提供)

圖 14-3 平定縣北整石大隊現場批鬥會，1971 年

資料來源：李俊瑞提供。

王增榮《糧食工作回顧》記錄了糧食局清隊與一打三反的情況：

糧食局的清隊工作，經過一個多月的深挖細找，共揭出屬於歷史的、現行的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 一、屬於政治歷史、社會關係、家庭成分不清的共十五人。
- 二、屬於貪汙盜竊的七人，其中三人問題明確，性質嚴重。
- 三、入黨手續不清的三人。

在文化革命期間，由於派性造成的問題，有如下幾條：

- 1、對進駐糧食局支左解放軍的態度。
- 2、煽動職工離崗撤走的問題。
- 3、帶走糧票、現金、公章的問題。
- 4、沒有上級批准，放給農村糧食的問題。
- 5、不經開票收款，供給貧代會糧食的問題。

局革委會對這些問題還是非常重視的，通過內查外調，搞清楚了問題，提出來處理辦法。但是，縣裡領導還是不滿意。王增榮說：

縣革委的主要領導，總認為糧食局的問題很大，性質嚴重，沒有揭露透，壞人沒有揪出來。左治貞在幾次彙報會上點名批評說：「平定的五大司令已揪了四個，就是你糧食局那個司令沒有問題？」、「你糧食局帶出那麼多糧票、現金，放了那麼多糧食，沒有壞人？」、「再看看你周圍用的都是什麼人？」還說糧食局是不放心單位。因此，左治貞曾多次參加糧食局的革委常委會、職工大會、小型座談會，親臨指揮。

1970年3月5日，左治貞在糧食局的職工座談會上說：「糧食局原來是個兩派對立比較嚴重的單位，而且力量懸殊很大，所以糧食局的階級鬥

爭蓋子的揭開就比較困難。」他說，「三年來，鬥爭的焦點是個權字。現在都得拋開原來的觀點，不能再鬧派性。九大以後，共產黨員再鬧派性，就要開除黨籍。你們糧食局有沒有派性活動，你們知道。革委會內部要很好注意，如果不注意就要犯孫家溝的錯誤，就會形成一派壓一派（指紅總站派壓了兵團派）。老王（指我），你要自我革命，對社會上的階級鬥爭也要注意。如官道溝糧站，沒有壞人支持，他能鬧到那種程度？特別是你們糧食局兩派的基礎懸殊很大，有人感到壓力大，為什麼？就是因為糧食局的壞人沒有揪出來。……

看來如果不揪幾個出來，糧食局的領導也交不了帳。他們需要想個辦法。王增榮繼續說：

在我們革委的常委中，有人建議，根據現在的形勢，硬頂著也不行。不是說揪鬥對象都要經縣革委批准，我們可以報材料，讓他們批。但一定要實事求是反映情況。常委會同意這個意見，後來就整理了霍有章等三個人的材料。我們常委在通材料的時候，非常認真，原則是：事實必須如實反映，是什麼就寫什麼，不添不去。認識可以提高，上綱上線。記得在材料中關於去測石糧站拿糧票的過程，寫成「更深夜靜，跳牆而入，撬門奪鎖，盜竊糧票」。這樣聽起來，其情節、性質就相當嚴重。對這些詞，我們常委還進行了一番爭論。因為事實並非如此。測石糧站的職工，都是紅總站派，在取糧票前就已取好聯繫。到測石糧站取糧票時，確實是更深夜靜，其目的是怕別人發覺，所以不僅是開門而入，而且還給吃了飯，才把糧票帶走。一詞之差，可能造成嚴重後果。因此，必須加以修改。

這三份材料，報去縣革委一打三反辦公室不久，又把材料退回，批語是：事實不充足，情節不細緻，繼續發動群眾深揭，重新整理材料。過了

一段時間，一打三反辦公室又催要那三個人的材料。因為沒有提出新的事實，只得從認識上加以修改，重新報批。此間，正是四五月份，運動已開展半年有餘。報去的材料，不久又予以批回，批語是：霍有章批准揪鬥，其餘兩人，作為內部矛盾批判對象。同時將前已報去的王正榮、馮存先也批准揪鬥。……

於是，最終還是揪了幾個出來。王增榮又說：

一打三反運動，在繼續引深。特別是在經濟領域中的鬥爭，即貪汙盜竊投機倒把，正在向縱深發展。地革委、縣革委抓的很緊，不斷地召開會議，或者電話會議，督促指導，提出措施。

1970年8月12日，縣革委召開了專案組會議。楊志忠在會上做了報告。他總結了運動所取得的成績和存在問題。當前要堅持四個不停，即：宣傳不停、批判不停、深挖細找不停、抓革命促生產不停。一句話就是抓階級鬥爭不停。……

楊志忠的話是重點，典型的文革思維：抓階級鬥爭不停。但是，誰不抓階級鬥爭誰就得下臺。所以在那個時候，互害模式就已經形成了。王增榮總結他們單位一打三反的處理原則：

8月15日，人武部李計春部長對定案處理中的問題（主要是經濟領域中的案件）做了解答。他說：「大、中、小問題的區別，以斤（糧食）元（現金）尺（布票）為單位，綜合計算（以一斤一尺一元為一號，簡稱號）。五千號以上的為大問題，五千號以下、一千號以上為中問題，一千號以下、三百號以上為小問題。三百以下，屬於經濟上犯錯誤。三百號以

上為貪、投分子。在經濟上，不論數額多少，都必須退賠。各公社、縣級的供銷、商業、工交、手管等單位，一千號以下的由本單位做結論，一千號以上的報縣革委做結論。凡構成貪、投分子的，一律批判從嚴，處理從寬。要求各單位在八月底或九月初，完成定案處理的 70%-85%。……

如前所述，這個運動中還有一位非正常死亡人士叫董偉。關於他的死亡，趙成秀專門撰寫紀念文章。他是陽泉白羊墅轉運站工人，曾於 1965 年 11 月 28 日，和山西省的其他 30 名代表一起，出席了由共青團中央和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全國青年業餘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並受到了周恩來、朱德、彭真、賀龍、葉劍英、楊尚昆等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董偉是平定城裡彰化坡人。1940 年生。三歲時摔傷左腿，從此落下殘疾。7 歲喪母。他在石太線白羊墅轉運站任司磅員，但在下班之餘，常從事一些詩歌、散文、小說創作並發表在晉中和省縣的各種文藝雜誌上面。在文革中，他加入了平定農機廠（廠址在鎮筭）的造反派隊伍，並走向社會，參加了紅總站，為紅總站整理資料，撰寫批判文章。1969 年冬，平定兩派發生武鬥，董偉也隨總站到了昔陽的安坪大隊。趙成秀寫道：

在殘酷的「清隊」和「一打三反」運動中，總站及總站基層組織的主要頭目或被批判，或被鬥爭，或被逮捕，或被迫自殺。董偉，這個文弱而又身有殘疾的青年也被軍管組逮捕，罪名是：一貫看黃色小說，書寫反動文章，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多次偷聽美帝、蘇修、臺灣廣播，並在群眾中宣揚，圖謀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和偉大的共產黨；利用擔任司務會計之職，貪汙農機廠食堂糧票 3251 斤，現金 1301 元；1962 年 2 月，將廠附近的四名幼女猥褻，並在運動中頑抗，死不認罪，對抗運動。

1970年4月15日，董偉被捕，被打，1972年2月初讓家人領回，3月4日被送到醫院後死亡，死得不明不白，年僅33歲。1976年經過董偉父親等家人的多次申訴，終於該年8月接到了中共平定縣委平發〔1976〕186號文件。該文件概述了董偉的簡歷和原定案事實依據，並詳細公布了復查結果和處理意見。意見中說：

一、關於董偉一貫看黃色小說、書寫反動文章一事，原案中沒有有關得力證據，通過復查也沒有找到有關線索和證明，只是在董的自我檢查中寫到：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期間，董在平定紅總站造反司令部資料組時，曾寫過「楊李翻案記」、「追悼戰友張九崗」、「猴子擣月亮」等二十餘篇文章，均屬派性所致，不屬反動文章，應予否定。

二、關於收聽敵臺廣播並宣傳一事，經查，董於一九六二年春天，在平定黑白鐵社工作時，曾和王金元在閒談中說過，董在陽泉讀書時，自己不斷用老師的收音機收聽廣播，有一次聽到播送臺灣一老人跳舞昏倒之事。除此之外，再沒有聽到董說過什麼，也未發現董收聽過敵臺。王偉一次到董的辦公室，見董收聽廣播，但音樂聲調不同，問董，董說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電影插曲，不是敵臺。根據以上證明，同原證的出入很大，應以此次復查為準，因此，此事應予否定。

三、關於董猥亵四名幼女一事，經復查，是在一九六七年春，有本廠附近的呂蘭英、郗文珍、王建華、馮存美等四名幼女，去董的辦公室玩耍，董給過王建華五歲的弟弟幾塊果乾和一分錢讓他們買糖吃，就因此事，引起了風波。當時，就由本廠負責人趙植本、鎖簧大隊書記馮元慶協商，已經解決，並否定了有猥亵幼女之事。但在「一打三反」運動中，由於派性所致，又拾起此事，給董列為定案依據。經此次復查，四個幼女均出證，一致證明董沒有對她們進行猥亵。因此，予以否定。

四、關於董的貪汙問題。董被拘留之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在縣軍管組主持下，就由本廠的會計和其他單位的會計數人，對此貪汙一事進行復查了，對董貪汙的糧票、現金已被否定。在此次復查中，只查明董在一九六九年八月三十一日轉交會計手續時，有 48.08 元確為貪汙，應予認定〔其實有無這筆錢款，董偉已無法為自己辯護〕。除此所定貪汙均已否定。

文件最後說，根據上述復查結果，縣委於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研究決定：董偉一案純屬錯揪、錯鬥、錯拘捕案，應給予徹底平反。董偉的貪汙問題應按一般貪汙錯誤對待，因此，對縣委一九七〇年三月十日的揪鬥批示和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五日的拘留證，要徹底撤銷，並宣布給其恢復政治名譽，對董偉被錯拘留期間的工資問題應全部補發，死後的撫恤處理，要按國家的勞保條例執行。

「清隊」和「一打三反」運動是在經過數年的大動盪之後，政權力量動用權力、以「平定縣革命委員會鬥批改案辦公室」的專門機構用「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進行的一次大整肅。這個運動的重點，不是造反派，而是「隱藏的階級敵人」，即「九種人」（毛澤東：「清理階級隊伍要搞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反革命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⁷）。不過，造反派也同時被整了。這個運動的烈度，不是平定一縣，而是全國皆然。只不過在前段的武鬥中，平定死人並不嚴重，因此，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過程中，才凸顯了平定「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現象。1970 年 5 月，晉中地區革委會轉發了平定縣岩會耐火材料廠革委會《領導帶頭，發動群眾狠抓經濟領域階級鬥爭的做法》的典型材料，這是

7 毛澤東，「在中共九大期間的講話（二）」，1969 年 4 月 11 日。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轉發文件語）在平定的開頭。我們在最後一節會敘述清隊和一打三反的「成果」。顯然，整人越多，成績越大。

兵團以及其他人士被整肅：清理三種人

原總站的人的翻身，是 1975 年昔陽縣的幹部被派到平定來以後。隨著昔陽幹部的到來，就是原兵團的人被清算的時候了。1977 年清理「三種人」運動中（參加二次奪權的人、造反起家的人和打砸搶分子；中央文件提到的「三種人」定義似有不同，時間是 1982 年，顯然平定早已開始了類似的工作），三種人的來源主要是兵團。原總站領袖之一荊履榮回憶說：

73 年喬素祥來平定，紅總站又抬起頭來了。閻扣成是縣長，喬素祥是大寨公社的黨委書記，任副書記。當時的縣委書記沒有來平定。後來李鎮壽就來平定當書記來了。陳永貴是省、地、縣、村的一把手。

74 年上了一批幹部基本上是紅總站的。我在劇團當業務團長，岳吉昌當行政團長，史桂英當團長。

這時縣委在流杯池辦了平定武鬥打死了人的學習班，對兵團的人進行了調查核實，最後有兵團的董福昌、劉懷祿等人被判刑才算了了。

67 年我住了 70 天監獄，給我寫揭發材料的人，我掌了權後，見了我痛哭流涕，表示上了別人的當，我很注意這些人了，要做到寬以待人，我在工作中罵過好多人，但大家都認為我是好心，所以得罪不了人。

派性是害煞人，都認為自己跟毛主席，自己對。別的派的人不是跟毛主席。

.....

（訪談者問：李文元是怎麼回事？）李文元〔原兵團的骨幹〕是說江

青和「四人幫」，和這夥人不一樣，是一個普通人，作為一般群眾，按現行反革命抓了。這時董福昌也被抓了。學大寨的過程中，光明日報上登了〈太行奇冤〉的岳增壽和李文元是一夥。他們的上邊是郭巧文，郭巧文是兵團的，但這個人說一不二，非常幹練，心直口快，為人很好，說能辦，就能幹的女性。先在平定縣委當宣傳部長，後到陽泉市婦女聯合會當主席。現在退休了，為人非常好。

李鎖壽是陳永貴的好學生，所以派他到平定當縣委書記，上面有人，陳永貴從北京回來，路過平定，總要打個電話，所以沒有人敢反對。李鎖壽不要說民主作風，就是沾了霸道的光，李鎖壽是正兒八勁的農民，幹事情可以，要論文化理論水準不行。

由於在「文革」前期陳永貴支持山西「紅總站」，所以，兵團派通常被指責為反大寨，儘管他們自己從來不承認。總站和陳永貴連在一起，所以反總站就是反陳永貴，反陳永貴就是反大寨了。這也是典型的文革思維。我們下面幾個例子談到，即使是說昔陽的閒話，也屬於反大寨行列，要受到處罰。不過對兵團派的處理，主要是涉及到三個（包括一位被流彈打死的河北人楊勇志）死人案件的問題。處理最為嚴厲的是對「兵團」的派首領的處理。時任「兵團」派政委的劉懷祿談了兵團頭頭被判刑的情況：

咱平定武鬥死了兩個人，一個叫李成柱，另一個叫張九崗，都是紅總站的人。李成柱那會也算一個領導，支持學大寨，支持陳永貴。紅總站退到昔陽後，他也去了昔陽，就在昔陽住，後來有一次悄悄回來了，讓人發現以後被抓住送到縣委大院，在縣委大院給打死了。張九崗聽說是一次路過手管局，挨了打了，不過到底打沒我也不清楚，完了人就死了。就因為

這，1975 年「一打三反，整頓文革以來問題，清理三種人」的時候我就倒了霉了，誰打死的我不知道，就知道是讓兵團的人給打死了，找不到具體的人，就是負責人受過了。當時兵團主要的頭頭是董福昌和李田柱，他們一個是司令一個是總指揮。我是政委，可是我參加活動也就是跟上去，不起什麼大作用。清理整頓的時候就因為這，董福昌判了 20 年，李田柱判了 10 年，我判了 15 年，後頭改成董福昌 7 年，我 5 年，李田柱免除處分，最後 1980 年才給落實的政策。

平定中學「紅指」的首領潘佩經，在 1972 以及在 1977 年「清理三種人」中受到了清查。但是顯然他是輕鬆過關的。他回憶道：

因為三條人命的事，1972 年李計春在南關流杯池主持清查，兵團被叫去了六七個人，我、劉振傑、岳智明、李建智、高二頭、竇永年等幾個都去了，不過最後也沒查出來，住了 19 天，伙食不錯，中間岳智明還悄悄跑回家給我們拿了點紅薯和辣椒。

我〔後來〕分配到了高壓電器廠，領導很重用我，不到一年就成為團支部書記兼民兵連長。1977 年清理三種人的時候我就被放倒了。當時廠裡通知我到人事局 304 房間有事，到那才看見掛著清理三種人辦公室的牌子，姓李的一個女的是記錄，馬易茗是主審。「清理三種人」的三種人是：參加二次奪權的人、造反起家的人和打砸搶分子。具體到咱們平定，就是參與三·二八奪權、戲院武鬥、馬車社武鬥以及和三條命案有關的人。

姓李的女的和我說「清理三種人實際是想寫縣史」，還說「知道要言無不盡，不知道的不要胡說」。她問我「你在學校是什麼角色」，我說「我是總指揮」。她問「那一派呢」，我說「董鋼」。第一次問話就說了個這，說還要再找我談話，可是也沒再找我。到最後，平定也沒定出三種人來或

者是和三種人錯誤有聯繫的人。後來單位裡清理反大寨反陳永貴的黑窩，一個姓謝的和楊貴美成為批判對象，讓他們揭發我。還有一張大字報是「請鄭忠華一答」，弄到最後結論沒給我定。反正有運動就找潘佩經。

在郵電局工作的董銀明丟了工作，不過後來又給他平反了。他回憶說：

1975 年左右，我曾被隔離審查。當時我正在局裡上班，公安局的張耀文晚上叫我去談話，我被直接帶到公安局，進去他們就變了臉，問我武鬥時死的那幾個人（張九崗、李成柱和一個河北人）是不是我殺的。我想咱就沒有幹過呀，我就死活不承認。他們就把我帶到一個家裡，由兩個人看著我，對我進行隔離審查。後頭查出來確實和我沒關係才放了我。

接著到了 1976 年，那會我到了工代會上班，其實就是掛了個名，我還是在原單位工作。當時的郵電局是條條管理，高子清是書記。紅總站掌權後就把高子清弄到二輕局了，又派來個書記，我也受到排擠，要調我去鎮簧。當時我老婆也在局裡工作，是話務員，我二小子才一歲多一點，我走了的話，家裡就很困難了，我就和領導解釋說等孩子大點再走行不行。領導根本不聽我說啥，我生了氣了，就說「開除了我我也不去」。

1976 年 12 月 12 日，我就被正式開除了，其實他們就是借這個機會整人了。12 月 16 日，在縣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宣布開除我和劉玉榮的公職，開除了又讓人家審查了我三個月。1979 年平反以後才又回了郵電局。

公允地說，「文革」期間，不是「兵團」一派單方面的地搞武鬥，也不是「兵團」一派就沒有人被對立派打傷。但是，因為總站打人但沒有打死人，所以「紅總站」一派的首領們基本上沒有受過處罰。派性的陰影，

在「文革」後期的各種運動中，還是不時地閃現著的。與此同時，一些在「文革」中參加「紅總站」派而現在又處於一定職位上的人們，利用中央搞治理整頓的機會，不失時機地對「兵團」派搞起了整肅。

朱存業，縣委機關幹部，「文革」中是「兵團」一派的。他是在「文革」運動中動口不動手的人，也不是造反奪權的領軍人物。他談論自己因為對昔陽縣有微詞而被批鬥並被留黨察看的經歷：

1975年，縣裡決定對我留黨查看一年，具體過程是：一天晚上要在戲院開大會，我預感不好，覺得要受處分。結果在會議中有18個受處分，其中有一個在平定工作的昔陽人叫田良，他因不小心說了昔陽的閒話，被說成是昔陽的叛徒，受到重處，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還有一個叫翟國昌，被逮捕進了監獄。還有一個校長叫張守禮，留黨查看兩年。1977年，在宣布對我的處分之前，有一次要求我在千人大會上做檢討，在檢討過程中群眾自發地給我鼓掌七次，一個昔陽的領導都感到吃驚。群眾給我鼓掌，是因為我說了「昔陽群眾很辛苦，三毛錢一碗片片湯」、「昔陽產量沒那麼高，虛報產量」。這些話也是我後來被處分的重要原因。我受到處分之後，被分配到離娘子關三十里外的一個偏僻之地，到處都是山，在那裡待了一年，當地的群眾對我很好，覺得我是一個好人，不歧視我，很崇敬我，所以我沒有參加勞動改造，沒有受罪。

同樣是「兵團」一派的張啟傑，也因為說了大寨的閒話而受到了隔離審查的情況，有點像現在的「雙規」，之後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他說：

革委會對武鬥的事件進行了清查處理，兵團的領導被隔離審查，紅總

站掌了權。當時我是商業局革委會的副主任。商業局與平定縣聯社合併之後，我是政工組組長，我認為這次清查處理是排除異己。第一批審查和第二批審查都沒有我，因我當時正在下鄉，我成為革委會副主任後就一直在下鄉，幾乎沒有回過單位，四年下了四個地方。

1975年，平定縣商業局與縣社合併後，整頓商業局的領導班子就成立了，組長是張世春，副組長是苗源。我從鄉下回來，整頓工作組開會給了我一份文件，第二天就讓我檢查：「老張，你檢查吧。」我說：「局長、副局長都還沒檢查，為何讓我先檢查呢？」最後我說：「檢查不寫，會議也不參加，你說什麼就什麼吧」。讓我寫檢查是兩個原因：一是有一年去參觀大寨，我說今年的莊稼長得不如去年。這就是一條反大寨罪。

二是有一回，插隊青年都回城了，只有一個女青年沒走成，我就給這個女青年辦了手續離開了，這個問題我在會議上提過，但沒有形成決議，後來就把這事歸到我頭上，說都是我的錯。

還有一次，盧生玉讓我乘車回家，卻把車直接開到了法院，某領導說：「給老張打盆水洗洗臉，再給老張安排個房間」。晚上我剛睡下，有人叫我說：「老張，辦公室叫你有事」。我就跟那個人上了二樓，那天停電，到了二樓那個房間一看，有好幾十個人，可是沒有座位了，只有屋子中間一把椅子，然後楊子玉、□孝知兩主持人問「你知道不知道為什麼讓你來？」我說「不知道」。他們又問「真不知道？」我說「不知道，沒人告訴我。」他們說「這回便宜你了。」我說「為什麼說便宜我了，給我解釋清楚。」他們說「平定縣縣委決定對張啟傑進行隔離審查。」之後四五天沒理我，後又對我隔離審查了四十天，我沒簽字也沒蓋章，他們就放我回家了。之後讓我待分配，最後讓我到畜牧辦公室養豬，我就成了張莊、陽勝、古貝、鎖簧四個公社的養豬員。

1975年，公安局局長劉子義電話通知我，讓我第二天回去，他們要宣布對我的處分決定，結果是撤銷黨內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之後讓我到

工農兵旅店做登記，1977 年到人民旅店。到現在對我的處分也沒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在周恩來逝世和「四五運動」爆發這一段時間裡，平定人民受外界影響，自發悼念周恩來，曾在平定劇院設起靈堂，群眾自發進入悼念。平定文化館的李俊瑞是專業攝影的，他悄悄翻拍了報紙上的周恩來遺照，私下送給與他相互信任的人。平定師範的師生在中操場設起靈堂，由於沒有大幅周恩來遺照，便把學校保存的舊彩旗上的周恩來炭描畫像用作遺照。這個運動，早已跳出派性運動的窠臼，成為了人民反對專治、要求安定的訴求運動，但是，在平定，它仍然是派性報復的理由。

岳智明因談及此事，受到追查。他撰文回憶了這段經歷：

1969 年到 1970 年四五月份昔陽的幹部派往平定，來了之後就換了領導幹部，成立了以昔陽幹部為領導的核心小組，閻扣成是組長，組成新的革委會，整個山西都是昔陽幹部。

1976 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後，7 月份，平定縣「專政委員會」的王茂樹到我所在的運輸社找我，讓我交代「傳政治謠言和奇談怪論」的事，他說有人揭發你了。這事的原委是：我在家裡時，有一天，有幾個化肥廠的工人在我院裡抽水，我說了句「天安門事件，鄧小平的黨籍沒開除，可能是此人將來還要用」，我還說了「天安門悼念周總理的花圈像海一樣，還有使用鐵做的十幾米的花圈」。就因為這些話被揭發了，追問我是聽誰說的，我說是下班路上聽兩個騎車的說的。就因為這，我被審查一個月，說我是奇談怪論，是右傾翻案風的言論。我當時是馬車社的趕車人。單位十幾個人圍著我一個人，批了一個多月，拍桌子瞪眼睛，還拿送我去公安局戴手銬腳鐐嚇唬我。最後他們的定論是奇談怪論，逼我寫了經過和不再

傳播的保證書。

這樣的有意識或者無意識的派性爭鬥，還在以結合當時政治形勢的方式延續著。

在 1976 年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曾經有一個普通農民因言被迫查，迫於壓力而自殺，他叫王振興。王振興是城關公社城裡大隊的社員，原為教師，因「右派」言行而被剝奪公職返鄉務農。1976 年，周恩來總理去世與隨後爆發的「四五」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群眾示威運動波及平定一帶。在陽泉市中心的天橋新華書店牆壁上，曾經張貼過悼念周總理詩文的大字報。王振興也在私下議論過發生在北京的這些事。

當時任城裡大隊黨支部書記的張成身回憶說：

那時候，任光（原一完小教員）在一完小（現實驗小學）辦公室工作，王振興給大隊搞「九二〇」菌肥實驗，實驗室就設在一完小。任光和王振興是熟人，因此，任光常到王振興那兒去閒談，閒談中就說到悼念周恩來的事。有一天，岳步義（時任城關公社黨委書記）、苗源（時任副書記）和張躍文（時任公安局城關派出所所長）三人叫了王振興去談話，是後晌叫的，叫的時候也沒有通知大隊。談完話後，王振興回家吃了一點飯，吃的不多。吃了晚飯，在街門口抽了一會兒煙，丟下許多煙頭。第二天叫王振興再談話時，尋不著了。四隊隊長任成喜到達連坡（城南一地名）尋找，在達連坡水池發現王振興的屍體。我和趙秀、梁元生（二人同是大隊黨支部委員）去撈的，張躍文也去了。我趴在池邊，把他撈上來的。

王振興的妻子趙桂蘭回憶說：

王振興是 1976 年 4 月 14 日死的，他當過「右派」，後來摘了帽了。王振興沒去過北京，也沒有抄過天安門的詩（指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的詩文，當時在民間地下流傳甚廣），他只是和人說過鄧小平為什麼又下臺了的事（指鄧小平在「文革」後期復出搞整頓，「四人幫」搞「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鄧小平被撤銷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留黨查看一事）。王振興是 1979 年平的反。那年開三幹會，有人在戲院門口貼了大字報，問王振興的事為什麼不平反。那天黑夜，我和朱新田（趙的後夫）寫了一張大字報，給王振興喊冤。朱新田說：「我寫，大不了我再住一回法院」。貼出來以後，公安局就叫我去談話，說給王振興平反。

看來人真的是很脆弱。而那些致人於死地的人，卻沒有承擔任何責任。下一節我們討論平定在清隊與一打三反運動前後的案件統計以及平反的問題，但是無論如何平反，死去的那些人們已經不能復生，發生在人們身上的苦難也無法去除。

平定縣清隊與一打三反的所謂「戰果」與平反、落實政策

從下面的表 14-1 中我們可以看到，1974 年平定縣的清隊和一打三反運動共揪出現行反革命 254 名，叛徒 57 名，特務 36 名，地主 2 名，富農 6 名，壞分子 84 名，右派 9 名，歷史反革命 226 名，有嚴重歷史問題的 1680 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分子 758 名，共 3112 人，被揪鬥者為 352 名（包括縣社兩級）。我們從表 14-2 中可以看到，從 1966 年下半年到 1974 年，全縣非正常死亡人數為 70 人，其中在清隊和一打三反是就死亡 59 人。表 14-3 中可以看到主要死亡原因為被刑訊逼供與害怕之後自殺。如前所述，實際死亡人數並不清楚，根據原革委會副主任王來金的說法，是超過 150 人的。

表 14-1 1974 年統計的平定縣清隊、一打三反運動案件統計及 1980 年被平反人數

罪名	被定罪人數	被揪鬥人數	被遣返會農村 (身分不詳)
現行反革命	254	153	109 戶
叛徒	57	24	
特務	36	8	
地主	2		
富農	6	3	
壞分子	84	48	
右派	9	2	
歷史反革命	226	74	
有嚴重歷史問題的	1680		
貪汙盜竊投機倒把者	758	30	
走資派		5	
漏劃地富		5	
合計	3112	352	320 (人)

資料來源：平定縣檔案館藏「平定縣清隊、一打三反運動中案情情況統計表（一）、（二），1974 年 4 月 10 日。」

表 14-2 1966 年下半年以來非正常死亡人員情況統計

時期	清隊	一打三反	整黨	其他	總數
人數	21	38	3	8	70

資料來源：平定縣檔案館藏，中共山西省委政策落實領導小組辦公室製，平定縣「一九六六年年下半年以來非正常死亡人員處理情況統計表」。

表 14-3 1966 年下半年以來非正常死亡人員死亡原因

死亡原因	畏罪自殺	刑訊逼供自殺	對政策不理解自殺	抓打死致死	總數
人數	1	10	53	6	70

資料來源：與表 14-2 來源相同。

上列表格均為檔案館藏的原表。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幾個主要案件的受害人及其正在處理的情況。其中包括我們在前面敘述過的在武鬥中死亡的三人。當然，當時給這些人的定性有的也是有待重新檢驗的，比如何謂「嚴重政治錯誤」，何謂「畏罪自殺」，等等。但是因為是 1975 年，文革還未結束，所以能夠承認這些人死亡的事實，討回哪怕是一點點公道，或許就是進步了。許多案子 1980 年經過了重新審理，並獲得平反。比如我們之前講過的董偉，主要事實後來都已推翻。從表格裡所列的罪行來看，基本上都是捕風捉影，或者小題大作的問題。有好幾個是所謂的「偷聽敵臺」，還有「反標」（反動標語）問題，通常都是小題大作。

表 14-4 重大案件處理人員花名登記表

中國共產黨平定縣委員會政策落實領導小組（章）1975 年 4 月 8 日

姓名	性別	原在單位及職務	案情摘錄	受何處分	復查結果
張九崗	男	平定城關鎮領導幹部	1969 年 1 月 29 日從街上被抓走打死的。	未定	還沒有復查結果；判 3 人
李辰〔成〕珠	男	平定城關供銷社職工	1969 年 4 月 21 日被抓走打死的。	未定	還沒有復查結果；雙開 1 人，開職 1 人
楊勇志	男	石家莊市色顏廠供銷科幹部	1969 年 6 月乘車在平定被開槍打死的。	未定	還沒有復查結果；判 2 人；出口 1 人
費千集	男	槐樹鋪公社古驛鋪大隊	70 年清隊學習班中刑訊逼供致死	未定	還沒有復查結果；判 1 口口
潘子琪	男	平定糖業煙酒公司職工	70 年在批鬥當中打死的。	畏罪自殺	批鬥打死雙開 口口口口口口
李振家	男	平定手管局車輛社工人	70 年 4 月 4 日被批鬥後死亡。	嚴重政治錯誤；自殺	還沒有復查結果；口口口口
董偉	男	平定鎮簧農機廠工人	70 年 4 月 15 日一打三反中因貪污被捕，72 年 2 月 24 日保外就醫死亡。	未定	還沒有復查結果

姓名	性別	原在單位及職務	案情摘錄	受何處分	復查結果
程致新	男	平定商業局生產資料公司幹部	70 年因破壞集團案被捕，後保外就醫死亡。	判刑 12 年	按廠、隊因用電問題引起民事糾紛。 平反程福祿 4 人口口
董如貴 (?)	男	平定巨城公社會裡大隊	68 年 9 月 30 日揪鬥中重刑致死。	未定	還沒有復查結果； 留黨 1 人
馮文秀	男	平定文革煤礦工人	70 年 3 月因其子反標案與其夫婦談話後，當晚夫婦自殺。	未定	還沒有復查結果； 平反
李乃馨	男	平定維社公社裡社大隊教師	攻擊領袖、黨。偷聽敵臺散布戰爭恐怖。	未定	還沒有復查結果； 糾正
馮富貴	男	平定鎮黃農機廠工人	煽動工人鬧事，偷聽敵臺，搶走機要，包庇壞人。	戴現反帽	還沒有復查結果； 平反
霍占魁	男	平定縣革委生產組勞辦	依口職權違法亂紀，流氓腐化。	未定	未查； 戴帽分子、雙開
趙德庫	男	平定鎮黃公社立壁大隊	叛黨投敵。	叛徒	不定叛徒； 恢復黨籍、平反
張侃	男	平定維社公社裡社大隊	收聽敵臺。	現反 判刑 15 年	還沒有結果； □正
岳海貴	男	平定維社公社裡社大隊	破壞電動機、寫反標、偷聽敵臺。	現反 判刑 15 年	有一問題未查清， 先釋放待查； □正
翟炳春	男	平定維社公社幹部	毆打本公社教師。	現反 判刑 15 年	犯一般派性錯誤， 錯定錯判； 平口
潘枯田	男	平定維社公社西溝大隊	破壞生產，運動中散布反動言論。	留黨察看 二年	批評教口、□口； 糾正
耿富義	男	平定石門口公社橋頭大隊	廣播敵臺。	現反 判刑 12 年	未復查完； 平反
丁道金	男	平定城關公社城關大隊	放炮、破壞。	現反 判刑 10 年	未復查完； 前口

資料來源：平定縣檔案館藏同名檔。

上面只是其中一些名字。1975年3月，平定縣對「文革」前中受到衝擊和批判的人實施復查處理。到同年11月，一批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平反：有的全糾，有的有所保留。這批人大多集中在文教衛生系統。據不完全統計，這些人是：商性齋（平定中學）、張德光（平定師範）、李鵬（平定中學）、荊域（平定中學）、楊乙榮（平定中學）、陳元才（平定中學）、申興兆（平定師範）、劉子騏（平定師範）、俎民傑（平定師範）、吳覺民（平定師範）、關一之（平定師範）、劉德昌（醫院）、趙昌言（電影管理站）、段巧娥（平定醫院）、陳增清（平定師範）、王傑（裡社學校教師）、張維潔（維社中學教師）、李銘新（馮家峪學校教師）、黃永海（馬上固學校教師）、王晟（北三大隊教師）、張世複（甘井學校教師）、方甫（平中職工）、陳全卿（平定醫院）、張增榮（南坳衛生院）、石仁保（娘子關賢溝教師）、張榮（西峪學校教師）、程受樂（鎖簧中學教師）、史文華（平師附小教師）、王振（醫務工作者）、白愚生（鎖簧學校教師）、孫壽（平中職工）、楊學蘇（東回衛生所）、郗永忠（羅家峪學校教師）、王耀珠（岔口學校教師）、王建華（黃統嶺供銷社）、楊擢甲（東莊學校教師）、耿慈（馬山供銷社）、范俊秀（木槽學校教師）、王登幫（文教局）、李長讓（龍莊醫生）、薛葆坤（平中退休教師）、裴智世（土嶺頭學校教師）、陶予（平定中學）、苗英（教師）、張毓文（教師）、劉培富（鎖簧小學職工）、王志昌（新村教師）、蔡二海（張莊廣播站）、張繼良（鎖簧中學教師）、光侗（教師，縣人民代表、人委委員，縣政協常委、副主任）、石炳德（冶西教師）、朱德志（城關衛生院醫生）、光僖（平定醫院醫生）。

由於這一時期縣領導機構還沒有完全走上規範，很多部門還處於停頓或沒有設立的境況，所以，這一時期的檔案資料很少。我們找到一個1976年的「平反」文件。是平定縣委政策落實領導組對前面提到的平定醫院姜永祿醫生被批為反革命分子後自殺的鑒定公函：

[76] 平落函字第 17 號

北京市德勝門外公安學校政治處：

關於你校職工姜鳳×同志來信，問訊其哥哥姜永錄〔祿〕同志自殺的復查處理結果，現將我縣縣委落實結果告知你處，請轉告本人。

姜永錄，男，係山東省黃縣姜家村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學生，一九六一年畢業於山西醫學院，同年九月十六日到平定人民醫院任外科醫師。在清隊運動中，於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八日經縣門批改辦公室批准，對該姜按現反揪鬥，同年三月三十日該姜上吊自殺死亡，死年三十六歲。

1976 年 3 月 9 日經縣委研究決定：該姜原以現行反革命分子揪鬥，又以現行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按人民內部矛盾定性，經過此次復查認定，原定書寫反革命標語和畫反革命漫畫，只有群眾反映，沒有原始物證，經分析研究，該在亂寫亂畫中發現有「社會統治著我的靈魂」一句，根據當時的時代背景，加之出身剝削階級家庭，係思想認識問題，說了錯話，不屬反動口號，對畫反動漫畫一事，認為該姜平時就好胡寫亂畫，因無原始物證不能認定為反動漫畫。運動中按現反揪鬥和定性是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應予平反。撤銷一打三反辦公室於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八日對該姜按現反揪鬥的批示和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七日縣革委黨的核心小組的處理決定。經查死因，該姜確係在批判郭從真醫療事故而聯繫其醫療事故，加之運動有擴大化錯誤影響對其有壓力，思想一時糊塗而上吊自殺。應該做家屬善後工作。除該死後一切按幹部待遇外對其所遺子女應按勞保條例執行。

平定縣委政策落實領導組（章）

一九七六年七月廿四日

從該公函中我們可以看到，儘管平定縣政策落實領導組給姜醫生平反，但是沒有承認構陷姜醫生的責任，反而認為姜醫生說「社會統治著我的靈魂」是對社會不滿，而且平時還好胡寫亂畫，似乎在說姜醫生自己也有責任，是一時糊塗上吊自殺。看不到官方有什麼同情與懺悔。當然這也是和大社會本身對生命的蔑視分不開的。

1979年10月至1980年9月，中共平定縣委對文教系統、行政人員、財貿系統進行人事政策落實，一批在「文革」中受到衝擊和批判的人得到再次復查處理或政策落實。據不完全統計，除前述一批教師、醫生等得到徹底平反外，一批更大範圍的受衝擊者得到平反。據不完全的統計，他們有：謝濟民、陳友彬、朱存業、張繼良、黃永海、李永澤、趙昌言、石仁保、李長讓、苗英、申興兆、楊擢甲、李乃馨、高建忠、朱玉新、何崇峻、史文華、王學良、李成巨、岳增壽、李恕、翟治亭、陳培苗、陸文蔚、高海亮、梁錦銘、郭守仁、石萱田、酒召泉、張守禮、翟國昌、田良、王建平、張士錄、楊培基、馮富貴、劉德義、王守家等三人、郭巧文、石敦章、王貞、魏德卿、董福昌、劉懷祿、李田柱、竇銳、耿東才、王子貞、李守珍、霍保榮、潘鄉田、潘新、耿慶忠、呂新、李夢悟、宋忠錄，其中數人經二次以上復查結論。

據《中國共產黨平定縣歷史紀事》記載：1979年1月，在揭批「四人幫」運動中，縣委狠抓了落實政策的工作，對「文化大革命」中的4136個案件全部進行了復查，全錯的全糾，部分錯的部分糾；對第一次「全農會」後的105個案件也進行了認真的復查，糾正了錯案。

《中國共產黨平定縣歷史紀事》記述道：⁸

8 前引《中國共產黨平定縣歷史紀事》，第217頁。

(1971年)12月18日，縣革委「一打三反」辦公室總結了本縣一年來的「一打三反」運動。截止年底，全縣共清理出「九種人」646人，有經濟問題的(300元以上)754人；清出貪汙盜竊、投機倒把總值達622,658元，鋪張浪費總值2,047,395元，糧食糧票346,561斤、布證33,046尺，黃金11兩，白銀115塊，大煙土1兩等。通過貫徹落實全國、全省、地區及本縣公安會議精神，貫徹執行省委「四·二七」指示意見，本縣的城關清隊、財貿戰線和文教戰線的「一打三反」進一步發展。城關黨委認真學習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基本路線，開展廣泛深入的「四大」運動；財貿戰線堅持三會即路線分析會、戰地整風會、鬥私批修會，大大提高了廣大幹部職工和專案工作人員的路線鬥爭覺悟，增強了搞好「一打三反」運動的堅定信心。

(1972年)10月26日，縣「一打三反」案件復查領導組成立，開始對全縣在「一打三反」運動中提出的案件進行復查，共立案1,182個，處理951個，落實經濟總值52萬元，經濟賠償總值37萬元；在案處理956人，依法懲處13人，戴帽監督改造60人，其餘883人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糾正錯案15個。

這個時期，局勢逐漸穩定下來。由於「文革」造成的經濟停滯，現在經濟工作被提上了議事日程。而農業的經濟工作，便以「農業學大寨」的運動形式重新被提起。

1980年左右，按照上級部署，平定縣又設立了「落實政策辦公室」(「落辦」)。下面是「落辦」的一份統計資料。該資料顯示了在歷次運動中發生的案件已經甄別、落實、平反或者維持原判的情況：

一、文化大革命四大運動中定處的案件。全縣共立案4,136件。在復

查中，除對原未處案 3,120 件做了銷案處理外，對原定處的 1,016 件都認真進行了復查。通過復查，平反 333 件，部分糾正 373 件，維持原結論 410 件。共糾正冤、錯案件 606 件，占復查總數的 59.6%。運動中被開除公職的幹部、職工 59 人，收回工作的 54 人，占總數的 91.5%。文革初期被以「黑五類」趕遷的對象 109 人，隨遷家屬 211 人，均按政策做了妥善安置。

在一打三反中發生的案件約四分之三都做了銷案處理。糾正冤假錯案達約 60%。其實那些沒有糾正的案件是否還有冤枉的情事則不得而知。

二、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案件。共立案 95 件（其中抓打致死 9 件，自殺 86 件）。經復查對其死亡人員的結論全部進行了修改。有 30 人按不幸去世結論。55 人按正常死亡結論。有 1 人按敵性畏罪自殺結論。對其中 41 名喪失主要勞力、生活困難的農村社員的遺屬，在經濟上給予了適應（當）補償。

這裡的統計數字比上面的表 14-2 關於 1966 年下半年到 1974 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要多，那裡是 70 人。或許這 95 人包括了 1966 年上半年和 1974 年到 1980 年的死亡人數。

三、四清運動案件。全縣共立案定處 395 件（其中受到各種處分的 124 件）。通過復查平反糾正 75 件，占總數的 19.9%。部分糾正的 41 件，占總數的 8.8%。維持原案的 279 件，占總數的 71.3%。在平反糾正的冤、錯案件中，恢復黨籍的 4 人，尚待收回工作的 7 人，改判處理的 5 人。

四、文革以來判處的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共判處各種刑事案件 234

件，262 人。全部進行了復查。經過復查，改判 70 件，77 人，占到原判案件總數的 30%，占原判總人數的 29.4%。其中，現行反革命案件 49 件，53 人。改判了 46 件，50 人，占到現反案件總數的 94%，人數的 94%。文革以來，公安機關處理的政治案 30 件，全部進行了復查，平反糾正 19 案，占案件總數的 63.3%。部分糾正 11 件，占案件總數的 32.7%。

五、錯劃右派報導改正和安置工作。全縣原劃右派 40 名，復查後，改正 39 名，摘帽 1 名。在反右運動中因受右派問題牽連按其他問題處理的 20 名，改正 14 名。復查改正後，除去在職人員外，對勝任工作的 18 人（包括外地轉回的 4 人）都分配了適當工作。這（還）有 5 人正待安排。（外地安排 3 人，剩劉印華未安排，給□□□□）

從行文來看，原來全縣所劃的 40 名右派，只有一人沒有被改正，儘管被摘帽。這似乎要證明鄧小平所定調的反右沒有錯，只是擴大化的問題。但是如果一個運動只有四十分之一的正確，那麼這個運動的性質還是應該得到質疑的。

六、關於起義投誠人員、民族資產階級政策。起義、投誠人員的案件有 5 件，全部落實。原被開除公職的 3 人，收回工作的 2 人。魏□玉 1 人因犯新罪，維持原案，未收回工作。民族資產階級有冤、假、錯案 18 件，全部平反糾正。

七、反右傾遺留問題，全縣有 2 件。1961 年已甄別平反。對其遺留問題，經復查全部落實。

八、對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分子的摘帽工作，全部結束。全縣原有四類分子 452 人。經群眾評審，平反糾正 24 人，宣布無效 25 人，摘帽

391 人。現尚留戴帽分子 12 人，占原四類分子總數的 2.7%。

九、地富子女修改成分工作，全部完成。地富子女第二代新定成分 2,339 人，其中社員 2,193 人，工人 85 人，幹部 51 人。第三代新定本人出身 3,537 人，其中社員 3,389 人，工人 79 人，幹部 69 人。

為地富子女改成分，似乎預示著告別階級鬥爭。但是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即文革的思維方式其實並沒有告別。正如我們後面兩章要討論的那樣。

十、關於幹部政策和幹部、群眾檔案的清理工作。文革中受到各種處分的國家幹部 78 人，農村基層幹部 60 人，全部復查落實。陸文□維持 1956 年榆次地委五人小組的□□結論。審幹案件 60 件，已復查落實 59 件。其中因運動結論上升的 18 人，經復查恢復了原結論。釋疑 6 人，維持原肅反結論的 39 人。原以敵我矛盾定性、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 4 人。不需做結論的 2 人。(有 1 人，因當事人在文革中互相串聯，使問題複雜化，尚待進一步查證落實)。對於幹部、群眾的檔案清理工作已全部結束。組織部門共清理檔案 3,774 卷。從縣到社，對文革四大運動形成的 4,442 件檔案也都全部進行了清理。

此外，去年以來，中央、省、地交辦我縣的重要信訪案 5 件，也認真落實上報。同時，受理歷史申訴案 259 件，有 68 件復查落實。為了善始善終地做好復查落實工作，除在政治上分清是非外，在可能的條件下，我們還適當地進行了經濟補償。全縣除上級撥來 88,000 元外，還從地方財政、企事業單位抽出 96,572 元，社隊抽出 90,000 元，共 274,572 元，對 1,685 人進行了補償。(原數目字為漢字——轉抄者注)

這份彙報材料，大約成型於 1980 年左右。對中共建國以來各種運動中案件進行甄別並平反其中大部分的案件，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是這些問題卻有不是平反一次就可以解決的，因為人們的習慣性思維方式需要更多的工作才能改變，包括對多少年來的階級鬥爭思維方式的改變。

我們在前面列舉這一個個數字與人名就是一座座紀念碑，在訴說著一個個悲劇故事。在以上這些事情發生的同時，還有一個大運動在進行中，這是一個以「促生產」的表面形式出現的政治運動——「農業學大寨」運動。它以壓倒一切的巨大威勢，將階級鬥爭繼續進行下去。

學大寨運動：一首唱走調的歌

學習大寨呀趕大寨，
大寨紅旗迎風擺。
它是咱公社的好榜樣啊，
自力更生建設咱們新時代。
堅決學習大寨人，
敢把那山山水水重呀麼重安排。
幹起來，幹起來，大寨的紅花遍地開。
幹起來，幹起來，大寨的紅花遍地開。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一個固定欄目
「農業學大寨」節目開始曲所用的歌曲

大寨與平定縣境相距二十里，且同屬一個專區領導，關係一向比較緊密。大寨土地狀況與平定基本一致。歷史上，糧食問題一向是平定經濟的瓶頸，這種狀況在建國後一直未能得到較大幅度的改變。因此，當大寨這

個先進典型被樹立起來後，平定縣委立即積極地向大寨學習。1964年，平定縣邀請陳永貴到平定縣作報告，向平定縣的幹部群眾介紹大寨的先進事蹟。同年，在縣委指示下，平定縣大張旗鼓宣傳大寨，元宵節傳統街頭文藝活動基本上全部演唱大寨。此時，平定縣開展了以平田整地、攔河造地為內容的「農業學大寨」運動，使平定的土地品質提高，土地面積擴大，糧食產量提升。以1964年為例，這年，平定縣糧食總產量達14,004萬斤。與1962年相比，提高了46.79%，比建國後最高年產量的1958年提高了20.6%。由於土地品質的改變，1964年糧食畝產量達280斤，有2個公社、44個生產大隊，257個生產隊畝產達400斤，實現農業發展綱要目標。¹

即使「文革」運動鬧到兩派劍拔弩張水火不容的地步時，即使在陳永貴和山西軍隊分成兩派相互對立時，即使平定新的由軍方主導的領導機構掌權時，平定的「農業學大寨」運動也沒有停息。但是這個學大寨運動，已經和上文所述的單純提高糧食產量的那個「學大寨」運動不再一樣。除了在土地建設、糧食生產上起了一些作用外，主要是在和任何貌似資本主義的現象作鬥爭，和對大寨有看法的、不贊成大寨做法的人作鬥爭。而且將所有生產上的成績都看成是和階級敵人做鬥爭的結果。本章介紹了在文革運動的後期，平定縣在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中越來越「左」的過程，和運動中幾起影響較大的事件。

學大寨、趕昔陽、批判資本主義傾向、狠抓階級鬥爭

如前文所述，平定縣的「農業學大寨」運動在「文革」尚未發動時就已經開始了。但是，那時的運動，有著明顯的經濟目的，大寨也不是政治

¹ 這裡以及下面關於學大寨的資料與案例，見平定縣檔案館存藏檔案。這一段歷史，跨度為15年（1964-1978），案卷數百冊。我們就不一一引述了。

典型。當「文革」運動從混亂逐步趨向穩定時，陳永貴作為政治明星冉冉上升，大寨也脫胎換骨，從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模範上升為無人敢摸的老虎屁股。於是，在「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政治大氛圍下，學習大寨不再是恢復和發展農業經濟，而是關乎「兩條路線、兩條道路鬥爭」的政治運動了。平定縣這個緊鄰大寨且由昔陽幹部逐步掌權的縣份，也就在越來越左的風潮中格外賣力地向左倒了過去。

1971年11月23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記者報導〈學大寨一定要抓好路線鬥爭——山西省平定縣學大寨趕昔陽的經驗〉。²這篇報導「總結了平定縣二年來學大寨趕昔陽的群眾運動的經驗」。文章認為平定縣學大寨的經驗就是：

學大寨就要搞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學大寨的過程就是戰勝階級敵人，戰勝資本主義，戰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戰勝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思想的過程，也就是在鬥爭中用毛澤東思想教育群眾的過程。如果忽視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不是把功夫用在根本上，只想馬上在一些生產措施上趕上去，結果是「欲速則不達」，或是一時上去了又會跌下來，甚至可能會走上歪門邪道。

文章還認為平定的經驗就是要狠抓縣委內部的兩條路線鬥爭，狠批階級鬥爭熄滅論。中共平定縣委為此下發文件，要求：「各級黨組織在學習這篇報導的同時，要認真開展一次引深反驕破滿為主要課題的小整風，做到在看書學習中知不足，成績面前找不足，深入實踐看不足，對照先進比

² 見《人民日報》本報通訊員、本報記者文章「學大寨一定要抓好路線鬥爭——山西省平定縣學大寨趕昔陽的經驗」，1971年11月23日，人民日報網：<http://www.rmrbbw.net/read.php?tid=413689>，上網日期2015年10月15日。

不足」。

但是這樣的學大寨並沒有完全解決民生問題。1972年2月，省委主要負責人謝振華到平定，聽取了縣委負責人（當時的縣委書記和革委會主任都是軍代表李計春）關於落實黨的農村經濟政策的情況彙報。這個《情況彙報》為歷年歷次彙報中所罕見，為農村分配兌現問題。《情況彙報》說：「目前，全縣757個基本核算單位的分配，全部兌現的有545個，占72%；兌現50%以上的有151個，占20%。以上兩項共占92%。兌現50%以下的只有61個，占8%。歷年社員欠款221萬元，已還163萬元，占73%。歷年社員拖欠糧食1,536萬斤，通過群眾討論，以折款還糧的辦法，已歸還1,150萬斤，占75%。」《情況彙報》所反映的問題。說明農村經濟困難之現實狀況。這一方面是農業生產經濟效益低下，農產品價格不能反映其實際價值所致。另一方面，也與極「左」的思潮下的「以糧為綱，全面砍光」政策有極大關係。無農不穩，無錢不富。這是在任何時候都起作用的經濟規律。

當時產生的問題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不合理的勞動管理制度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情況彙報》說：「在批判『重錢輕糧』的資本主義傾向之後，又出現了『農業單打一』現象。有的單位連服務於群眾的砂鍋廠也砍了，服務於修墻的石灰窯也下馬了，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在批判了『工分掛帥』之後，又出現了『平均主義』。名義上是學習『大寨工分』，實際上搞的是一年一評的『大概分』；有的隊出現『掙十分的站，掙八分的看，掙六分的直冒汗』現象。吃糧全村一樣平，吃菜全村搞平衡，出勤多少一個分。由於記工不合理，有的沾光，有的吃虧，挫傷了群眾的勞動積極性。」

於是，當任中共平定縣委員會著手開始糾偏。在農副業關係上，重新

調整了布局，在以農為主的前提下，積極發展鐵、木、編、牧、電、灰、硚等副業，落實了「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方針。在勞動管理上，變一年一評的「大概分」為天天記、月月評的「合理分」；變男女同工不同酬為男女同工同酬；在隊與隊的分配上，變拉平為承讓和體現差別，落實了按勞分配的原則。中共山西省委在批轉按語中認為「平定縣委落實黨的農村經濟政策是認真的，做法是可行的」。在極「左」氾濫、人人噤口不談工副業生產的情況下，縣委能夠正視現實，敢於調整結構，這種頭腦是相對清醒的，勇氣是十分可貴的，也從而改善了一些農村基層社隊的經濟狀況和農民的生活狀態。

但是，好景不長。隨著軍隊退出地方黨政權力機構，1973年4月由昔陽籍的、總站派的閻扣成任縣革委會主任，儘管李計春還是縣委書記（一直到1974年1月）。地方幹部的「左」的思維和派性意識交雜著，逐步占領了平定領導層面的主導地位。於是，「農業學大寨」運動也越來越「左」了起來。

1973年2月，中共平定縣委在給地委《關於貫徹「中共山西省委批林整風彙報會議」的情況報告》中，談到「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有了新發展。1972年，大旱大幹，水利建設大發展，完成水利工程項目等於文化大革命16年的總和，新建水地比1966年提高38%；糧食總產量9,582萬斤，超過1968年。國民經濟總收入比1971年超過2.6%。副業收入比1971年增長2.7%。」

1973年12月，平定縣召開了歷時8天的三級幹部會議。這次會議上，學大寨運動越發向「左」傾斜，「以糧為綱，全面砍光」愈演愈烈。會上，縣委主要領導閻扣成把一些農村「重副輕農」的工作傾向歸結為「大量的農村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激烈鬥爭中認識到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問題。他例舉：

古貝公社郭家山大隊，重錢輕糧，副業勞力占到全村勞力的 33%，搞副業的人每月要掙 100 多元錢。為了給副業人員解決補糧問題，大隊主要幹部都跑河北倒販糧食。由於資本主義氾濫，造成了兩極分化。外出搞副業的 130 人中，就有 34 輛自行車，17 臺縫紉機。群眾說，副業隊成了洋車隊。副業隊長翟三孩，1 個勞力養活 7 口人，過去是欠款戶，自從搞上副業後，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留聲機樣樣都有，炕上有地毯，身上隨帶半導體，相反，同樣條件的人家，孩子上學買不起本子。」他又例舉「娘子關公社井溝大隊，全隊 8 個共產黨員，就有 7 個帶頭刨小塊地，黨員李三元就開了 1 畝 1 分小塊地，僅小塊地產量 305 斤。

在講話中，他給出的辦法是大批資本主義傾向，整頓並嚴格控制副業：

這次會議後普遍進行副業整頓，進行路線教育，批判資本主義傾向。在整頓的基礎上。全縣 324 個大隊全部要實行副業大隊統管。大隊統管副業的原則是收入不少於生產隊。統管後，大隊要派得力的幹部管副業生產，不能派思想不健康的人去管副業，防止副業變質，把社會主義的副業，變成資本主義的副業。有條件的地方實行公社統管副業試點，巨城、張莊等社有條件、可試點，做到一是收入不少於大隊經營水準，二是經營好，還要支援條件差的大隊。這次會議後，副業勞力要嚴格控制在 5%-7%，副業生產主要看方向正不正，不在於勞力多。一句話，一定要堅持社會主義副業生產。關於自留地問題，在向社員進行路線教育，提高社員集體生產積極性的基礎上，自動地把超過規定的自留地收回來，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依靠集體生產。小塊地堅決剎住。

顯然，階級鬥爭的弦繃得還是很緊。搞副業被認為是搞資本主義，要嚴格管制。原縣委副書記鄭忠華在《我的回憶》中寫到了平定這個時期的情況：³

一九七二年底幹校學習結束了。過了春節，一九七三年地委通知我有要事回地區……閻扣成和賈正杞再三向地區要求把我又調回了平定，就這樣不想回平定又回了平定。

喬素祥是一九七三年初跟隨張懷英從昔陽到壽陽工作的，後來地委根據喬素祥本人的意見，就安排到了平定工作，地委又派王德滋到平定當了書記。王德滋是個派性實（十）足的人，到了平定一屁股坐到一邊，而且在班子裡誰的話他也聽不進去，自己剛到平定，情況不熟悉又不聽別人的正確意見，一入手就形成了既脫離領導班子，又脫離群眾的局面。自己給自己設置了障礙，從任命到離開平定共有半年時間，但實際工作連兩個月也沒有。因為不能工作，經常回家和住醫院。地委看到這種情況，就把王德滋調走了。王德滋一走，郭存華同志到平定任第一書記。

於是有的人就到陳永貴那裡去反映郭存華的情況，說郭存華，一到平定就給反大寨的翟高山開了追悼會。

翟高山是古貝公社，牛角溝大隊的老支部書記，是太行區的勞動模範。全縣開了追悼會後，對全縣的農村幹部特別是一些老幹部震動很大，一致反映說，像翟高山這樣革命幾十年，給牛角溝造了那麼多林，修了那麼多地，為人民立了功，這樣做應該。但是有人認為翟高山造林修地是為了反大寨，縣裡給翟高山開追悼會，是為了支持反大寨，所以也就成了郭存華反大寨的罪狀。

³ 鄭忠華，《我的回憶》，趙成秀收藏並賜用。

反大寨是反革命罪。是不得了的事情。當然在文革思維的主導下，這些都是捕風捉影、莫須有的罪名。鄭忠華繼續說：

郭存華另一件反大寨的罪狀是，一九七五年春，為了推廣復壯種植經驗，請晉東南地區農科所技術員，後來成了農技師的張風鳴給平定公社、大隊幹部作了一次農業技術報告。這個報告在全縣確實見到了效果，糧食總產量由一九七四年的一億四千多萬斤，增到一億九千多萬斤。把這件事說成是不學大寨，學晉東南，如此等等，總之，郭存華是反大寨的。

郭存華在平定反大寨的得力幹將是鄭忠華，所以，鄭忠華成了縣委班子裡的實權派。一九六八年叫鄭忠華到昔陽人家就沒有去，這就證明他反大寨是一貫的。

郭存華得到這個消息後是個什麼心情？他不僅沒有反感，反而從內心裡感激，為什麼？原來郭存華從晉東南地委回晉中來工作就不同意。主要是不同意到平定去兼任書記，因為年歲大了，六十歲的人了，身體又不好，在地委工作也可以，到縣裡在第一線工作，擔子重，有些力不從心。同時文化革命前在平定工作過，文化革命又在平定度過，對一些問題的處理不好辦。基於這種情況他覺得不如在晉東南好。所以王謙叫他談話，讓他回晉中他沒有痛快地接受。王謙看到不好說服郭存華，王謙說叫你回晉中到平定工作，和永貴同志商量過。平定是個大縣，又是昔陽的鄰縣，工作上不去對全省的影響很大，叫你去幹上一、二年就可以離開。既然你有困難，你可以去看一下永貴，徵求一下他的意見，咱們最後決定。

郭存華覺得既然王謙同意了自己的意見，看看陳永貴可能達到自己不去平定的目的。結果相反，見了陳永貴，他還沒開口，陳永貴就說：「老郭，聽說你不同意到平定，你是幾十年的老黨員了，怎麼能不服從組織決定。」郭存華覺得不對，再多說也沒有用，他說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看

看你的意見，看我去平定該先抓哪些工作，因為我離開平定五、六年了，情況不夠瞭解，你給我指導一下免得走彎路。這樣把話題一轉，陳永貴也沒有話了。接著郭存華提出，老陳你看平定的班子怎樣，我年歲大了長期幹不可能，老閻（閻扣成）歲數也不小了，是不是讓素祥當二把手，讓他主持日常工作我當後臺，把年輕人推出來，不用多長時間就接起來了。陳永貴聽了不假思索地說，現在不能定，一年以後再說，他們幾個估計都會聽你的，這個可能你不會有困難。

郭存華上任五個月，原來就不想到平定，想離開又沒有個說的，覺得〔有人指責他反大寨〕這是個機會，就這樣郭存華立刻離開了平定，回地委當他的常委和革委副主任去了。

但是能夠主持公道的郭存華被擠走是 1975 年 10 月份的事情了，共做了 5 個月的縣委書記。

我們再回到 1974 年。當年的 9 月 13 日至 20 日，中共平定縣委召開縣社隊三級幹部會議，與會共 1600 餘人。會議的主要議題是進一步抓緊「農業學大寨」工作。會議請地委常委、地革委副主任李韓鎮作了報告，並赴昔陽大寨和南壠大隊參觀，請昔陽縣石坪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有棠、西固壁大隊黨支部李七毛介紹學大寨的先進經驗。會議在學大寨問題上進一步強調了「大幹快上」，要求「回答」北方農業會議要求建成大寨縣，「一年不行，二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總可以了吧？」的問題。會議確定了當年冬季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規劃，共計上馬工程 168 項。縣裡組織 1500 人的專業隊伍，集中治理南川河，興建尚怡水庫，使南川河兩岸 3 萬畝土地變成穩產高產的大寨田。會議確定全縣當年要改造 10 萬畝三類田，使穩產高產的大寨田達 20 萬畝。會議確定加強農業機械化程度。會議確定全縣大力養豬，做到戶均 1 頭。

這次會議的報告說：通過「批林批孔」運動，「全縣群眾自覺交歸超放的自留地和亂開的小塊地 2,411 畝，破獲投機倒把案件 62 起。」「報告」把一些農村管理中的不同做法和缺點與錯誤當作資本主義傾向，而且認為是十分嚴重的資本主義傾向。它們是：「（一）以副傷農，副業包乾；（二）蠶食集體耕地；（三）自由種植，自由分配；（四）以物易物，投機倒把。今年前半年發現 62 起投機倒把案，倒販糧食 14,400 斤，糧票 450 斤，牟取暴利 3,550 元。特別是利用煤炭搞以物換物、投機倒把、十分嚴重；（五）貪汙盜竊，瞞產私分；（六）鋪張浪費、請客送禮；（七）買賣婚姻；（八）大搞封建迷信活動；（九）工分掛帥、物質刺激；（十）階級敵人賊心不死，破壞搗亂。」

《報告》再一次強調了領導班子「革命化建設」和「發動廣大群眾，大打治山治水，改天換地的人民戰爭」，重點表揚了城西、南坪、北莊頭、橋頭、寧艾、聶家莊、主鋪掌等大隊。《報告》對省委領導謝振華「批極左」的表態是：（平定）「不僅沒有抵制，相反盲目執行。昔陽是反右傾，咱們卻是批極左。」會議安排部署了下一階段農業工作，重點是繼續建設高標準大寨田。會議推出維社公社王家莊大隊黨支部《敢於鬥爭、就是勝利》、娘子關公社城西大隊黨支部《七鬥八鬥學大寨，一步一個新勝利》、石門口公社西郊大隊黨支部《堅持革命大批判，學大寨步步邁向前》、石門口公社南坪大隊黨支部《狠抓批林批孔，引深學大寨運動》、巨城公社北莊頭大隊黨支部《堅持抓路線、常邁新步伐》、古貝公社王家坪大隊黨支部《山區面貌變，根本在路線》、鎖簧公社官道溝大隊黨支部《堅持鬥爭學大寨》、張莊公社上馬郡頭大隊黨支部《不靠「天命」靠革命，敢教山河面貌新》等典型材料。

1974 年 11 月，中共晉中地委在昔陽縣召開了全區農業學大寨經驗交流會議。中共平定縣委對農業學大寨運動的檢討：

集中考慮了昔陽邁新步，壽陽大變化，祁縣、盂縣大增產，平定應該怎麼辦的問題。一致認為，平定要大變，縣委是關鍵。縣委的差距在哪裡？差就差在思想境界不高，路線不正，決心不大，作風不硬。具體來講，主要有「三個沒有辦到」：一是沒有像昔陽縣委那樣，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帶頭學、帶頭批、帶頭幹。因而，沒有取得領導運動的主動。二是沒有像昔陽縣委那樣，在學大寨運動中，落實黨的政策，加強黨的建設，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培養一支強有力的基層骨幹隊伍，因而，學大寨就沒有保證。三是沒有像昔陽縣委那樣，在鬥爭實踐中掌握和應用辯證唯物論的思想武器，頭腦中存在著形而上學思想，因而，學大寨運動就沒有正確的思想作指導。」這個檢討，不可謂不深刻。縣委對下年的工作作出計畫：「四年兌下一年趕，拼命決戰七五年，全縣畝產過『黃河』，總產突破兩億關，農林牧副大發展，誓把平定建設成大寨式縣。」

在這個總體思想指導下，在同一個文件中，縣委給各公社確定了糧食和油料當年產量。在發展林業上，確定任務為全縣育苗 4000 畝，四旁植樹 280 萬株，荒山造林 3 萬畝。這些任務，都分解到各公社。縣委還確定了養豬 10 萬頭的計畫，並且分解到各公社。每個公社的任務都在當年的基礎上增加了四五倍。縣委決定成立農田建設總指揮部。縣委常委蹲點包片。

1975 年，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中共平定縣委於 9 月 8 日至 12 日召開三級幹部會議，與會 1100 餘人。會議傳達學習了李先念、華國鋒、陳永貴三位中央領導在全國農田水利座談會上的講話和省農田水利會議精神，確定了「橫下一條心，就是下了苦戰二、三年，把平定建設成大寨縣的決心。」會議確定在 1976 年內，張莊、鎖簧、城關、維社、南坳、石門口、巨城、岔口、岩會、娘子關 10 個公社 200 個大隊達到了大寨社

隊標準，其餘社隊 1977 年達此標準。會議要求大搞農田水利基層建設，深翻土地 10 萬畝，整修二坡地 10 萬畝，建設大寨田 10 萬畝。會議要求全縣農業 5 年內實現機械化。會議要求糧食畝產在 1975 年 450 斤的基礎上，1976 年保證 600 斤，力爭 650 斤，1977 年畝產過「長江」。1980 年突破千斤關。會議要求養豬業在當年 47,000 頭的基礎上，1976 年達 10 萬頭，戶均 1.5 頭，要求抓好植樹造林，全縣荒山造林 30,000 畝，零星植樹 460 萬株，育苗 4,200 畝。會議認為：

1972 年謝振華同志提出〔批〕「極左」、批「個性」的錯誤路線後，由於我們識別能力差，錯誤地認為上邊來的東西就正確，結果一執行，在全縣掀起了下放風，把集體耕地、牲畜、羊群、樹木分給社員；木匠、鐵匠、泥匠走村串鄉；副業包乾、副業單幹。全縣原來搞副業的只有 5,000 多人，一下就猛增到 15,000 多人。」……〔會議要求〕「狠批資本主義傾向，要把外流勞動叫回來，把多放的自留地和亂開的小塊地收回來，把欠集體的糧款清回來，把背上糧食住在城裡的人叫回來，把外出搞包工的車馬趕回來，在城鎮要求幹部職工帶頭清理拖欠，對幹部、職工進城圍院蓋房的收回來。」

這時候，郭存華還是縣委書記。看來，他也需要積極向左靠攏。1975 年，縣委出臺《關於推廣大寨勞動管理經驗的意見（討論稿）》，這是「農業學大寨」運動的一個新內容，也是「農業學大寨」運動由生產運動轉為政治運動且越來越「左」的產物。《意見》說：

一年來，全縣 324 個生產大隊普遍推廣了大寨「一心為公勞動，自報公議工分」的勞動管理經驗。目前的推廣情況是：一、有 22% 的生產大

隊，領導重視，對學習推廣大寨勞動管理經驗認真，堅持用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有力地促進了社會主義農業的大發展，為全縣推廣大寨勞動管理經驗取得了一定經驗。二、有 35% 的生產大隊，學習比較認真，推廣基本上路，並且已取得了初步成效。還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有 30% 的生產大隊還是新說法，舊做法，基本上沒有認真推廣。」《意見》認為：「是不是認真推廣這一經驗，是勞動管理上堅持什麼方向，執行什麼路線的問題。」從推廣大寨經驗的效果上，《意見》認為：「英雄的大寨人民，二十多年來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認真實行了『一心為公勞動，自報公議工分』的勞動管理制度，不斷同黨內資產階級鬥，同集體經濟內部的資本主義傾向鬥，同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思想鬥，改造了一代小生產，造就了一批『一心為公勞動』的新型農民，成為全國一面紅旗，人民學習的榜樣。」《意見》對「勞動組織形式」、「勞力、土地、耕畜、農具的使用」、「勞力支配」、「社員勞動底分和出勤天的評定」、「工分評定」、「幹部參與集體生產勞動和補貼工制度」、「對因公致傷殘和死亡者家屬」、「支持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社員投肥」、「副業生產」十個方面作了詳細的規定。

應該看出，雖然平定的「農業學大寨」運動仍然在整修「大寨田、提高糧食產量等生產工作上下功夫，但是，「左」的思想傾向已經顯露。在涉及農民經濟利益的評工記分問題上，在對待農民自留地的問題上，在對待農村副業的問題上，都顯現出「一刀切」的傾向。而且，這一刀所切中損傷的，恰恰是農民那本來就很薄弱的經濟利益。「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傾向，使用政治高壓的簡單粗暴的工作方法，動輒「戴帽子」「打棍子」，也已經露頭。在「文革」的大環境下，「左」的東西已經成為主流，這就註定，「農業學大寨」運動也只能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1975年10月6日，中共晉中地委任命李鎖壽為中共平定縣委書記，免去郭存華的縣委書記職務。李鎖壽是在1974年晉中地區農業學大寨經驗交流會議、1975年全國農田水利座談會、山西省農田水利會議接連召開和陳永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形勢下來到平定並擔任縣委主要領導職務的，是昔陽縣對外輸出的幹部之一。



县委书记李锁寿（前右）在东关大队蹲点劳动。（1977.5摄）

圖 15-1 縣委書記李鎖壽（前右）在東關大隊蹲點勞動，1977年。

資料來源：李俊瑞《一方水土》，第 142 頁。

李鎖壽來到平定，帶來了昔陽縣農村基層幹部扎實、認真的工作作風，也帶來更「左」的思想和工作作風。囿於當時的普遍思潮和他的思想

認識程度，他在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中，摻雜著簡單粗暴；在大刀闊斧的工作作風中，混雜著不講究政策。整個縣委在他的帶領下，工作作風也同他一樣，在為本縣農業發展做出一定成績的同時，也在極「左」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1975年11月，縣委批轉寧艾大隊黨支部「用整風的方法學習貫徹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精神」的典型材料。這個材料的中心思想是「鬥」。材料說：「『軟』就軟在抓階級鬥爭軟，批資本主義軟，鬥歪風邪氣軟」，鬥爭氣氛愈加濃厚。這就又回到了前述《人民日報》關於平定學大寨的經驗上來了，即狠抓階級鬥爭。

1975年12月，中共平定縣委出臺了《平定縣二年建成大寨縣的規劃》。《規劃》說，本縣現有公社經濟在三級所有制中，只占6%，是很薄弱的。要求到1976年占到15%，1977年占到30%，到1980年占到40-50%。社辦企業基礎比較好的張莊、鎖簧、維社、城關、石門口、巨城、岩會、南坳、岔口、娘子關等公社，占到60%以上；東回、馬山、柏井、槐樹鋪、古貝、占到40%以上；床泉、陽勝、冶西、黃統嶺占到20-30%。

與此同時，平定縣將鎖簧公社作為「公社核算」的試點樣板上報地、省。核算級別問題最早是在1958年大辦人民公社時提出的，說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當時，平定縣就成立了四個人民公社，比後來的鄉鎮規模大得多。吃飯有食堂，並且管飽吃，糧食不足就互相抽調。這種體制很快就顯示出「窮吃富，一拉平」，結果出現了窮村窮隊有飯吃不幹活，富村富隊多勞不多得也不幹活的局面。在度過1959-1961三年的經濟困難時期後，中央痛定思痛，提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核算級別體制，以生產小隊各自核算，農村的生產積極性才再次調動起來，農業經濟才有了較大提升。時隔十數年，傷疤剛結，新肉才長，但疼卻忘記了，又要重走老

路。

在「左」的思潮占統治地位的形勢下，整個平定的形勢就像方向盤失靈的汽車，離開平坦的大路，向著荒灘疾馳著。很快，原先各個生產大隊辦起的小煤窯、小耐火廠等小企業被無償收歸公社統管，生產大隊所指靠的勞動力分紅錢款值被公社掌握。雖說公社其時在全縣有 19 個，規模比 1958 年小了許多，但在一個公社內，窮吃富又開始抬頭。加之在農村社員中評分記「大寨工」——社員叫「大概工」——的報酬體制，「大寨勞動管理經驗」就越發氾濫開來。與 1958 年稍有不同的是，由於更加嚴厲的政治高壓，也由於「社辦企業」的利潤作用，加上強度勞動所獲得的糧食口糧的提升，這種體制的弊端尚未完全顯現，就在改革開放新的浪潮中壽終了。

「規劃」更進一步強調了治土治水的重要性，要求「第一條是重建二坡地和大寨田，由小變大，由薄變厚，由瘦變肥，把三跑田建成三保田，建成穩產高產的大寨田。」《規劃》計畫在二年內，40 多萬畝土地普遍治理 1 次，在現有 10 萬畝大寨田的基礎上，1976 年建設 10 萬畝，1977 年建設 10 萬畝，人平 1 畝大寨田，二年消滅三跑田，達到土堵硬埂化，山地石堵化，溝平田園化。對於已經墊起的河灘地和山梁上的二坡地，要逐年平整復墊，達到大寨田標準。第二，重新安排山河，擴大耕地面積，主要抓三項：一是採取築庫鏟洞選田，改河治灣，打壩墊灘的方法，繼續根治全長 190 華里的桃河、陽勝河、南川河三大河流，在現已墊灘 1 萬畝的基礎上，二年內全部治理，再以墊灘地 2 萬畝。二是徹底治理全長 1,000 華里的 109 條大溝，新增土地 15,000 畝，1976 年治理 62 條，新增土地 5,000 畝。第三是搬山填溝造平原，小塊變大塊，禿山變良田。「規劃」在「治水」方面，要求：

在二三年內，主要抓好三項骨幹工程：（1）西面蓄住南川河水，興建尚怡水庫，容水 550 萬方，澆地 2 萬畝。1976 年 6 月攔洪，年底全部完工。（2）東面引回娘子關的水，1976 年 10 月動工興建娘子關提水工程。這是一項揚程 630 米的四級提水工程，也是一項水利建設的翻身工程，主幹渠全長 79 華里，計畫三年完成，澆地 18 萬畝。（3）北面蓄住溫河水，修建趙家莊水庫。1976 年 10 月動工，二年完成，容水 1500 萬方。澆地 4 萬畝。



圖 15-2 热火朝天建設大寨田（南川河），1977 年 1 月 29 日

資料來源：李俊瑞《一方水土》，第 141 頁。



1975年糧食自給，摘掉“一州吃三縣”的帽子。

(1975攝)

圖 15-3 平定縣的大寨田，1975 年

資料來源：李俊瑞《一方水土》，第 142 頁。

「規劃」對肥料問題、科學種田、農業機械化、建設新農村以及文教、衛生、計劃生育都有涉及，但相對籠統。「規劃」仍然強調了在建設大寨縣上「抓路線」、「縣委是關鍵」、「全黨全民總動員」和「農業要大辦」的措施。

1975 年 12 月，對於「重副輕農」的批判再次猛烈起來。縣委常委擴大會議《關於鎖簧公社學大寨步伐慢的調查》的結論是：「重副輕農，以副傷農，違背了毛主席『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發展社會主義農業的方針。」《調查》認為：「重副輕農，以副傷農造成了兩極分化，打擊了群眾建設社會主義大農業的積極性。」例證是：「這個大隊富農李萬，全家 25 口人，12 個勞動力，5 個在副業上，全家人平收入 310 元，全大隊人平收

入才 129 元，人多勞力少的戶只有 60-70 元，高低相差四、五倍。結果，搞副業的富了，搞農業的窮了。」《調查》認為：「重副輕農，以副傷農，削弱了黨支部的戰鬥力，動搖了無產階級專政。」《調查》舉了一個例，說「立壁大隊富農社員郭六毛十年沒參加過農業勞動，大隊十八種副業專案行行有他，人稱十二能，幹部的大紅人。全社 34 個採購，像郭六毛這樣的就有 14 個。他們老毛病沒改，又添了『煙開路、酒搭橋』的新手段。這樣，實際上就是把過去熱衷於搞資本主義的人又重新組織起來，新老結合，形成了『集體資本主義組織』，向社會主義進攻。」又開始拿階級成分說事了。不過也恰好反映了以前的地主富農比較富裕與他們腦子比較靈活，善於找機會發家致富有關係。

鎖簧公社是當時平定相對比較富裕的地區。由於地下礦產資源相對豐富，靠近交通幹線，因此工副業一直比較發達，社員分紅水準較高。

1975 年，南關大隊被當作「一個資本主義氾濫的典型」受到整肅。南關大隊被整肅的主要理由是：「重副輕農，棄農經商。」這份沒有以縣委紅頭文件出現的縣委常委擴大會議文件說：

全大隊在副業上用了 193 個精壯勞力，占全村整勞力的 60%。21 個黨員，17 個不在農田第一線，而在搞副業、抓現錢，全村 54 輛小平車，副業上用了 44 輛；全村 102 頭大牲畜，副業上占用 89 頭。1974 年副業收入占到總收入的 65%。領導的主要精力放到副業上了，農業上基本沒人管了。

他們不顧國家種植計畫，每年在計畫以外種 100 到 200 畝蔬菜，將菜擔到外地自由賣錢。有些不能到處搞副業的戶，不是養豬積肥，而是餵開奶羊，蠶食集體的作物和秸草，一隻奶羊一年為個人賺 200 多元。這樣搞的有 32 戶，餵 52 只奶羊。

已經變得富裕一點的村子也一定要讓它們變窮了，才是學大寨的成果。1975年11月26日至12月8日，縣委召開縣委常委整風擴大會議。與會人員於11月29日到大寨參觀，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和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郭鳳蓮在大寨禮堂接見與會人員並講話。陳永貴重點強調「舒舒服服學不了大寨，輕輕鬆鬆改變不了面貌。小打小鬧不行，非大幹才行」。閻扣成作了大會講話。他重點講了「這次整風就是要解決真學、假學的問題。我們平定學大寨的步伐到底怎麼樣？」並且算了四筆帳：

第一筆帳，糧食產量帳。建國二十多年了，畝產才翻了一番，每年平均增產7斤，人均產量們每年增加4斤。第二筆帳，對國家貢獻帳：從開始學大寨的1964年到1974年，11年內賣給國家餘糧18,980萬斤，吃了國家供應糧15,957萬斤，實際對國家貢獻了3,023萬斤，平均每年貢獻268萬斤，每年人均貢獻只有9斤。全縣42萬畝糧田，還比不上昔陽皋落大隊一年給國家的貢獻。第三筆帳，生產條件改變帳：1970年以來，每年都喊改造三類田10萬畝，建設大寨田10萬畝。5年過去了，實際上還有半以上三類田沒有改變。化肥由文化大革命前的畝均3.5斤，到1970年以來畝均64斤。汽車由文化大革命的45輛增到現在的157輛。拖拉機由文化革命前的2臺增到現在的170臺。水泵、電動機等各種農業機械由文化大革命前554臺（件）增加到現在的4,023臺（件），水利投資1970年至1975年共558萬元，年均91萬元。通電大隊占大隊總數的84%。第四筆帳：農副業收入比例帳。1974年，全縣農村牧副總收入46,795,100元，其中副業收入26,465,500元，接近農業收入的1倍半。

1976年2月24日至29日，縣委召開全縣向大寨縣進軍大會，參會者

為公社書記、上山下鄉知青、農村黨的基本路線教育工作隊隊員、大隊黨支部書記與革委主任以及婦女主任和生產隊長，工交、財貿、文教和城鎮街道負責人 3,500 餘人。

會議任務是：一、以階級鬥爭為綱，學習上級指示，批判「黨內不肯悔改的走資派鼓吹『三項指示為綱』的反動實質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的偉大意義」；二、繼續貫徹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精神；三、繼續開展縣社兩級黨委的整風。在會上，解剖了黃統嶺公社「糧食產量低而不穩，上上下下，去年是全縣倒數第二，畝產 376 斤，全縣畝平 463 斤」的問題。會議披露，「公社黨委親自研究決定，除自留地外，每個社員可刨 5 厘小塊地。去年自留地集體代種後，每人又放了 6 分菜地，農副產品減價一半分給社員。在公社黨委的這個下放風的影響下，全社不少大隊刮起了自由刨藥材、自由割條、自由刨洋油壠、自由高價賣農副產品等自由風。」

黃統嶺是本縣偏遠高寒山區，水源缺乏，生活條件差。該公社黨委的這個決定，是改善山區人民生活的步驟。被當作「學大寨運動走偏了方向，致使不少社員學大寨心散了，幹社會主義身懶了，搞資本主義上癮了」的錯誤。「大幹」與適當的農家小自由並不矛盾，改善自身生活狀況並非搞資本主義，概念上的混淆和認識上的放大化，使「左」的思想嚴重到不加思辨的程度。

這次會上，對黃統嶺公社「資本主義大氾濫」、南坳公社常家莊大隊「幾年來打內戰，革命生產受損失，資產風刮的烏煙瘴氣」、維社公社嶺上大隊「搞資本主義成了災，非法動用集體經濟 78 萬元」、石門口公社南坪大隊「工作隊入村二個多月，黨支部的個別成員和工作隊一直唱對臺戲」進行了點名批判，把這些現象歸結為「1.『唯生產力論』的毒害；2. 資本

主義牽連；3. 老好人擋道；4. 兩面派作風的殘存。」

1976年1月，縣委出臺《關於貫徹「全農會」精神二年建成大寨縣的情況報告》。《報告》在總述在「全農會」後平定「變」時，認為：

一、要把縣委建設成同走資派戰鬥的堅強堡壘，不抓縣委的思想革命化不行；二、要端正農業發展的方向道路，不批判資本主義傾向不行；三、要把農業學大寨運動步步引深，不認真推廣大寨勞動管理經驗不行。

火車頭在變：群眾對縣委有個評語：抓階級鬥爭的膽量大了，繼續革命的覺悟高了，對大寨的根本經驗認識深了，大幹社會主義的勁頭足了。……群眾的精神面貌在變：現在，在全縣從農村到城鎮，從工廠到學校，從機關到街道，可以這樣說，上至七八十歲的老人，下至八九歲的兒童，都積極投入了批鄧和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的群眾運動之中。廣大貧下中農，不僅是積極地大幹苦幹，而且是自覺地掌權管線，當社員幹部中央兩項英明決議發表後，縣城召開了萬人批鄧大會，公社召開了千人批鄧大會，共寫批判文章 50,000 餘篇，大幅標語 30,000 餘幅。……社會主義新生事物蓬勃發展：工人貧下中農理論隊伍全縣發展壯大到 10,000 餘人，愈戰愈烈；「七二一」工人大學、政治夜校、「五七」學校全縣發展到 400 餘所；業餘文藝宣傳隊全縣共有 300 多個……。山河面貌在變：去冬以來，整修二坡地 10 萬畝，搞大寨田 57,000 畝，完成水利工程 452 處；發函水地 2,000 餘畝；動用土石方 4,868 萬方，勞平 480 方，相當於去年的 3 倍。……工業支援農業在變。

1976年8月，在晉中地區農業學大寨彙報會議上，縣委書記李鎖壽作了「學大寨必須同黨內資本主義階級鬥」的發言。李鎖壽的發言，中心在一個「鬥」字上。

對 500 多名四類分子進行了評審，把其中 100 多個有現行破壞活動的階級敵人進行了揭發和批判，對以重副輕農為特徵的集體經濟內的資本主義傾向進行了深入批判。全縣共從外流勞力和不正當的副業中壓縮了 3,000 多名勞力加強了農業生產第一線，並對一些大型的隊辦企業實行了公社統管，社辦了工副業 95 個項目，年收入可達 1,200 萬元，比去年社級經濟收入增加了 45%，可占全縣副業收入的 50%。這樣不僅在思想上批臭了資本主義，而且在組織上也堵塞了資本主義的閭門。

批判和鬥爭階級敵人，仍然是當政者的拿手好戲。1976 年，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平定縣委書記李鎖壽做了《建設大寨縣就要豁出去同資本主義鬥》的典型發言，仍然強調一個「鬥」字。

1976 年末，中共平定縣委《狠批『四人幫』反大寨的滔天罪行，認真推廣大寨勞動管理經驗》作為山西省「深揭猛批『四人幫』，學習推廣大寨經營管理經驗會議」典型材料推廣。「材料」認為：

「四人幫」反黨集團出於他們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的需要，硬把大寨勞動管理經驗說成是單純的業務問題，評工分的方法問題，給推廣大寨勞動管理經驗帶上了「業務掛帥」的帽子，妄圖借批「關、卡、壓」制度扼殺大寨勞動管理經驗。「材料」總結推廣此管理辦法的經驗時說：「一、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毛澤東思想領先』的原則。二、堅持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制度，克服官僚主義，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三、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發動群眾參加管理。四、堅持鬥爭哲學，在鬥爭中推廣大寨管理經驗。」

反正是中央批判鄧小平，鄧小平就是反對學大寨。中央批判四人幫，

四人幫就是反對學大寨的罪魁禍首。沒有敵人也要製造一個敵人出來，才能把大家都嚇唬住，按照自己的命令走。

誰反大寨打倒誰

1977年2月，中共平定縣委書記李鎖壽的典型材料《抓綱治國促大幹，學大寨再上一重天》作為山西省1977年農業學大寨會議文件下發。在材料中，除總結以往學大寨的成績及經驗外，李鎖壽提出：

當前，反對學大寨的大體有這麼幾種人：第一種人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第二種人是像岳增壽這號緊跟「四人幫」的小丑，雖然出身好，但已徹底背叛了自己的階級，墮落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鐵心跟著「四人幫」砍大寨紅旗，搞反革命活動的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第三種人是社會上抗拒改造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他們是「四人幫」的社會基礎，是「三反一攻」的急先鋒。

本來四人幫是支持大寨的，現在被說成是反大寨的。於是，如果對大寨有一點不恭順或者疑義的人，就必然變成了四人幫的爪牙。總之，階級鬥爭為綱，總得有一個目標，也就是敵人。有了這個敵人，誰對學大寨哪怕有一點方法上的不同認識，誰就是敵人方面的人，就得去「鬥」和「批」。上面李鎖壽提到的岳增壽的案子就是一個這類型思維方式的典型。

岳增壽案件

關於縣廣播站職工岳增壽寫信反映學大寨中的問題而受到迫害的事件，朱存業的回憶是這樣的：

平定最大的事件：岳增壽被判了 18 年，這是陳永貴那一派搞的。因為岳反映了昔陽的問題，反映了大寨的虛報產量，反映了陳永貴的歷史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光明日報記者對這件事做了報導，發表了〈太行奇冤〉的文章，胡耀邦批示要正確處理岳增壽的問題。岳出獄後，到處寫大字報，寫事件的原委。他與我一起平的反。岳後來寫了十萬字的回憶錄，去世後，交給他哥哥岳恒壽完成。後來他哥哥完成了此書，共有二十萬字。在書中岳增壽把他的事情以及陳永貴的歷史問題都寫進去了，後來交給湖北出版社，但因為一些原因無法出版，原因就是陳永貴的歷史問題。岳恒壽在完成該書的過程中，我親自幫忙找人做訪問，被訪問的一些人都害怕，怕把他們的錯誤公布於眾。

我們通過平定縣縣誌辦出版的《走過六十年》一書，找到了當年記述岳增壽事件的報載原文。文章名為〈太行奇冤〉，由陳英茨、梁衡撰寫，於 1980 年 9 月 20 日發表於《光明日報》。主要內容摘錄於下：

一九七六年，在太行山上，娘子關內，發生了一起震動山西的奇冤。今年八月，我們在一間斗室裡，訪問了這一冤案的最大受害者岳增壽同志。他是平定縣岳家山大隊人。一九六八年參軍，一九七一年復員後到縣廣播站當修理工。今年雖然只有三十二歲，但由於近兩年的牢獄生活，加上種種迫害，身體受到了很大摧殘，兩頰瘦削，面色蠟黃，兩腿因神經和皮膚萎縮，已陷於半癱瘓。

.....

從一九七四年五月到一九七六年底，他連續給毛主席、周總理、華主席、葉副主席和中央的其他單位寫了十二封信。這些信雖然都石沉大海，不免使他焦急和憂慮。但萬萬沒有想到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一些信卻

批轉到縣公安局來，於是，大禍臨頭了。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群公安人員突然闖入岳增壽的住處，把他強行拖到會場。在千人大會上被宣布為「四人幫」的黑手。「反大寨的跳樑小丑」。在經過一場激烈的批鬥後，又被五花大綁地牢牢捆起，他感到傷口劇痛，渾身冒汗，四肢冰涼。特別是三個公安人員拖著他飛跑時，更使他疼痛難忍，幾乎氣絕。到看守所鬆綁後，他的手腕已被勒得皮開肉綻，由於一次翻車事故造成的腰椎骨折剛剛癒合的傷口又斷裂了。

預審時，他們要岳承認對大寨的前後領導人是「惡攻」、「誣陷」，要他交代同夥和幕後操縱人。

岳增壽橫眉冷對，他不能為解脫自己而誣陷任何一個人。他斬釘截鐵地說：「我信裡講的都是事實，你們可以去調查。我給毛主席、華主席寫信，不是受什麼人指使。我也沒有同夥。一人做事一人當。你們不要誣陷好人」。他停頓了一下又接著說：「正因為考慮到你們會這樣迫害我，在我寫信時都是背著家裡人和任何人的。而且我在寫給毛主席的第一、二封信裡，就明確講過，如果我因這些信而被打成反革命，請對我一個人實行專政，不要株連我的親屬。你們可以去查！」

岳增壽一家有三個現役軍人，四個共產黨員。他自己則是復員軍人、共青團員。但一夜之間，這個革命家庭竟變成了「反革命家庭」。岳增壽的家被抄了七次。他父親和他愛人的娘家也被抄了多次。他的父親被捆到公安局進行了十天的追究、審訊。公社幹部還在岳家山坐鎮，連夜召開各種會議，逼迫全村群眾揭發岳全家所有人的問題。

他大哥岳維壽在北京的一個部門工作，縣裡把他的所謂「反革命」材料寄去，使岳維壽同志也受到株連，被審查三個月，批鬥了多次。最後轉業處理。

岳增壽的姐姐岳維生一家，以及三個外甥也一一受到連累。

岳增壽同志的愛人李金鵬同志，被關了四十三天，並被迫和岳增壽離了婚。

文化革命已經結束了，但是因為反大寨的罪名，還要株連九族。正如下面所講，岳增壽工作的單位的同事也受到株連。

岳的工作崗位——縣廣播站，受牽連的人更多。副站長被關四十多天後下放到娘子關提水工程處。一個編輯被撤職當了工人。縣醫院醫生郝玉金因給岳看過病，被陸續整了兩年。甚至一個跟岳下過棋的汽車司機，也被審查一個多月，撤了司機的職務去修平車，諸如此類的挨整的，不下數十人。

但平定縣委書記李鎮壽並不就此甘休，他還無中生有地宣稱：「這個人反大寨為什麼那樣猖狂，就是在縣委常委班子裡有人同情、支持、包庇他。這個人在被揭露後，縣委常委中仍然有人和他秘密串聯」。於是把常委王建平和郭巧文揪了出來。郭巧文同志被撤了職下放公社改造。

而且縣委裡面也要揪出岳增壽的同情者來。

岳增壽真是痛苦極了，他不僅為數十個被株連者痛心，也為李鎮壽打著「社會主義實幹家」的旗號大搞封建專制而悲憤。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二日，僅僅根據縣委書記定的調子，就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他徒刑十八年。

判決以後還不罷手，又連續五天，每天長達十一、二個小時把他拉到平定縣所屬十個公社。六十多個大隊和一些廠礦遊街示眾，巡迴宣判。

那麼岳增壽這些信的主要內容是什麼呢？

第一封信是一九七四年五月寫給毛主席和周總理的。信中反映昔陽縣委前主要負責人包庇他的妻子的前夫王金魁……。〔認為〕只准提「學大寨」、「趕大寨」、不准提「超大寨」，是林彪鼓吹形而上學的「頂峰論」。

第二封信寫於同年七月，是寄給毛主席和周總理的。這封信……指出擔任了高級職務「就無視黨紀國法，一般庶民又將如何？這與舊社會一人作官，雞犬升天有什麼兩樣？」……反映前昔陽縣委主要負責人「一貫驕傲自大，目中無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信中還系統地揭露了他支援武鬥，大搞昔陽幫。把昔陽幾十個大隊和公社幹部提拔到省、地、縣各級領導崗位上，認為「這是販賣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難道哪裡落後就得昔陽的治世英雄去改變嗎？這不符合毛主席的幹部路線」！

第三封信是一九七六年三月，寄給毛主席的。信中對「反擊右傾翻案風」和「批鄧」問題，提出了不同看法。

第四封信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寄給華主席和葉副主席的。提出昔陽縣委前主要負責人緊跟「四人幫」大力推行極左路線，粉碎「四人幫」後搖身一變，又戴上紅帽子。……

第五和第六封信講昔陽縣委主要負責人的吹牛，給廣大農民帶來的災難！指出「大寨糧從來不扣水分，使農民吃虧，群眾反映：分多分少由人家定，但吃虧要吃在明處，為什麼分給含水分的糧？而領導人卻既要馬兒不吃草，還要馬兒跑得快，農民吃不飽，卻要沒明沒夜地幹，早上四點多就趕著出工，一天兩送飯，晚上還得加班加點，不管風雨大雪，酷暑寒冬，天天如此，誰要不去就開會整誰，這樣農民還有幾個小時的睡眠時間」？「一個人養活不了三口人，搞點副業吧，就被斥為『重副輕農』、『只知抓錢，不看路線』的資本主義道路，『與學大寨唱反調』。我要求能

體貼農民的疾苦，適當解決分糧不扣水分和減少勞動時間與強度，以保證農民的身體健康」，同時對那個人「今天講過了『黃河』明天講過了『長江』，把功勞都記在自己帳上」，表示不滿。

兩位記者評論道：

從這些信中，完全可以看出，岳增壽同志不是「四人幫」的爪牙，而是抵制和反對極左路線的英雄。

岳增壽同志被判刑以後，他哥哥向晉中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平定縣法院經過復查，作出二審判決，認為，「岳以真名實姓真位址向黨中央領導反映問題，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現象，原以反革命判刑不當，宣告無罪，立即釋放」。但並未徹底平反，仍然留了尾巴。釋放以後，岳增壽同志提出「應對他十二封信的正確與否作出結論，並徹底平反，召開平反大會，消除影響。」其實岳增壽同志所關心的，並不單是他個人的徹底平反問題，他最關心的還是反映的那些問題能否得到徹底解決，如果僅僅為個人徹底平反，當初不寫那些信好了，他對因冤獄而導致的癱瘓，也並不悔恨，他說：無數烈士的鮮血為人民的解放灑在太行山上，我個人損失又算得了什麼？可是，這些合理的要求卻被中級人民法院認為「上訴無理，予以駁回」。之後，岳繼續上訴於省高級法院和中央有關單位。一直沒有解決給他徹底平反的問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晉中地區和平定縣的一些人，在去年十二月六日舉行的有岳增壽同志參加的一次座談會上還說什麼「已經做到仁至義盡，再召開平反會，這個是過高要求，是不現實的，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對七十二個受株連的人的平反，這是多餘的要求，現在是安定團結，不應該出現為多少人平反的提法。株連了、審查了、批鬥了，也就是不

了了之。如果他們不服，他們可以申訴，用不著你（指岳）要求」！另一位同志也說：「至於要求召開平反會，恢復名譽，這是不可能的，也不現實。增壽要求回大隊平反，這就有點過分」！第三個也說：「平反會不能開，上邊有精神，不允許」。

《光明日報》編者附記說：

本報記者這篇通訊脫稿以後，於八月十八日由昔陽寄給山西省委，立即引起省委負責同志的重視，二十日電話通知晉中地區副書記李林廣同志徹底查處這件冤案。晉中地委當即責成平定縣委迅速為岳增壽以及被株連的全體同志徹底平反，恢復名譽，並做好善後事宜。八月二十三日，平定縣委召開了平反大會，縣委書記李鎮壽同志等宣讀了為岳增壽等徹底平反的決定，並向所有受害者賠禮道歉。岳增壽同志也在會上講了話，對黨為他徹底平反，表示衷心感謝。這次平反大會受到廣大幹部群眾的熱烈贊同和支持。

據《中國共產黨平定縣歷史紀事》記載：

1980年1月，縣委認真落實黨的政策，對「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案件4,442件全部進行復查，銷案處理3,120件，其餘進行了平反與糾正，其中有1,685人得到經濟補償，共計27.45萬元。

同年8月23日，縣委為岳增壽冤案徹底平反。岳增壽原為本縣廣播站機務修理工人，1974年1月至1976年12月間，岳增壽先後向毛澤東、周恩來、華國鋒、葉劍英等中央領導人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編輯部投信，反映陳永貴和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一些問題。為此平定縣公安局

於 1976 年將岳增壽拘留，並於 1977 年 4 月 25 日以所謂「惡毒攻擊大寨紅旗，污蔑陳永貴同志，分裂黨中央」罪名判處岳有期徒刑 18 年。後經岳增壽一再上告，平定縣人民法院於 1979 年 1 月 6 日宣布對岳增壽無罪釋放。又經省委第一書記王謙批示和省委紀律檢查委員會催促，中共平定縣委作出《關於為岳增壽同志平反的決定》，由原定錯案改為冤案，在縣城劇院召開了平反大會。同時，中共平定縣委還為在農業學大寨運動和揭批清運動中被錯批、錯鬥、錯清、錯判的 115 人，賠情道歉。

牛角溝案件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牛角溝的案子，也就是導致文革後重新上臺的縣委書記郭存華又被批評而離開平定的那個案子。

1977 年 10 月，以李鎖壽為首的縣委出臺〈學習大寨的根本經驗，狠抓生產關係領域革命〉一文，在談到「以糧為綱」問題時，重點批判了古貝公社牛角溝大隊，使這個大隊的問題成為延續數十年的積案。該文說：

對照大寨揭矛盾，揭出了所謂「老先進」，多年來被樹為「全面發展」典型的牛角溝大隊委問題。牛角溝大隊書記翟高山這個「勞動模範」的「全面發展」，和大寨完全是背道而馳的。大寨是樹上山，糧下川，林茂糧豐；而他卻任山禿、任川荒，把 500 畝好地種上了蘋果樹、核桃樹，收穫後高價賣到陽泉。不久前，有 300 多棵果樹枯死，社員要砍掉種糧，大隊某些人用大帽子壓人，說這是「破壞」。這個大隊養豬豬瘦，養兔兔死，最後都分給了社員。由於路線方向不對頭，牛角溝年年向國家要糧食。1976 年，全縣大增產，賣糧 5,000 萬斤，而牛角溝不僅對國家沒有貢獻，而且吃了 60,000 斤供應糧。牛角溝是搞資本主義的「老先進」，它「全面

發展」是重副輕農，重錢輕糧的資本主義傾向。

平定縣一度出現「以糧為綱，全面砍光」。這其中，牛角溝是一個受害甚深的典型。根據平定縣幹部、牛角溝人岳萬壽的回憶：

牛角溝本來是平定縣農業戰線的模範，其書記曾經五次出席省勞模大會。他們的成就是把十里的亂河灘變成糧田，而且種植了 500 畝林果園，種了很多核桃樹。他們在 1963 年就是全縣的紅旗單位。在學大寨開始時，牛角溝的人們不服氣，認為大寨幹得不見得有他們好，沒有說大寨的好話。結果就把他們不贊成的話說成了反大寨的話。老書記為此從 1966 年到 1978 年多次被批判。⁴

李鎖壽這樣做是得到山西省委以及中央領導的支持的。1977 年 9 月，中共山西省委批轉省委農村政治部《關於平定縣一年多建成大寨縣驗收情況的報告》。批轉文件說：

英明領袖華主席指出：「建成大寨縣，縣委是關鍵。」平定縣為什麼一年多就能建成符合六條標準的大寨縣，成為我省速度較快、品質較好地建成大寨縣的一個典型例子？最重要的就是縣委一班人在李鎖壽同志帶領下，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深入揭批清「四人幫」，以大寨精神學大寨，昔陽經驗趕昔

4 但是翟治璧認為岳萬壽的最後一句話回憶有誤。他說，「翟高山書記一直是牛角溝的書記，文革期間他仍是書記。我在 1971 年調到古賈公社工作時，翟高山仍是書記，直到 1975 年病故。這期間，他沒有受過批判，反而常受表揚，因為他一直是先進大隊的先進書記。1975 年病故後，公社黨委為其主持追悼大會，全公社十三個大隊都由各大隊書記參加追悼大會並送花圈。公社書記段諱明、革委主任岳步義都親自主持追悼會。縣委常委組織部長張鐵鎖參加了追悼會」。

陽，堅持常年整黨，不斷整風，大批修正主義，大批資本主義，大幹社會主義，認真地，反覆地解決學大寨是真學、假學，還是反對的問題，進一步端正方向路線，把學大寨運動引上正路的結果。



圖 15-4 王謙（省委第一書記）、陳永貴（省委書記）、王庭棟（省委書記）出席平定縣學大慶、學大寨群英會，1978年2月

資料來源：李俊瑞《一方水土》，第 140 頁。

顯然，中央、省裡是支持縣委的，而且還是使用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理論。

這時候，是宣告「文化大革命」運動結束一兩年之後了。但是，自上而下的方針和政策，與「文革」時期相較，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轉變。



圖 15-5 社會主義實幹家李鎮壽

資料來源：李金田提供。



圖 15-6 平定經驗在北京展覽

資料來源：李俊瑞《一方水土》，第 143 頁。

縣領導的分歧

1977年末，政治形勢已經顯露出朝改革開放方向轉變的苗頭。其時，在本縣農學大寨運動中暴露出的一些問題已經使一部分幹部有所察覺。但是，在專制思維的慣性作用下，民主的概念還缺乏生長的土壤。這些不同意見由於縣委內部民主生活開展的缺乏而得不到反映和解決。縣委在給上級的一份報告中說到縣委內部意見分歧時說：

縣委抓住關鍵不放，請公社書記，部分大隊書記和機關支部書記參加，按照三個基本原則把問題擺到桌面上。大家從回顧平定縣十一年學大寨上不了路的歷史分析入手，聯繫去年「四人幫」反大寨，砍大寨紅旗甚囂塵上的七、八、九月份，平定縣反大寨的言行紛紛出籠的表現，揭發出一件觸目驚心的事實：縣廣播站岳增壽從一九七四年連續給「四人幫」寫了十二封黑信，誣告和辱罵大寨，惡毒攻擊陳永貴副總理，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反對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岳增壽如此猖狂，肆無忌憚，就是因為得到縣委常委、縣革委中的郭巧文和王建平的支持。郭巧文在文化大革命中屢犯錯誤，一九七五年就支援岳增壽告黑狀，「四人幫」垮臺後，他又同岳增壽共商對策。郭對岳說：「你長的眼要看，長的耳要聽，好好養病。」王建平還安慰岳：「不要幹了，時候不對了。」並答應上邊轉回信來告訴他。岳被拘留後，郭又為岳開脫罪責，說什麼岳沒什麼，是他寫狀遞錯了地方。這件事，十分生動地說明了「四人幫」「三搞一篡」、「三反一砍」的流毒已侵襲到縣委班子裡，學大寨與反大寨的鬥爭在縣委班子裡地非常激烈的。

縣委內部在學大寨這個問題上有分歧。這本來是正常的。但是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是一定要把和自己看法不同的人視為敵人。縣委的這個報告

還說：

整風開始後，縣委書記李鎮壽同志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第一個站出來批判郭巧文、王建平的反大寨言行。並在大會上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從思想政治路線上分析批判郭巧文、王建平反大寨的嚴重錯誤，極大地啟發、教育了與會同志，使廣大幹部一下子發動起來了。領導敢字當頭，群眾更有勁頭。參加會議的同志寫出了兩千多份大字報，把「四人幫」破壞平定建設大寨縣的罪行，一樁樁地揭露了出來，把縣委常委那兩個人的錯誤事實一條條地端了出來。一時間，大字報、小字報滿樓滿院。當時另有一些大字報揭出了其他經濟、生活、作風等方面的問題，並點了一些人的名。這時，縣委及時注意引導大家緊緊圍繞「四人幫」「三搞一篡」、「三反一砍」的滔天罪行，批判郭巧文、王建平反大寨的錯誤。通過批判郭巧文、王建平的嚴重錯誤，教育了縣委一班人和廣大幹部。一些領導同志一邊搞批判，一邊查自己，自找解剖，對號入座，從思想深處查對大寨的立場、感情、態度問題，並帶頭亮醜揭問題。

原兵團的人這個時候的日子也不好過。因為本來和陳永貴就不是一派，反大寨是當然的罪名。

「揭批清」運動中的「反大寨」者

在「文革」運動以「四人幫」的倒臺為標誌結束之後，全國上下開展了一個「揭批清」運動。十年「文革」對中國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中共中央把揭發、批判「四人幫」罪行和清查其幫派體系作為一個重要任務，旨在糾正「四人幫」的影響和政治觀點。可是，建國以後所經歷的歷次運動形成的慣性和「文革」運動中所形成的

派性影響，使平定這個運動又一次走向了歧途。唯一不同的，是「階級鬥爭」的對象由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鄧小平變成了禍國殃民的「四人幫」。被整的人如同臭狗皮膏藥，只要找個臭的地方，貼上去就成，這也有名稱，叫「上綱上線」。原兵團的人首當其衝，被認為是和四人幫有牽連的人，並再次成為清查對象。

岳智明回憶了他在「揭批清」（揭發、批判、清理）運動中所受清查的事情：

縣清查辦的王貴林等人把我叫到清查辦的木頭小樓內，讓我交代和魏德卿的反大寨問題。當時全縣被戴上反大寨帽子而被批被鬥被抓的人不少。我說，我擁護大寨精神，我沒有反大寨的言論。王引導我說，有人叫陳永貴是「白手巾」，我說這話我沒說過。氣得王摔了墨水瓶，把我趕了出來。

又有一次，專委會的霍慕舜等人到馬車社，把我叫到辦公室，對我威脅圍攻，強迫我交代為李田柱、劉玉榮寫上告材料的問題。我有些情節記不清，不能合他們的意思，他們就把我圍在中間，大聲訓斥罵我，說我頑固不化，說要帶我到公安局……從上午 10 點一直問到晚上 1 點，問得我頭昏腦脹，吐了出來。寒冷的夜裡，我被送回家裡，還沒過一個小時，又派人把我叫回去看起來。這樣搞了我兩個多月。

這事的原因是這樣的：在處理張九崗、李成柱被打死的案件時，李田柱、劉玉榮認為對他們的處理有派性，不公正，要向中央反映。一天晚上，叫我和原黨校校長張守禮去劉玉榮家，問張有關政策。張說黨員有權利向黨中央以至黨的主席反映問題，這是黨章規定的。於是他倆口述，我寫了材料。材料寄出後，又轉回了本縣。因此，對張守禮進行處理，對李田柱、劉玉榮加重了處理。

這一段時間，專委會的曹黑小、清查辦的王慶榮經常叫我到他們的辦公室審問，讓我交代問題。

1977年春節前，平定縣在原手管局舉辦了「學好文件抓住綱，深入揭批『四人幫』」學習班。開始是學文件，繼而是聯繫實際讓和「四人幫」有牽連的人交代問題。我被立為重點對象，讓我在大會上作了深刻檢查。記得和我一同檢查的還有劉振傑、姬世民等工交系統工作的同學。

四十天的火線整風，把我弄到平定縣的下馬鄉頭，實際上是白天當勞力種地、鋤地，晚上挨批判，主要是讓交代平定出現的大字報是否是我寫的，寫了多少，每天批判到晚上十二點、一點。最後是「拼刺刀」，幾十個人〔開大會〕一起審問我。我作過兩次檢查。被整的有兩三個人，村裡的貧下中農也參加了整人。「四人幫」倒臺後，地方上聯繫實際揭批「四人幫」，昔陽派來的幹部把我們和「四人幫」聯繫起來，說我們是四人幫的小爬蟲，說我是反大寨的。我在會上檢查時就講到我對這種做法有意見，就出去貼大字報。我講了我如何穿上大棉襖，把大字報塞懷裡，戴上口罩，戴上大帽子，騎上自行車，把車子放一邊，看沒人，用木棍弄上漿糊，「啪啪」把大字報貼上牆，然後騎上車就溜的故事，會場悄悄的，像聽講故事一樣聽我說，主持人很生氣也很無奈就帶頭喊口號，把我趕出會場。

文革已經結束了，但是「拼刺刀」沒有結束。只是現在是和反大寨的四人幫的「小爬蟲」拼刺刀。

1977年初夏一天下午一點多，我趕車〔岳智明當時在馬車社當工人，趕馬車，搞運輸〕回到單位門口，忽然聽到街上的喇叭播放縣委書記李鎮壽的講話：「馬車社的岳智明寫黑信、告黑狀，反縣委、反大寨……。」

當時我就暈了。後來我反覆思考，覺得與其任其冤枉倒不如把事情說明白。於是又一天下午，我沒換工作服就去找李鎖壽。李吃了飯回來，問我找誰，我說找你。他問我找他幹什麼，我說想和你說說我的事。進了辦公室，我自我介紹，並申辯說，我沒有反縣委反大寨，只是代筆為李田柱等人寫過上告材料，而且多次作了檢查。李鎖壽說：「直接找我很好，反映問題歡迎。」後來我寫了申訴材料，通過辦公室轉交了李鎖壽。

這一年夏末秋初的一天，早晨五點多，我正準備套車去河北衡水拉飼料，突然通知我不許外出，下午兩點在戲院參加寬嚴大會，並派人把我看管起來。我心裡緊張起來，就在看管人的監視下回了一趟家，把我所有的積蓄 240 元給了妻子 120 元，讓她過日子用，另外 120 元給了弟弟，讓他給父母看病，以備我被抓後使用。我看過父母，去了單位，在兩個人看押下去了戲院，坐在第一排，等著結果。大會開始後，首先抓了十幾個人，押上臺去，宣讀罪狀。當叫到我時，兩邊看押的人和我都站起來準備上臺被逮捕。沒想到李鎖壽說我主動檢查，認識深刻，從寬處理。當我回到家，全家都長出了口氣，父母妻子甚至高興得流下淚來。

1980 年初，我已調到陽泉工作。那時全國平反冤假錯案，我又去找李鎖壽。他把我讓到辦公室，給我倒上水，態度真誠地說：「我來平定，念的是一本學大寨的經，我也不認識你，都是他們（指閹派性的幹部）搞的，都錯了，都要給你們平反。」當我再找他時，李已經調回了昔陽。1980 年 8 月 6 日，平定縣委給我送來平反通知，上寫「推翻一切不實之詞，徹底平反，當眾燒毀所有的黑材料。」歷時三年多的「清查運動」和「追查政治謠言、奇談怪論」運動這才結束。

這裡敘述的故事也是我們在前面曾經提到的故事，只是更加詳細一些。同樣遭遇的還有原兵團骨幹劉振傑：

1975年12月的一天下午，廠支部書記突然通知我說縣有關部門找我談話。下班後，縣揭批清辦公室、公安局、法院、宣傳部等七個部門的負責人一起上陣與我「拼刺刀」。他們一開始就問「你在反大寨反陳永貴的活動中都幹了些什麼？」、「給中央華國鋒寄信是誰讓你幹的？信的內容是什麼？在什麼時間和誰搞黑串聯？」等等。我想，事關重大，要實事求是。於是我把寄信的過程和信中反映平定縣在學大寨運動中推行極左路線和大搞幫派等問題如實說出。他們七八個人輪番審問，用「進公安局」「×××已經說出」等恐嚇誘逼，一直審了七八個小時。後來，又讓我在全縣「揭批清」大會上檢討。當時正是春節，他們不讓我回家，軟禁在廠裡強迫接受批判。1980年8月6日，遵照黨中央的政策精神和上級指示，給我下達了平反通知書，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當時的平反書，其實也很簡單。另外一位兵團骨幹、縣文化局幹部朱存業在他的回憶錄《步履人生》中回憶了他被以「反大寨」罪名隔離審查的情況。⁵他的故事我們在上一章也提到過，這裡比較詳細。

宣布我隔離審查，在機關食宿，不准回家。同時宣布隔離審查的還有德高望重、懿德高尚的張守禮。他是黨校副校長。我和張守禮同樓不同室，監視的還很嚴格，不允許往來，不准見面和交談。在批判和揭發他時，不讓我參加，在批判和揭發我時，不讓他參加，生怕串聯和訂立攻守同盟，抵制運動。……經過半個多月的隔離審查，終於結束了。

在隔離審查前後，曾有一次要我在千人大會上作檢查，那是一天晚上，戲院坐滿了人，而且通道上擁擠的人，水泄不通。……每當（我）講到要害處，戲臺下黑壓壓的人，就會立刻爆發出雷鳴般的熱烈掌聲。比如

⁵ 朱存業，《步履人生》，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125-132頁。

天南地北的人參觀大寨，人潮如流，一個人肩一回屎，撒幾泡尿，就不缺肥料；昔陽人也很困難，既缺糧又缺菜，在「割資本主義尾巴」時，曾經是三毛錢一碗片片湯，昔陽人冒充平定人出來偷偷摸摸買糧，曾發生了不少笑話，如此等等。戲院裡的人，大概也給我鼓掌了八九十來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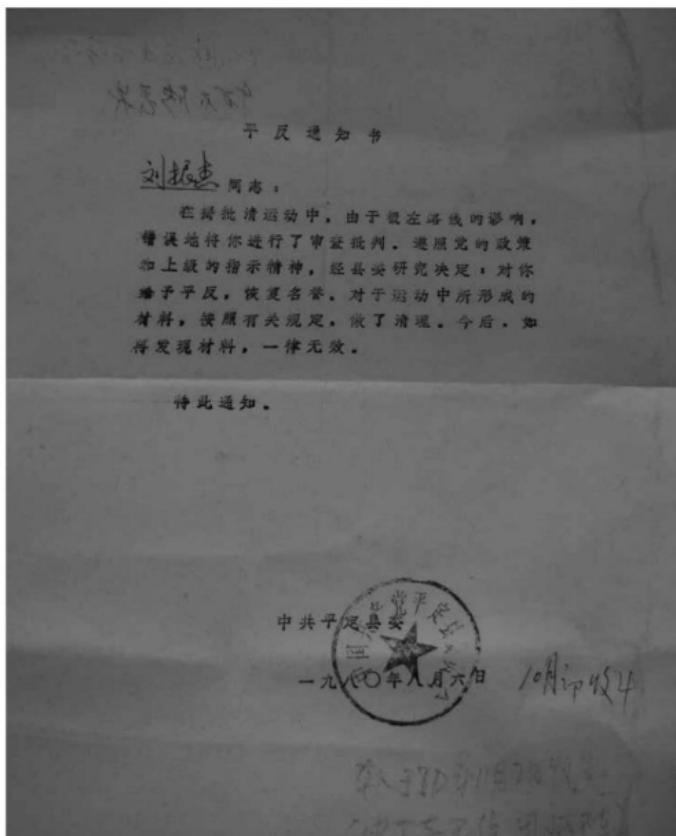


圖 15-7 劉振傑平反書

……那兩位掌管平定大印的縣太爺並沒有立即發作，倒是本地籍的一個副頭，訓斥坐或立在戲臺下的群眾：「你們還要歡迎歡迎他哩？！」……從此以後，再沒有讓我在大會上作檢查。儘管不在大會上作檢查了，但中小會作檢查，並未中斷過。當初是文教系統，以後是政府機關，長達一年之久。幾乎是一週之內的星期六晚上，或者隔三差五，總會召開一次批判會。……

記憶猶新的 1977 年初秋吧，……那一天中午，一個宣傳部的小幹事，曾經在清查我們做筆記的趙某某，通知我下午去戲院開會。通常通知了人就離去，但他不走，豈不蹊蹺？顯然他要跟蹤我、監視我，不妙不妙。我心裡很清楚，也很明白，完全知道那天下午要處理我們。那個小幹事一直尾隨著我，生怕我跑了。……那天受懲罰的計 18 人，除了幹部外，還有工人和教師。

開會後，幾個人上臺，宣布交代比較好，又能揭發問題，從輕處理。接著就輪到我了，當一喊到我的名字，我馬上跑到臺上，聽宣布罪狀。那個年歲很大、口齒混濁的王貴林，好像也是左權縣人，他宣布我的罪狀時，好像有攻擊昔陽虛報產量，為殺人犯翻案等問題，受留黨察看一年處分。

隨後是張守禮，受留黨察看二年處分。接著是田良，他是昔陽人，是個最好的幹部，愛開玩笑，喜歡說笑話，平時不注意，說到陳永貴的歷史問題，還有昔陽和大寨的一些鮮為人知的瑣事，成為罪中之罪。作為一個昔陽人，不維護昔陽的利益，卻成了昔陽的叛徒，豈能輕饒？因此宣布開除田良的黨籍和公職。俗稱「雙開」的田良，禁不住如此打擊，被遣回昔陽後，臥病在床。宣判的排名，好像是先輕後重，最為嚴重的是，五花大綁捆了翟國昌，投入監獄。

這些僅僅是一些比較大的事件。李鎖壽在平定擔任領導職務的幾年，正是「左」的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時候。功過是非，見仁見智。三十年後，很多當事人已經作古，但對他的看法，仍是各抒己見。我們前面曾經提到原紅總站的常委荊履榮的正面評價。郝忠德也撰文說：

當時的中央為改革政治體制，把有著實踐經驗的農村基層幹部選拔到縣的領導崗位上，作為不脫產的領導幹部，以改變過去的官僚機構，這是政權機構革新的嘗試。昔陽縣推薦了一批在農業學大寨中作出顯著成績的農村幹部，昔陽縣南端大隊黨支部書記被推薦任命為平定縣委書記。由於在平定三·二八奪權、籌委會等問題上，陳永貴按當時中央的意圖支持了紅總站，後又容留了紅總站群眾在昔陽避難，有些人以派性的觀念看待當時的政治體制的改革，認為軍人掌權是兵團派掌權，李鎖壽來平定任縣委書記是紅總站掌權。特別是對前縣革委主要掌權的一些人以派劃線、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敵我界限不清，廣大的幹部群眾遭受了極大的傷害，製造了大量的各種冤假錯案，把甄別、糾正、平反、昭雪等工作，說是紅總站翻了身。對在動亂期間，有些人違反七·二三布告、搞武鬥打死人的查處，說成是紅總站派整兵團派，這些人在派性的泥潭中不能自拔。

李鎖壽以一個普通的勞動者，勤勞地工作著，每天早上黎明前就到東關大隊擔茅糞，吃大食堂、住辦公室，報酬仍是記工分。他為平定經濟發展所做出的成績是顯著的，尤其在農業方面，在很短的時間創出驚人的變化，在平定歷史上繪劃出濃墨重彩的畫卷。他的工作作風在平定人民群眾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沒有派性，堅持黨性，在平定所做的工作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李鎖壽卸任回鄉後，平定人民還懷念著他。

當然也有相反聲音。原兵團的人就對其持批評態度。粉碎「四人幫」後，平定街頭曾經出現過「李鎖壽從平定滾出去」的大字標語。當時地委還表態說「歡迎群眾給領導提批評意見，包括用大字報批評領導，但我們堅決反對極個別人借用大字報的形式搞煽動、搞誣陷、搞人身攻擊。那樣是損害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的，是不利於工作著重點的轉移的」。但是無論如何，李鎖壽的「左」傾作風，還是傷害了一些人——儘管有些事情上，他也身不由己，或者囿於個人修養而沒有意識到。但是，當歷史把他推上政治舞臺時，他的任何個人思想行為，都不再僅僅是個人的思想和個人的行為了。

平定「文革」的徹底結束是 1980 年結束學大寨、改革開放為標誌的。換句話說，平定的文革如果是從 1966 年開始，那麼應該是進行了 14 年。仍據《中國共產黨平定縣歷史紀事》記載：⁶

1980 年 6 月 14 日，縣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縣委書記李鎖壽代表縣委在會上作了講話，認真總結平定學大寨的經驗教訓，掃清落實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的思想障礙。李鎖壽在講話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平定縣學大寨是自覺、健康、有效的，如神峪的萬年壩、官道溝的大口井、西郊的百畝灘、南川河的十裡壩、南坪的劈山改河、趙三虎的高產穀等。當時縣委提出「外學大寨，內學官道溝，生產隊要學趙三虎」的口號，對農業生產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文化大革命」時期，學大寨的成績是：全縣自然條件和農業生產條件有了較大的改變，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社員生活水準有所提高。經驗是：艱苦奮鬥的精神，大幹快上的幹勁，農田建設的興辦，科學種田的推廣。物質條件的改變，平定廣大農村的變化，絕不是極左路線帶來的好處，而是全縣人民牢記周總理學

⁶ 平定縣史志辦公室編著並出版，《中國共產黨平定縣歷史紀事》，2000 年，第 240 頁。

習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幹出來的。教訓是：一、把大寨經驗當成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不管什麼政治運動，不管哪條戰線都生搬硬套；二、用「一批二整三大幹」的口號能代替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學大寨變成了搞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合法形式；三、用「一本經」代替了黨的現行農村經濟政策；四、用「一刀切」違背了自然規律，違背了經濟規律。一句話，吃了極左路線的虧。

李鎖壽對他在平定的工作做了一分為二的分析。看來他也意識到階級鬥爭所帶來的問題了。中共平定縣委 1979 年 11 月 26 日所發「平發〔1979〕173 號」文件說：

關於認真總結學大寨運動的經驗教訓，清算極左路線影響的報告（摘錄）

- 一、錯誤地理解大寨基本經驗，擴大了農村的階級鬥爭。
- 二、片面理解「共同富裕」的理論，混淆了共產主義與平均主義的界限。
- 三、錯誤地把社會主義的東西當作資本主義進行批判，妨礙了農村經濟政策的落實。
- 四、照抄照搬大寨具體經驗，影響了農村經濟的全面發展。

縣誌辦王玉光在 2000 年代撰文〈對平定縣農業學大寨運動的思考〉說：⁷

⁷ 作者賜稿。

平定縣從 1962 年開始學大寨，到 1980 年結束，長達 19 年時間。這段歷史大體經過三個階段：即 1962 年到 1966 年秋第一階段，1966 年秋到 1975 年秋第二階段和 1975 年秋到 1980 年的第三階段。三個階段各有不同的特點，在農業生產及社會各方面都產生過重大影響。對於這段歷史，既不能全盤肯定，也不能全盤否定。客觀分析，實事求是地肯定成績，徹底否定「左」的錯誤思想，吸取教訓，以史為鑒，對建設繁榮富強的平定縣具有重要意義。

據《中國共產黨平定縣歷史紀事》記載：⁸

1981 年 2 月 10 日至 17 日，縣委召開工作會議貫徹中央指示。縣委常委、縣革委副主任，各公社全體黨員幹部，縣直各部、局、委、室負責人，各廠礦、企事業單位的負責人共計 629 人參加了這次縣委工作會議。會議傳達了中央和省委工作會議精神，貫徹在經濟上實行進一步調整、在政治上實現進一步安定的方針，回顧總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依賴的思想實際和工作實際，進一步統一思想認識，無條件地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縣委書記馬余龍代表縣委作動員報告，提出了貫徹調整與安定方針的具體措施。這是一次學習會、鼓勁會、貫徹執行調整與安定方針的誓師會。

看來，或許真的要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全面轉到經濟工作上來了。

「農業學大寨」運動就這樣從發展生產的運動逐步走向了政治運動，走向了階級鬥爭運動。一些踏實肯幹的幹部也由於「左」的影響和其水準

⁸ 前引《中國共產黨平定縣歷史紀事》，第 242 頁。

的限制而自覺不自覺地走向政治運動這潭混水，越走越深，成為錯誤路線的忠實執行者。

進入 1980 年，各地改革開放風雲初起，但山西仍然波瀾不驚，中央對此高度關注。先派羅貴波來擔任省委第二書記、省革委主任。同年 10 月，又調國家農業部部長霍士廉來山西擔任省委書記，王謙調出。據《中國共產黨平定縣歷史紀事》記載：同年（1980 年）11 月 16 日，馬余龍任中共平定縣委書記，原縣委書記李鎮壽調昔陽縣任職。官員的調動是政治動向的風向標。一個時代結束了。歷史合上了它沉重的一頁。平定歷史上開始了一個嶄新的時代——改革開放的時代，發展的時代。⁹

9 關於文化革命時期的經濟發展情況，通常的說法是「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多少有些誤導。實際上從 1966 年到 1976 年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是 5.94%，有的年份高至 15%，如 1970 年，而有的年份則負增長，如 1967 年負增長 6%，1976 年負增長 2%。不過文革結束那年的確是負增長。同期（10 年）平均水準則高於印度（2.95%），低於印尼（6.95%）。見 Richard Curt Krau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第 66 到 67 頁。

餘音嫋嫋：階級鬥爭的邏輯還未拋棄

毛主席早在全國勝利以前，就告誡我們：「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

我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充分認識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長期性、曲折性、複雜性，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我們一定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觀察一切，分析一切，對待一切。見到錯誤的東西就批判，見到毒草就剷除，見到牛鬼蛇神就打倒，決不能讓它們無法無天、興風作浪。

——《解放軍報》編輯部社論〈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1966年5月4日¹

1 《解放軍報》編輯部社論，「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1966年5月4日。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人民民主專政作為政治手段、階級工具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的勢力，對蓄意破壞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各種敵對分子實行專政；第二個任務就是防禦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和平演變」、西化、分化活動和可能的侵略，對企圖顛覆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外部敵對勢力實行專政。因此，必須強化軍隊、員警、法庭、監獄等國家機器，以鞏固社會主義制度，保證全體人民和平勞動，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最終達到消滅階級、消滅「三大差別」、實現共產主義的目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學部主席團主席王偉光
 〈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2014年²

文化革命結束了，但是一直伴隨著文化革命的階級鬥爭思維方式是否也結束了？我們想借助發生在平定縣的兩個在 1980 年代才獲得平反的案子，來進一步說明一下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是如何繼續運作的，以便於我們更好地吸取文化革命的教訓。第一個案子是李文元、荊一陽案，是在 1977 年文革結束後才發生的；第二個案子是「碧濤」組織案。前者涉及到個人，後者涉及到組織。是比較典型的案例。

李文元、荊一陽案

李文元、荊一陽都是平定縣晉劇團的演職人員。李文元撰文敘述這個 1977 年發生的冤案時說：

² 王偉光，「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紅旗文稿》，2014年第 18 期。

當時的平定縣晉劇團，在客觀上更是形成了以掌權派借揭批「四人幫」運動打壓、迫害持不同觀點和意見的人的一邊倒清算運動。運動由當時任縣委宣傳部副部長的王××坐陣親自指揮，劇團黨支部書記孫××積極組織，發動持不同觀點和意見的人員「反戈一擊」、「不交白卷」。形成了針對持不同觀點和意見人員的濃烈的白色恐怖。

當時劇團的一批新學員正當年幼，也多有持不同觀點和意見者。在那種政治攻勢下，難免恐懼和害怕。因而個別人被迫「反戈一擊」，編造事實，寫了揭發李文元的所謂反革命材料。掌權人先從與李文元同志在下鄉期間住在一起一個宿舍的人入手做工作，迫使其將李文元與荊一陽在宿舍中的閒談言論採取斷章取義、牽強附會、生拉硬扯、無限上綱等手段，捏造了針對李文元的所謂反革命活動揭發材料，但由於所捏造的材料是二人閒談與對話，因而將荊一陽同志也牽扯進來。於 1977 年 1 月首先在平定晉劇團展開了批判，然後以黨支部名義向縣裡編造了所謂針對李文元、荊一陽的所謂報案材料。起草人員在劇團領導的授意下，無限上綱，以莫須有的罪名給李文元、荊一陽二同志扣上「反對毛主席、反對周總理、反對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粉碎『四人幫』的偉大鬥爭」的反革命分子帽子。

那麼他們到底說了些什麼呢？當時平定縣人民法院〔77〕法刑判字第 16 號刑事判決書是這樣寫的（見圖 16-1）：

李、荊二犯思想反動，在我舉國上下熱烈歡慶兩個偉大勝利的大好形勢下竟膽敢逆行逆施，進行反革命活動。於一九七六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間，先後在李犯的宿舍和本縣槐樹壠大隊等地，麇集一起，利用閒談之機，二犯前呼後應，一唱一和，互相傾吐反革命言論，惡毒地攻擊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肆意誣衊和分裂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竭力反對

粉碎「四人幫」的偉大鬥爭，妄圖打倒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領導幹部。同時，李、荊二犯又將其反動言論分別在不同場合向他人進行傳播，反革命氣焰甚為囂張。因此，由群眾檢舉揭發，公安機關偵查屬實，起訴在案。經開庭審理二犯雖對其主要犯罪事實供認不諱，但在某些情節上仍施以狡辯。然而，本院已獲得有關證明材料，存證可稽。

該判決書按當時的標準判斷，文筆不錯，但是全是文革語言。當然這也無可厚非，時空限制使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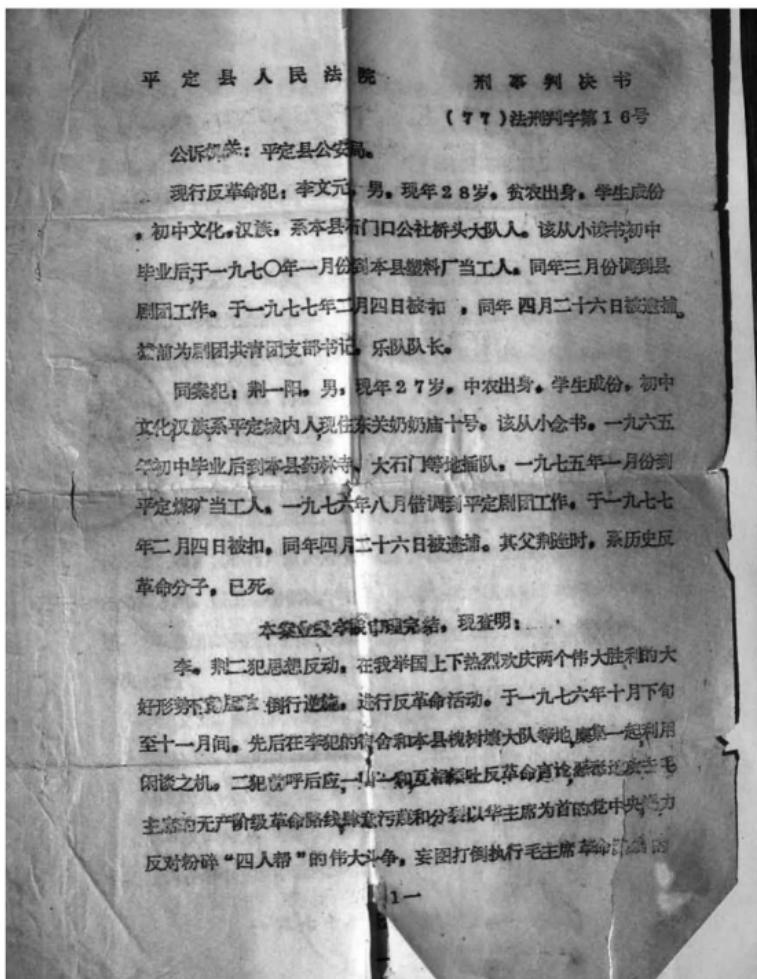
查李犯文元，身為劇團樂隊隊長，又係團支部書記，本應遵紀守法，向壞人壞事做無情的鬥爭。但卻於此相反，竟然站在反動的立場上，與同案犯荊一陽勾集一起，狂噴反革命毒汁，攻擊黨的領導，破壞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再查荊犯一陽，正當青年之際，本應努力學習，加強思想改造，和廣大人民群眾一起，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而相反地是竟然和李犯麇集一起，一唱一和，發洩仇視大好形勢的反革命禍心。綜上所述，認為李、荊二（犯）之行為，確已構成現行反革命之罪。其罪行嚴重，應予嚴懲。本院為了捍衛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光輝旗幟，保衛英明領袖華主席，保衛揭批「四人幫」的偉大鬥爭，進一步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堅決鎮壓反革命，故依法據情分別判決如下：

李犯文元，現行反革命罪，處予有期徒刑十三年。

荊犯一陽，現行反革命罪，處予有期徒刑十年。刑期均從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起算。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次日起，十日內向本院提○○訴，上訴於晉中地區中級人民法院。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一日



1-

圖 16-1 李、荆案判決書

資料來源：作者自拍。

在「文革」已經結束近一年、撥亂反正工作正在進行之際，即使在「反革命罪」沒有廢除之前，這個判決的言之無證和用詞華麗空泛失當，判決獲罪之重，也是相當罕見的。但是話又說回來，這些詞語，或者說對反對自己的人所實行的類似的思維方式與用詞，比如「前呼後應」、「倒行逆施」、「惡毒攻擊」、「肆意污蔑」、「氣焰囂張」、「發洩仇視大好形勢的禍心」，等等，難道今天已經絕跡了嗎？

李、荊二人在獄中服刑一二年後，終於得到糾正。平定縣人民法院〔79〕法刑覆判字第5號刑事判決書 1979年4月14日這樣結論（見圖16-2）：

經復查，上列二被告在我黨一舉粉碎四人幫以後，由於不瞭解黨內鬥爭的真實情況，加之資產階級派性，在機關和下鄉演出間的幾次私下議論中，曾說過一些錯話，屬於認識問題，尚不構成犯罪，故再審判決如下：

撤銷本院〔77〕法刑判字第16號刑事判決書，對李文元、荊一陽予以釋放。

這是司法機關一貫的做法，說是平反了，但是還是要留個尾巴。直到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七日，平定縣人民法院〔1980〕年度法刑覆判字第14號刑事再審判決書這樣結論（見圖16-3）：

本院復經查證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閒談語論屬於正常行為，不屬任何問題。不僅原判以此定罪論處顯然不當，而改判也不徹底。故再審判決如下：

一、撤銷本院〔77〕法刑判字第16號刑事判決書與〔79〕法刑覆判字第5號刑事判決書。

二、對李文元、荊一陽宣告無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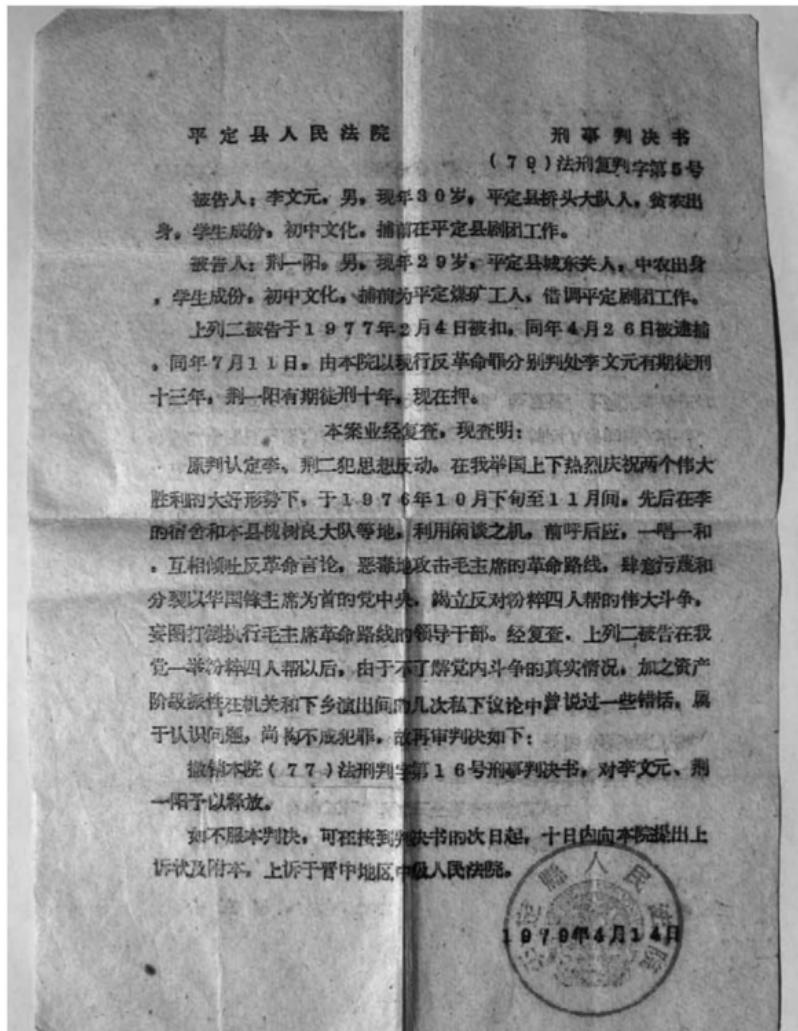


圖 16-2 李、荊案覆判書

資料來源：作者自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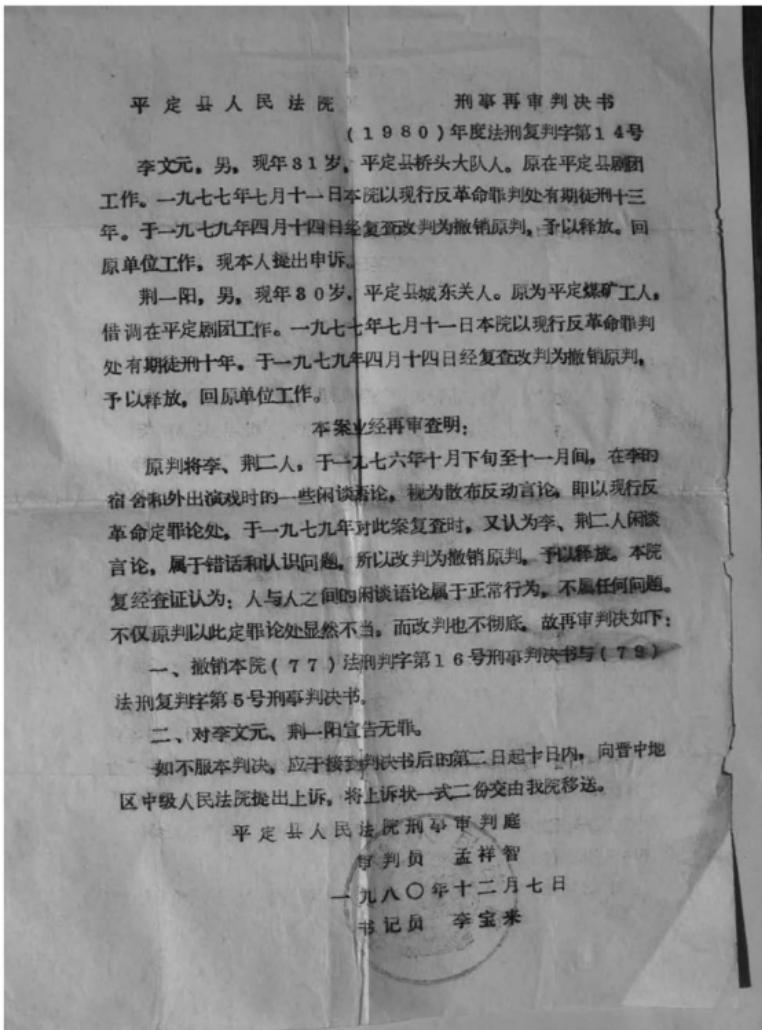


圖 16-3 李、荊案再判書

資料來源：作者自拍。

但是，牢已經坐了，苦也受了，對個人、家庭和社會造成的悲劇已經釀成。所有這些，一紙改正的判決能夠補償嗎？

「碧濤」和「真理小組」案

這個案件的意義在於當時個人能否結社，即使是一個愛國愛黨的非政治性組織。當然，答案是否定的，涉及到「碧濤」案和「真理小組」案的人們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趙成秀撰文記述了這樣兩個案子：³

上世紀七〇年代初，平定縣教育局和公安局聯合炮製了一起「碧濤」反動集團大案。此案涉及無辜青年 54 人，拘捕 4 人，歷時 23 年方被平反昭雪。那麼，人們不禁要問：「碧濤」究竟是什麼組織？拘捕的究竟是什麼人？為什麼 23 年後才平反昭雪？

.....

該案時間之長，橫跨文革，是比較罕見的。

1959 年 9 月，一個眉目清秀、有著藝術天分的青年走進平定師範的校園，他就是杜聯。對書畫的酷愛使他很快嶄露頭角，成為「新苗」〔即新苗畫刊〕的骨幹，並當選為總編輯。

1961 年，我國的經濟遇到暫時的困難，為了減輕國家的負擔，學校決定，二年級的四個班下鄉實習一年。杜聯滿懷信心地回到自己的家鄉平定，到位於南關流杯池的教師進修學校參加培訓。培訓間隙，有著「新苗」情結的杜聯，突發奇想，何不仿照「新苗」模式，也成立個組織，將

³ 見趙成秀（著）〈「碧濤」真相：一樁延宕 23 年的驚天冤案始末〉，載於拙樸園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3457b60101s3j9.html，上網日期 2015 年 10 月 4 日。

愛好書畫和寫作的青年團結起來，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切磋技藝，共同提高。這個想法很快得到同年級同學潘能福的同意。

湊巧，杜聯回到自己的家鄉岩會公社龍莊小學任教，而潘能福所在的學校連莊和龍莊是鄰村。更讓杜聯興奮的是，他的初中同學劉培田和李毓秀也在岩會公社工作，他們對文學和書畫也有同樣的愛好。這樣，他們幾個一拍即合。龍莊村邊有條桃河，河水碧波蕩漾，滔滔不絕，杜聯的靈感被觸動，立即給起了個富有詩意的名字：「碧濤」。「碧濤」文藝研究小組就這樣成立了。

有著編輯、展示《新苗畫刊》經驗的杜聯，對「碧濤」做了慎密的設計，用銅板刻印了《碧濤文藝研究小組》的小冊子。小冊子的內容由三部分組成：組織宗旨、組織方法、工作建議。劉培田、潘能福、李毓秀人手一冊。其組織原則明確規定：要堅決聽黨的話，不斷地提高社會主義覺悟。要有無產階級的立場，社會主義的政治方向，擁護黨的領導，擁護人民政府，擁護各族人民大團結，擁護社會主義國家和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團結。要立場堅定，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添磚加瓦。參加者不得驕傲自大，鬧分裂活動。無論文學作品或美術作品，都必須面向工農，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使文藝成為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路線的得力工具；成為反映現實生活和偉大理想的喉舌；成為鼓舞人民鬥志，打擊人類共同敵人的有力武器。要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文藝理論，提高思想覺悟和創作能力。要自覺掌握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真心實意地幫助同志，善於團結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前進。

「碧濤文藝研究小組」組建後，杜聯、潘能福、劉培田等同志立即投入緊張的工作，通過相互推薦、串聯的方法，發展組員十二人，其中有教師、科技人員、農村文藝骨幹，也有在讀的高中學生。通過面談和書面的形式，要求小組成員要嘴勤，勤問；要腿勤，多走訪；要手勤，多練習。

以謙虛的態度待人，甘當群眾小學生，善於集中群眾的智慧，吸取自己創作的營養。在學習文藝理論的基礎上，積極搜集民間故事、民間傳說，自找素材進行文學和繪畫創作練習，自己覺得是成熟的作品，可向報社投稿。這些有著文學和藝術夢的年輕人按照小組的要求，一方面深入實踐，激發創作靈感，寫詩作畫，另一方面，苦讀作家名著、學習文藝理論，還將王計明大學的課本借來相互傳閱、學習。濃厚的學習和創作氣氛令他們英氣勃發，對未來充滿信心。

所有這些結社的工作，看來都是順理成章、無可非議的工作。

1962 年秋，杜聯和潘能福的實習期已到，不得不回校繼續學業。而其他小組成員，或因教學工作緊張，無暇參加活動，或因考上大學，赴外地就學，或因居住分散，聯繫困難，所以成立一年，基本沒有集體的聚會和研究活動。到年底，雖沒有有明確指示將《碧濤》解散，但實際上已經是名存實亡了。後來，杜聯不無感慨地說：「十二名小組成員，居住分散，又各有各的工作，聚在一塊談何容易，哪兒能比得上學校的『新苗』？當時真是書生意氣！」

.....

未曾想，文革要來了。

1965 年冬，平定縣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巨城南莊學校教導主任鄭養田通過私拆信件，發現連莊學校有反動組織，於是上報給平定縣公安局和教育局。與此同時，亂流學校教導主任翟文選隨之緊緊跟進，上報亂流學校也有類似的組織。平定公安局和教育局立即著手調查，他們以縣文化

館收集創作為名，到龍莊將杜聯的二十多本日記和繪畫集收走。由此，以杜聯的日記為「由頭」，揭出了所謂「碧濤」大案，當時的縣委書記郭存華不無自負地說，此案已上報華北局。

主動尋找階級敵人，把握鬥爭的新動向，是上上下下的領導們必須做的功夫，當然郭存華也不例外。隨之而來的自然就是沒完沒了的批鬥乃至更加嚴厲的懲罰。到文革時，他們的問題就是歷史問題了，隨時可以拿來說事。

最先波及的就是杜聯。杜聯從平定師範畢業後，沒有回實習學校，而是分配到陽泉市下站小學。新婚才一個月的他，正滿腔熱情地將自己的才華貢獻給鍾愛的教育事業，沒想到，離開了自己的家鄉，卻沒有逃脫對他的追剿。學校在上級的授意下，先是剝奪了他教學的權力，隔離審查。接著就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圍攻，什麼「三家村黑幹將」「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一頂頂政治大帽漫天飛。並於 1969 年「清隊」和「一打三反」中被關進了牛棚。

在牛棚裡，杜聯除了戴著寫有「壞分子杜聯」的白袖章參加勞動之外，還要接受狂風暴雨般的批鬥。教室裡坐滿了群情激奮的革命師生，在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他反剪手臂被押上講臺，一位工宣隊頭頭用粗糙的手掌將他的頭強按地面，在「杜聯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喊聲中宣讀罪狀。一次，兩次……，這個貧農的兒子，忍受著平生最大的奇恥大辱。

在接受學校批鬥以外，杜聯還要接受來自「專政機關」沒完沒了的調查，來者都是打著公安旗號的專案人員。他們氣勢洶洶，威逼，恐嚇，推打，引用他日記上的片言隻語上綱上線，逼他承認「反革命」罪行。杜聯則以擺事實講道理予以反駁，對蠻橫無理嗤之以鼻。

在那個年代，任何未經許可而成立的組織，都可以和反革命掛鉤，可以得到任何懲罰的。

1972 年，離開牛棚接受勞動改造的杜聯被叫到校長辦公室，聽取了上級對他的宣判：十六開白紙上列印的文字密密麻麻，其中大意是：杜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開除教師職務，留校勞動。

1965 年冬，杜聯的同學潘能福、劉培田參加了平定縣教育局在西關教師進修學校舉辦的學習班，接受批判和鬥爭，將「碧濤」定為非法的反動的組織。1970 年 9 月，兩人同時被平定縣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小組拘留。在看守所裡，他們在火鉤等刑具的威逼折磨下，不得不屈辱而又違心地承認所謂的「罪行」。

在一份列印的四千餘字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山西省平定縣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小組關於對「真理研究小組」一案的處理決定》中，通篇看到的是編造的謊言和嚇人的大帽。

杜聯的同學潘能福還曾經在 1961 年成立過一個「真理研究小組」，即研究文藝和教育學的組織。他們還於 1963 年向省教育廳遞交了成立組織的申請書。其章程也是參照黨章和團章所寫。

但《處理決定》中卻說：「平定師範學生潘能福等人，不滿我社會現實和共產黨的領導，為實現他們成名成家，升官發財，聚眾而起，不要黨的領導的反革命野心，便相互勾結，於 1961 年 10 月 1 日成立了『紅色青年團』，……1962 年 7 月，根據國內形勢變化，又將『紅色青年團』改名為『真理研究小組』。」

《處理決定》又說「該組織設有總部，潘能福任主席。下設三部三組。三部即政治部，設在連莊由潘能福負責，任務是研究時政，加強組織內的政治氣氛。文藝部設在龍莊，由杜聯、杜淵、潘能福負責，任務是搞創作和宣傳。勞動部設在太原，由王武負責，任務是抓勤工儉學，解決組織內開支。三組即『碧濤文藝研究小組』，由杜聯、潘能福、劉培田、李毓秀負責。『哲學研究小組』由潘能福負責。『教學研究小組』由劉憲負責。」

於是，依靠辦案者的想像力，「真理研究小組」和「碧濤」文藝研究小組就自然地結合成為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反動團夥了。

「大帽子」那可真是「滿天飛」！什麼「含沙射影，指桑罵槐，借古諷今，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極力醜化我社會現實，有的甚至呼風喚雨，制造反革命輿論」，什麼「想蔣盼美，妄想蔣匪捲土重來，顛覆我無產階級專政」，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但是，這些「大帽子」之下，卻沒有任何事實依據。

就是這樣一份「決定」，竟然把潘能福定為反動集團首犯，戴反革命分子帽子，遣返回村，交群眾監督改造。一張「專政」的大網將他牢牢捆住，精神崩潰，患了嚴重的腦血栓。劉培田，這個風華正茂、多才多藝的亂流學校的教師，同樣以莫須有的罪名，不僅拘留受刑，還定性戴帽，開除公職，回村監督勞動改造。沉重的肉體折磨和精神打擊，使他英年早逝，只度過 49 歲光陰。

杜聯聽到好友劉培田的噩耗，痛徹肝膽，寫下散文〈為了忘卻的紀念〉。他說：「今天，本該是你舒展胸懷，放開歌喉，頌揚祖國改革開放，甩開臂膀大幹事業的時候，你卻離開了我們，離開了親人，離開了生你養

你的故土而去了，母親失去了兒子，妻子失去了丈夫，孩子失去了父親，我失去了諱友。多麼遺憾啊，讓人心痛！」

當然，劉培田僅僅是千萬個文革中遭到迫害而冤死的人之一。

「碧濤」的另一位成員李毓秀的被捕似乎更有「傳奇」色彩。李毓秀是趙家峪大隊的農民，擅長寫作、繪畫，還寫的一手好字，是平定縣文化館著力培養的農村文藝骨幹，經常幫助文化館搞書畫展覽。1965年初冬，趙家峪大隊召開年終總結表彰大會，李毓秀被推選為「先進」得到大隊的獎勵。會議即將結束，文化館來函，邀請他為縣裡的四級擴幹會議刻印材料。就在他手握鐵筆緊張工作的時候，一位縣公安局的股長採取誘導的辦法，逼問他組織、策劃「碧濤」的詳細情況，還讓他寫成書面材料。第二天清晨，一位大個子校長取走材料，並把他帶到西關教師進修學校的學習班。

時間到了1970年，9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李毓秀正在家中的院子裡用荊條編籃，大隊的一個村幹部引來三個大漢，稍加問詢，其中兩個年輕人從腰間掏出繩子，一聲不響地迅速把他背了雙手捆了起來，徑直擁出村口。先乘火車，又坐汽車，押送到縣城的看守所，單獨關在一間房子裡。過了幾天，李毓秀才知道，同時被關的還有潘能福和劉培田。

在看守所裡，軍管組怕他們三人互相串供，訂立攻守同盟，所以各關一室，單獨提審。提審時，關門遮窗，李毓秀戴著手銬，坐在牆角的小板床上。提審的人戴著眼鏡，翻著李毓秀交出的日記，尋章摘句，然後無限上綱，逼其承認罪行。如若不從，便用火鉤夾手。提審人還拿出李毓秀《喻世雜吟》書稿，專挑有關虎、狼、蛇、蠍之類的詩詞尋找突破，本來，從古至今，文人將虎狼蛇蠍入詩，都是取其特徵，比喻世上類似之

人、類似之事，以警策後人嫉惡如仇，積德行善，可是，提審人卻非讓他承認是專指偉大領袖毛主席，李則反問：「如果說是專指劉少奇，你信不信？」弄得提審人啞口無言。

又是無中生有，又是無限上綱。這是階級鬥爭的定式思維。

寫不完的檢查，答不完的逼問，幹不完的苦活，李毓秀習以為常，調侃以對。日子就這樣在孤獨和憤懣中挨過。1970年元旦之後，軍管組決定將潘、劉、李三人戴反革命帽子，遣返原籍，監督勞動改造。

李毓秀是被趙家峪的治保主任接走的，令他想不到的是，回到村裡竟有許多人歡迎，就好像歡迎久別後歸來的家人那樣。李毓秀的心裡是欣慰還是苦澀，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

「株連九族」，包括自己的同事，是中國政治文化的傳統。我們在上一章討論岳增壽時已經討論過了。在「碧濤」案上，情況也一樣。

災禍不僅降臨到「碧濤」主要發起人的頭上，還牽涉了五十多位與此毫無瓜葛的幹部和群眾。董濱澄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他是共產黨員，岩會公社聯合校長，是杜聯小學時的老師。1961年，杜聯到家鄉龍莊小學實習期間，董校長正在太谷縣參加培訓。杜聯創辦「碧濤」時，有心想讓董校長在政治上給予指導，這種想法在他的日記裡有所記載。但因他即將歸校繼續學業，「碧濤」也面臨解散，這種想法一直沒有跟董校長透露過。平定教育局將他的日記沒收以後，在日記中發現此事，便把董校長也列入「碧濤」成員，在平定西關教師集訓班接受沒完沒了的交代，還免去了他聯合校長的職務，他的家人也因此事受到株連。其弟當時在河北省軍

區衛生院給馬輝司令員當專職醫生，並準備提拔到河北省醫療器械處擔任主任，結果因兄長是「反動集團」成員，提拔落空，最後調到內蒙墾疆戍邊。

風聲鶴唳，草木皆兵。1966 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在《人民日報》上刊登之後，「碧濤」被推上了風口浪尖。〔他們在〕亂流農中搞野營活動，被懷疑為「碧濤」舉事暴動；「開河寺籃球隊」背心上印的號碼被認為是反動組織的編號，還把一些八竿子打不著的事說成是「周邊組織」所為；有人甚至懷疑「碧濤」組織的根不是在臺灣，就是在美國。……

多麼可怕的株連！多麼可怕的「莫須有」，「想當然」！

但是話又說回來，本書中所描述的那些無論是牛鬼蛇神還是被打、被打的雙方造反派，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都是因為一些「莫須有」、「想當然」的罪名所引起的嗎？現在呢？當然，杜聯他們並不服氣，於是，他們開始了漫漫的上訪路。

1976 年 3 月，為了澄清事實真相，還十二名「碧濤」成員的清白，杜聯和劉培田踏上赴省城太原的火車，開始了漫漫的上訪之路。

三月的太原春寒料峭。杜聯穿上愛人剛做的新鞋，雖心裡充滿溫馨，可寒冷的天氣還是凍得雙腳發麻，疼痛，走起路來磕磕碰碰。

清晨下了火車，他們一路打問，直找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信訪處。但那裡早有人排起了長隊，等輪到他們的時候，已經十點多了。因上訪人員太多，他們的事又不是一言半語可以說清的，信訪處的人安排他們下午兩點再來。

下午兩點，他們回到信訪處接待站，把有關「碧濤」文藝研究小組的

情況進行了詳細的陳述，並把帶來的書面材料呈上。接訪員談了他的看法：「如果情況真像你們反映的這樣，是不犯什麼法的，因為憲法就有保障公民的言論、結社、出版自由。在文藝界又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完全應該平反。如果事情有出入，那我就說不定了。所以，給你們開個介紹信，介紹你們到本地的落實政策辦公室解決，你們的有關材料，我們會負責轉回陽泉。」

看來當時的信訪接待員還是有點水準的，知道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結社、出版自由。但是上訪並使問題得到解決，還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三月下旬，杜聯到陽泉市公安局打問此事，辦公室的同志說，「省裡材料已經轉回，現在正在解決你們的問題，你到辦公樓上找陳兆亭吧，原先是她一手承辦的，讓他回答和解決你們的問題。」

杜聯到公安局辦公大樓找到陳同志，把來意向他說明。陳同志說：「從省裡轉來的材料我看過了，情況是這樣的，文革前轉來你們『碧濤文藝研究小組』一案，咱們陽泉公安局協助平定公安局調查這件事。調查結束後，沒做任何結論，更沒定性。接著文化大革命開始，陽泉造反派砸了公檢法，咱們處於癱瘓狀態。對於文革中對你們處置、定性，那是下面搞的。根據黨的政策，完全可以平反。最近抽時我到城區看看，讓他們儘快解決一下。」

杜聯在等待著。劉培田在等待著。十二個「碧濤」成員在等待著。五十多個無辜群眾也在等待著。

時隔一個多月，陽泉城區落實政策辦公室派人來到下站小學，對杜聯說：「關於你的案子，撤銷過去決定，給予平反，恢復教師工作。」並把文革前沒收的日記、習作、繪畫全部退還。不過，他仍沒有走上講臺，而

依舊在校辦工廠勞動。這讓杜聯的心裡蒙上了厚厚的陰影，想來，平定方面落實政策仍然有巨大阻力，他得為此繼續奔走。

果然如杜聯所料，在平定，雖然劉培田、李毓秀、潘能福都將自己的申訴材料送到落實政策辦公室，也曾面見相關領導據理力爭，但一些曾經參與此案的人，總想維持原來的結論，以證明自己一貫正確。1977年5月29日，縣委決定：「真理研究小組」和「碧濤文藝研究小組」定為反動組織的性質不變；對潘能福、劉培田定為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開除公職，回村勞動改造，李毓秀以嚴重政治錯誤對待。

又是平反但是還要留尾巴的做法。什麼叫定為反革命但是不戴帽子呢？反革命不是帽子嗎？反革命怎麼是人民內部矛盾呢？顯然，文革的結束，並沒有結束這些人的文革思維。這個思維方式除了不講事實之外，也不講邏輯。

1984年，劉培田將一封喊冤的信寄到山西省人民檢察院。當時的檢察長劉硯青仔細看了這封信，與有關同志作了深入細緻的研究，之後，省檢察院責成陽泉市檢察院對此案進行復查。陽泉市檢察院控申處副處長張鎮同志與有關同志調閱了此案的案卷，令人吃驚的是，案卷竟有一米高，一摞十二袋，6000多頁，足足看了兩星期。除了不實之詞外，案卷中找不到任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實證。他們茫然了，為什麼有一些人一定要千方百計地把這些很有才華的青年打成反革命？為什麼直到今天，這些人仍然死抱住原來的結論不放？

是啊，為什麼非要千方百計地這些才華橫溢的愛國青年打成反革命呢？這些問題不是我們今天仍然在問的問題嗎？不光是以前那些「反革

命」，還有今天的所謂「敵對勢力」、企圖「顛覆國家政權」的勢力。有多少人是真正的「敵人」呢？

1987年，在省市檢察院的再三督促下，平定縣委落實政策領導組和平定縣公安局聯合對此案進行了復查。結論是：「根據該組織產生的背景、事實，結合有關文件精神，認為『真理研究小組』和『碧濤文藝研究小組』是非法組織，對潘能福、劉培田、李毓秀可按一般問題對待，不予追查。」「非法組織」？仍然留著一個小小的辯子。而且，既然是「非法組織」，卻又「按一般問題對待，不予追查」，豈不自相矛盾，難圓其說！劉培田、李毓秀、潘能福仍然不服。又是申訴，又是上訪，然後又是焦心的等待。

又是留小辯子，又是自相矛盾，又是邏輯混亂。文革當時已經結束了10多年了。

1988年5月12日，平定縣落實政策領導組下發「平落法〔1988〕21號文件」，文件說：經過研究認為：「『真理研究小組』和『碧濤文藝研究小組』不按其反動組織對待，潘能福、劉培田、李毓秀的問題，應視為一般問題對待，給以結論。」與1987年的結論相比，除了沒有提「非法組織」，一切都是換湯不換藥。對此結論，受害人依然不服。

可能還是「組織」問題。組織是犯忌的。

杜聯獲知此結論，立即向山西教育報社寫信，希望報社能呼籲社會，還「碧濤」真相。山西教育報社立即回函。信中說：「你們所反映的問題，我們已和省人大聯繫過了，省人大已於4月25日給陽泉市人大常委會發

文，責成落實你們的問題，並限期三個月函報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請暫等等，或到陽泉市人大常委會追問一下。若三個月後仍無處理結果，或還有何問題，歡迎和我們聯繫。」

真的，落實政策就像擠牙膏一樣，一直「擠」到 1988 年的 8 月 23 日。平定縣落實政策辦公室下發了 32 號文件。文件說：「關於對『真理研究小組』和『碧濤文藝研究小組』縣委落實政策領導組以平落法〔1988〕21 號文件做過結論。發文後，潘能福、杜聯等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見向市委作了反映。市委召集市檢察院、信訪局、平定縣委、平定公安局等有關領導同志，對兩個組織的性質問題作了具體的分析研究，交換了意見。縣委落實政策領導組於 1988 年 8 月 13 日重新進行了研究。決定『真理研究小組』和『碧濤文藝研究小組』都不應該定為反動組織，也不應該定為非法組織。對加給潘能福、劉培田、李毓秀等同志的不實之詞一律取消。」

至此，這一牽連 54 人、延宕 23 年的驚天冤案，總算畫上了句號。杜聯、潘能福、劉培田、李毓秀歷劫之後，總算長長舒了一口氣。

這一冤案的長途旅行，或許象徵著文革思維的革除，可能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行。但是，青春已經被折磨掉了，失去的歲月已經無法挽回。

.....

1988 年 9 月 23 日，在陽泉檢察院的會議室裡，在座的，除了「碧濤」一案的受害者杜聯、潘能福、劉培田、李毓秀等人，還有山西日報駐陽泉記者站、山西教育報駐陽泉記者站、山西工人報、陽泉報等新聞媒體的記者，他們是應杜聯之邀前來參加會議的。

在肅穆的氣氛中，陽泉人民檢察院的領導同志宣讀了陽泉市對「碧濤文藝研究小組」和「真理研究小組」的平反結論，杜聯沉痛地回顧了他和

他的同學、好友所受到的歧視和迫害，為爭取清白在漫漫上訪的長路上所經歷的曲折和艱辛，讚揚了陽泉市人民檢察院張鎮等同志捍衛法律尊嚴、伸張人間正義的大無畏精神。在長達三年的時間，作為檢察院控申處副處長的張鎮同志審讀案卷三百多萬字，並從案卷中找出有人認為是最「反動」的東西複印給領導看，最終所有的領導都找不出其中的問題……李毓秀還代表杜聯、潘能福、劉培田向陽泉市人民檢察院控申處贈送了兩幅字畫；一幅是「青松挺立，紅日東升」；一幅是「正黨風，申法紀；國運昌，樂嘉祉」。

在座的所有同志聽了杜聯的訴說，都對受害者給予極大的關懷和同情，對還「碧濤」以真相的政法幹部給予真誠的頌揚和感謝。《山西工人報》的記者葛葆慶更是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連夜構思，奮筆疾書……

1988年10月20日，《山西工人報》在醒目的位置發表了葛葆慶採寫的文章，題目是：《子虛烏有23年——陽泉市為「碧濤」、「真理」研究小組平反始末》。文章以簡練的筆法、犀利的語言，披露了不為常人所知的駭人聽聞的冤案內幕，對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錯誤給予無情的抨擊和鞭笞。

有位叫毛利國的青年，曾是杜聯的學生，當他看到這篇文章後，立即寫小詩一首，寄贈老師杜聯。他說，拜讀《山西工人報》給杜老師等平反的報導，方知你們竟承受不白之冤二十三年之久，真是令人髮指毛寒。「二十三年霧迷程，騰呼一掃天地新」，祝願老師「奔馬再馳聘」。

如此看來，人們還是可以有點樂觀，因為畢竟人心都是肉長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是所有的人都揣著明白裝糊塗。讀著學生的詩，杜聯激動得熱淚盈眶。他在「文革十年總結」中寫道（趙成秀摘錄）：

十年浩劫歲月，我像路邊的小草一樣，任人踐踏，任風吹雨打，連伸張正義、抗議邪惡的資格都沒有。同學朋友，眾叛親離，埋在心底的話無處可訴。我產生了一種難以言狀的惆悵，性格內向，心靈扭曲。我不愛理人，也不希望別人理我。我不去瞭解別人，也不希望別人瞭解我。天馬行空，獨來獨往，痛苦和不幸共鳴，不安和苦心糾結，留下一段屈辱的記憶。

十年浩劫歲月，我的生活失去了航盤，思想像小船漫無目的地飄蕩。政治風雲的瞬息變幻，使我感到朝不保夕，更談不到為自己的愛好去奮鬥。青春年華，多麼寶貴的黃金時期啊，就這樣讓它白白流逝了。

牛棚生活，肉體的折磨姑且不說，心靈的創傷難以癒合。當我回望家鄉，想起了黃土下沉眠的母親，彷彿看到了蒼然衰老的父親和他腳下那片貧瘠的土地，聽到了妻子歎息聲中隱藏的痛苦和憂傷。我的心碎了。唯一安慰我的就是故鄉的白雞山和終年流淌不息的桃河水。

我登上講臺了，重新獲得了工作的權力。失去過自由的人，在重新得到自由後，會把自由看得比金子還貴重。回到家鄉，我盡情地呼吸著山村清新的空氣，在門前的洋槐樹下，觀看落霞繽紛美麗的色彩，欣賞月落桃河倩影的神秘。

坎坷的人生使我懂得世態炎涼，明曉人情世故。在蒙受了巨大痛苦之後，我清醒了，決心投身於工作。我成功過，失敗過，歡樂過，痛苦過。往日的酸甜苦辣都在生活的搏擊中解脫，從此，我要以新的姿態去迎接新的生活。

趙成秀說：

然而，這時的杜聯已經是兩鬢染霜了。

是啊，一個人有多少個「二十三年」，青春，青春，千呼萬喚歸不來！

很難得杜聯能從這個噩夢中走出來。多少像他這樣經歷的人是走不出來的。趙成秀的敘述還有很多附件，包括當時這兩個小組成員之間的大量通信、他們的交代材料、申訴書等等。

涉案人員之一平定縣岩會龍莊小學教師劉培田所寫的申訴材料，或許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看到當時那些對他們的指控是如何的荒唐。

申訴材料之二

文化革命的「一打三反」中，在平定縣亂流小學，我被打成反革命。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三日被縣公安局拘留，一九七二年一月宣布定為反革命分子，開除公職，戴帽回村監督勞動。

當時定有五條罪：

- 一、參加反動組織「碧濤文藝研究小組」，任副主席。
- 二、偷聽敵臺，發生共鳴。
- 三、書寫反動作品〈驕傲的小鶴〉和詞句。
- 四、帶領學生求神拜佛。
- 五、拉攏亂流青年。

回村後我多次申訴，粉碎「四人幫」後，平定縣委於一九七九年四月復查落實。以上「罪狀」除否定「帶領學生求神拜佛」與「偷聽敵臺」一事中「發生共鳴」一語外，其他全部保留。結論是：參加反動組織「真理」「碧濤」，用代號和其他成員聯絡；偷聽敵臺；寫〈驕傲的小鶴〉和詩句，事實切有；拉攏亂流青年。但念其勞動積極，根據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政

策，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恢復公職，不斷工齡補發工資。

這個結論仍與事實不符。

實際情況是：

一、關於參加反動組織「真理」「碧濤」用代號和其他成員聯絡的問題。事實的全過程是這樣的。一九六一年我在亂流當小學教員，我的同學杜聯（現在陽泉下站小學任教）在平定師範讀書，我們都愛好文藝。杜在平定師範「新苗」美術小組任副主編，辦得很活躍。他到龍莊實習時仿照「新苗」形式組織了一個「碧濤文藝研究小組」並親自起草了守則即「綱領」。這個綱領的主要內容是：熱愛黨，熱愛毛主席，遵循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進行學習和繪畫、寫作（見附件1）。杜徵求我的意見，我同意綱領內容並共同商量了「碧濤」這一定名。當時我年輕，想學習寫作，並有成名成家的思想。後來由於工作忙，加之其他老師勸告我們不要組織起來學，看以後出了問題，於是我和杜聯商量於一九六二年春便解散了。後由杜通告有關人員。

一九六五年搞教育思想革命化，我們主動談了這件事，並檢查了成名成家的錯誤思想。縣教育局要我們交出全部原始材料，並派人到我家拿走了我的全部日記和練習寫作的全部草稿。杜聯在陽泉工作，不屬平定管轄，但縣教育局要我到他家和他父親借出了他的日記和全部筆記本（在筆記本上杜指定我為「碧濤」副主席）。

同年十月，縣教育局把參加「碧濤」的七八個人叫到平定隔離檢查，還擴展到了亂流、龍莊、移穰學校的十多名教員同時檢查。名為檢查，實是批判鬥爭。搞推理論識，逼供信，無限上綱。二十多天後，縣教育局長宣布：「組織非法，思想反動，問題不算解決，回去工作，繼續檢查」。

復查落實後的結論仍與事實不符。

(一)「碧濤」綱領無反動內容。

(二)按照憲法規定人民群眾有集社的自由。組織「碧濤文藝研究小組」是自由集社，並無與憲法相抵觸。

(三)文革中「碧濤」發起人杜聯被陽泉定為反革命，不戴帽子，留校辦工廠當工人，保留原工資。在一九七九年復查落實中，批覆「碧濤」不定為反動組織，撤銷原結論，恢復教師職務。同一案陽泉能夠如實處理，平定為何不能。(附件二)

至於這次落實中給我增加的參加反動組織「真理」，用代號和其他成員聯絡，根本沒有此事。

二、所謂「偷聽電臺」

一九六二年春節放假，杜在龍莊學校住著，晚上我常去和他閒談，聽廣播對臺時聽到過兩三句臺灣廣播，很快就擰過去了。現在陽泉已與否定，我是一個旁聽者怎能有罪？平定定罪的唯一依據是杜聯在當天日記中寫的「大陸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這是胡說八道」。一九六五年批判我時，縣教育局拿著日記，前捂後蓋硬要我承認這句「大陸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是和杜聯說的。與事實不符。

三、所謂書寫反動作品〈驕傲的小鶴〉和詞句

一九六一年春我念初中時寫了這個習作，其主要內容是歌頌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文中寫了蘇聯的繁榮，這個習作曾寄給《電影藝術》編輯部，他們看後並沒有指出政治上的錯誤。(附件三)，當時中蘇分歧還沒有公開化，我黨的報紙還在刊登蘇聯的正面消息。我是一個中學生根本不知道中蘇有分歧。這個習作文革中定為反動作品。落實後雖取消作品的帽子，但仍說事實切有，難道能夠以此為罪，作為辯子來揪嗎？

所謂反動詞句，主要是指我六三年日記中抄寫了電影《搜書院》的幾句臺詞。這部電影是國家批准公開上映的，我抄幾句也犯罪嗎？

四、所謂「拉攏亂流青年」的問題

我在亂流任教九年，全村青年我都認識，特別是當時的青年團的幹部、團員、知識青年與之關係都比較接近，平時既談學習、工作，也談生活問題，所謂拉攏完全是無稽之談。

以上就是我被打為反革命的全部「罪名」和落實政策的情況。我任教二十多年，政治包袱背了二十多年，雖經多次申訴，仍不能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落實問題，現在中央又發了 22 號檔，進一步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懇請領導以事實為依據，法律為準繩，重新審理我的問題，將感恩不盡。

山西省平定縣岩會龍莊小學教師劉培田

而且從《碧濤》的〈組織綱領〉上來看，也沒有任何反動組織的蛛絲馬跡：

我們為了在文學藝術及其繪畫上，共同研究互相幫助，取其成就，特願結合一批文藝愛好者，在共同的政治基礎上，統一正確的前進目標指導下，徵求個人志願，組織一個命名為「碧濤」的文藝研究會。凡參加者必須遵守下列原則，也是我們今後的行動綱領。

一、堅決聽黨的話，不斷地提高社會主義覺悟，要有無產階級的立場，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政治方向；擁護黨的領導，擁護人民政府，擁護各族人民大團結，擁護社會主義國家和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團結，擁護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

二、立場堅定、忠實可靠。凡參加者不得隨意退出和失掉聯盟關係。

三、無論文學作品或美術作品都必須面向工農兵，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使文藝這個武器成為宣傳黨的政策、路線、方針的有力工具。使文藝成為反映人民現實生活和美好理想之喉舌。使文藝成為打擊人類共同敵人的有力武器。

四、為了在文藝上取得成就，參加者還必須有組織地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並不斷地學習文藝和美術理論，提高成員的思想覺悟和創作能力。

五、參加研究會的成員，必須自覺地掌握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真誠地幫助同志緊密地團結同志。

六、我們的學會是以勤儉節約的原則舉辦的，有必要時我們可以利用公積金到外地去採集材料和向他人請教及其訪問。

這些二十歲左右的愛國青年的青春歲月就這樣無端地被扼殺了，而且反革命的帽子還要戴 20 多年。即使是漫漫的上訪路，也不應該是他們應該發揮自己才能的地方。這一切的悲劇又是如何造成的呢？我們這些過來人不應該深刻反省嗎？這些比較典型的案例說明，後人需要深刻地汲取文革的教訓，不要讓文革重演。文革這種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罔顧事實、罔顧邏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思維方式，應該堅決摒棄。應該用普世價值、民主的理念來解決路線鬥爭、權力鬥爭、群眾組織（如兩派）等等政治和社會問題，否則政權會永遠處在不可預測的變動當中，社會也不得安寧。

文革反思的困難與必要性

不反思文革的社會，也許還是一個食人部落。這樣的部落，無論人們的外表多麼光鮮，採用多麼現代化的文明果實，終究還是沒有人性的食人部落。經歷了文革，國人沒有反思，就走不出食人部落，人人就都可能食人，人人也都可能被食。

——張鳴，〈沒有反思就沒有人性的復甦〉，
《中國青年報》，2013年2月20日¹

現在如果把毛再抬出來，群眾的矛頭是針對現在一切不滿意的事，不滿意的根子在現在的領導。所以「文革」再現可能不太大，但是「反右」再現是有可能的，目前就在專門打壓不同意見和知識分子。這是我感覺到

1 張鳴，「沒有反思就沒有人性的復甦」，《中國青年報》，2013年2月20日，http://zqb.cyol.com/html/2013-02/20/nw.D110000zgqnb_20130220_5-02.htm，上網日期2015年10月25日。

的一種情況，「反右」重來的危險是存在的，因為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還是最弱的。

——資中筠，〈我對當下中國的幾點看法〉，
《成報》，2014年1月19日。²

我們在前言部分反思了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討論了社會運動的成因、分派、文革暴力、文革對個人的傷害及其對社會的傷害。在前面的16個章節中，我們敘述了平定文革的發生與發展的過程，具體描述了平定文革的來龍去脈。在研究與寫作過程中，一個問題總是在困擾著我們：所有這些，到底為了什麼？我們的國家、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得到了什麼？我們折騰了那麼多年，除了災難之外，我們收穫了任何東西嗎？在本書後面的人物小傳中，我們看到以前的走資派都官復原職，造反派們大多也發展不錯，也有不少傲人的成就。文革給他們帶來的只是災難。那麼所為何來呢？在前言中，我們尤其討論了理解這些問題對當今社會的啟發，以便使我們更好地瞭解我們這幾代人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應該去哪裡。也許慘痛的經驗和血的教訓才是我們十年文革的收穫，只是這個收穫，只有通過反思才能得到。

但是對文革的反思卻是說到容易做到難的事情。其中一個原因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政治與經濟上的兩極分化、官員腐敗成風，各種社會問題積重難返，使得一些人開始懷念過去，懷念毛澤東。我們在訪談時，問了被訪者多年以後對文革的看法以及文革對自己的影響。我們發現很多人仍然崇拜毛澤東，相信文革的合法性。我們的訪談基本是在2009年之前做的，

2 資中筠，「我對當下中國的幾點看法」，《香港成報》，2014年1月19日，http://www.singpao.com/xw/ht/201401/t20140119_484977.html，上網日期2015年10月25日。

所以他們的觀點現在可能已經有所改變，但是毛澤東和文革在中國還是大有市場的，所以他們的觀點是有代表性的，如果有什麼變化的活，也許是更加崇拜毛，更加為文革辯護。

這種現象代表了文革反思的困難。當然也有一些人對文革持批判的態度。但是如果不能夠開展討論，而是一有對文革的批判、對毛的批判，就要立刻將其打入冷宮，如畢福劍那樣（當然畢福劍還不能說是完全被打入冷宮，他也不能說是對毛進行了完整的批判，只是調侃而已，但是連調侃都不可以），那麼文革的反思就很難開展。文革的悲劇就很難避免，我們在上面談到的很多問題就會繼續存在。

當然，不少人對文革那段經歷感到不堪回首。我們的被訪者之一劉玉榮就認為，自己既是文革的積極參與者，又是重點受害者，覺得文革是一場災難，受害太深，太傷感情，而再也不願意回顧這段歷史了。這和以前歷次運動中的情況非常類似。很多人積極參加，但是後來又都成了受害者。時代造成了一代代人的悲劇，他們不願回顧這段歷史完全情有可原。但是，他們也理解，人們還是要回顧這段歷史，找出文革發生與發展的機理，以免我們今後重蹈覆轍。而重蹈覆轍是完全可能的，儘管涉及到人以及鬥爭的方式和方法可能有所不同了。文革思維是一樣的。

2012 年，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所長撰文提醒中央防止美國利用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路領袖、弱勢群體來滯緩或干擾中國崛起的進程。³這五類人被視為當代的「新五類分子」，並正在被嚴加看管起來。這種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正好證明今天反思文革的必要性。正如王蒙所指出的，文革中的階級是不按照財產來劃分的，而是以思想來

³ 袁鵬，「中國真正的挑戰在哪裡？」，原載《人民日報海外版》（望海樓），2012 年 7 月 31 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2-07/31/content_1090137.htm，上網日期 2015 年 8 月 1 日。

劃分的。⁴這正是中國 1949 年以來「階級鬥爭」的定義。而現在的鬥爭思維，正是對這種「階級鬥爭」思維方式的繼承。下面我們來看一些反思文革的具體例子。

為文革辯護、為毛辯護

我們首先來看對文革、對毛的認同。我們的被訪者之一郝鼎丞認為毛是為底層人服務的，他鬥爭的目標是特權者。但是這些特權者是否在走資本主義，則是另外一回事：

反修防修、防止中國演變、復辟資本主義，毛主席要解決這個問題，站在底層人的立場上看問題，衝擊了很多特權者的利益，衝擊了那些忘記了人民利益的人。至於這些人是否真走資本主義，那是另外一回事。指導思想是這個，所以人民群眾動頭很大。

但是以前的那些走資派真的是忘記人民利益的人嗎？正如我們在第 13 章所討論的鄭忠華的例子所顯示的，至少之前的走資派是不承認的。或者說郝其實是在講現在的當權者？是為了打鬼，借助鍾馗？另一位被訪者翟全臣認為毛的功勞是偉大的，他對未來資本主義復辟的預見是英明的。他說：

我的看法，毛主席始終是我心中的紅太陽，是神。解放不幾年，人民雖說苦了點，但國家既無外債又無內債，不容易。他是窮人的救星、勞苦大眾的領袖。他預見到他在中國建立的社會主義模式會被改變，「死後幾年或幾十年復辟資本主義」，因此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他在工農兵中

4 見前引王蒙，「毛澤東為什麼非搞『文革』不可？」。

選拔領導幹部，是反修防修、反腐防腐的千年大計。

但是在工農兵中選拔領導幹部就可以反修防修嗎？沒有制度的建設，反腐敗能夠成功嗎？毛澤東給中國造成的災難在這裡看不到了。毛澤東反修防修的失敗，也看不到了。

要我說，毛主席一句能頂一萬句，不論當時還是現在他都是我心裡的神。主席就說過，他死後中國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在我看來，是不是資本主義主要看經濟形式，所以老人家沒說錯，你們看看人家說的準不準。毛主席是窮人的領袖，比較注重國家，先要國富，但他沒有注意到國富了人窮了。

顯然，他對毛澤東還是有點保留。郝忠德也認為自己很佩服毛澤東關於中國在他死後會出現資本主義的論點。他認為實踐證明毛澤東把中國的事情看透了。「文革之後的發展把毛澤東解脫了」。正如郝鼎丞所說：

現在的幹部和以前不能比，以前十塊錢的問題就會被搞臭，現在十萬元都沒事，買官賣官到處都有，不是選拔優秀人才，而是選拔有錢人。

現代社會發生的許多問題，比如貧富懸殊、醫療制度和教育制度的腐敗等等，讓我感到多少懷念毛澤東的那個時代。

但是，如果真讓大家回到毛澤東時代，恐怕即使這些擁毛派也不會同意的。潘佩經說，「否定了『文革』等於否定了我自己的一生，〔對文革〕我不後悔」。不後悔不見得願意回到文革。如果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是對文革的反動，不正是證明了毛澤東的失敗嗎？毛派一方面無法回到文革，一方面又不知如何解決改革所帶來的問題，不也是毛的失敗嗎？

正是人們對當代社會的不滿，使得人們會懷念毛澤東的時代，同時為文革辯護。問題是如上所述，文革所代表的並不只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而是文革思維，階級鬥爭的思維，是暴力。對毛的懷念是一種選擇性的思維方式，而且也解決不了他們所關心的問題。即使是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討論，也應該看到資本主義不是什麼都不好，社會主義也不是什麼都好。關鍵是如何能夠保留社會主義的優點，克服它的缺點；吸收資本主義的長處，避免它的弊病，讓老百姓自己去判斷，自己去選擇自己認為應該走的路。這或許是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其實當前中國的左派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不是沒有道理，對毛的社會主義的懷念也不是不能理解。問題是左派們對毛的懷念不能也不應該阻止其他人對毛的批判。

不同的觀點應該在意識形態領域展開大辯論。在辯論中，釐清事實、理順邏輯，求得對別人觀點的理解，並修正自己的觀點，這才是文明社會應該做的事情。德國人對納粹時代的深刻反省是建立在對事實的瞭解基礎上的。日本人缺乏對侵略時代的反省、中國人缺乏對國共內戰、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反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當時的年代、當年的罪惡並不瞭解的原因。因為不瞭解，所以自以為是。

這正是文革給我們的教訓。正如我們在本書中所描述的，文革的悲劇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那種自以為是、認為真理只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態度。社會的健康發展需要輿論與言論的自由，需要謙虛謹慎的態度。只有通過對事實的認定（比如走資派到底有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通過觀點的碰撞（如果真的走資本主義道路，難道不好嗎，怎麼好，怎麼不好），並隨時修正自己的觀點，我們才能使自己更加接近真理，從而找到中國前進的方向，而不是老是摸著石頭過河，一直不上岸。

對自己的反思、對毛的質疑、對文革的質疑、對責任的反思

李金田在他的《「文革」的回憶》中對「文革」的反思，主要是對自己的反思：第一，我們當時缺乏思考。第二我們張揚了性惡。他說：

有人曾經說過，我們這一代人是喝狼奶長大的。我不知道他的原意是什麼，但我覺得的確如此：社會向我們灌輸了盲從和狂熱，我們又用這些給社會注入動力。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承認，我們都是一場浩劫的推波助瀾者。

首先，缺乏思考。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理兒：有真理，有歪理；有大理，有小理；有實在理兒，有虛玄理兒。別人說出一個理兒，咱得去想去辨。想不透不要緊，可千萬別不去想。比如說，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為了「反修防修」，粗想是這個道理。但是仔細一想，問題來了：什麼是「修正主義」？它在「修正」什麼？這些被「修正」的東西該不該修正？這些挺玄的道理，遠非我們這個封閉的小地方人所能明白的。那麼，這些我們隨口而出的詞兒，誰給過我們一個嚴格的標準和具體操作的尺度？回想當年，我們高喊支援或者打倒「任王張」，卻連這是一個人還是幾個人都不明白，白白喊了幾年，留下一段笑料。他們離我們才幾十里，我們就一頭霧水。遠在北京的高層政治鬥爭，我們又能知道幾何？當我們高喊「萬壽無疆」或者「打倒砸爛」時，我們是否在為虎作倀？

但是這正是文革思維，是不要思考的、罔顧事實的、沒有邏輯的、階級鬥爭的思維。

我們從小受的教育就是偉大領袖的話是「一句頂一萬句」，是「句句是真理」。在這樣的信念支配下，我們已經習慣了盲從，習慣了恭順，習

慣了領袖揮手我就前進，沒有用自己的腦袋過一過的智慧，也沒有用自己的心想一想的膽量。結果，我們用自己的手給自己挖了個坑，然後自己心甘情願地跳進去。反思過去的「文革」歲月，我們的思維方式，還和老戲裡大臣見了皇上跪下就磕頭皇帝說句話就趕緊「吾皇聖明」沒什麼區別。歸根結底，「文革」鬧騰成這樣，我們自己也在添磚加瓦、擦油放火。

換句話說，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是建立在愚昧的基礎之上的。而啟蒙與去昧，儘管需要幾代人的時間，卻又是不得不從現在就應該做起來的事情。

鄧小平說過一句話：「發展才是硬道理。」道理怎麼還有軟硬之分？我想，大概有些軟道理，不是讓你去探索真理，而是讓你用來唬人的。據說當年包產到戶，有個大領導想不通，和萬里吵起來。萬里說，一邊是你那社會主義，可是老百姓得餓肚子；一邊是能讓老百姓吃上飽飯。你要哪一頭？大領導說，我要社會主義。萬里說，我要吃飽飯。萬里說的就是真理，而真理就是這麼簡單明瞭。那位大幹部說的社會主義，只怕連他也不知其為何物。如果那位大領導大權在握，誰知又有多少人要餓肚皮！

這就是「軟道理」和「硬道理」的區別。

或許真正的硬道理是人權。人權就包括了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權利。而經濟權利就包括了能吃上飯的權利，生命的權利。而政治權利則包括了能說話而不受到懲罰的權利。這難道不是文革給我們的教訓嗎？

「文革」中流行一句「名人名言」，叫作「知識越多越反動」。這話千真萬確。瞭解的東西多了，就見識廣了，就想的多了，就凡事問個「為什麼」了，就少「愚」了，就把腦袋安在自己的肩膀上了，就不迷信了。所以就「反動」了。對於愚人者，這當然不是好事。

以前我沒這麼想過，現在我這麼想了。

想比不想強，儘管我還沒有想透。

總之，對別人的話，對官方的話，對宣傳的話，自己要思考，要過腦子，不能人云亦云，否則最終吃虧上當的是自己，受害的是自己。而且我們還可能助紂為虐。

第二，張揚性惡。

人性中有善，也有惡。人之初到底性本善還是本惡，這是哲學家研究的東西。但是人性中有不少惡的東西，比如自私、狹隘、偏執等等，人皆有之，連偉人也不可免，卻是千真萬確的。

「文化大革命」的核心是「整」和「鬥」。力量對比絕對優勢，就「整」；如果力量稍可抗衡者，便「鬥」。總之，人的關係劍拔弩張。這也張揚了人的本性中的惡。

我讀過韋君宜的《思痛錄》和一些關於延安整風的資料，方知在那次整風中的許多荒唐事兒，也方知「文革」濫觴於此。我讀過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和一些關於「反右」的資料，方知我小時給老師寫大字報、唱「捉住狐狸剝下皮，原來是章伯鈞和羅隆基」的那次運動，整垮門倒了多少有才之士。「大躍進」中反「右傾」，反倒了說真話的，扶起來吹牛皮的。「四清」運動本來是搞經濟問題的，卻搞成「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至於「文化大革命」，那更是「整」和「鬥」的大混戰。「階

級鬥爭為綱」這個貫穿始終的主題，「階級」姑且勿論，「鬥爭」卻不斷花樣翻新。鬥來鬥去，把人性中的惡張揚起來了，打人成了鬥爭手段，殺人成了勇敢行為。至於信口胡說、揭短抖醜、造謠污蔑、上綱上線，更是習以為常、家常便飯。

這就是我們在前言中講的善惡不分、好壞不分，一種社會的潰敗。在今天的中國社會，我們面臨的不是同樣的社會潰敗的問題嗎？誰能說這和文革思維沒有關係呢？

其實在「文革」前，這種揚惡抑善已經呈現，而且滲透於社會的每一個細胞。比如一個班級，已經分出了積極分子和落後分子。這種分野，不是以學習和道德為標準，而是以思想「紅」否論英雄。班級的團支部對那些學習刻苦努力而不關心政治的學生的「幫助」，其實就是一種優越感驅使下的「整」和「鬥」，只不過整鬥的形式比較溫和罷了。在這種「幫助」下，被「幫助」者心理上的尊嚴感喪失殆盡，或者「幡然悔悟」，或者一蹶不振，或者畏首縮腦。而那些團幹和骨幹，則在班級中占盡話語權，有的以至盛氣可凌人。其實，關心同學進步大多只是外表，優越感和嫉妒心倒是實質。

至於「文革」中被打死的張九崗、李成柱，被打傷的蔣寶山、馮拉科、潘佩經、董銀明，和打人殺人者並沒有血海深仇，甚至從未謀面。打人殺人的那些人，也並非真正憎恨他們什麼或者捍衛著什麼，基本上是一種無厘頭的「多數人的暴力」，一種起鬨和邪性。……

對於「文革」，我在經常反思。反思是對信仰、信念的顛覆，這種顛覆令人痛苦。但顛覆建立在假惡醜上的信仰，再痛苦也得顛覆。

李金田對個人作用、個人責任的反思，和我們在前言中所討論過的「平庸的惡」是一個道理。其實關於對文革的責任，郝鼎丞認為即使は中央，也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責任：

當時的黨中央領導不是只有毛主席一個人，決議是表決過的，為什麼其他人沒有站出來提出反對意見？不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只有毛主席錯，自己都對，那時正確的都去哪裡了？這是一個需要認真回答的問題。

豈止如此，後來對文革的研究都討論到周恩來的責任、劉少奇的責任等等。比如，鄧小平就說過，如果沒有周恩來，大家受的苦就更多，但是如果沒有周恩來，文化革命可能也搞不起來。很多研究者都納悶，劉少奇當時有著和毛澤東叫板的實力，但是他為什麼逆來順受呢？吳迪在我們前言中提到的討論會上提出了歷史的假設問題。他說歷史應該假設，否則我們永遠學不到應得的教訓。比如，如果在一開始批判彭羅陸楊的時候，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朱德、彭真聯手起來反毛，他們並不是沒有勝算的可能。⁵但是他們沒有做。結果自己成了助紂為虐的幫兇，共犯結構的一個分子。這和我們在前面講過的黨的組織基礎與路徑依賴是有很大關係的。他們本來可以拿著憲法和黨章與毛澤東論理。但是他們沒有做。當劉少奇在手裡拿著憲法和紅衛兵講理的時候，是否感到自己這樣做，有點太晚了呢？毛澤東當時也拿著黨章和憲法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說一個不讓他參加黨的會議，一個不讓他發言。既然大家都知道有黨章、有憲法，為什麼不去實行呢？同樣的問題，我們也可以問今天的中央領導。有憲法，為什麼不實行呢？

⁵ 見前引「歷史學者座談《毛澤東最後的革命》」。

老百姓或許有平庸的責任，但是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責任是更大的。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都以帝王的方式和權術統治中國的時候，黨章和憲法都成了擺設，成了選擇性使用、為我所用、統治老百姓的工具。郝鼎丞就認為：「中央領導也怕毛澤東，所以才給了他這個舞臺。咱們是遵循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導去做了」。所以，說到責任，或許所有的中央領導都無法逃避。

如果路線鬥爭、權力鬥爭都是正常的，那麼我們需要制訂的是一個鬥爭的規則。對此，正如對文革一樣，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大家都有責任。

文革思維的一個現實案例

但是要想做到這些，就必須拋棄文革思維。我們在前言中，談到了文革思維的三個特點，一是不講事實，二是只有階級鬥爭的邏輯，沒有其他邏輯，三是對階級敵人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我們在這裡想引用羅援將軍的例子來說明這個思維方式在當代是如何運作的。羅援是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部副部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常務理事兼國際軍事分會會長、少將軍銜。《長江日報》記者訪問了羅援，請他談論在參觀了羅馬尼亞後的觀感：⁶

另一邊有一條弧形走廊，也就是骨灰牆，擺放的都是原羅馬尼亞中央委員的骨灰，「我去的時候，這些骨灰全沒了，被清理了，不允許擺在那。」

6 《長江日報》，「羅援：『自由民主派』若得勢，共產黨人連骨灰都難留」，中華網，2015年9月27日，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50927/20474762_all.html#page_2，上網日期2015年10月21日。

這給了羅援一個啟示，「如果讓所謂的自由民主派得勢，倒楣的是老百姓。這表面上看是一場民主的革命，實際上也是血雨腥風，最後共產黨人連骨灰盒都不能留下，這說明有了他們的自由，就沒有另外一些人的自由。」

這兩段話很短，但是給我們清楚地揭示了事實、邏輯和鬥爭方式的文革思維。首先，假如羅援的描述是真實的，那麼「連骨灰盒都不能留下」的是那些中央委員，而不是羅援在第二段話裡似乎想讓人相信的是所有「共產黨人」，或者「老百姓」。中央委員和所有共產黨人以及老百姓不能畫等號。這不是事實。而且即使「不允許擺在那」，或許是被親戚另找地方存放了。所謂「全沒了」是什麼意思呢？是扔掉了呢，還是被親戚朋友取走了呢？羅將軍想讓我們相信是扔掉了。但是他顯然沒有搞清楚事實到底是什麼，而是主觀認定哪些是、哪些不是事實。這和本書中所描述的文革中的做法是一模一樣的。

再者，從邏輯上講，如果羅馬尼亞共產黨真的死無葬身之地，那並不意味著一旦民主化後中國共產黨也死無葬身之地。在同一篇文章中，羅將軍自己說別人的鞋不見得合自己的腳。那麼羅馬尼亞的鞋怎麼就一定合中國的腳呢？蘇聯的鞋怎麼就合中國的腳呢？顯然，邏輯在他那裡是為我所用的。也就是沒有其他邏輯，只有階級鬥爭的邏輯。

第三，他說的「血雨腥風」就是和持不同意見的人之間的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文革思維、階級鬥爭思維。民主的原則之一恰好是不要暴力，而是要和平的遊戲規則，否則不是真民主。只有文革思維才會將民主看作文革式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

羅將軍簡單的兩段話給我們揭示了文革思維的當代表現：罔顧事實、

罔顧邏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連羅將軍這樣位高權重、博識多聞的人都這樣思維，可見在體制內以及體制外，有多少人會有類似的想法。聯想到連「妄議中央」，不與中央保持「絕對一致」，就要被繩之以黨法，或者國法，這「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⁷要消除文革思維，何其難也！

結論

本書的主標題「平定縣裡不平定」，是模仿了一副對聯的句式。據說解放初平定的一位政協委員，在1937年日軍入侵平定時逃往河南新鄉避難，寫了一副對聯：「只因平定不平定，才把新鄉做新鄉」。我們改為「平定縣裡不平定」。我們在第一章裡也敘述了「平定」這個地名來源於宋太宗建立的用來討伐北漢的「平定軍」。所以「平定」又和「不平定」在歷史上就有淵源。

我們的主標題也是模仿了文天祥（1236-1283）「惶恐灘頭說惶恐，伶仃洋裡歎伶仃」的句式。或許我們現在討論文革，無論是起源也好，還是紅衛兵的發動、兩派鬥爭、暴力，還是文革對個人、對社會的影響及其對我們今後的政治和社會發展的啟發，我們總是也有些「惶恐」，因為一來我們感到我們對文革還不能說是已經完全瞭解，我們可以肯定還有很多遺漏。我們手頭還有一些材料，由於篇幅所限，不能盡錄。二來限於我們自己的能力，或許還不能夠對文革做到完全公允的評價。我們畢竟是文革的過來人，「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所以「惶恐」之感油然而生。當然，文革過來人談文革、寫文革也有好處，就是對文革那些事我們還有所記憶，事實上不會有太大的出入。假如等後人來寫的話，就不敢保證沒有以假亂真的情況了。但是，畢竟我們的識見有限，本書肯定還有不

7 見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66年8月5日，載於《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0805/2563.html>，上網日期2015年10月25日。

少瑕疵，希望讀者批評，以利將來有機會再做修改。

另外我們也有「伶仃」之感。作者之一最近曾經有機會去參觀了珠海和香港之間的伶仃島，看到了一片繁華、和平的景象。但是有多少人會想到近一千年前，南宋的官兵被元軍追到廣東這塊地方，沒有地方可以再逃，文天祥被俘，發出了上述「過伶仃洋」的感歎的情況呢？文革剛剛結束才 40 年，有多少人還會記得文革、瞭解文革的悲劇，知道要汲取文革的教訓？即使有，這些人不是也倍感「伶仃」嗎？

即使正如文天祥在同一首詩裡所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多少可以給自己一些安慰。或許我們無論是哪一派，無論是支持毛主席還是支持劉主席、鄧（軍委）主席，都是為了中國好，都可以「留取丹心照汗青」。

但是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避免我們在第一章開頭所引述的金朝的趙秉文（1159-1232）在平定縣西郊村韓信廟（見下圖）的題詞中所說的，「興劉業就人何在，破楚名存事已空」的悲劇呢？難道我們還要讓「古壘帶煙餘殺氣，荒祠向晚動悲風」嗎？為了不讓社會「空」轉，讓人們承受那個「空」轉所帶來的沉重的後果，為了去掉那猶存的「殺氣」，讓平定以及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平定」起來，減少鬧劇，減少荒唐劇，更不要悲劇，我們或許真得應該牢牢汲取文革的教訓。應該反思文革，儘管有很多困難。



趙秉文為之題詞的平定縣西郊村的「古壘帶煙餘殺氣，荒祠向晚動悲風」的韓信廟

資料來源：郝志東、郝志剛（著）《西郊村》，第 315 頁。

附 錄

人物小傳

(以姓名的漢語拼音為序)

蔡守惠（1923-1997），山西平定人，文革時任平定中學黨支部書記。「文化大革命」時被罷官審查，挨批鬥，1969 年平定中學革委會成立後任第一副主任（主任空缺）。1972 年調縣文教辦公室任主任，後任平定醫院黨支部書記、縣委宣傳部長、縣文教局長。1984 年退居二線，後離休。他早年參加革命工作，1948 年南下，任湘潭縣委秘書，後因身體不適調回家鄉。曾任平定四區區委書記、縣委宣傳部副部長。1957 年任平定中學校長，同年被任命為平定中學黨支部書記至文革。

陳元才，六〇年代初大學畢業後到平定中學任教，文革時在平定中學任音樂教師。文革開始後，因曾有所謂「右派言論」而受到教職工和紅衛兵的批判鬥爭，並幾次被下放農村勞動。為免繼續受到人身傷害，曾隻身逃回東北老家，後被學校領導追回，罪加一等，多次因此受到批判。文革結束後，調往太原工作。

董福昌，文革前任東回中學校長。文革中曾任「兵團」司令。1973 年曾短暫擔任石門口公社革委會主任。一打三反期間因為張九崗、李成柱案

住獄，出獄後在平定同意煤礦工作。後在東回老家因煤氣中毒身亡。

董鋼（原名董命長），1947 年出生，山西平定人，文革開始時在平定中學高三班就讀，後任平定中學「紅戰團」總指揮，平定縣「紅總站」副總指揮。文革後在陽泉礦務局四礦上班，後調五礦工程處勞資科，五礦多營公司。

董銀明（1940-2015），山西平定人，文革時在平定縣郵電局參加工作，參加郵電局群眾組織的「紅色郵電戰團」並任戰團司令，也稱「一號勤務員」，在平定縣「兵團」組織成立初期任總指揮。文革後仍在郵電系統工作。

馮拉科，1946 年出生，山西昔陽人，1966 年文革時正值平師學業期滿畢業之際，文革運動開始，順應形勢留校參加文革運動。是平定師範紅衛兵組織「紅司」（兵團派）主要負責人，平定縣「籌委會」委員。文革結束後任縣體委主任，後體制改革，任縣文化體育委員會體育辦公室主任。

高連冬（1920-2001），平定石門口鄉小橋鋪人。1945 年參加革命，歷任平東縣抗日政府六區農會主席、區長，1955 年後歷任平定縣水利局局長、副縣長，1969 年後歷任平定縣生產組副組長、革委會副主任等職。1981 年任人大常委會副主任，1984 年離休。

葛秉臣，1949 年出生，山西平定人，文革時在平定中學高四班就讀，是平定中學「紅指」常委，平定中學「紅代會」主席、平定中學「紅指」文藝宣傳隊隊長。1970 年參加工作在鎖簧機械廠、平定鋼鐵廠，曾任鎖簧機械廠副廠長。

葛東海，又名葛稱意。平定縣上城人。1949 年以前在北京等地以卜卦

為生。1949 年後返家，間或從事舊業，「文革」期間因此受到批鬥。「文革」後死亡。其子即文中所述葛懷義，「文革」後期被捕入獄，後在服刑期間在煤礦事故中死亡。其女嫁給了縣城有名的孫家，現居北京。

郭存華（1912-1991），山西昔陽人，文革前已調入長治市任中共長治市委副書記，文革運動開始時被押回平定打成走資派。文革運動中多次受到群眾造反派組織的批鬥，被關進派出所，失去了人身自由。建國前曾任昔陽縣二區聯防隊長、武委會主任等職；建國後歷任中共太谷縣委組織部長、縣委書記，中共晉中地委委員，榆次縣委書記、平定縣委書記、陽泉市委副書記；文革運動結束後被解放，任晉中地委常委、農工部部長、晉中行署副專員。

郭旭明，1940 年出生，山西昔陽人，郭存華之子。文革時在平定縣化肥廠工作，參加了化肥廠的紅總站群眾組織，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1970 年他父親被解放出來時，他才免於批鬥。之後，他刻苦鑽研技術，並擔任了化肥廠電工組組長，生產技術科長、副廠長、廠長。平定縣工業辦主任職務，1988 年被評為中央化工部勞模，1995 年參與了娘子關二期工程建設。在談起文革時所受到的遭遇時，他說：「娘打錯了孩子，孩子也沒啥怨氣的。」

郝忠德，山西平定人，文革時在平定中學初中班就讀，是平定紅衛兵組織「紅戰團」主要成員，1969 年回原籍西郊村下鄉插隊勞動，後又參加工作在陽泉鋼鐵廠。

郝守映（1945-1999），山西平定人，文革時在平定化肥廠工作，「紅總站」總指揮，參與組織了平定縣「一·二二」奪權。文革結束後仍在化肥廠工作，曾任副廠長，後病故。

賈正杞，1920 年出生，山西平定人，文革開始時任平定縣副縣長。文

革運動中，縣委、縣政府被奪權，賈被打成「走資派」，受到造反派組織的多次批鬥，正如他說：「文化大革命是挨不完的批鬥，請不完的罪，寫不完的檢查，站不完的隊」。曾任平定一區組織專員、八區區委副書記、鎖簧公社黨委書記、平定縣副縣長。文革結束後，任平定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縣委副書記、第七屆人大常委會主任。

荊履榮，1941 年出生，陽泉市石荀咀村人，1957 年加入平定縣晉劇團，任演奏員、導演等職務。文革中為總站常委。文革後 1978 年任該團創作組長、副團長。1984 年調陽泉市藝校，高級講師職稱，2001 年退休。

李成柱（?-1969）文革前為平定供銷系統城關供銷社職工。文革中加入紅總站一派，在紅總站集體撤退昔陽後返家探視，被抓後被打致死。文革後期平反，召開追悼會，恢復了名譽。

李計春，1921 年出生，山西陵川人，1942 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歷任平定獨立七師副連長、新鄉分區獨立營華北補訓十二團、華北部隊一團營長，河北圍場縣、平定縣人民武裝部部長；1972 年—1974 年任平定縣委書記，後任平定縣人民武裝部政委，曾榮獲解放軍獎章、獨立獎章、獨立勳章。

李六孩，1919 年出生，河北井陘人，曾任井陘縣石門村武委會主任、黨支部書記，1946 年任西郊區區委委員，1948 年後歷任區委副書記、區委書記、東回區區長、白羊墅煤炭交易所所長、平定縣稅務局局長、縣委財貿部部長、東回鄉黨委書記等職。1965 年任財貿部部長，1969 年 9 月平定縣革命委員會成立後，任縣革委會政工組組長，1976 年後歷任計委主任、統戰部長，是平定縣第六屆、第七屆政協主席，1984 年退休。

李守珍（1936-2009），平定縣王家莊人。1955 年參加工作，中共黨員。文革時為總站常委。第一學歷中專畢業。早期從事教育事業，曾任小

學教師、中心校長、教研員等職；後調任縣晉劇團編劇、團長，縣文化館館長；後任本縣維社公社黨委書記、縣委宣傳部長；再調任晉中地委宣傳科副科長、晉中地區晉劇團黨支部書記；又調任平定縣委宣傳部副部長、縣文聯主席（兼）、縣文化局長；再調任陽泉市藝校主任、校長。

李鎖壽，2004 年去世。1967 年任昔陽縣大寨公社南壩大隊支部書記，1975 年任平定縣委書記。《人民日報》記者著文稱其為「社會主義實幹家」。在平定期間遵循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打擊了他認為是重副輕農的資本主義思想，打擊了任何對大寨略有微詞的人，製造了岳增壽的冤案。但是人們通常認為是他解決了平定的吃糧與吃水問題。

李田柱（1937-？），文革前為化肥廠、化肥機械廠木樣工，文革中任兵團總指揮，因為張九崗、李成柱案被判刑，住獄之前已調陽泉煤管局經理部任副經理，出獄後到南莊煤礦工作。後病故。

梁子銘，1952 年任縣文教科長，1956 年任縣委秘書，1958 年任縣文教部副部長，1959 年任陽泉郊區委員會辦公室主任，1961 年任平定縣委辦公室主任，1967 年為平定縣核心小組成員，1975 年任統戰部長，1976 年任文化局副局長，1981 年任縣科委副主任。

劉懷祿，1936 年出生，文革前任縣團委副書記。文革中任兵團副政委。1971 年到 1972 年曾擔任縣革委政工組副組長。一打三反運動中因張九崗、李成柱案入獄。出獄後到供水局工作。

劉維忠，1944 年出生，山西平定人，文革時在平定化肥廠工作，參加「紅總站」所屬的化肥廠群眾組織。曾任化肥車間團支部書記、廠團總支委員。

劉振傑，1947 年出生，山西平定人，文革時在平定中學高三班就讀，是平定中學「紅指」常委、宣傳部長，平定中學「紅代會」常委、平定縣

「紅代會」委員，1976 年揭批清運動中被審查批判，1980 年平反。1970 年參加工作在縣印刷廠，1986 年後調平定縣礦業公司，在首飾廠、礦業公司、鄉鎮物貿經理部工作，歷任首飾廠廠長、礦業公司辦公室主任、工會副主席，物貿經理部黨支部書記、經理、工會主席，2003 年退休。

劉志義（1927-2011），山西平定下馬鄉頭人。1949 年前在平西、平東縣政府工作，後為山西省公安廳副科長，1962 年調返平定任公安局副局長。1967 年任平定縣核心小組成員，1969 年平定縣革命委員會成立時任副主任、1972 年任平定縣醫院黨支部副書記，1973 年任平定縣公安局局長。1975 年任縣委常委，1977 年任縣革委副主任，1981 年任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1987 年縣政協副主席，1991 年離休。

牛增福，1939 年出生，山西平定人，1964 年參加工作。文革時在平定化肥廠工作，參加了化肥廠和平定縣「紅總站」群眾組織，任「紅總站」第一軍軍長和「紅總站」副總司令。文革結束後，他刻苦鑽研技術，研製成功焦炭粉電礮、石油支撐劑、不燒渣磚等多項小改小革，任車間組長、生產主任、生產科長、副廠長。

潘佩經，1947 年出生，山西平定人，文革時在平定中學高三班就讀，是平定中學「紅指」群眾組織的總指揮，平定「兵團」副總指揮，平定縣「紅代會」主任。1970 年參加工作，在縣高壓電器廠，任高壓電器廠監事會主席、技術科長，工程師。1976 年清隊運動中被審查。1981 年之後研製成功了「高溫強度碳化矽墊片」，並在全國範圍推廣，榮獲山西省科技成果三等獎，山西省三等功。同時編制了「陶瓷、電瓷用碳化矽窯具」技術標準，並被山西省標準局確定為山西省地方標準，獲山西省優秀標準二等獎。1987 年之後，又研製成功了「碳化矽硼板」、「金鋼砂水洗及工藝設計」等多項技術成果，並獲得了省、市、廳評選的「優秀產品」獎、「科

研成果二等獎」、「省重大技術難題攻關優秀成果獎」等，這些優秀技術成果被編入了《中華英才大典》一書。

戎崇璽，1949 年出生，山西平定人，文革時在平定中學高三班就讀，是平定中學「紅戰團」主要成員，文革後插隊下鄉。後參加工作在陽泉供電分公司，曾任陽泉供電分公司審計科長，郊區供電局副局長、審計科長、變壓器廠廠長。

史文華，1963 年畢業於平定師範學校，留平師附小任教，文革後調陽泉郊區蔭營中學教師、陽泉市郊區區委辦副主任、統戰部長，陽泉市郊區環保局黨支部書記，曾當選陽泉市政協委員。

王增榮，1925 年生，平定縣鎖簧鎮南莊村人。1954 年到平定糧食局工作。1960 年任該局副局長。1969 年任該局革委會主任，1976 年改任該局局長。1984 年退居二線，1991 年離休。

魏德卿，1964 年畢業於平定師範，之後任平定師範附小老師，文革前即到平定小報做記者、編輯。文革中為機關東方紅戰鬥隊隊長，籌委會委員，革委會的秘書處秘書，兵團派。文革奪權之前任縣委辦公室秘書，奪權後任核心小組秘書，後又到鎖簧鎮任公社黨委副書記。1979 年之後到晉中地委農工部、行署農委任辦公室副主任、地委委員、副秘書長、秘書長、地委常委。1992 年任陽泉市常務副市長，1996 年任副書記，及副書記兼市長。1998 年後曾任山西省審計廳廳長、黨組書記、當選山西省第九屆人大代表和全國第九屆人大代表、省人大財經委副主任。

閻扣成（1919-1994），山西昔陽人，文革時任平定縣核心小組組長、縣委副書記，革命委員會主任，縣長。文革後任晉中地區外貿局局長，供銷社黨委書記，中共晉中地委外貿部部長。曾任昔陽縣委宣傳部幹事、昔陽二區區委副書記（1950）、書記，平定縣六區區委書記（1951-1952），

平定縣委宣傳部長、組織部部長（1953）、左權縣委副書記、縣長（1952-1962）、內蒙古林西縣委副書記、縣長職務（1963）。1983年離休。

楊乙榮，1936年出生，江蘇儀征人，1950年代由北師大附中考入北師大物理系，並被錯劃為右派（1979年改正），1958畢業後到平定中學任教，文革時因其曾有「右派言論」而受到批判鬥爭，並幾次被下放農村勞動。文革結束後歷任平定一中教師、副校長、校長。1989年調任平定師範學校副校長，曾被評為山西省模範教師（1979年），山西省特級教師。曾任平定縣第七、第八、第九屆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十屆人大代表、政協陽泉市第八屆委員會委員。

楊志忠（1927-1975），山西平定人，1958年曾任陽泉市團委副書記，後在晉中當過團委負責農村工作的部長、廣播局副局長。回平定後曾任平定縣張莊公社黨委書記（1962-1965）、平定縣副縣長（1965-1967）。1967年3月28日奪權後，他任平定縣核心小組組長，是最早被解放並參加奪權的幹部之一，兵團派。1969年9月兩派實行大聯合，成立了「三結合」的平定縣革命委員會，楊志忠縣委常委，副主任，一直到1973年，後病故。

岳萬壽，1931年出生，文革時在縣稅務局工作，並參加政府機關群眾組織的「東風戰鬥隊」，1951年參加工作，曾在縣稅務局、基層稅務所工作，任縣國稅局副局長。

岳增壽，平定古貝人，中共黨員，曾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復員後在平定縣廣播局工作。因給中共中央領導人寫信反映大寨虛報糧食產量等問題被捕入獄，遭遇非刑。後因《光明日報》記者發表長篇通訊〈太行奇冤〉平反出獄，任平定律師事務所律師，退休後病故。

岳智明，1947年出生，山西平定人，文革時在平定中學高三班就讀，

是平定中學「紅指」政委，平定縣「兵團」常委、平定縣三結合「籌委會」常委。1976 年揭批清運動中被審查批判，1980 年徹底平反。1970 年參加工作後在同意煤礦、化肥廠、馬車社當工人、縣工交局任團委書記。1979 年調陽泉建工局建築安裝工程公司，後又調建工局、城區政府、城區環保局工作，歷任城區政府秘書、工會副主席、組織部副部長兼老幹局局長、環保局局長、城區政協副主席職務，2008 年退休。

翟高山（1917-1975），山西平定人，山西省勞動模範。曾任平定縣古貝鄉牛角溝村農業社社長、黨支部書記。1953 年，響應政府號召，辦起了農業合作社，大力發展集體經濟，當年糧食畝產局全縣之首。他帶領群眾利用荒山野窪種植蘋果樹，年產量 45 萬斤，號稱「蘋果大王」，他「以林養木、以牧促農、三者並舉」，使牛角溝成為全縣農林牧全面發展的典型，他曾九次被評為「山西省勞動模範」。文革中受到衝擊。

翟全臣，山西平定人，文革時在平定中學初中就讀，參加平中「紅戰團」紅衛兵組織，任常委、作戰部部長，文革結束後回村務農。

翟治璧，1939 年出生，山西平定人，文革時在平定縣政府人事局工作。1955 年參加工作，曾任古貝公社副主任、黨委副書記，縣公交部統計員、縣經委副主任，縣體改辦主任，縣總工會主席。1996 年退居二線，2000 年退休。

張福林，山西左權人，文革時為平定中學教師，1959 年參加工作，先後在北京 105 中學、平定城裡小學任教。1964 年調平定中學，擔任高中政治課教師，後任黨支部書記、副校長、工會主席。文革初期受黨支部書記蔡守惠的委派與高三班學生董成科去北京瞭解文化大革命的動向，當時，有教師和學生稱其是「鐵杆保皇派」，他卻說「我是尼龍杆保皇派」。

張光輝，1924 年出生，河北赤城人，1966 年至 1968 年任平定縣人民

武裝部部長。1941 年參加八路軍，歷任晉察冀軍區獨立團戰士、文書、三縱八旅參謀，六十五軍司令部參謀、副團長，河北省萬全縣、懷安縣人民武裝部部長。

張瑾瑤（1925-1988），山西平定人，1948 年參加解放軍，1952 年轉業，到岔口鄉紅育口小學任小學老師。1967 年「三結合籌委會」成立後任常委，1969 年平定縣革委會成立時任副主任。在多年的執教生涯中，帶領學生搞勤工儉學，解決辦學費用問題，被譽為「紅色的山鄉教師」，1964 年中國平定縣委號召全縣人民向優秀教師張瑾瑤學習。他多次被評為省、地、縣先進工作者，1971 年後歷任縣委委員、縣委文教部部長、縣委常委、縣革委會副主任。還曾任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教育學院理事、山西省第四屆政協常委、平定縣第六、七屆政協副主席。張瑾瑤認為文革兩派鬥爭就是權力鬥爭，就是「你呀上去，我呀下來」。

張九崗（1920-1969），平定縣張莊鎮寧艾村人。中共黨員，高小文化。1945 年參加解放軍，1948 年退伍，文革前是城關鎮負責鎮營企業的幹部。文革中被抓後被打致死，文革後期平反，召開追悼會，恢復了名譽。

張啟傑，1938 年出生，山西平定人，文革時在平定縣商業局服務公司工作，參加了縣商業系統「財貿兵團」群眾組織，任常委，文革結束後任商業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政工組組長。

張有貴，1925 年出生，山西平遙人，文革時任平定中學副校長，1972 年後任平定中學革命委員會主任，後改任校長，1981 年任黨支部書記。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鬥。

趙成秀，1940 出生，昔陽人，文革前為平定師範附小老師。文革中參加了總站的一些活動。在一打三反中受到批判。文革後任職平定教育局副

局長。1990 年以後擔任平定報總編。退休後寫了大量的回憶文章，本書多有引述。

趙岐山，1964 年平定師範畢業，任平定東關學校教師、副校長。文革時任總站常委。1976 年任平定師範黨政辦公室主任。1978 年任陽泉新華小學校長。1987 年後任陽泉城區教育局局長，1997 年任陽泉二中校長。曾任陽泉市城區第九屆、第十屆人大代表，陽泉市第十一屆人大代表，山西省第八屆人大代表。

鄭忠華（1924-1998），山西昔陽人，文革時任平定縣委副書記。文革運動開始，縣委、縣政府被造反派奪權，鄭被打成「走資派」，受到造反派組織的批鬥，在縣政委茶爐房燒鍋爐，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曾任昔陽縣委秘書、中共晉中地委農工部部長、中共平定縣委農工部部長、縣委副書記、平定縣第五屆政協主席。1970 年恢復工作後任縣核心小組成員，1973 年任縣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1975 年調任晉中地委農工部副部長，1982 年離休。

鄭子英，1932 年出生，山西陽泉人。文革時任平定縣副縣長，文革運動中被打成走資派，受到造反派的批鬥，有一次在大寨的婦女會議上因重複了張子義的一句話「就好像旗杆上長了蟲蟲，大寨也有缺點」，就在回平定的路途中被鬥挨打。她於 1949 年畢業於陽泉衛生學校，曾任平定縣固驛舖區婦聯主任、岔口婦聯主任、平定縣婦聯委員、中共平定縣農工部幹事、岩會鄉鄉長、陽泉市郊區婦聯會副主任、主任，平定縣婦聯會主席、副縣長。文革結束後，任手工業管理局黨支部副書記、副局長，平定縣財貿政治部副部長、部長、副縣長。1981 年任平定縣革委會副主任、副縣長，1984 年任平定縣第七屆政協副主席，第三到第八屆縣人大代表，1991 年離休。

朱存業，1936 年出生，山西平定人，文革時在縣文化部門工作，其間任縣文化系統群眾組織負責人。長期從事文學創作。其作品有《古州散記》、《散文集粹》、《華夏紀行》、《走進臺灣》等多部作品。他是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中國作家協會山西分會會員。

朱永，1926 年出生，山西平定人，文革時任平定縣縣長、縣委副書記；文革時被打成「走資派」，受到批鬥，在患病住院期間，仍然被抬到平定劇院批鬥。他被打成走資派後，人去看他時，他伸伸懶腰說：「權被奪了，沒事了，不讓幹嘛，還不讓看？」他曾任平定縣二區區委書記；中共平定縣委農工部部長、公社黨委書記、副縣長、縣長、縣委副書記。文革運動結束後，獲得解放，任中共孝義縣委副書記、書記，呂梁行署副專員。

左治貞，1925 年出生，河北臨城人，1947 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曾任河北臨城二區分委委員、四區區委副主任，邢台軍分區政治部幹事、軍事科參謀，清河縣、高陽縣人民武裝部第二政委，平定縣人民武裝部第二政委。1969 年 9 月平定縣革命委員會成立時任「革命委員會主任」、中共平定縣委書記，後調平遙縣人武部第一政委、中共平遙縣委書記。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平定縣裡不平定：山西省平定縣文革史 / 郝志東, 黎明著. -- 初版. -- 臺北市：致知學術, 民106.01
冊； 公分. -- (當代中國研究. 二；9)
ISBN 978-986-5681-73-9 (全套：平裝)

1.文化大革命 2.歷史 3.山西省平定縣

628.75

105023466

當代中國研究（二）09

平定縣裡不平定：山西省平定縣文革史（下）

No Peace in a County Named "Pea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Pingding, Shanxi

作 者／郝志東、黎明

執行主編／李佳燕

封面設計／陳宜伶

美編排版／菩薩蠻

發 行 人／陳俊彥

出 版 者／致知學術出版社

公司地址／思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地 址：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53號8樓815室

電 話：(02)29490172

傳 真：(02)29490161

電子郵件：service@tec2c.com

出版日期／民國 106 年 1 月 初版一刷

定 價／新臺幣 920 元（上、下冊不分售）

感謝澳門大學支持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平定縣裡不平定：山西省平定縣文革史(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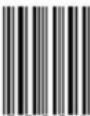
No Peace in a County Named “Pea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Pingding, Shanxi

2016年是文化大革命開始50週年、結束40週年。這個革命導致了約200萬人非正常死亡，讓近七億人生活在動盪之中。這個被稱為「史無前例」的大事件，以及它所彰顯的「文革思維」，至今都在制約著中國的發展。於是，研究文革的機理，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但是迄今為止的文革研究，通常集中在對大城市、大人物的研究上，很少有對基層文革、對小人物的研究。本書所探討的縣域文革以及在其範圍內活動的大、小人物在文革中的思想、行為與命運，他們與在全國發生的大事件的聯繫，對我們研究文革的機理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本書不光填補了一項文革研究的空白，其立足點和寫作風格對文革過來人以及後來人了解文革、了解中國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ISBN 978-986-5681-73-9



9 789865 681739 0 0920



致知學術出版社
<http://www.tec2e.com/>